胜道

土地革命战争经典战例

tudi geming zhanzheng jingdianzhanli

张社卿 李涛◎编著

人民军队历史上100个经典战例



军事科学院专家作品

中国文史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作者介绍



张社卿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军事术语与军事志研究室主任，大校军衔。军事学硕士。1967年出生于河南渑池，1983年入伍。历任排长、指导员、股长、副处长、处长、协理员、副部长等职。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2008年被总政治部表彰为“全

军优秀党务工作者”。先后参与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和理论专著、教材、军事法规的编写与起草工作。



李涛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军事术语与军事志研究室副主任，大校军衔。军事学博士。1970年生于山东济南，1989年入伍，荣立三等功3次。从事军事科研工作二十年来，先后参加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纂等重大课题，出版了20余部共计360余万字的军事著作。

胜道

土地革命战争经典战例

tudi geming zhanzheng jingdianzhanli

张社卿　李涛 ◎ 编著

人民军队历史上100个经典战例



军事科学院专家作品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人民军队历史上100个经典战例丛书》编委会

主　笔：张社卿　李　涛

参与编写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国瑞　王雅夫　刘　帆　胡　轶

胡景峰　李欣　李崇智 吴佳熹

吴建业　陈永红　张少宏　南卫华

寇军强　梁毅雄　牛随前　王丽荣

张金英　章世森　胡　博　刘　璇

李砺寒　徐树森　慕小明

前言

道者，法也，事物之规律。胜道，取胜之道，胜战之法也。

清朝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曾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要掌握社会发展的“大道”，就应首先研究蕴含着社会发展“大道”的历史。只有以史为鉴，才能知史明智。故凡欲治国安邦者，必先追寻历代为政者的治国之道；凡欲克敌制胜者，必先探求各国为将者的驭战之法。

众所周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武装斗争中诞生，在浴血奋战中成长，至今已经走过了87年的辉煌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挥下，这支军队展现出一切剥削阶级军队从未有过的风貌，冲破艰难险阻，纵横山河疆塞，历经磨难，百炼成钢。人民军队战胜了一个个强敌，创造了无数个奇迹，书写了一部气势恢宏的英雄史诗。其间经历过大大小小上千次战役战斗，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黄洋界保卫战、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大捷、广阳伏击战、百团大战，从解放战争时期的苏中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三大战役，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这一个个经典战例，一个个战争奇观，汇成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弱转强的发展壮大史，令人津津乐道，叹为观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只有熟悉历史、读懂历史、借鉴历史，才会认清昨天、珍惜今天、放眼明天，不会为浮云遮望眼；才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军队，不会迷失政治方向；才会以史鉴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会在前进的行途中走弯路。

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兴衰史告诉我们：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需要与之匹配的军事力量去守护，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快、走得更远。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这是基于对世界强国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基于对我国安全和发展形势的清醒研判、基于对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痛苦反思、基于对我军建设差距的强烈忧患。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当前，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浪潮席卷下，战争形态、作战样式、战斗力生成模式等正发生

着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对我军实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一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学习研究人民军队的战史，尤其是经典战例，就要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审视，用辩证的眼光加以剖析，更好地把握治军规律、带兵要则、指挥方略，不断提高驾驭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能力，真正做到能打仗、打胜仗。这也正是编写《胜道——人民军队历史上100个经典战例》丛书的初衷。

本丛书共分四部，分别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四个历史时期，撷取了具有鲜明代表性的100个人民军队经典战例，其中既有进攻战，也有防御战；既有围歼战，也有阻击战；既有攻坚战，也有奇袭战；既有伏击战，也有遭遇战；既有追击战，也有突围战……这些战役战斗，或集中优势兵力，或以少胜多；或以逸待劳，或长途奔袭；或运筹帷幄，或决胜千里。无不体现出指挥者的胆大心细、神机妙算、英勇果敢，闪耀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智慧光芒。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林林总总的战役战斗，根本无法穷尽人民军队所创造的石破天惊的经典战例、所书写的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所孕育的凝心聚魂的战斗精神，只是力图运用权威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以记实的手法和生动的语言，崭新的视野和独到的见解，还原历史真相，讲述传奇故事，展现雄才大略。

由于作者水平及查阅资料等因素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一批历史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得到了军事图书资料馆等单位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并由军事科学院彭玉龙研究员进行审读把关，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宣传部包国俊副部长、中国文史出版社张蕊燕主任为丛书的最终付梓作了艰辛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张社卿 李涛

2015年6月

目录

作者介绍
《人民军队历史上100个经典战例丛书》编委会
前言
龙源口战斗
黄洋界保卫战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双桥镇战斗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黄安战役
商潢战役
苏家埠战役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突破乌江
四渡赤水
嘉陵江战役
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
包座战斗
腊子口战斗
吴起镇战斗
劳山战役
直罗镇战役
乌蒙山回旋战
东征战役
西征战役
山城堡战斗
主要参考书目
声明

龙源口战斗

【交战时间】1928年6月22～23日

【交战双方】红4军第28、29团和第31团1个营；江西国民党军第9师第25、26、27团。

【指挥将领】毛泽东、朱德；杨池生

【战果】红军歼敌1个多团，击溃2个团。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古城。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位于江西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酃县之交，总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山高林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而且在大革命时期建立过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并有一支由共产党员袁文才和旧式农民武装首领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秋收起义失败后，在文家市召开的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力排众议，主动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计划，转战井冈山地区，正是基于以上考虑。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抵茅坪，随即经湖南省酃县水口镇转至江西省遂川县境，于27日进至茨坪。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农革命军在周围各县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收编了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将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团，并攻占了茶陵、遂川县城，建立了两县工农兵政府和赤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群众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

1928年1月下旬，江西国民党军朱培德部第9军第27师第80团和第79团1个营，由吉安进入泰和。第79团1个营经永新推进到宁冈新城，在当地靖卫团的配合下，企图对井冈山地区实施“进剿”。新城是宁冈的县城，也是井冈山北面的大门，自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的威胁。

2月，毛泽东率部由遂川返回井冈山，积极进行反“进剿”斗争准备，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

18日清晨，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第1、第2团主力乘晨雾发起新城战斗，全歼守敌1个营，俘虏近300人，并攻占宁冈县城。这是井冈山革命军民对敌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第一次“进剿”。随后，工农革命军占领宁冈全境、遂川北部和永新、酃县、茶陵各一部，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

4月24日，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及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这就是光照千秋的井冈山会师。

当时在场的何长工回忆道：

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会见地点是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一到砻市，得知朱德、陈毅住在龙江书院，顾不上一路征尘，立即带领干部向龙江书院走去。朱德同志听说毛泽东同志来了，赶忙与陈毅、王尔琢同志等主要领导干部出门迎接。我们远远看见他们，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朱德同志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近书院时，朱德同志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儿，他们的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又是那么深情。毛泽东同朱德同志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月下旬，江西国民党军第31军（由第9军改称）第27师第79团主力由永新推进龙源口，第81团由遂川向永新拿山移动，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4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击破战斗力较弱的敌军。

月底，第28团第1营营长林彪奉命驻守五斗江一带。但当1营赶到时，敌军已抢先占据了五斗江以北的制高点，形势十分危急。

时任1营2连党代表的唐天际后来回忆道：“我们被包围了。天正下着大雨，林彪迅速集合队伍。他命令我们2连上。我们冒雨冲上山去，把敌人打垮了，乘胜追到夏场。这一仗歼敌第81团大部，占领了永新。”

第4军乘胜追击，在永城附近又击溃了第79团的1个营，一举攻占永新县城，第二次反“进剿”斗争取得了胜利。

然而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5月中旬，江西国民党军第31军第27师和第3军第7、第9师各1个团，再占永新城，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进剿”。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工农革命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草市坳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由永新西进的第79团，击毙团长刘安华。随后乘胜追击，第二次攻占永新县城，并歼守军第27师师部和第9师第27团1个营。第27师师长杨如轩也被击伤，带着残兵败将抱头鼠窜。国民党“进剿”军各部都知道了工农革命军的厉害，惊恐之下，纷纷退缩自保，当起了“缩头乌龟”，第三次“进剿”遂被打破。

败军之将杨如轩在50年后回忆起此次惨败时，曾写下一首诗：

三十余年一梦空，永新附逆妄交锋。

那堪旗鼓未成列，已报弹花满市中。

飞将白天突兀扑，两杨无计把身容。

一团劲旅平中国，豪言铭心服总戎。

在一连取得三次反“进剿”斗争胜利后，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县茅坪召开，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以袁文才为主席的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边界各县普遍建立了赤卫队，各区、乡建有工农暴动队，井冈山根据地建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6月，江西国民党军卷土重来，对井冈山发动了第四次“进剿”。“进剿”的主力是江西国民党军朱培德部的第3军第9师和第31军第27师共5个团的兵力。由于杨如轩的第27师在草市坳遭到惨败，此次“进剿”由第9师师长杨池生任总指挥。与此同时，湖南国民党军第8军第2、第3师由平江、浏阳地区调至攸县、茶陵，企图对红4军构成围攻之势。

红4军在得悉这一情况后，主动撤出永新、砻市地区，退回根据地中心区域宁冈。在茅坪，前委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决定此次反“进剿”作战方针是对湖南之敌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消灭江西之敌，命令第28、第29团和第31团1营、军直属队和第31团机炮连向新城地区集结。同时组织地方武装袭扰进犯永新之敌。

6月中旬，杨池生率部由吉安向永新推进。进驻永新县城后，杨池生便将指挥部设在永新，急令将各种作战物资向永新集中。

此次进攻，敌人以第9师指挥第25、第26、第27团为第一梯队，

向龙源口、新城方向进攻，妄图寻歼红4军主力。以第27师指挥第80、第81团为第二梯队，集结于永新城及其附近地区，除保障后方及补给线安全外，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增强突击力量扩大第9师的战果。

面对敌军重兵压境，毛泽东亲自召开军民动员大会，号召广大军民团结战斗，坚决粉碎敌人的“进剿”。他风趣地说：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工农红军，现在敌人从永新向我们进攻，我们一定要打个大胜仗，“吃掉两只羊”（指江西国民党军第9师师长杨池生和第27师师长杨如轩），让大家高高兴兴地过个端午节。

会后，广大军民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反“进剿”的各项战斗准备。整个井冈山地区斗志昂扬，展现出一幅壮丽的人民战争的图景。

龙源口，位于江西省永新县西南40余里的七溪岭山脚下，依山傍水，是一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在村南的河上，一座古老的石拱桥连接着永新通往宁冈的道路。村北地势平坦，稻田毗连，村庄密集。从龙源口向南过龙源口拱桥，便是巍峨雄伟的七溪岭。

七溪岭有两座主峰，海拔700多米，虽说不高，但坡度陡峻，峭壁耸立，层峦叠嶂，加之荆棘竹木密集繁盛，难以攀登。东面的叫新七溪岭，西面的叫老七溪岭。新、老七溪岭相距六七里路。两峰之间，有山脊相连，如一条蜿蜒长城，横切于永新和宁冈之间。新、老七溪岭上各有一条小路，都是此次敌人进攻的必经之地。由于老七溪岭路远坡陡，很少有人行走，破败的小道完全湮没在荒草乱荆之中，新七溪岭便成为永新通往宁冈的主要道路。

22日晨，第9师兵分两路进犯：一路由第9师师部率第25、第26团，在县保安队分队长李圣斋的带路下，由墩上进驻白口村，准备向老七溪岭进犯。另一路为第27团，由烟阁经秋溪进驻龙源口，准备向新七溪岭进犯。

11时左右，两路敌军分别到达指定位置，敌师指挥所设在白口村。午饭后，敌人向新、老七溪岭方向的高地上派出了警戒。

据此，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4军军委决定，由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率红4军主力在新、老七溪岭阻击国民党军，然后相机转入反攻，求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打破其“进剿”。具体部署如下：

红28团迎击老七溪岭方向之敌，为主攻方向，歼灭老七溪岭、白口村地区之敌后，向龙源口方向发展，会同红29团歼灭龙源口地区之

敌。红29团和红31团1营，迎击新七溪岭之敌。红32团及红29团新兵留守井冈山，并向湖南方向警戒。各县地方武装分头游击，牵制和迷惑敌人。

时任永新县游击大队长的张宗逊回忆道：

朱德同志指挥红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红二十九团在新七溪岭阻击敌人，令红二十八团从老七溪岭向龙源口迂回，抄新七溪岭敌人的后路。我带领永新县游击大队连夜赶往龙源口，配合主力行动。



6月23日，天还没有亮，敌人就开始向新、老七溪岭进发。战斗首先在新七溪岭打响，敌27团沿着山路向红29团发起猛攻。

红29团是由湘南暴动农民自卫军新组建的部队，枪支很少，大多是梭镖。虽然把枪支弹药集中起来顽强抵抗，但也压制不住敌人的火力。加之山路是在狭窄的山梁上，两侧为陡坡险崖，草木丛生，兵力无法展开，密集的队形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部队伤亡很大。

骄横的敌人凭着优势的武器装备，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向红军进行猛烈冲击。红29团在团长胡少海的指挥下节节抗击，边打边撤。很快，敌人就占领了红29团的前沿阵地风车口。

红31团1营为二梯队，按3、2、1连的顺序在红29团后面跟进。不料，3连思想麻痹，认为是二梯队，不会立即投入战斗，没有作任何战斗部署，甚至连警戒都没有派出。结果，红29团向后一撤，3连就和敌人迎面遭遇，只得仓促投入战斗。

战斗打响后，3连长中弹牺牲，其余几个连干部也先后负伤，连队一下失去了指挥。

危急关头，1排长向大复挺身而出，指挥全连顽强阻击。但因地形不利，队形混乱，伤亡太大，又难以发扬火力，一时无法阻挡住敌人的冲击。

疯狂的敌人欺负红军装备差、火力弱，居然以密集的队形，向山上猛冲。战斗中，向大复英勇牺牲，3连终因伤亡过大，没有支持多久，就全部撤了下来。

接近山顶处有一个茶亭，名曰望月亭，红31团1营的指挥所就设在附近。

眼看敌人冲到距望月亭只有200米左右的地方了，突然间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枪声，冲在前面的敌人应声倒地，其余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慌忙停住了脚步。

原来红31团2连利用红29团、红31团3连和敌人激战之际，迅速占领了望月亭西侧小山背一带有利地形，展开兵力，临时挖了些简单的单人掩体和交通壕，因而能够发扬火力，有效地抗击敌人的冲击。

清醒过来的敌人，便集中各种火器一齐朝2连阵地猛烈射击，打得阵地上硝烟滚滚，山石飞溅。在火力掩护下，大批敌人又狂吼着蜂拥而上。

2连越打越猛，顽强坚守阵地。连长身负重伤后，副连长接替指挥。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副连长的膝盖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但仍伏在地上用驳壳枪还击。



红4军军长朱德

激战正酣时，朱德军长手提一支花机关枪（冲锋枪），带着3名警卫员，向望月亭赶来。只见他头戴八角帽，身着灰布军装，腰系皮带，腿上打着绑带，衣袖卷到臂弯，动作十分利索。

一到望月亭，朱德就跳进1营指挥所的工事，命令营长陈毅安：“一定要顶住敌人，不能让他们冲上来。”

陈营长大声回答：“请军长放心，我们一定顶住。”

这时，敌人又再次发起了冲击，2连伤亡逐渐增大。危急时刻，朱德果断命令警卫员投入战斗，协助2连守住阵地。随后，1连也增援上来，用排枪射击敌人，火力集中而猛烈。

敌人冲了半天，也没有攻下阵地，锐气大挫。时正中午，烈日当头，骄阳似火，又闷又热。敌军每人背了两条子弹带、一条米带、一条手榴弹带……爬了半天山，又热又渴，疲惫不堪，攻势逐渐减弱。

敌指挥官见几次攻击虽未能得手，但判断红军的兵力不多且弹药不足，认为拿下新七溪岭只是时间问题，倒不如先休整一下，养精蓄锐，待午后天气凉爽些后再发起进攻，便可一蹴而就。于是下令除前沿部队外，其余士兵在路边休息。

一个个疲惫至极的敌人，放下枪支，解下子弹带，躲到荫凉处横七竖八地躺下来纳凉。战场上顿时安静下来，双方在距离望月亭100米的地方形成对峙。

此时在老七溪岭，红军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原来，按照战前部署，红29团和红31团1个营在新七溪岭负责正面阻击敌人，红28团经老七溪岭迂回敌后，寻机歼敌。由于路程较远，待红28团赶到老七溪岭时，敌人的先头部队已抢先占领了老七溪岭制高点——百步墩。

红军立即组织展开攻击。但战斗进展得不顺利，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连续发起三次进攻，由于敌军地形有利，火力猛烈，红军冲击道路狭窄，兵力不易展开，均未奏效，部队伤亡不断增大。如不尽快控制老七溪岭，不仅红28团站不住脚，还可能使坚守在新七溪岭的红军部队腹背受敌。

这时，红28团听到新七溪岭方向枪声越来越急，并不断向山上移动，显然敌人正在进攻，红军正在后撤。



龙源口战斗旧址

在这大敌当前、处境困难、友邻情况危急的情况下，1营营长有点动摇，向团长王尔琢提出：新七溪岭恐怕失守了，应该向莲花方向撤退，并要求召开营以上干部会研究行动问题。

王尔琢和党代表何长工认为，目前战斗正紧不能开会，新七溪岭还没有失守，不管困难多大，都要坚决按原定计划打下去，否则红军在井冈山就站不住脚，撤退只会遭受更大损失。

考虑到地形狭窄，无法展开较多兵力，发挥红军擅长的近战优势，王尔琢和何长工等人研究决定组织冲锋集群，以猛烈的小集群的连续冲击，突破敌人阵地，打垮敌人。

于是，王尔琢当即指定3营营长肖劲挑选作战勇敢、有战斗经验的党员、班长、老战士和连排长、党代表组成若干冲锋集群。每个冲锋集群20余人，配备以驳壳枪、花机关、梭镖为主的近战武器，隐蔽进入冲击出发位置，并重新组织掩护火力。

这时，新七溪岭枪声虽然异常激烈，但老是停留在山顶上不动，显然敌人的进攻已经被阻挡住了，红28团的指战员们倍受鼓舞。

激战仍在继续。肖劲率领冲锋集群，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利用地形地物向前跃进，很快接近了敌人。就在战士们准备冲击的时候，敌人的重机枪突然开火，严密封锁着冲击的道路。冲锋集群被压制在敌前沿前，无法前进。

战斗中，红军指挥员的模范行动是无声的命令和强有力的政治鼓动，有力地激励着战士们顽强斗志。肖营长虽已负伤，但仍坚持指挥，不下火线。卧在最前面的有位姓彭的班长，带着几名战士向敌人的重机枪摸去。敌人发现了他们，疯狂射击，彭班长的腰上几处中弹。

身旁的战士问：“班长，你负伤啦?”

彭班长忍住剧痛说：“没关系，小声向下传，作好冲击准备，听到口令，不要管敌人火力，只管向上冲!”说完继续匍匐前进，身后的地上洒下了斑斑血痕。

终于，彭班长爬到了敌人的阵地前沿，鼓足全身力气大喊：“冲啊！”后面的战士一跃而起，几个箭步就冲到敌人面前。

短兵相接，红军的优势立刻显现出来。花机关、驳壳枪像铁扫帚般横扫敌人，指向哪里，哪里就倒下一片；刺刀、梭镖闪烁着寒光，杀得敌人人仰马翻。一开始，敌人还想负隅顽抗，但哪能挡住红军冲锋集群一个接着一个地英勇冲击。

敌人渐渐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地向后逃窜，一边跑一边喊：“红军来了，赶快跑啊！”

后面的敌人摸不清情况，也喊着往后跑，争相逃命。山上道路狭窄，又塞满了敌人，本来就拥挤不堪，这么一冲，路上结成了人疙瘩。越往下，人越多，越混乱，到处是一片乱糟糟的喊声……

王尔琢当即命令1营跟踪追击，红军像疾风扫落叶一样追下山去。隐蔽在武功坛一带的红32团2个连和暴动队，也举着红旗，拿着大刀、梭镖、土枪，燃放起鞭炮，突然杀下山，追歼逃敌。

战斗中，红28团3连连长粟裕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当他冲上百步墩制高点阵地后，才发现自己的身边只有9个人，连队主力都落在了后面。

怎么办？是退回去，还是继续追下去？

狭路相逢勇者胜。

粟裕当机立断，留下6名战士控制制高点，接应后续部队，自己带上3名战士，越过山顶，猛追逃敌。

翻过山坳，粟裕发现有百余名敌人猬集在一个山沟里，就立即冲上去，举起手中的枪，大声喊道：“不许动，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

敌人一时蒙了，还没弄清粟裕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就乖乖地缴枪投降。

经过一番血战，红28团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阵地，并一举捣毁了敌军设在白口村的指挥所，转而向龙源口迂回。

这时，新七溪岭激战正酣。敌人虽然只有一个团，但却是杨池生的主力团，装备良好、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他们依托有利地形向红军猛烈射击。

红29团组织几次反击均无效，伤亡也比较大。朱德鼓励大家说："就是剩下一条枪也要打下去，只有打垮敌人才有生路。"随即将机炮连调上来，并亲自向机炮连连长陈龙鹤交代任务，要求看准目标，测好距离，保证首发命中。然后又重新组织了步机枪火力，还从红29团和红31团1营挑选了40名作战经验丰富的官兵组成突击队。

一切准备刚刚就绪，突然听到老七溪岭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朱德等人侧耳倾听，发现枪声正由上逐渐向下发展，判断是红28团发展顺利，于是下令部队开始攻击。

各种火器一齐向敌人猛烈射击，掩护突击队前进。陈龙鹤连长亲自操作，迫击炮首发命中敌指挥所，接着第二发又命中敌人机枪。突击队乘势向前猛冲，却被敌人另外一挺机枪压制无法前进。

多处负伤的红31团1班长马奕富忍着疼痛，利用地形隐蔽接近敌人机枪，突然跃起，双手紧抱敌人的机枪不放，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枪口，壮烈牺牲。

就在这刹那间，突击队员们猛然跃起，高喊着"杀呀"，向敌人扑去。红29团的战士们也挥舞着大刀、梭镖，紧跟着突击队，杀向敌阵。

起初，敌人还在拼命挣扎，妄图稳住阵脚。突然，侧后方枪声大作。原来是红28团和暴动队已向龙源口冲了过来。只见红旗招展，杀声震天。敌人见被红军抄了后路，军心完全动摇，像受惊的兔子，争相逃跑。

红29团和红31团1营追下山来，与红28团会合，将新七溪岭之敌大部围歼。战至下午5时许，战斗胜利结束。此役，红军共歼灭敌人1个多团，击溃2个团，缴枪800多支，并乘胜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国民党军仓皇逃往吉安，第四次"进剿"再次以失败告终。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

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

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

黄洋界保卫战

【交战时间】1928年8月30日

【交战双方】红4军第31团第1营2个连；湖南国民党军第8军第1师2个团。

【指挥将领】朱云卿、何挺颖；吴尚

【战果】红军打退敌人的进攻，保住了井冈山根据地。

龙源口大捷后，红4军抓紧敌军受到重创、一时无法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将各部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一派大好形势。

然而在盲动主义影响下，中共湖南省委对形势变化和敌我力量做出错误估计：过高地估计了红4军的力量和湖南群众斗争的形势，过低地估计了湖南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制订了湖南武装起义计划。

1928年6月26日，湖南省委致信湘赣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同时，信中还特意提出"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前往督阵。

当时，红4军和湘赣边界特委都接受湖南省委的领导，湖南省委的意见就是上级党委的意见。但这一决定明显不符合当时的作战实际情况，让红4军主力向湘南发展，与强硬的湖南军阀抢地盘，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反对或者不执行，就意味着对抗党的领导。

这封指示信令毛泽东左右为难。但事关红4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生死存亡，一向以党的事业为重的毛泽东思虑良久，最后决心力持异议。

6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4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杜修经参加了会议。

会上，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向大家说明红军向湘南发展是不切实

际、不合时宜的做法，最终取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7月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4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出书面报告，详细陈述没有执行省委决议的六条理由，认为“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仍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提出“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



永新联席会议旧址



红4军参谋长王尔琢

永新会议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4军转战于永新、莲花、安福和吉安边境，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这月中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纠集重兵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

次“会剿”。湖军第8军进入永新西南部，等待与赣军会合。

红4军军委决定兵分两路迎战。一路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红28、红29团跨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后方营地酃县、茶陵，而后返回永新，打击赣军；另一路由毛泽东、宛希先、朱云卿率领红31团经拿山打回宁冈，对付即将进入永新的赣军。

13日，红28、红29团攻克酃县，迫使湘军第8军退出“会剿”，返回茶陵。这时，杜修经等人不顾永新会议决议，一味坚持要执行省委命令，乘毛泽东远在永新之机，利用红29团官兵（成分主要是湘南宜章的农民）过不惯井冈山的艰苦生活、想回老家的情绪，企图将部队拉向湘南。

朱德、陈毅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给毛泽东写信，并召开红4军军委扩大会议，阻止红29团返回湘南的行动。

14日，朱德、陈毅率领红28、红29团离开酃县向东开拔，准备回师井冈山北麓的永新。不料，“走了一天只走了30里。士兵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队伍零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到达沔渡后，红29团官兵又闹起来，坚持要回湘南。

为整顿红军纪律和确定部队行动方向，红4军军委在沔渡召开扩大会议。然而，会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最终，返回湘南的意见占了上风。

17日，红28、红29团和军部特务营向湘南开进，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毛泽东收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立即回信，要部队按永新会议决议行事，停止去湘南的行动，并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带着他的信追赶部队。江华回忆道：

我为这事从永新县城跑到酃县县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100多里，找到陈毅、朱德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是在酃县的一个大庙里面，都是干部……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结果挽回不了。

形势的突然变化，立刻使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危险。

果然，24日，红29团在攻打郴州时惨遭失利，一部跑回宜章家乡后失散，一部在乐昌被国民党地方武装胡凤章部打垮，仅剩团长胡少

海等百余人，编入红28团，撤到桂东。

毛泽东在得知湘南失败后，立即决定以红31团第1营等部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红31团第3营前往桂东迎回红28团。

8月28日，红军分两路回师井冈山。当行至崇义县新地圩时，担任前卫的红28团第2营营长袁崇全擅自率部向思顺开去，企图叛变投敌。

红28团团长王尔琢赶到思顺追回了部队。但当王尔琢进入袁崇全盘踞的村子喊话时，遭叛徒枪击，不幸中弹牺牲。袁崇全只带着几个人逃向遂川，投靠了赣军刘士毅部。

王尔琢，1903年生于湖南石门。黄埔一期生，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战役和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5师第74团参谋长。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谋长。井冈山会师后任红4军参谋长兼红28团团长。王尔琢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等战斗，在部队中声望甚高。杨得志回忆道：

我们怀着悲痛和对叛徒愤怒的心情，从烈士遗体边走过。不一会儿，朱军长来了。他悲伤地低着头，在王尔琢同志的遗体前脱下军帽，站了好久好久……

此时，在井冈山根据地的部队只剩下了红31团。其中，代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率领团直属队和第1营的1连、3连到宁冈县去活动，并向酃县方向警戒；以蔡会文为书记临时组织的行动委员会，率领红31团第1营2连和特务连以及地方武装，依靠永新县小江区根据地，坚持永新西南区和莲花县的游击战争。

8月中旬，狡猾的敌人在发觉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立即发起猛扑，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相继失陷，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大部被破坏，“农民被屠杀者以千计，房屋被烧者不计其数”，井冈山根据地大部丢失。

杨开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这一次失败，我们叫作‘八月失败’。”

究其失利原因，毛泽东曾对江华说：“主要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问题，军队内部也有责任。”

下旬，湘军第8军第1师2个团进至酃县，赣军第3军2个团进入宁冈，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会剿”。30日，湘军吴尚部向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黄洋界发起进攻，企图抢在赣军前夺得头功。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即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是上山的必经之地。

黄洋界位于井冈山西北，海拔1300多米，两侧是陡峭的山崖，其间只有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可通，山上只长青草，不长树木，哨口雄峰耸立，险峻异常，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清晨，哨口浓雾弥漫，周围的山坳深谷都被白雾覆盖，宛若一片汪洋，故黄洋界又有汪洋界之称。



井冈山五大哨所之一的黄洋界

然而守卫黄洋界的红军缺粮少弹，一个人只有两三发子弹，一个班有两三条毛毯，晚上站岗只能相互依偎在一起，再盖上一些茅草御寒。兵力更是少得可怜，只有红31团第1营2个连和团部机炮连。说是机炮连，其实只有20来人，2挺机关枪、2门迫击炮和几发炮弹。由代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第1营营长陈毅安指挥。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怎样才能坚守住山口呢？

经反复研究，针对兵力不足、武器弹药匮乏实际，红军决定利用黄洋界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采取层层梯次防御、依山势构筑工事、

用石头作子弹、用原木作武器的办法，沿着通往大陇、茅坪两个方向的小路，布设几里长的“竹钉阵”，挖壕沟和射击掩体。

当天，何挺颖就把山上军民甚至伤员都动员起来，制造当地猎户用来对付野兽的竹钉，每人至少削28根。井冈山遍地翠竹，军民齐动手，将竹节削成竹钉，火烧、陈尿浸泡后，将这种竹钉埋了个满山满坡，构成一道特殊的防线。同时充分发挥山区作战中道路难行的优势，把山上的树木砍下来，堆在路口。因为山路狭窄，有了障碍，敌军必然要清除，在清除的过程中，红军就可以瞄准目标进行射击了。然后又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挖掘壕沟，迟滞敌人行动，为消灭敌人创造条件。最后，加固哨口已有的工事，架设土炮，埋设土地雷。

此外，红军还动员山下的乡亲们上山，布成疑兵阵。战斗时，或在铁桶里燃放鞭炮，冒充红军大部队；或在山林里高声呐喊助阵，以壮声势。朱挺颖把这一项任务交给毛泽东的新婚妻子贺子珍和朱德的新婚妻子伍若兰负责。

具体作战部署是：以一个连守卫哨口两侧主要工事，阻击敌人；一个排守卫哨口北侧的工事，防御来犯之敌；山顶瞭望哨布置两个排，作为预备队，掩护前面两个工事。同时，赤卫队、暴动队隐蔽在各个山头，协助配合红军作战。并派出红军小分队和赤卫队，下山至敌人侧后进行佯动袭扰。

一切准备妥当，红军严阵以待，只等敌人来犯。

30日清晨，大雾刚刚散尽，敌人便沿着陡峭的山路，成鱼贯式散兵线战斗队形，在小炮和机枪强大的火力掩护下，一个挨一个地往上爬。

子弹在红军战士头上呼啸，炮弹在阵地前后炸起团团烟尘。何团长命令部队不要理会，沉着应战，把敌人放近了再打，保证枪响人倒，弹不虚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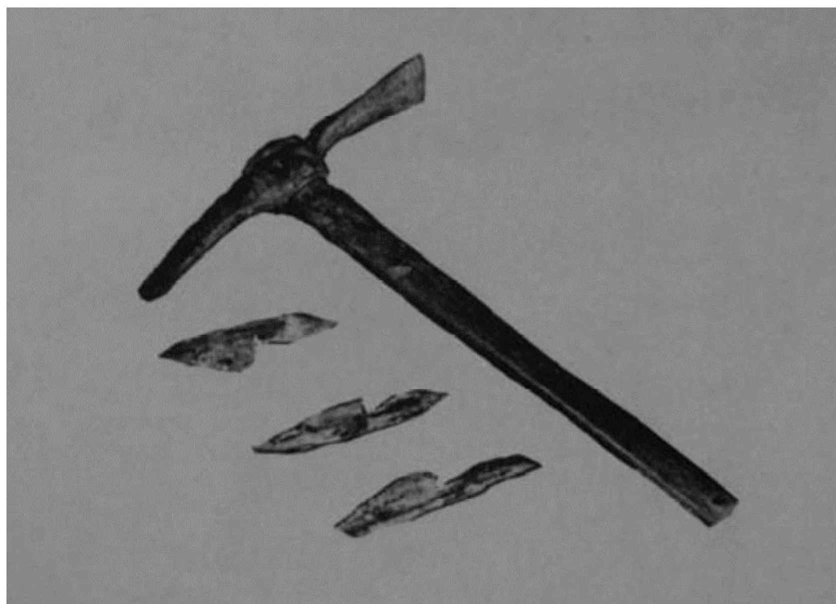
由于山路狭窄，左盘右绕，敌人也无法进行火力准备，只能一个接一个地挨着往上爬。虽然敌人数十倍于红军，在兵力上占了绝对优势，可是他们投入战斗的只是一个营，其他的大部队在山下等候。

爬山的敌人首先尝到了竹钉阵的苦头。那些竹钉大都埋藏在草丛之中，进攻的敌人只顾往山上看，观察红军阵地的情况，结果稍不留神就会被竹钉扎伤，不时传出惨叫声。

敌人好不容易越过了竹钉阵，到达了山口，在机枪的掩护下，呐喊着往山上冲。50米、40米、30米……敌人越来越近了。猛听朱团

长一声令下："打！"

红军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冲在前面的敌军呼啦啦倒了一片，死的死，伤的伤，哭爹喊娘地叫起来。走在后面的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逃。队伍顿时乱作一团，你拥我挤，加之山路狭窄，敌军慌不择路，赶忙朝小路两旁逃命，却正好踩上那一排排被杂草盖着的竹钉，有的刺上了脚跟，有的刺穿了脚板，疼痛难忍，狼嚎鬼叫。



黄洋界保卫战使用过的竹钉、十字镐

这时，隐蔽在周围各个山头上的赤卫队、暴动队也用单响枪、鸟铳、土制手榴弹向敌人发起攻击。

猛然间，山坡上、林丛中，漫山遍野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激昂的军号声和冲锋的呐喊声。原来是贺子珍和伍若兰组织的疑兵大队，在油桶里点燃了鞭炮，哒、哒、哒……如同一挺挺机关枪怒射的声响，吓得敌人左躲右窜；隐蔽在各个山头上的妇女会、儿童团、暴动队等众多群众，乘机摇旗吹号，"杀呀！""冲啊！"巨大的怒吼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震耳欲聋，似有千军万马在丛林中作战一般。

这下果真把敌人吓破了胆，一个个丢枪卸甲，连滚带爬地逃下山去。

待明白是虚惊一场后，敌人又气哼哼地冲上山来。"冲啊！先冲上去的有赏啊！后退不前的军法从事……"敌军官在后面挥动着手

枪，连威胁带利诱地强逼着士兵再次发起进攻。

可是敌人刚一露头，便又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屁滚尿流地缩回山下“老巢”。

就这样，敌人一连发起数次冲锋，除了留下一具具尸体，就是给红军送上武器弹药。但敌军毕竟是正规军，很快就发现了红军阵地的薄弱点，加之敌我兵力悬殊，火力严重不足。红军的好几个阵地先后被敌军占领。

面对蜂拥而上的凶煞敌人，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和赤卫队员们，举起棍棒、竹竿和石头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敌人发现红军的弹药快用光了，更加猖狂起来，后面督战的军官大喊着：“赤匪的子弹已经打光了，弟兄们，不要怕，快往上冲啊！”

下午4时许，敌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又一次向黄洋界哨口发起猛攻。

就在危急关头，几位红军战士把山下茨坪机械厂刚刚修理好的一门迫击炮抬上了山。由于敌人从黄洋界进攻，封锁了山口，红军战士是从别的小路绕道上山的。

迫击炮很快就架在瞭望哨上。可是这门炮只有三发炮弹，大家刚刚松弛的心又揪了起来。

朱团长果断下令：“炮弹太少了，不能打登山的敌人，瞄准敌人的指挥所射击。”

随着“轰、轰”的几声巨响，炮弹准确命中了敌指挥所，把指挥所炸了个人仰马翻。

顿时，敌军失去了指挥中心，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被炸得晕头转向的敌指挥官误以为毛泽东、朱德已率红军主力回到井冈山，急忙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连夜仓皇逃回湖南老巢去了。

第二天，赣军王均部正准备经宁冈茅坪进攻黄洋界，刚走到半路，突然听到湘军已经败退的消息，立即掉转头退回永新了。

就这样，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凭借黄洋界的天险，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泽东闻讯，欣喜之余，做《西江月·井冈山》一首以示纪念：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交战时间】1930年12月～1931年1月3日

【交战双方】红一方面军；国民党军11个师又2个旅

【指挥将领】毛泽东、朱德；鲁涤平、张辉瓒

【战果】红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3个多旅约1.5万人

1930年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之间矛盾激化，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4月初，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爆发了。双方投入100万兵力，在河南、山东、湖南等地展开混战。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纷纷调离原地，参加这场新军阀间的大战。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约10万人，并开辟了10余块苏区，根据地数量和面积不断扩大。仅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就已在34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9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200多万人，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主动参加各县、区、乡、村组织的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以及红军。对此，国民党当局异常不安和极度恐慌。

8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苏区红军的总方针。

10月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基本取得胜利后，立即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提出要在3～6个月内消灭红军，重点是中央苏区，同时指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实施。

10月20日前后，从湖南省和陇海铁路方面抽调“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陆续进入江西省境内，在武汉的第十九路军也准备进入江西参战。此番“围剿”与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进剿”或多省“会剿”都属局部性的行动，而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

挥下的全局性行动。

这时，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正在中央苏区西北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活动。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在查明敌情后，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就反“围剿”的方针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一部分人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把守地看家看得很重。他们主张仍按中共中央和军委8月初的指示，进攻南昌、九江，以迫使国民党军转入防御，放弃其“围剿”。

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据理力争，指出：敌人在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力量还很强大，防御工事也很坚固，红军的武器装备相当简陋，在苏区尚未巩固、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不宜脱离苏区贸然攻打大城市。因此，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应主动退却，将敌诱进苏区内部，积极利用根据地地形等优势，发现和造成敌之弱点，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于红军作战之战场，集中兵力适时反攻，各个歼敌于运动之中，以粉碎其“围剿”。

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指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

这时，有人反问：“井冈山就不要了？”

朱德解释说：“因为大前提还是敌强我弱，而且具体地看，湘敌强，赣敌弱，我们要避实就虚，诱敌深入，以弱胜强。赣江西岸夹在湘、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之东呢，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然而，由于少数红3军团的领导干部坚持要在赣江西岸作战，会议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10月25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县的罗坊，立即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



罗坊会议旧址

会议继续讨论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朱德也指出：敌军已在南昌、九江周围集结了优势兵力，红军只能东渡赣江，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革命根据地内消灭敌人。

经过毛泽东、朱德耐心细致的劝说，大家终于统一认识，一致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

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式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取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的纠正。

接着，会议就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还是以西的问题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红3军团和江西省行委的少数领导干部反对“东渡赣江”，主张“夹江而战”。

彭德怀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三军团渡江之前，因三军团之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平江、浏

阳人，八军大多数是阳新、大冶人，地方主义者利用这一点反对过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认为这样既可以集中消灭敌大部队，也可以团为单位分散于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有利。从坚持长期战争这方面看，这些同志也还是有些理由的，因此它就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但实际上一、三军团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六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我说：一、三军团分开，两军团夹江而阵，这对于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我说，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

红3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回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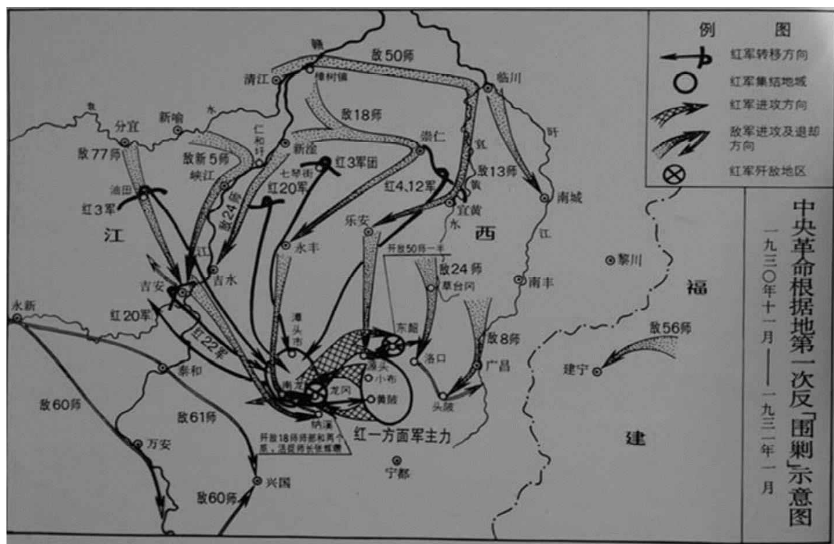
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30日，会议正式通过两个军团一起东渡赣江、“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11月1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东渡赣江的命令：方面军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并规定各路红军在一个月内完成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按照上述命令，红3军留在赣江西岸监视国民党军，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批从袁水两岸东渡赣江，在新淦、崇仁、南城、宜黄、乐安、永丰之间地区伺机作战，并向樟树、临川方向进逼。同时，中央苏区党、政、军、民也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展开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实行坚壁清野，部署游击作战，反“围剿”作战准备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11月2日，鲁涤平将集中江西境内的7个师又1个旅编为3个纵队，并限于5日前，第1纵队第18师集结于樟树，第24师集结于丰城西北之赣江北岸，新编第13师集结于临川；第2纵队第50师集结于西山万寿宫，独立第14旅集结于靖安；第3纵队第77师集结于上高，新编第5师集结于高安；总预备队第8师集结于南昌。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示意图

是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分别进到清江、新淦、黄土街、罗坊、新余、分宜等地，均因红军已先期转移而扑空。鲁涤平在获悉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后，深恐红军夺取樟树镇、临川，遂放弃了原定的进攻计划，以第3纵队仍在赣江西岸进攻，以第1、第2纵队尾追过赣江，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面对“围剿”大军的节节进逼，红军为保存实力，待机破敌，便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群众武装迟滞、消耗“围剿”军，主力于11月中旬分别由赣江以东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水之间地区和赣江以西路口、油田地区，逐次向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转移。

11月18～20日，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已被“围剿”军各纵队分别进入，但还是扑了空。鲁涤平气极败坏，一边给蒋介石上报作战顺利的战况，一边就地转入“清剿”，为进攻苏区中心区域作准备。

12月初，红20军分散在富田、东固、龙冈地区活动，为配合和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宁都县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集中，与当地群众在东固附近山头，日夜构筑假工事，迟滞、迷惑敌人。随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批转移至平田、砍柴冈、安福圩一带地区隐蔽集中，积极做好再战准备，抓紧整训和筹措给养。

这时，蒋介石亲自赶到南昌组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确定于中旬开始，各路“围剿”军以东固地区为会攻目标，分进合击。同时急电

催调第十九路军由武汉入赣参战；另调驻福建的第56师、第49师、暂编第2旅向闽赣边界推进，堵截红军。至此，“围剿”军总兵力增至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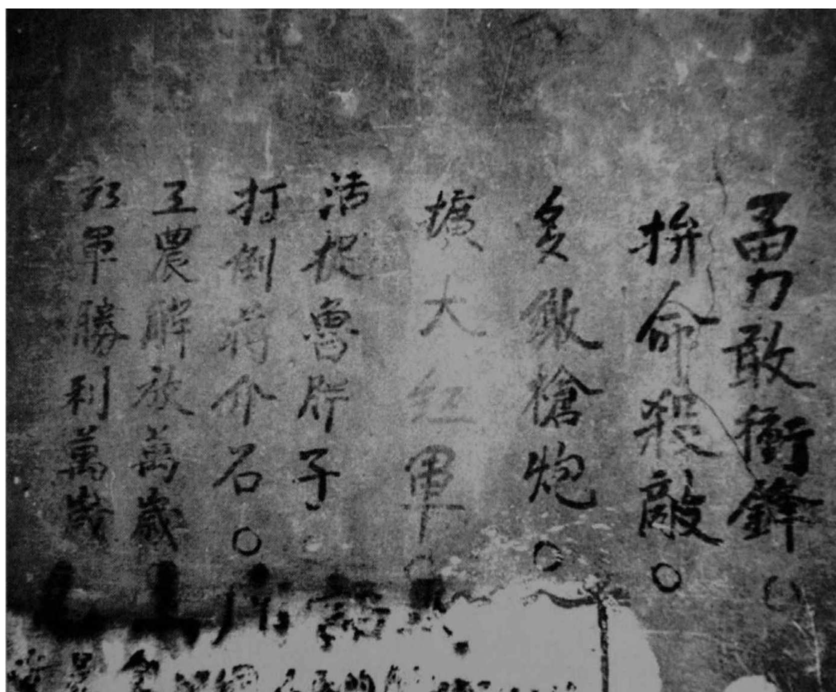
为加强指挥，蒋介石下令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任命鲁涤平兼主任，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总体部署是：

第六路军第24师由蛟湖向东韶、洛口、宁都进攻，第8师由黄陂、南丰之线向广昌、宁都、雩都进攻，第56师经建宁向石城推进；第49师和暂编第2旅向瑞金、会昌推进；第九路军第18师由永丰分经古县、白沙向东固进攻，第50师由乐安分经招携、藤田向龙冈、东固进攻，新编第5师由吉安经富田向东固进攻；第77师主力守吉安，一部向安福方向“清剿”；第十九路军第60、第61师经萍乡分向万安、泰和推进；第12师第34旅仍驻守赣州。

为一举剿灭“赤匪”，蒋介石不惜血本，电令悬赏5万块大洋，购缉朱德、毛泽东、彭德怀以及黄公略的项上人头。

见敌人一步步深入苏区内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宁都县黄陂召开会议，再次缜密研究反“围剿”作战方案。会议认为，敌军虽有十万之众，但这种宽大正面的“围剿”布势，势必造成战线拉长、间隙过大、兵力分散，而且“围剿”军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内部派系复杂，协调不畅，当前的战场态势已利于红军反攻。据此，毛泽东等人决定选择接近红军集中地的“围剿”军主力为歼击目标，集中兵力实施中间突破，割裂“围剿”军整个部署，然后各个击破，粉碎“围剿”。随即命令红12军第35师赴兴国东北约溪地区引敌西向并监视之，主力全部集中到黄陂、麻田地区隐蔽待机，抓紧进行政治鼓动和临战准备。

12月16日，各路“围剿”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进攻。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苏区军民写的标语

19～21日，新编第5师、第18师先后进占东固，搜寻红军主力。因云雾蔽天，细雨蒙蒙，加上联络不畅，两支部队发生误会。结果，双方机枪、掷弹筒、迫击炮齐发，打得好不热闹。冲突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双方伤亡不小。这时才发觉对方的火力不像红军，于是用军号联系，始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时任国民党军第18师第52旅旅长的戴岳回忆道：

20日晨浓雾弥漫，对面不见人，我旅先头部队到达东固时，果然与前一天到达东固的公秉藩师发生误会，自己打了起来，双方死伤许多人。公秉藩以首先占领东固报捷，大受蒋介石嘉奖。由于这次误会，公秉藩与张辉瓒不和，也不与张见面，而将全师开往富田。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第50、第60、第61、第24、第8师分别进到招携、万安、泰和、草台岗、新丰、三坑等地。各路敌军沿途屡遭红军小部队和地方武装袭扰、阻击，加之在狭长路段行军，交通运输常被阻断，人员不能快速跟进，物资补充困难，进展迟缓。

“围剿”军已被诱进苏区腹地，红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时机成熟了，决战即将拉开帷幕。但这一仗该怎么打呢？先打哪支敌军？

朱德和毛泽东经周密思考，反复研究，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左翼的张辉瓒部第18师或离红军主力最近的谭道源部第50师。“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

25日，红军在宁都小布河畔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特意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柱子上。

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红军指战员们反复吟诵，打心底里钦佩这副对联写得好。短短46个字，就把红军的战略战术讲得明明白白，而且通俗好记。

会上，毛泽东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详细分析此次反“围剿”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一是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是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是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是红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是红军可以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再打；六是红军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

慎重初战，历来是古今中外兵家津津乐道的原则。毛泽东更是深知，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是敌我双方各种因素激烈对抗的过程，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

兵法云“胜可知而不可为”，就是说战场上的胜利是可以预先知道的，但战斗中敌人有无可乘之隙，则不是由我方所决定的。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争，从没有一成不变的战场，也从没有完美无缺的作战计划。只有不断依照新情况，改变既定的计划，使之适应新情况，才能于瞬息万变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墨守成规和一味蛮干，最终必在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自食苦果。

最初，毛泽东、朱德选择了孤军深入的谭道源第50师作为首歼目标。

25日和27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先后两次在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围歼谭道源师。结果等了两天，敌人也没有来。

原来，谭道源率第50师自接到“围剿”命令后，经永丰每天以70里的速度经宜黄向宁都进犯。该师曾与红军交过手，深知红军组织严

密、行动神速、战斗勇猛，而苏区军民早已坚壁清野，不仅找不到一粒粮食，就连向导也找不到一个，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

谭道源见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因此越是深入苏区越是心虚胆战，正如他在后来战报中写的“真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该师第149旅第298团第3营上士文书罗文浪回忆道：

12月下旬进至源头。这时，中央苏区实行坚壁清野，就我记忆当时获得的油印文件，大意谓敌人向苏区进攻，我们要实行坚壁清野，将一切可以移藏的粮食、器物全部隐藏，使敌人不能利用一件东西，然后我们实行各个击破，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事实上当时苏区确实是这样做的。我们驻在源头时，大米运不来，掳掠些稻谷，但找不到推砻和舂具，磨子也不全，费尽力气弄出点大米来，里面还有许多稻谷。我早晨看到士兵解的大便，里面有很多的谷子没有消化。其次，是找不到一个壮年男子汉，行军时因为没有好的向导，时常走错了路，在荒僻的山中上不得，下不得。

进抵源头后，狡猾的谭道源本打算继续进犯小布。但他似乎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息，怎敢孤军深入，于是走到半道又撤了回去，不敢脱离源头阵地。也有记载说是有人从苏区逃去报告了红军在小布设伏的消息，谭道源便下令将部队撤了回来，盘踞在源头迟疑不出。

源头一带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敌军居高临下，硬打强攻显然于红军不利。

两次设伏谭道源不成，红军立即撤出阵地，回到原集结地继续等待战机。有的指战员难免产生了急躁情绪，甚至有人还说起牢骚怪话来。

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

至28日，各路“围剿”军继续向苏区内部缓慢推进。其中，第28师进至因富，第18师先头1个旅进到南垄；第50师进到源头，准备续攻小布；第24师经东韶进至洛口；第8师进到广昌，先头进至头陂；第60师准备经赣州转向北进，配合泰和之第61师进攻兴国。

战机终于出现了。29日，张辉瓒率第18师2个旅孤军冒进龙冈。

张辉瓒，字石侯。湖南长沙人，生于1885年。国民党陆军中将。早年就读于湖南兵目学堂和军官讲武学堂，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

1914年归国，任北京军需学校总队长兼军事学教员，旋即赴德国学习军事。1916年回国，在天津从事反袁活动。为躲避袁世凯重赏缉拿，回湖南老家组织独立团，参加护法战争，历任湘军游击司令、兵站总监、第2区司令、第4混成旅旅长等职。1923年任建国湘军总司令部军务委员、第9师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4师师长。后任第2军副军长、代军长。1928年10月，第2军缩编为第18师，任副师长。次年入赣，兼任南昌卫戍司令。1930年任第18师师长。

说起这位张师长，竟与毛泽东还有着不解之缘。二人同为湖南老乡，共饮湘江水长大，张辉瓒生于长沙唐田神塘，毛泽东生于离长沙不远的湘潭县韶山冲。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到长沙求学，就已听到了张辉瓒的大名。年长毛泽东8岁的张辉瓒时任湖南第4区守备司令，在长沙城里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了。此后，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二人相识，毛泽东还到湘军作过演讲。

对于共产党，张辉瓒心狠手辣。1929年，鲁涤平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为巩固统治，他调亲信张辉瓒第18师来赣。到江西后，张辉瓒兼任南昌卫戍司令，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可谓杀人如麻，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人称“张屠夫”。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共青团江西省委几次遭到破坏，被迫从南昌迁到九江，数百名党团员被捕遭到杀害。

此番出任前线总指挥率部“围剿”中央苏区，张辉瓒春风得意，在誓师大会上口出狂言：“吾党与共匪势不两立，此番不踏平赤区，剿灭赤匪，誓不生还。”并煽动士兵：“朱毛主力猬集于东固，那里有赤匪的银行，弟兄们打进东固，金子银洋任你担。打到东固去，发财归自己。”

12月28日，鲁涤平下令深入苏区的5个师向宁都以北黄陂、小布、麻田地区红军发起总攻。

一向骄横的前敌总指挥、第18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令第54旅留守东固后方，自己亲率师部和第52、第53旅，向龙冈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戴岳回忆道：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斗旧址——龙冈

12月29日，部队到达龙冈。龙冈位于丰县城南部约180华里，集镇上铺屋有300余家。当时，市面上不但找不到食物，且寂无一人（师部到达后，搜出一中年男子，即指为奸细，把他枪毙了），惟遥见远山红旗隐约，我认为情势是相当严重的。当日下午5时许，张辉瓒率王捷俊的第五十三旅及师直属部队（计有炮兵营、工兵营、特务营、骑兵连）开到龙冈。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结地，群山环抱，中间为一狭长盆地，当地群众基础好，能够帮助红军封锁消息，因此是红军设伏的理想场所。朱德、毛泽东等当即决定以一部兵力在赤卫军、少先队配合下，牵制源头、洛口、头陂之第50、第24、第8师；集中主力分左、右两路秘密西进，求歼第18师主力于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际。

下午，红军主力隐蔽西进，在向龙冈前进途中，查明第18师主力已到龙冈。当晚8时，朱德、毛泽东下达命令：左路红3军为右翼，于30日晨占领木坑以北地区，继向龙冈攻击前进，红12军（欠第35师，指挥第64师）为左翼，于30日拂晓向表湖前进，以一部占领龙冈南端之盲公山，主力截断龙冈至南垄大道，从兰石、茅坪攻击第18师侧后；右路红3军团、红4军以主力向上固、下固前进，以一部到还铺附近，向龙冈西北端之张家车攻击前进，如上固无敌，主力向还铺、张家车攻击前进，以一部向下固、潭头警戒。在约溪地区的红35师，于30日午前插至南垄、龙冈之间，配合红12军主力攻击龙冈，并向南

垄警戒。方面军总部30日进至小别附近的黄土岭指挥。

30日凌晨，龙冈山区大雾弥漫，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手指眼前的景物，风趣地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

清晨，浓厚的大雾仍弥漫着整个龙冈，群山遍野云雾笼罩，如同黑沉沉的夜间。红军按照预定部署进入了伏击阵地。这时，第18师第52旅为先头，师部和第53旅随后，由龙冈向五门岭前进。

上午9时许，浓雾渐渐散去，天气豁然开朗，龙冈山区晴空如洗。红军指战员居高临下，清清楚楚地看到第18师先头部队正大摇大摆、旁若无人地走进伏击圈。

随着一声“打”，红3军先头第7师猛烈开火，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张辉瓒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还远在黄陂、小布一带，先头部队遭遇的只是红军小部队袭击，便自恃兵力、武器占优，根本没放在心上，当即命令先头部队组织反扑。一时间，战斗呈现胶着状态。

战至中午，红3军全部加入战斗。张辉瓒毕竟喝过洋墨水，并非一个酒囊饭袋，指挥作战还是颇有些手段的，亲自组织2个团的兵力展开猛攻，战斗进行地十分激烈，给红军造成了较大的伤亡。激战至下午3时，张辉瓒孤注一掷，亲自指挥4个团向红军阵地实施多路进攻，均被击退。

此时，红4军和红3军团一部已插到张家车，截断了第18师与东固、因富的联系，并从侧后向龙冈猛攻；红3军团主力占领了上固及附近有利阵地，切断了敌从西北方向增援和龙冈之敌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完成了对第18师的完全包围。

下午4时，红军发起总攻。眼见包围圈越来越小，红军战士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张辉瓒知道大势已去，再无先前的狂横，带着手下的残兵败将向西北方向仓皇逃窜。但为时太晚，张辉瓒和他的第18师已成瓮中之鳖，插翅难逃。

各路红军从龙冈背面的高山上猛冲下了，迅速将敌军冲得七零八落。第52旅旅长戴岳混入伤兵中侥幸逃脱，第53旅旅长王捷俊束手就擒。

张辉瓒偷偷换上士兵衣服，企图夹在散兵队伍里逃跑，不料

因“身高体胖”行动不便被红军捕获。张谎称是书记官，梦想蒙混过关。不料被国民党俘虏兵当场揭穿。原来，这位张师长平日里净干些克扣士兵军饷、中饱私囊的勾当，深为士兵们所痛恨。

于是，红军战士便把张辉瓒押解至龙冈大坪。这时，朱德和毛泽东也从指挥所走下山来，向龙冈走去，沿途听到许多红军战士兴高采烈地喊道：“前头捉了张辉瓒。”

龙冈战斗是红军第一次大规模消灭敌人，全歼第18师师部和2个旅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子弹100万发，以及电台等其他军用物资。

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毛泽东自然十分高兴，当即填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红军活捉了国民党中将师长，而且又是自己的老相识，毛泽东自然要去见个面的。张辉瓒也认得毛泽东，便提出愿意以捐款、送枪弹和医药物资的方式赎回自己的命。

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当时显然没有要杀张辉瓒的意思，双方谈得还不错，而且张的利用价值还挺大，至少对红军的装备改善会有帮助。他说：诸葛亮擒孟获敢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连两擒两纵也不行呢 我看不能一擒就杀。于是就答应了张辉瓒的请求，并嘱咐部下好生对待，不要杀掉。

对此，朱德表示同意，并提出要办一个红军学校，让张辉瓒来做教授。毕竟张留学日本，又曾到德国学习军事，可谓是个学有所成

的“海归”人士，在红军中难得一见。

民国时期的报人和民史专家陶菊隐在1934年8月出版的《正海轶闻》中对此事是这样描述的：张辉瓒被捉时，毛泽东忽然出现，驱握张手曰，石侯先生，别数年矣，不期相值于此。顾谓卒曰，此吾旧友，宜善视之，张默然无语。

虽说张辉瓒杀人如麻，贪婪成性，却平生不二色，与妻子朱性芳伉俪情深。在得知丈夫被红军俘虏的消息后，朱性芳急赴南昌，哭求鲁涤平，又电请湖南军界的程潜、唐生智、范石生等人向中共传递信息，表示愿以钱物换回张辉瓒的性命。同时又频频向南京政府施压，呼吁赎张。

国民党悬赏索取红军领袖的首级，不料龙冈一役损兵折将，第18师被歼近万人，连师长张辉瓒也被红军生擒活捉。噩耗传来，国民党军界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政府内也引起一片叫骂声。

陈诚幸灾乐祸：18师太不行了，等我去试试看。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嘲笑道：18师送了近万支枪，连个收条都没有得到。鲁涤平惊慌失措，痛哭流涕，气得蒋介石大骂他：18师失败不足为怪，一败即馁，何鼠胆乃尔？你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使为共产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

蒋介石权衡再三后，指示南昌行营同红军做交易，赎救张辉瓒。鲁涤平等人反复计议，开列出同红军交易救赎张辉瓒的条件：张部未被歼灭的朱耀华第54旅4000余人，连同全部枪械归降红军；由上海三家银行担保，给红军20万元现洋和20担西药，并提供可装备2个团的武器；释放一批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

客观地讲，这对当时物资奇缺的红军来说，无疑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交易。然而，这笔“交易”最终没有达成。

就在双方进行谈判时，1931年1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在东固召开了反“围剿”胜利庆祝大会。群众要求在大会上公审张辉瓒，张遂被押到了会场。

张辉瓒做的坏事实在是太多了。一个月前，在“进剿”东固的时候，张辉瓒命令部下：东固已匪化，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40里内，凡10岁以上的男女老少，格杀勿论。不论民房公房，草屋土屋，在部队撤退前，一律烧光！凡可携带之物资、食物，全部带走！

东固是个南北狭长，东西扁圆形的盆地，四周都是高山大涧，从四壁山冈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东固街上一片火光，听得到杀害平

民百姓的枪声，以及受害者惨不忍闻的啼哭声、呼救声。

有道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虽说毛泽东已安排人去东固做群众的说服工作，可到了公审批斗会场，局面就失去了控制。会场上群情激愤，一片“剥皮”、“抽筋”的喊杀声。维持秩序的红军战士也十分痛恨张辉瓒，因为他们有好多战友在龙冈战斗中牺牲了。

于是，祝捷大会变成了公审大会，在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声中，张辉瓒被当众枪决，尸体悬挂在东固“翰林第”附近的“连理樟”树上示众。

朱德后来回忆起此事，痛心地说：“按说真不该杀张辉瓒。如果当时留着他，不但可以解决根据地的不少困难，还可以用他做人质，换回许多狱中的同志，可是把他杀掉之后，蒋介石为了报复，立刻处决了我们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几次起义失败后被俘的军官。”

就这样，官职并不显赫的张辉瓒因被红军俘虏后杀头，而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创造了几个第一：

他是红军在江西第一次俘虏的国民党将军，也是在江西俘获的国民党最高级别的将领。

他是毛泽东第一次写入诗词的国民党将领，在以后的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许多人的职务和军衔都高于张辉瓒，却无缘享此“殊荣”。

他是第一个被共产党军队俘虏后又被杀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此后，即便是“战犯”级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后也未有被处死者，往往经过一段时间教育改造后被特赦。

张辉瓒的命最终还是没有保住，可一同被俘的第18师无线电台报务主任王诤、译电员刘寅等人，却成了毛泽东的宝贝疙瘩。不久，他们都参加了红军，并组建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开展无线电侦察，使红军能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为以后的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9月，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讯部部长的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18师主力在龙冈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深入苏区的各路敌军都知道了红军的厉害，惊恐之下，纷纷退缩自保，当起了“缩头乌龟”。

1931年1月1日深夜，早已尝过红军苦头的谭道源丝毫没有过新

年的喜悦，反倒是坐立不安，生怕自己成为朱毛红军下一个打击目标。冥思苦想一番后，他决定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离得越远越好。

事不宜迟，说走就走。谭道源急令所部各取捷径连夜开赴东韶，相机向广昌靠拢。名为开赴，实为夺路溃逃。

但谭道源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一举一动早就在红军的掌控之中。

2日晚10时，朱德、毛泽东下达对谭道源师的追击命令，指出：“视此情形，敌军似有全线退走之模样”，“方面军决于明晨追击东韶之敌，然后次第扑灭朱逆绍良部之许（两团）、毛（两旅）两师，以树政治上之声威”。

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为左、中、右三路尾击敌军：红12军为中路，经南团、琳池由西向东攻击东韶；红3军团为左路，经头陂由北向南攻击东韶；红3军为右路，到达田营后，以主力牵制第24师，以一部迂回东韶以东攻击；红4军为总预备队，随红12军跟进；方面军总部进到龙坛指挥战斗。

3日晨，红军中、左路相继进抵东韶附近，旋即向立足未稳之第50师发起猛攻。敌军依仗优势装备，集中火力向红军发起反冲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

激战至15时许，红军分别突破敌人防御。在红军强大的攻势下，敌军犹如惊弓之鸟，伤亡惨重，全线不支。谭道源早已六神无主，无心恋战，率残部突围。由于右路红军尚未迂回到东韶东端，敌军乘隙向东和东北方向窜逃。红军奋起追击，再歼其一部。此战共歼第50师1个多旅，缴获长短枪2000余支，声威大震。

东韶战斗后，各路国民党军争相撤离苏区，在兴国、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之线转入防御。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宣告失败。

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的第一个战役。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支援下，共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3个多旅约1.5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

双桥镇战斗

【交战时间】1931年3月9日

【交战双方】鄂豫皖红4军；国民党军第34师

【指挥将领】徐向前；岳维峻

【战果】红军歼敌1个师部、2个旅、4个团、1个山炮营、2个迫击炮连。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获胜后，随即调集重兵对各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剿”。11月上旬，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奉命集结兵马，由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李鸣钟统一指挥，组织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12月上旬，国民党军开始对鄂豫皖苏区实施“围剿”，总兵力达8个师又3个旅近10万人。具体部署是：

第13、第44、第48师由麻城、宋埠、黄陂向北推进；第30、第31师由商城、罗山向南推进；第34师、新编第25师、新编第1旅由平汉铁路南段向东推进；位于皖西的第46师、警备第2旅和罗田新编第5旅由东向西防堵。计划第一步完成对苏区“圆箍式”的包围；第二步以主力攻占苏区内的交通要道及城镇，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第三步分区实行“清剿”。

此时，中共中央派任曾中生到达鄂豫皖苏区，在黄安以北七里坪召开紧急会议，建立了以曾中生为书记兼军委主席的中共鄂豫皖特别区临时委员会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反“围剿”斗争。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军，会议决定在罗山、孝感、黄陂地区，黄安、麻城地区，光山地区分别建立第1、第2、第3路指挥部，指挥地方武装约2万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尽快与活动在皖西地区许继慎、曹大骏领导的红1军取得联系，以便集中兵力突击敌人的弱点，转变战局，粉碎敌人的“围剿”。原活动于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红15军，在军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率领下，此时也已经皖西、豫南到达黄安、麻城边界地区，随即在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军委领导下参加反“围剿”作战。

12月9日，国民党军第44师进占黄安城。三天后进占黄陂县河口

镇。

16日，红15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攻入河口镇，歼敌一部后主动撤出。接着在七里坪阻击从光山、罗山南下的国民党军第30、第31师，在予敌杀伤后，向商城南转移，准备会合红1军在外线打击敌人。各路指挥部亦率领地方武装在苏区内利用高山密林，时隐时现，割电线、摸岗哨、截辎重，打击小股分散的敌军和反动民团，积极开展袭扰活动，迫使国民党军不敢轻易冒进和分散“清剿”。



与此同时，红1军在皖西发起攻势作战，先后攻克金家寨、麻埠、独山和叶家集等地，取得东香火岭、二道河等战斗的胜利。至1931年1月初，共歼敌4个团又4个营，击溃4个团又1个营，毙伤俘5000余人，缴枪近3000支，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1月中旬，红1军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同红15军胜利会师。在这里，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了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会议在对立三路线的错误进行批判纠正的同时，总结反“围剿”的经验，制定了新的斗争方案。

根据中央指示，红1军和红15军正式合编为红4军，归鄂豫皖特委直接领导。全军共12000余人，下辖第10、第11师。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曹大骏。第10师师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副师长刘英；第11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

就在这次会议上，徐向前与曾中生第一次见面，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他对一些问题的深刻分析能力和平易近人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合编后的红4军鉴于敌人已取守势，决定乘胜追击，向黄安、麻城开进，转入战略反攻，拔除根据地内敌人的孤立据点，收复被敌人侵占的根据地。

1月下旬至2月初，红4军一路高奏凯歌，先后攻下麻城北部的磨角楼和光山南部的新集等敌据点。经短暂休整后，红4军于3月初在平汉铁路信阳至广水段先后袭占李家寨、柳林车站，拆除铁轨，捣毁设施，歼敌1个营，击溃2个团，击毙敌新编第12师第1旅旅长侯镇华，威逼豫南重镇——信阳。

京汉铁路被红军切断，而李家寨、柳林北距信阳只有40多里，国民党当局对此极为震惊。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火速调集第6师主力迅速开赴信阳，并以该师第18旅和第31师第91旅及第二十路军第63旅等部，由信阳、罗山向南逼近；何成浚令新编第2旅固守广水，第31师主力由广水沿平汉铁路向信阳推进，第34师由孝感经花园沿澴水北进，企图南北夹击集结于孝感县北部大新店、三里城地区待机的红4军。

3月8日，红4军侦悉第34师师长岳维峻率3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营

经小河溪、阳平口、二郎畈孤军进抵双桥镇；第6、第31师等部则徘徊于信阳与广水之间。

提起这位岳师长，在西北军中可谓资历颇深。岳维峻，字西峰，1883年生于陕西蒲城。1899年，年仅16岁的岳维峻补武学生员。随后追随井勿幕、胡景翼参加革命，加入同盟会，在渭北一带联络革命志士。

1911年，辛亥革命光复西安后，岳维峻率众在蒲城起义响应，后又随井勿幕宣抚渭北，转战山西运城。1914年，随胡景翼入陈树藩所部第四混成旅军官教导营，此后一直追随胡景翼。结业后出任以胡景翼为营长的游击营2连连长，驻守富平。1916年参加护国战争，因作战勇敢升任营长。

1918年年初，响应孙中山在广东发起的护法运动，岳维峻随胡景翼等人在三原起兵，竖起陕西靖国军旗帜，出任陕西靖国军右翼第三支队游击司令。陕西督军陈树藩派人持函策反岳维峻，并许以团长职位。岳不为所动，率部东征西讨，屡建战功，予北洋军以重创。

同年8月，于右任、张钫分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胡景翼任第四路司令，岳维峻任第四路第三支队司令。

9月中旬，胡景翼在渭南固市被陈树藩劫禁西安后，岳维峻继任第四路司令。他顶住陈树藩重兵进攻和封官诱降的压力，率领第四路官兵高举靖国军旗帜，奋勇杀敌，大小数十战，历时二载，致使敌方无尺寸之获。为了救出胡景翼，岳维峻还派人告知陈树藩，愿率母亲、妻子和儿子为人质换回胡景翼，但为陈树藩所拒。

1920年7月，胡景翼获释后返回三原，出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岳维峻仍任第四路司令。1921年10月，胡景翼接受陕西督军冯玉祥的改编，出任陕西陆军暂编第1师师长，岳维峻任第1旅旅长。次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岳维峻随冯玉祥、胡景翼进兵河南，打败依附奉系的河南督军赵倜。

1924年10月，岳维峻参加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任中华民国国民军第2军前敌总指挥兼第2师师长。不久，随河南督办兼国民军第2军军长胡景翼入河南，在豫西击败镇嵩军憨玉琨部，稳定了河南战局。

客观地讲，那时的岳维峻是相当革命的，支持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不错。然而，当1925年4月胡景翼病逝，岳维峻继任国民军第2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后，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自以为羽翼渐丰的岳维峻滥收兵员，不治军旅，放纵所部官兵肆意横征暴敛，烧杀抢掠，导致中原大地民怨沸腾，义军蜂起。

刚愎自负的岳维峻为争夺地盘而四处用兵，结果在各路军阀的联合进攻下，被迫于1926年年初退守豫西。不料又被刘镇华打得惨败，曾拥兵20余万的国民军第2军顷刻瓦解，岳维峻只身逃往山西，成了阎锡山的阶下囚。同年11月，岳维峻获释，被冯玉祥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南路军总指挥，进军河南，参加北伐。

北伐战争结束后，岳维峻出任第2集团军第5方面军总指挥，驻防豫东。不久，他联络驻军豫西的樊钟秀部反对冯玉祥，结果被击溃，逃往安徽，投靠了蒋介石，任新编第1师师长。

作为降将，岳维峻一直苦于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总想找立功表现的机会。因此对于大多数国民党军将领视为苦差的“围剿”红军作战，岳维峻出奇地卖力。从1929年秋起，他历任陕西招抚使、豫西警备司令、第3纵队司令和第34师师长，率部在鄂豫皖一带“围剿”红军。第34师曾因“围剿”红军有功，被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誉为“模范之师”。但尽管如此，出身杂牌的岳维峻还是得不到老蒋的认可，几年过去了仍是个师长，这令他苦闷不已。

此番“围剿”红4军，岳维峻挂帅亲征，就是想立下头功，以得到委员长的赏识。但他并不知道，此次的对手竟会是他的老部下。当年，岳维峻任国民军第2军军长驻守河南时，徐向前就在他麾下的第6混成旅任参谋。

立功心切的岳维峻，自恃兵强马壮，难免心骄气傲，冒进突出。自3月4日从孝感出发后，急于寻找红军主力求战的岳师长就不断督令手下火速前进，5日由小河溪协同旅长张万信、王俊杰督率第3、第4、第6团向双桥镇进发，8日即孤军进抵双桥镇，距红军主力集结地大新店、三里城仅30多里。

岳维峻抵达双桥镇后，即令第100旅2个团位于澴水两岸刘家湾、松岭山、田子山、罗家城一线；第101旅2个团位于澴水东岸的长岭岗、刘家楼、白马石岗及小魁山一线；师部、两个旅部及炮兵营驻双桥镇。

在认真研究当面敌情后，徐向前等人认为第34师离开铁路线单独行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且双桥镇东西两侧山高林密，便于我军隐蔽接敌，决定以红11师1个团留置三里城向北监视，集中红10、红11师主力共5个团，在罗山独立团等地方武装配合下，连夜南下，奔

袭双桥镇，吃掉岳维峻的第34师。具体部署为：

以红10师从北向南进击澴水西岸之敌；由第30团正面突击；第29团从双桥镇西南方向迂回，断敌退路；第28团位于双桥镇以北之店二湾，作预备队。以红11师从东向西进击澴水东岸之敌；第31团担任正面突击；罗山独立团向双桥镇东南方向迂回，断敌退路；第33团位于余家集以西的麻雀岭，作预备队。

双桥镇，四面环山，东傍澴水，是红军和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区。奔袭双桥镇的命令下达后，部队立即进行了战前准备。为达到快速、突然的奇袭目的，红军指战员全部轻装，只随身携带枪支、弹药和大刀，并将子弹袋、手榴弹袋用腰带或绳子固定在身上，以免行进间发出响声。

夜寂静得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红军各部分头出发，向双桥镇袭奔。9日凌晨，各部队先后进入指定的位置。时任红28团1营营长的许世友回忆道：

我们隐蔽在双桥镇北面约四里路的一个山沟里，焦急地仰望着夜空，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天刚蒙蒙亮，高建斗团长带领我们几个营长登上附近的一个高地察看地形。

随着缕缕晨雾渐渐消散，不远处的双桥镇隐隐约约地映入眼帘：它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坳里，清澈的澴水河宛如一条碧绿的玉带，由北向南沿镇东漂流而下，在镇子周围，敌人构筑了一道道简易工事。

7时许，攻打双桥镇的战斗打响了。

红10、红11师各1个团分别从镇西北和东北发起攻击，迅速突破守军外围阵地，歼其2个连，夺占了部分高地。

岳维峻并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立即组织部队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发起疯狂反扑。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阵地几次易手。

战至上午10时许，红10师第29团迂回至镇西南罗家湾附近，罗山独立团进抵镇东南小葵山一带，将双桥镇守军四面包围。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在地方党的动员和组织下手执土枪、大刀、长矛前来参战。

见大批红军从四面八方将双桥镇围了个水泄不通，岳维峻这才慌了手脚，急忙通过电台呼叫飞机助战。

没过多久，从武汉方向飞来3架敌机，对红军阵地狂轰滥炸。岳维峻马上又来了精神头，把他的警卫连组成督战队，并亲自指挥2个

团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拼命反扑，企图突出重围。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12时，敌军终于精疲力竭，红4军乘势把预备队2个团投入战斗。许世友回忆道：

高建斗团长指着摊在地上的地图对我们几个营长说："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土桥沟、刘家祠敌阵地，直捣双桥镇，来它个中心开花，尔后向四周扩大战果。大家明白没有？"

"明白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政委扫视了大家一眼说："消灭三十四师在此一举，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活捉岳维峻！"

……

各连按照交代的任务，以班、排为单位交替前进。当三连的同志接近位于半山腰的敌前沿阵地时，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

"冲啊……"指战员们发出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个个像猛虎一样向上冲刺。前面的同志中弹倒下了，后面的同志毫不畏惧地冲上去。

我们突破了土桥沟敌阵地，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刘家祠敌阵地。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在督战队的驱赶下，成群的敌军士兵向红军阵地疯狂反扑。双方展开了一场血战。在打退敌人的最后一次反扑后，红28团尾随溃退之敌穷追猛打，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直插双桥镇。

这时，红11师第33团也突入双桥镇内，对守敌猛烈分割、穿插。敌军指挥中心顿时瘫痪，被分割为数块，阵脚大乱。

当许世友率红28团第1营冲进位于镇西的敌旅部时，旅长张万信还在急促地摇着电话机，要求增援。

"不许动，举起手来！"

随着红军战士们高声断喝，早已惊恐万状的张旅长顿时面如土色，汗如雨下，竟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晕了过去。

双桥镇外围松岭山、长岭岗、尖鸡岗和白马石岗等阵地的敌人，见双桥镇已被红军突破，立马没了斗志，纷纷弃阵而逃。红4军乘势发起总攻，以风卷残云之势追歼逃敌。

岳维峻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但纵使他使出浑身的解术也

挽救不了败局。眼见大势已去，覆灭在即，岳师长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命残部向西北方向突围，自己则虚晃一枪，率亲信向东南方向逃窜。

然而为时已晚。红军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从四面八方向残敌猛攻。一时间，冲锋号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响彻澴水两岸。前来参战的人民群众遍布山头，手摇红旗，呐喊助威：

“别让岳维峻跑啦！”

“活捉岳维峻！”


鄂豫皖苏区军民画在墙上的宣传画——活捉岳维峻

鄂豫皖苏区军民画在墙上的宣传画——活捉岳维峻

“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至下午1时许，战斗胜利结束，国民党军第34师全军覆没。

“捉到岳维峻啦！”人们争相传告着这一喜讯。战士们个个喜笑颜开，那神情就别提有多么自豪了。许世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我们赶到罗家城时，只见村边打谷场上，一个脑满肠肥的大胖子被人群围在中间，他就是敌师长岳维峻。曾几何时，这个一天前还坐着四人大轿、横行无忌的师长，此刻却穿着蓝色长衫，耷拉着脑袋，颓丧地坐在石碾子上。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生动记叙了当时的激战场景：

大白天，我们站在山头上，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扑上来，我军反击下去；阵地被敌夺去，又被我夺回，敌我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格

斗，扭成一团。我们的部队真英勇，发挥了近战歼敌的战术特长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干部带头冲锋、肉搏，伤亡再大都不打退堂鼓，我十师师长蔡申熙胳膊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这个硬仗，鏖战几个小时，难分难解。中午，敌人筋疲力尽，我们下令预备队出击，对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敌人受不住了，很快被我分割全歼，结束战斗。经七个多小时，我军毙敌千人，俘敌五千多人，缴枪六千余支，山炮四门、迫击炮十多门。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敌三十四师（一个师部、两个旅、四个团、一个山炮营、两个迫击炮连）的重大胜利。敌师长岳维峻的马兵骑上他的马逃掉了，岳被我军活捉。

战斗结束后，徐向前从双桥镇出来，匆匆赶往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去会见他的“老上司”岳维峻。

此刻已是黄昏时分，一间小茅草屋里点起了油灯，两名红军战士正看管着岳维峻。

虽说当了俘虏，岳维峻却放不下长官的架子，蹲在地上大嚷：“我要见你们最高指挥官！”

“什么高呀低呀！”徐向前走进屋来，在一条长木凳坐下来，开口就问：“岳师长，你认识我吗？”

岳维峻抬起头来，只见坐在面前的这位红军指挥员，30岁出头，瘦高个儿，身披一件灰土布大衣，皮带上别着一支小手枪。当时红军的服装是不分干部和士兵的，而小手枪却是指挥员的一个标志。往往级别越高，手枪越精小。

岳维峻自然认不出问话的人，满脸困惑地摇了摇头。

“请坐，坐吧！”徐向前指着对面的木凳说：“你真不认识我了？”

岳维峻坐在木凳上，借着昏暗的灯光，对徐向前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着，似乎有些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你是贵人多忘事，我可认识你呀！岳师长，不记得了，你做过我的老上司！”打了一个大胜仗，徐向前心情很好，对岳维峻开起了玩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徐向前

岳维峻顿时呆住了。他知道红军中有不少著名将领或出身黄埔军校，或参加过北伐军，但眼前这位又是何许人也？

“5年前，你在国民军第2军当军长，属下有个第6混成旅，对吧？”

“不错。”

“我叫徐向前，当时在第6混成旅当参谋，是你岳军长的部下。”

岳维峻又惊又喜。是的，当年他的第2军驻扎在河南安阳，有一个黄埔军校来的小军官分在第6混成旅当参谋。那时，他是一呼百应、威风八面的军长，自然不会把一个小小的参谋放在心上。

世事难料，仅仅过了5年，当年的军长竟败在了小参谋的手下，而且败得如此之惨，一时间心中涌出无限感慨，连忙抱拳拱手说：

“对不住，我确实认不得了。望看在我们曾是同事的情分上，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你对我们红军作战，有些什么见解？”徐向前想从岳维峻那里，检验一下红军作战指挥和战术动作还存在哪些问题。

岳维峻忙说：“惭愧，惭愧！战败之人，还说什么哟！”

这位“老上司”，军事上没说出个子丑寅卯，倒是很关心他个人的生命安全，一再要求徐向前不要杀他，如能释放，愿意答应红军提出的一切条件。

徐向前对岳维峻说：“你放心，红军是保证俘虏人身安全的。你要看清楚形势，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和红军，那是白日做梦。红军是剿不尽的！”

岳维峻连连点头：“是的，是的……”

从此，在鄂豫皖苏区流传一个故事——徐向前活捉了“老上司”。

至于岳维峻最终的下场，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

肥头胖脑的岳维峻是个老牌陕军，当过冯玉祥的河南省府督办。一九二五年他任国民二军军长，我是他属下第六混成旅的参谋、团副。当知道我曾是他的老部下时，长叹一声，说：“蒙多多关照，只要不杀我，我答应你们提出的一切条件！”我和曾中生、旷继勋商量，决定留他将来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后来，岳维峻的家属托人与我党中央联系，愿拿出几万块钱赎他。我们也同意，提出要二十万套军装。张国焘来鄂豫皖后，人家给我们送来十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圆，可张国焘变了卦，钱也要，命也要，借口岳组织反革命团体，把他给枪毙了。杀俘虏，是张国焘来鄂豫皖后才有的，破坏了红军的传统。

双桥镇大捷，大涨红军声威，也宣告敌人第一次“围剿”的彻底破产。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

【交战时间】1931年5月16～31日

【交战双方】红一方面军；国民党军18个师另3个旅、3个航空队

【指挥将领】毛泽东、朱德；何应钦

【战果】红军歼敌3万余人

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国民党军损兵折将，蒋介石又恨又怕。恨的是，手下诸将太无能，10万大军竟剿灭不了区区4万红军。在他看来，朱毛红军只不过是一群占山为王的草寇、目不识丁的泥腿子，而且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武器简陋，压根就不是堂堂国军的对手。怕得是，朱毛指挥出神入化，龙冈、东韶两仗下来，竟吃掉了他的1个整师和1个旅15000余人。如此下去，匪患何时能除？

1931年2月初，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

3月下旬，蒋介石增调的第五、第二十六路军以及第52师、第5师4个团全部到达江西境内，连同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第六、第十九路军等部，共计18个师另3个旅和3个航空队，20余万人，分别在雩都、赣州、兴国、万安、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黎川、南丰、康都、建宁等地集结完毕。

鉴于第一次“围剿”惨败的教训，蒋介石改变原先“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制定了“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首先在苏区周围集结兵力，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800里的弧形战线，并实行经济封锁，断绝一切物资输入苏区，然后以“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主力分四路推进，互相策应，以期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分别进至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广昌、康都、宁都、石城、兴国以西和以东等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豪绅武装，巩固与扩大了苏区。

但此时，苏区领导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主席台中坐者为毛泽东，右四为朱德）

这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项英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写道：

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

在洞察到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第二次“围剿”的情况后，3月1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反“围剿”策略问题。

会上，有人提出敌军有20万人，红军只有3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另寻出路。对此，多数人表示反对。毛泽东也坚决反对撤离苏区、另谋出路的主张。他分析了此次作战面临的形势，认为还是要继续采取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入苏区内部，凭借苏区内的有利条件，寻求战机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但由于意见不一致，会议迟迟形不成决议。

形势万分危急，朱德、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中共苏区中

央局先后发出进行反“围剿”准备的指示。红一方面军各级领导机关研究和部署了作战指挥、军事训练、政治动员、给养补给等方面的工作。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决定建立东、南、西、北、中路5个指挥部，将中央苏区划分为10个游击区，并规定各游击区以独立团、警卫营等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10项任务。苏区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和支援红军作战。

3月2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命令，要求主力部队从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向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转移，在新的地区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尽快实现根据地各项工作的重建。红军主力部队到达转移地域后，积极展开工作，全面恢复发展根据地生产。

4月1日，国民党军分四路开始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其中，第十九路军第60、第61师主力由兴国向龙冈、宁都方向前进；第五路军第28师、第47师1个旅、第43师、第54师，分由泰和、吉安、吉水、永丰向东固、潭头、沙溪方向前进；第二十六路军第27、第25师，由乐安、宜黄向大金竹、洛口方向前进；第六路军第8、第24师和第5师4个团，由南丰、康都地区向广昌方向前进。

在红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阻击、袭扰下，各路国民党军行动缓慢，至23日，始进至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界上、横石、广昌之线。

此次“围剿”中央苏区，国民党军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相结合的手段。按照“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每天只前进5～20里，每占一地，即构筑工事和进行“驻剿”；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实行恐怖统治和欺骗宣传；大肆抢劫、烧杀，并毁坏禾苗，屠杀牲畜，制造苏区经济困难；派遣特务潜入苏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挑拨人民群众与红军的关系，扰乱红军的后方。



王明

针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和破坏手段，苏区党政军民采取了一系列对应措施。红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广泛开展游击战，破袭国民党军的后方交通线，袭击其兵站，打击“守望队”和“善后委员会”，迟滞国民党军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进行反“围剿”作战的准备。

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

苏区并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中央代表团进入苏区，是缘于王明的上台。

王明，1904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原名陈绍禹。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沈泽民等人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结识了副校长米夫。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大学实际上成了一所中共“高级党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力图通过这所“高级党校”，培养出一批服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王明对米夫言听计从，讨好卖乖，因此得到了米夫的赏识和信任，成为其得意门生。由米夫在后台撑腰，王明很快就控制了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

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诩的王明，因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支持，俨然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中山大学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即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宗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圣经”，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当作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固定模式，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灵丹妙药。

王明回国后，先是在上海沪东区委做宣传工作，后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和采访员。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接掌中共大权。但王明很不争气，不仅没有得到当时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重用，反而因违反党的纪律受到了批评和纪律处分。这是共产国际特别是亲自培养和扶植王明教条宗派的米夫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亲自来华，扶植王明上台。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会议始终在一片吵闹声中进行。



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写在墙上的标语

为确保王明上台，米夫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拿出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向代表们施压。选举的结果，原来只是一名普通党员的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

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选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此人胸无主见，对王明言听计从。王明实际上掌握了党的领导大权，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重大挫折自此开始。

上台伊始，王明就不遗余力地开始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为此，他采用“钦差大臣满天飞”的办法，先后派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派夏曦、张国焘分别出任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在全国各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手握尚方宝剑，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钦差大臣”，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一大批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或对“左”倾冒险主义执行不力的革命干部蒙冤受屈。

果然，中央代表团一到中央苏区，苏区领导层里便产生了以作战指导思想为主的指挥领导与战略决策上的分歧，突出和直接表现为对第一次反“围剿”战略战术的怀疑，以前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受到干扰。

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举行，讨论反“围

剿”的方针和红军作战方向问题。会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许多人认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应采取“分兵退敌”的策略，即把兵力分散，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项英等人则提出“牵牛”的方针，即将敌军引出苏区外寻找战机打击敌人。还有的人根据中央3月2日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的苏区。

毛泽东坚决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把敌人引到苏区内，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围剿”。他指出：包围中央苏区的敌军虽然很多，但他们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指挥不统一，在苏区里没有群众支持、地形不熟、给养困难，弱点很多。相反，红军不仅熟悉地形，更有群众相助，可谓地利人和俱有，有利条件很多。经过反复讨论，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

在先打哪路敌人的问题上，意见又出现不一致。有的认为先打蔡廷锴部；有的说还是先打朱绍良部。毛泽东认为：四路敌军中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和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战斗力较强，先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而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是蒋介石收编不久的杂牌军，所辖第43、第47、第54师又均是从北方新来的，地形不熟、不擅爬山，且对南方水土不服，战斗力也不强，第28、第77师则在第一次“围剿”中曾被红军痛打，存有畏惧之心，先打王金钰部有取胜把握。然后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苏区，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下一次“围剿”。

为更好地说服大家，毛泽东还打了个形象的比喻：现在敌人的阵势是只螃蟹，两边两只大钳子，中间是个软肚皮。软肚皮好打，但搞得不好，钳子就会夹过来。接着，毛泽东又精辟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的派系斗争：蒋介石一贯借刀杀人，排除异己。红军如果先打中间软肚皮的杂牌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不会积极救援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打蒋（光鼐）、蔡（廷锴），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

钰这路，因为这路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

经过充分讨论后，毛泽东的意见最终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于4月19日签发作战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陈伯钧

次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都、石城、瑞金地区出发，于23日转

到龙冈、上固地区集中。接着从龙冈向西推进20公里，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耐心等待战机。

这一等便是20多天。东固以西离王金钰部进驻的富田只有20公里，3万多红军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隐蔽这么长时间而不被敌人发觉，简直就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红军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东固地处中央苏区腹地，在5个县的接壤处，离各县县城都达50多公里。周围是崇山峻岭，只有5条蜿蜒崎岖的小道通往山外。山内土地肥沃，盛产大米。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早在1927年9月中共就在此领导并发动了东固暴动，并诞生了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经过土地革命后，当地的群众觉悟很高，自觉为红军保守秘密。

但毕竟是3万多人马隐蔽在东固这个不大的山区里长达20多天，还是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困难。最突出的就是粮食问题。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包围和进攻，实行经济封锁，大肆抢夺粮食，恣意破坏生产，使中央苏区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生活本来就极度困难，还要支援红军，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时任红7师师长的陈伯钧回忆道：“那时正是5月份，粮食少，吃饭都成问题。东固的老百姓把所有的粮食都接济了我们。我们也上山采笋子，下田拣田螺，生活很苦。”

5月10日，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推进。第五路军之右翼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于13日由富田地区分两路向东固前进，15日进到桥头江、择龙坑之线；中路第43师由水南进到大源坑、潭头；左翼第54师由严坊进占百富、沙溪。

与此同时，第十九路军之第60、第61师各一部经崇贤、方太向城冈圩前进；第二十六路军之第27师经大金竹向南团前进，第25师进占肖田、东韶、洛口；第六路军之第5师一部和第8师进占头陂、白水后，即在这一带“清剿”，第24师进驻广昌，第56师进至福建省安远汛后，以一部兵力进入江西省“协剿”。

红军在东固山区待机20多天后，终于等到了极好战机。

5月13日，王金钰所部右翼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其中，公秉藩的第28师沿中洞向东固攻击前进；上官云相的第47师1个旅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

当晚10时，朱德、毛泽东发布命令：“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追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敌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

具体部署是：红3军团并指挥红35军为左路军，经江树头、固陂圩迂回到富田侧后进行攻击；红3军（欠第7师）为中路军，沿东固至中洞大道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红4军（并指挥第64师）、红12军（欠第35师）为右路军，分两路抢占九寸岭、观音崖两隘口，尔后向富田攻击前进，红3军第7师和红12军第35师一部位于枫边、城冈及方太、崇贤附近地区，阻击第十九路军；红12军第35师一部位于潭头一带，协同地方武装一部，阻击第五路军之第43、第54师；对第六、第二十六路军，则以地方武装和赤卫军予以牵制。

次日黄昏时分，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第28师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的通报：“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问：“到哪里去？”

富田台答：“东固。”

原来敌人以为红军没有无线电台，所以肆无忌惮地用明码谈话。

毛泽东、朱德果断决定：全军主力立刻从北面的郭宗华师和南面的蒋光鼐、蔡廷锴师之间25公里的空隙中隐蔽西进，钻过这个“牛角尖”，以两翼包抄的方式突然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15日拂晓，红军各部按照上述部署开始行动，快速行进。

能不能顺利钻过这个“牛角尖”而不被敌人发觉，关系到整个战局。毛泽东专门赶到担负正面攻击任务的红3军军部，与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不为人知的小路。毛泽东立刻改令红3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改变使红3军大大缩短行程，争取到宝贵时间，对消灭第28师起到了重要作用。

16日清晨，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排登上了位于东固至中洞大道北侧的白云山。接着，朱德带着总部少数人也登上白云山。

此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红3军主力已埋伏在中洞南侧，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国民党军自进入苏区后，始终没有发现红军主力的行踪，还误以为红军主力远在宁都地区，便放心大胆地向东固急进。

待第28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红3军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毫无应

战准备的第28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没有抵抗多久，便四处逃窜，全师崩溃。许多年后，师长公秉藩回忆道：

五月十六日早晨，我和平常一样，清晨运动完毕，率师直属部队从固陂圩出发。……在一声枪响下，步枪、机关枪齐发，山鸣谷应，响彻云霄。正在行进中的部队被打乱了，有的人马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横倒竖卧在山路和两旁的田地上。尚未死亡的官兵乱成一团，莫知所措。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遗址——白云山

战至下午4时许，红军将第28师大部歼灭。公秉藩了解红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便乘乱换上一套士兵的军服，冒充营部文书混入俘虏群中，在接受一番政治教育并领了3块银圆的“回家路费”后侥幸逃脱。副师长王庆龙则没有公师长的“机智”，带着手下卫士拼死向外突围，结果被当场击毙。

与此同时，右路军之红4军、红64师，向第47师1个旅展开攻击。经激战，将其大部歼灭于富田、东固之间地区，残部逃向水南。担任迂回任务的左路军红3军团、红35军，攻占固陂圩，歼灭第28师兵站，当夜进占富田。红12军主力转向大源坑、潭头方向进攻，第43师逃向水南。

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17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水南追击。逃向水南

之国民党军，因在潇龙河上架设的便桥已被赤卫军拆除，河水深不能徒涉，便转向白沙。红3、红4军跟踪猛追，红3军团也直插白沙河附近。

19日，各路红军在白沙截住了正在仓皇撤退的上官云相第47师残部和郭宗华第43师1个旅，当即发起猛烈攻击。早已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毫无斗志，争相逃命。红军将士个个如下山猛虎，猛冲狠打，没费多大劲，便将这股敌人全歼，共俘3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

与此同时，红12军攻占沙溪，驻藤田的郝梦龄第54师连夜逃往永丰；第十九路军也由城冈撤回兴国，随后又撤到赣州。

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次战斗——白沙战斗胜利结束了。时任红36师师长的张宗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郭宗华部在十八日晚仓皇向白沙撤退，红三十六师连夜跟踪追击，俘获甚多。我们师有一个送饭的炊事班竟俘虏了敌人一个迫击炮连。战士们形容敌人的狼狈情形时说：简直像打土豪时一个样，我们一进村，敌人不抵抗就缴了枪。

这次战役，红军大部队几万人在敌前集结了二十多天，敌人竟毫无察觉，不能不说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和诱敌深入予以歼灭的战略战术方针无比英明正确。那时，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防止坏人给敌人通风报信。由于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分得了土地，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又受到第一次“围剿”胜利的鼓舞，对革命战争充满了胜利信心，支前热情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坏人也不敢公开活动，加之红军在接近敌人的地区实行封锁，断绝了和敌人据点的一切往来，所以，没有走漏任何消息。二是大军云集一地，部队生活问题，如粮油盐的供应、烧柴吃菜等等，都难以解决。由于军民一心、士气高涨，粮油盐都由总部和地方政府统筹解决。

两仗获胜后，红一方面军按预定计划，继续向东横扫，扩大战果。

这时，高树勋的第27师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的第54师，其先头部队第81旅于21日抵达中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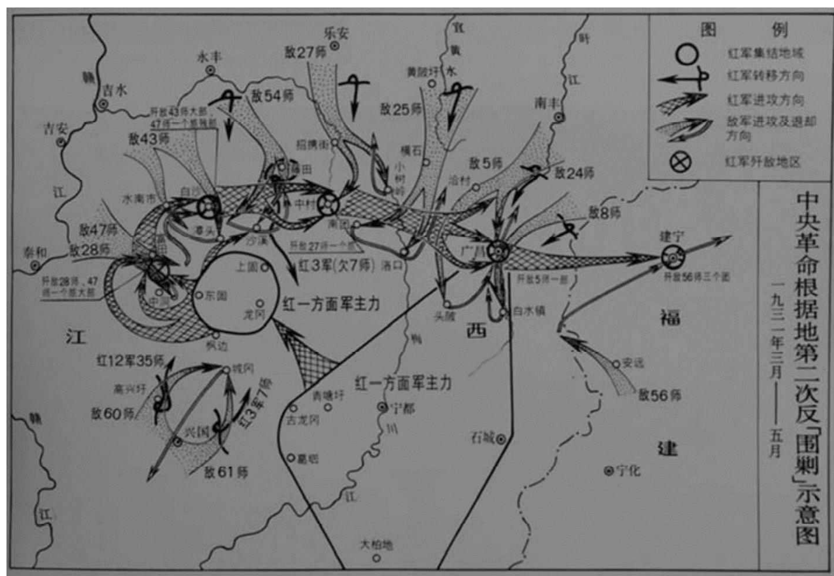
当日，红一方面军前锋部队也进至中村附近，即与第81旅的先头部队交火。战斗十分激烈，红军给予敌先头团重创，并击毙团长王广田。高树勋得报后，立即率师部和第80旅向中村疾进增援。

据此，朱德、毛泽东决定红4军和红3军团分两路攻歼中村之敌。

战斗于22日拂晓打响。红军向中村发起猛攻，全歼第81旅，重创第27师师部，残敌窜回乐安。当晚，驻东韶的李松昆第25师仓皇撤回宜黄。

红军三战三捷，各路“围剿”军闻风丧胆，纷纷后撤。其中，第六路军所属胡祖玉第5师、毛炳文第8师、许克祥第24师由白水、头陂等地向广昌收缩兵力，并自23日起，按第8、第24、第5师的顺序由广昌向南丰撤退。

24日晚11时，毛泽东、朱德下达“方面军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城”的命令，随后率红一方面军总部于次日到达宁都和广昌交界处的洛口圩严坊村。在这里，毛泽东、朱德等召集会议，研究决定方面军主力于26日开到广昌县城西北的苦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第5、第8、第24师。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示意图

毛泽东率总部进驻苦竹后，再次召集会议，研究当面敌情，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遂改变全力攻取南丰的原有部署，决定乘第5师4个团未及撤离广昌之机，攻歼该敌。

具体部署是：以红3军经甘竹向南丰方向急进，追击北撤之第8、

第24师；以红4、红12军攻击广昌城；红3军团为攻城总预备队。

广昌，位于闽赣交界的赣东南方向，南达宁都、石城，北通福州，地处几条交通要道的汇合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广昌县城坐落在群山环抱的盱江左岸，西北山高约200米，绵延数公里，东南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带。

27日晨，红军冒雨直逼广昌城下，从北、西、南三面发起猛攻。守敌凭坚顽抗，掩护主力向南丰撤退。激战终日，红军于当晚9时攻克广昌城，歼第5师1个团，师长胡祖玉受重伤后死去。

红军攻占广昌城后，归第六路军指挥的刘和鼎第56师仓皇从安远撤回建宁县城。

28日，毛泽东在广昌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总前委在决策时考虑到：鉴于国民党军朱绍良部的3个师向南丰退却，桥梁又遭破坏，已追赶不上，同时从整个战略形势考虑，会议决定再次调整作战部署，不攻南丰城，改为向东打第56师，夺取建宁县城。

具体部署是：红4军第10师北进，配合红3军继续追击第24、第8师和第5师余部；令红4军主力留广昌城开展工作；红一方面军总部率红3军团和红12军主力日夜兼程，向东疾进，直指建宁。

建宁，地处闽赣边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刘和鼎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会打建宁城，而且来得如此神速。

30日，红军进到建宁城以西地区，次日突然向建宁城发起攻击，于18时攻占该城，歼第56师3个多团，缴获颇丰，仅西药就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

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胜仗，也是这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次战斗。

从5月16日至31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的紧密配合下，横扫700余里，连续作战，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挺），炮30门，电台2部，并占领赣东、闽西北广大地区，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兴奋之余，毛泽东挥笔疾书，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交战时间】1931年6～9月

【交战双方】红一方面军；国民党军23个师又3个旅、5个航空队

【指挥将领】毛泽东、朱德；何应钦

【战果】红军歼敌3万余人

1931年6月，第二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枪炮声刚刚平息了20多天，不甘失败的蒋介石飞抵南昌，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这次，蒋介石信心十足，发表《为“围剿”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聘请了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参与策划，任命心腹爱将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并不惜血本，将其嫡系部队陈诚的第14师、罗卓英的第11师、赵观涛的第6师、蒋鼎文的第9师、卫立煌的第10师，共10万人调到江西，连同原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和新调来的非嫡系部队，参加“围剿”作战的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计30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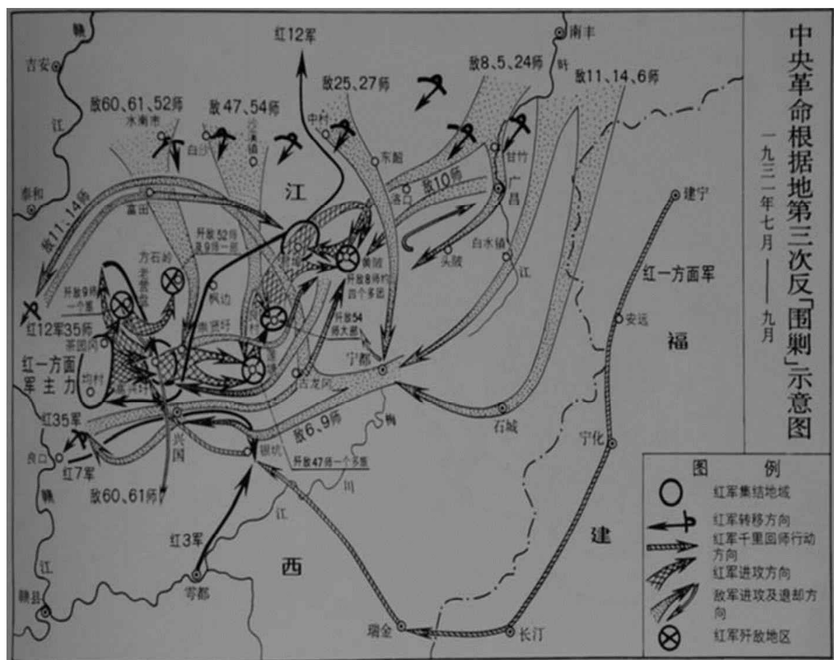
此番“围剿”，蒋介石吸取了前两次失利的教训，决定改“步步为营”为“长驱直入”的方针，企图首先消灭红军主力，摧毁苏区，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具体部署是：

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赵观涛的第1路进击军（第6师）、陈诚的第2路进击军（第18军第11、第14师）、朱绍良的第3军团（第六路军第5、第8、第24师）、蒋鼎文的第4军团（第9师），从南城地区向中央苏区实施进攻，寻求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蒋光鼐的第1军团（第十九路军第60、第61师和第52师）、孙连仲的第2军团（第二十六路军第25、第27师）、上官云相的第3路进击军（第五路军第47、第54师），从吉安、永丰、乐安方向深入苏区，实行“进剿”。分驻南昌、吉安、樟树等机场之空军第1、第3、第4、第5、第7队，支援左、右集团军作战。另以第10师和攻城旅为总预备军，位于临川地区；以第77、第28师和第12师第34旅，位于吉安、泰和、万安、赣州等地，担任“清剿”，维护后方，并拦阻红军西渡赣江；以第23、第79师和骑兵第1师

位于南城、临川、樟树镇地区，担任“清剿”和维护后方；以第49、第56师和新编第4旅位于闽赣边境，防堵红军东进。此外，还将第53师从河南省调往江西吉安待机。

对此次“围剿”，蒋介石信心十足，曾对手下人说：“这次‘围剿’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他严令各路将领：“限三月之内‘肃清’江西共军，如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自刎首级。”

6月25日，蒋介石收到情报，将在宜黄、南丰以南地区活动的红3军第9师和红4军第12师误认为红一方面军主力，遂下令进攻，并令第10师归左翼集团军指挥，以疾风暴雨之势向中央苏区“长驱直入”。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示意图

从7月1日起，左翼集团军主力在何应钦指挥下由南城地区出动，至6日，进占黎川、樟村、康都等地，继续向中央苏区推进。与此同时，右翼集团军由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等地区出动，向富田、东固、崇贤、沙溪、莲塘、招携、宁都方向前进。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闽西北、闽西、闽赣边和赣南等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客观地讲，第三次“围剿”来得如此之快，的确出乎红军领导人的意料。

6月底，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南丰康都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分析当前敌情。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后，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充分的休整，就要面对30万敌军的多路进攻，形势十分危急。后来朱德回忆道：“我们知道这一次比第一、二两次更困难了，知道硬打是不行的。”

会议研究决定不管敌人分几路进攻，红军仍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到赣南中央苏区腹地兴国、雩都、宁都、瑞金一带，寻找战机，实行反攻，以打破“围剿”。

敌军重兵压境，气势咄咄逼人，留给红军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命令留驻赣南的红军独立第4、第5师和红3军第9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以南地区，红4军第12师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协同当地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以运动防御和游击战，牵制敌军，迟滞敌军前进；红3军团、红4军主力、红12军由闽西、闽西北、闽赣边和赣南等地迅速收拢部队，回师赣南。

与此同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向苏区各级党组织、政府发出紧急通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支援和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作战；并命令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7军、红20军军部及第175团东渡赣江，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7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冒着盛夏酷暑，忍饥挨饿，昼夜兼程。经过十多天的急行军，于22日前到达雩都以北的银坑、琵琶垄、平安寨、桥头地区，同由雩都、瑞金北上的红3军主力、红35军和由赣江以西赶来的红7军及红20军军部和第175团会合。

红军主力会师后，隐蔽在赣南的深山峡谷里休整。28日，秘密转移到兴国县城西北的高兴圩地区，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

当天，毛泽东、朱德等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红军随即一边休整，一边转入反攻作战准备。

此时，国民党军进入苏区已经快一个月了，东奔西突，虽然相继进占广昌、宁都等地，却屡屡扑空，始终无法找到红军主力，冤枉路

倒是没少跑，武力“围剿”变成了“武装游行”。加之天气酷热难耐，地形不熟，时常受到小股红军和地方武装的袭扰，狼狈不堪，锐气挫去了一半。

朱德曾回忆道：“他们追着追着，天天爬山，还没接火，已经不知累死热死好些了。”

直到7月底，蒋介石才得悉红军主力集结在兴国地区，便错误地判断红军可能西渡赣江，遂以主力9个师分路向兴国地区猛扑过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围歼之。

7月3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得悉国民党军正向兴国方向行动，其右侧后富田、头陂、新安一带仅有3个团防守，由富田往东的后方联络线上，兵力也较薄弱。

毛泽东、朱德决心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以红军主力由高兴圩地区秘密北移，首先突破富田一点，当即向全军发布命令：“本方面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先夺取富田、新安。”

当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向富田开进。

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当红军先头部队进到石陂以北时，发现第2路进击军陈诚的第14师、罗卓英的第11师已抢先进占富田，显然红军的行动意图已为敌所知。

敌变我变。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改变原先作战计划，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于8月4日折返高兴圩地区，另寻战机。

这时，各路国民党军纷纷逼近，云集在兴国及其周围地区，将红军团团包围。红军处于北、东、南三面受敌，西临赣江的极端危急局面。

毛泽东、朱德临危不乱，认为进驻富田的陈诚的第2路进击军，进至白石、崇贤地区的蒋光鼐的第1军团，进至兴国地区的赵观涛的第1路进击军和蒋鼎文的第4军团，多为蒋介石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而正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3路进击军系杂牌部队，战斗力相对较弱，遂决定先拿上官云相开刀。

具体部署为：以红35军、红12军第35师和独立第4、第5师，协同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伪装成红军主力，以积极行动，将第2、第1路进击军，第4军团向万安、良口方向牵引，将第1军团牵制在白石、崇贤地区；集中红一方面军主力向东突进，实行中间突破，求

歼向莲塘前进的第3路进击军，尔后进击龙冈、黄陂，调动敌人于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扩大战果。

5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兴国、崇贤两地国民党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中向东急进。

时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红军将士们踏着打滑的山间小路，悄悄翻越陡壁悬崖，沿着深壑峡谷，迅速向东疾插。经过10多个小时的昼夜行军，于6日午前到达莲塘，隐蔽待机。

国民党军对红军的这一行动毫无察觉，第1、第2路进击军在红35军、红12军第35师的牵引下，正扑向赣江边；而第3路进击军则由良村分两路向莲塘、城冈前进。

6日午后，红军侦察获悉第3路进击军已进到莲塘以北30里的良村，其先头部队第47师第2旅已到莲塘附近。毛泽东、朱德认为这股敌人是各路“进剿”军中战斗力较弱的一支，且又是刚从北方调来的部队，不熟悉南方山地作战，便决定集中兵力歼灭该旅，尔后向北进击，求歼第3路进击军主力。

7日晚，红3军团、红4军和红7军秘密接敌。8日拂晓，乘敌不备，突然发起攻击。红军将士们从隐蔽的山冈上如天兵天将般冲杀下来，同敌军展开白刃战。敌人的强大火力还没来得及施展，便被英勇的红军冲得阵脚大乱。仅仅用了2个小时，红军就全歼第47师第2旅和从良村增援的1个营，击毙旅长谭子钧。上官云相被杀得魂飞魄散，只带了两三个参谋副官和几个卫士逃回龙冈。

红军乘胜向良村急进，途中与由良村出援的第54师第160旅遭遇，歼其1个团，该旅余部逃向良村。红军衔尾猛追，于13时许攻入良村，又歼刚由城冈撤回良村的第54师师部和2个旅的大部。

莲塘、良村战斗后，红一方面军以红3军佯攻龙冈，主力东进，围歼刚从君埠、南陵等地缩回黄陂的第3军团之第8师。

11日晨，红军进到黄陂附近。中午时分，红军向黄陂发起攻击，一举突入村内，歼第8师2个团。下午3时，第8师残部分向洛口、宁都突围，红军在追击中又歼其2个团。随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转到君埠以东地区休整。莲塘、良村、黄陂战斗的胜利，使红军从被动中夺得了主动。

在接连遭受重创后，蒋介石、何应钦如梦初醒，始知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由兴国西北地区东进，并估计可能北出临川，遂于8月9日起，令第1、第2路进击军和第1军团掉头向东，企图协同由广昌西进的第

10师，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于宁都以北地区。

12～15日，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的集中地域——君埠以东地区。

根据这一严重情况，毛泽东、朱德决定以红12军（欠第35师）向乐安方向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西返兴国县境内隐蔽休整。

16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利用夜暗，从正在东进的国民党军第1军团和第2路进击军之间10公里间隙的大山中穿越过去，跳出国民党大军的合围圈。

次日晨，红一方面军主力回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并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会合。与此同时，红12军则扬旗鸣号，大张声势地向东北方向行动，并以一部兵力攻占乐安县城。

蒋介石果然上当，误认红12军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并判断红军将进攻宜黄，威胁临川，遂急调其第10师返回临川，令第1、第2路进击军等部追击红12军。

红12军主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将国民党军主力一部拖了近半个月，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西移和休整。



苏区人民群众踊跃支援反“围剿”斗争

转眼间到了8月底，蒋介石才发觉红军主力已由君埠以东地区西去，气急败坏，遂以其第1军团为先头，其他各部随后，再次西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为进一步调动和疲惫国民党军，毛泽东、朱德于9月初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地区隐蔽待机。

此时，各路“围剿”军在中央苏区内来回奔波已达两个月，完全陷于被动，疲于奔命，几乎天天都被红军牵着鼻子走。

那真是一种磨死人的穷追瞎堵，频繁调动，路途遥远，山陡水急。除其3个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外，其余各部也受尽了苏区人民群众、地方武装坚壁清野和不断袭扰的困苦，士气急剧下降。全军上下牢骚满腹，怪话连连，“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

红军三战三捷之后，又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士气更加旺盛。战场上国民党军被动、红军主动的形势更为明显。

此间，广东、广西两省军阀利用蒋军主力深陷江西之机，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实行总退却。

9月6日晚，红一方面军总部得悉兴国地区国民党军正沿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首先抓住兴国地区北撤之敌一部歼灭之，尔后视机扩张战果。具体部署为：

红3军、独立第5师迅速抢占老营盘，断敌退路；红3军团、红4军（并指挥第35师）、红35军进攻高兴圩及其南北之敌；红7军牵制兴国之敌。

7日拂晓，国民党军第4军团由兴国地区向北撤退，其先头独立旅撤到老营盘附近时，红3军一部切断了该旅与第4军团后续部队的联系。随后，红3军、独立第5师向独立旅发起迅猛攻击。激战至14时许，将其全歼。

与此同时，红7军向兴国进逼，牵制第52师；红3军团、红4军（并指挥第35师）、红35军向高兴圩地区之国民党军第60、第61师发起攻击。激战至8日，毙伤敌2000余人，战斗形成对峙。红军为保持主动，遂即撤出战斗。

13日，国民党军第4军团主力和第52师分别由长迳口、兴国等地向吉安撤退，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该部实施追击。

15日拂晓，在第4军团主力通过方石岭隘口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赶到，一部抢占了方石岭，截住第52师及第4军团的1个炮兵团和1个步兵营，并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随即发起猛攻。

战至9时，红军将被围之敌全歼。其他各路国民党军纷纷撤至吉安、永丰、宜黄、南城、南丰、广昌、宁都、赣州等地。

至此，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在苏区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红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往返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避强击弱，速战速决，共歼敌17个团3万余人，其中俘1.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5万余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电台6部。作战中，红3军军长黄公略、红4军师长曾士莪、红3军团师长邹平牺牲。

黄安战役

【交战时间】1931年11月10日～12月23日

【交战双方】红四方面军；国民党军第69师

【指挥将领】徐向前；赵冠英

【战果】红军歼敌1.5万余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沈阳北大营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难当头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放地撤到关内，致使松辽大地山河变色，3000万同胞在日寇铁蹄下惨遭蹂躏。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人民群众，纷纷集会，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对日宣战和准许组织抗日团体。许多地区的工人节衣缩食，捐款购买飞机，支援抗日。海外侨胞也通电呼吁出兵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部分官兵也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然而，蒋介石依旧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准他的军队和人民抗战，反而加紧“剿共”，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9月着手筹划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至11月，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集结的兵力增加到15个师。具体部署是：

豫东南地区是汤恩伯第2师、曾万钟第12师、陈耀汉第58师、戴民权第45师，共4个师的兵力；鄂东地区是彭振山第30师、张印相第31师、葛云龙第33师、赵冠英第69师、肖之楚第44师、夏斗寅第13师、徐源泉第48师，共7个师的兵力；皖西地区是岳盛瑄第46师、阮肇昌第55师、李松山第57师、厉式鼎第7师，共4个师的兵力。



1931年9月28日，南京、上海的学生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门前集会示威，要求国民党出兵抗日

另外，徐庭瑶第4师、俞济时南京警卫师分别由河南、南京调来武汉，张钫第二十路军也向信阳集结，准备参加此次“围剿”作战。

但由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高潮，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许多地方军阀借机反蒋，因此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开始，国民党军仍处于分散防守状态。

面对敌人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围剿”，鄂豫皖区党委和红军抓紧休整，发展地方武装，深入开展政治动员，筹集粮食资材，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各项准备。红军士气和群众情绪极为高涨，根据地再次掀起了参军拥军热潮。

10月25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抽调红4军第10、第11、第12师部分部队，在安徽省六安县麻埠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邝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暂辖第73师，原红12师师部改编为红25军第73师师部，刘英任师长，吴焕先任政委。红25军成立后，即在皖西一带活动。

2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提出：“我们要进攻敌人，根本不让他们的第三次‘包围会剿’计划能够实现，我们要在他们布置未妥的时候，就先把第三次‘包围会剿’打破，然后乘胜前进，求得更伟大的胜利。”

11月7日，黄安县七里坪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七里坪，位于黄安县城正北，是个不小的集镇，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集镇上有条主要街道，两旁开着些小店铺，非常热闹，名曰“列宁街”。这天，居民的屋墙上、店铺有门板上、路口的树干上，到处是五颜六色的标语，到处都是迎风招展红旗。

鄂豫皖中央分局在七里坪西边的河滩上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十四周年。会场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刀枪林立，人山人海，不时响起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

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盛会。就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宣告正式成立了。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下辖第4、第25军，总兵力近3万人。红4军军部由方面军总部兼，下辖第10、第11、第12师（由原第13师改编，原第12师的2个团分别编入第10、第11师），归总部直接指挥。第10师师长倪志亮、政委甘元景，第11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第12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杞。红25军，军长邝继勋，政委王平章，下辖第73师。

当天，为庆祝红四方面成立举行了阅兵式。除红73师留在皖西活动外，方面军总部及各师部队都整整齐齐地在河滩上列队。王树声担任阅兵式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检阅了部队。

时年30岁的徐向前，身着灰布军装，神情严肃而威武。阅兵后，他发表了简短有力的讲话：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苏区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标志，是党领导鄂豫皖苏区人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四年英勇斗争的胜利成果。最后，徐向前号召全体指战员，团结一心，戒骄戒躁，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努力奋斗。

时任红4军第12师第34团团长的许世友回忆道：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标志，也是我们鄂豫皖军民的一件大喜事。同志们拍红了手掌，喊哑了嗓子，沉浸在极度的欢乐之中。

我站在整齐的队列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四年来，鄂豫皖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这是党领导鄂豫皖人民坚持武装斗争的结果。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发起黄安战役，主动进攻敌人，以打乱南线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进一步巩固和扩

大苏区。

黄安，地处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北接河南新县，南连武汉新洲，西界大悟、黄陂，东邻麻城，公路交通十分便捷，是鄂东北重镇，也是国民党军靠近鄂豫皖苏区中心的一个突出的据点，处于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包围之中。

驻守黄安城的是国民党杂牌军第69师，下辖2个旅4个团，战斗力不太强，9月才从豫西移驻黄安，人生地疏，城内粮食不多，主要靠后方运送接济。加之屡遭红军游击袭扰，士气较为低落。

师长赵冠英，只有一只眼，人称赵瞎子，原是湖北的地头蛇，惯匪出身，奸诈狡猾。自驻防黄安城后，第69师修筑了许多工事，碉堡林立，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

具体部署是：师部及第206旅驻守城内，第207旅1个团驻西城垣外王家畈、陈家畈、潘家湾地区，并以1个营前出下徐家建立独立据点，该旅另1个团驻北城垣外课子山、长林塝、田铺湾地区，并以1个营前出和地方反动武装在东王家建立独立据点；配属该师指挥的第30师1个团防守城南桃花店和西南高桥河，以保障黄安城侧后安全，维护通向黄陂、宋埠的供应线。同时还可以得到驻守宋埠的葛振山第30师、驻守麻城的张印相第31师、驻守黄陂的葛云龙第33师的策应。

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认为黄安是南线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揳入苏区的一颗钉子，应当首先把它拔掉。但对黄安城实行强攻显然不行，毕竟红军火力不强，既缺少重武器，也没有炸药及其他爆破器材，以现有的武器装备去强攻敌人坚固设防的据点，只能增加无谓的伤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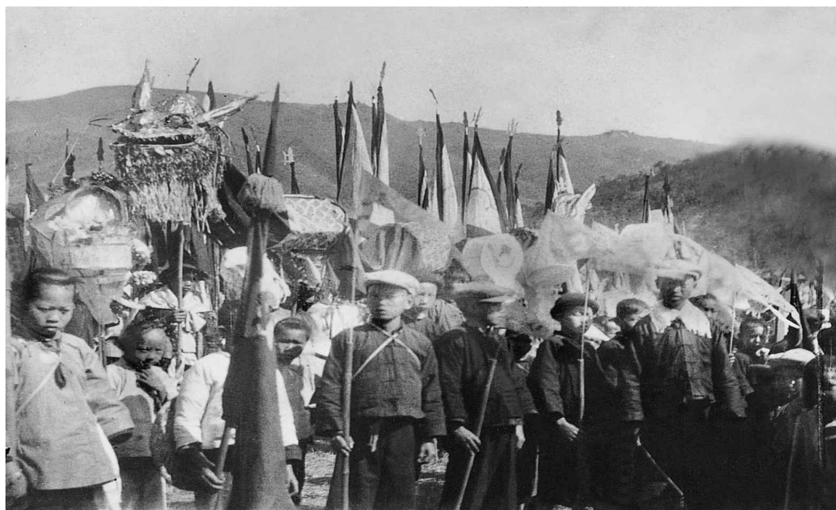
于是，徐向前想采用诱敌出城，在运动中予以歼灭。但老奸巨猾的赵冠英能出来吗？如果宋埠、麻城、黄陂的敌人来援，又该怎么对付呢？

经过几天深思熟虑，徐向前、陈昌浩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一部兵力牵制豫东南和皖西之敌，集中红4军主力7个团和黄安独立团攻占黄安，并提出“长期围困、逐步削弱、创造条件攻城歼敌”的作战方案：

第一步，以陈赓的红12师进攻城西敌据点，以王树声的红11师和黄安独立团拔掉城南桃花和高桥河据点，扫清外围，切断敌联系，以红10师第30团为预备队；第二步，大举围城，并准备打击宋埠、黄陂方向可能来援之敌；第三步，待条件成熟时，发起攻城，歼灭守敌。

会上，大家热烈地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这个作战方案既可行又稳妥。如果能全歼黄安守敌，就可以粉碎敌人的围攻。

10日夜，红军开始对黄安外围据点展开攻击。至20日，红4军和黄安独立团先后攻占黄安城北东王家、城西下徐家和桃花店、高桥河等外围据点，歼守敌1个团又2个营及部分地主武装，完全切断了黄安守敌与宋埠、黄陂敌人的联系，顺利完成了战役第一步任务。



人民群众热烈庆祝反“围剿”胜利

徐向前遂即调整作战部署，命令陈赓指挥红12师和黄安独立团继续围城，王树声指挥红11师在永佳河至桃花一线构筑多道防御阵地，准备打击来援的敌人，以红30团作为总预备队。

时值严冬，黄安城内给养捉襟见肘，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起来。守军仍穿着单衣，饥寒交迫，粮弹两缺。

22日上午，赵冠英指挥第206旅一部出击桃花店，实施反扑，企图恢复与宋埠、黄陂的联系，结果被红12师击退，未能得逞。

第二天，不愿坐以待毙的赵冠英命第206、第207旅各1个团再次向桃花店出击。

红34团正准备迎战，师部来人传达命令：“师长命令你们撤至五里墩东侧隐蔽待机！”

“为什么？”团长许世友不解地问。

“师长说徐总指挥要摆一个口袋阵。”

许世友回忆道：

我一下子明白了：在敌外围据点未被我攻占以前，把敌人堵在城

内是正确的打法；现在是赵冠英孤军作战，我们完全可以诱敌远离城

池，在野外予以歼灭。

“撤！”我高兴地把手一挥，带着部队向南转移。

见没有遇到红军的阻击，黄安城里的赵冠英一扫连日来的惆怅，兴奋无比地下令：火速向南猛突，冲破红军的包围圈。

中午时分，气势汹汹的敌军进至郭家岗以南的五里墩、陡埠河地区，一头钻进了徐向前事先设好的“口袋”里。红30、红34、红35团分别由东、南、西三个方向杀出，猝不及防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丢盔卸甲，狼狈逃回了黄安城。

两战下来，红军俘敌1000余人，缴枪700余支，迫击炮1门。赵冠英真正领教了徐向前的厉害，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命令紧闭城门，死守待援。

红军乘胜从四面八方紧缩包围圈，红34团夺取东关，红35团进抵南关，红36团直捣西关，黄安独立团也由北面向黄安进逼，将小小的黄安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红军把赵瞎子围住了！”

消息传到黄安及附近各县。成千上万的群众无不欢呼雀跃，立即掀起了支前高潮。赤卫军挥舞着土枪、梭镖、大刀、鱼叉、扁担、钉耙投入战斗；慰劳队送来了粮草、猪肉、鸡蛋、活鱼、糕点；妇女们不分白天黑夜地为红军将士们烧水做饭、洗衣缝补、救护伤病员；就连十一二岁的小娃娃们也在各个交通要道上站岗放哨，检查路条……

与此同时，各地的赤卫军和游击队在敌人据点附近积极活动，打岗哨、砍电线、散传单，搅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

快来！

兄弟姐妹们！

排好队，呼口号，欢送我红军。

攻下黄安城，活捉赵冠英

……

快送，

快送糍粑，

快送草鞋，

拥护我红军。

……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这几首歌谣正是当时军民围困黄安城的真实写照。

眨眼间又是十来天过去了，赵冠英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眼见围城的红军没有丝毫撤退的迹象，包围圈一天天缩小，如同套在脖颈上的绞索，勒得他透不过气来，这可如何是好。

思前想后，赵冠英只有每日登上城楼远望，盼援兵早日到来。虽明知这是幻想，然而也只有此一线希望了。援兵为什么还不来？

赵冠英哪里知道，此时徐向前也正在盼着敌人的援军出现呢！因为围点打援的目的，着重在打援，援军不出动如何打？徐向前回忆道：

敌军在城里筑工事，我军在城外筑工事。他出来我们就打，不出来则困在城里，有耗无补，难乎为继，干着急。赵冠英两次派兵出城，企图向南突围，均遭到我军致命回击，被迫逃回城去，南关亦被我占领。敌机前来投粮，往往投到城外红军阵地上。饥饿的敌人出城抢粮，屡遭杀伤，一筹莫展。红军和赤卫军乘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弄得赵冠英频频告急求援。

12月7日，驻守宋埠的葛振山第30师2个旅共4个团企图经永佳河增援黄安城。徐向前成竹在胸，立即命令担任阻援任务的王树声，以红11师1个团从正面节节阻击，诱敌深入，待敌进至主阵地前，另2个团从两翼迂回包抄，予以歼灭。

战斗打响后，红11师第33团在大小峰山稍作阻击后，即按计划撤至五云山、周家坳一带的第二道阵地。见没有费多大气力就占领了桃花店，援敌不知是计，以为红军根本不是对手，便于次日向红11师第二道阵地发起攻击。红11师第33团在予敌杀伤后，假装不支，又撤至黄安城南十里铺附近。

援敌气焰更加嚣张，集中2个团的兵力向红军猛扑过来。红33团依托阵地坚决抗击，拖住敌人，红11师另2个团则悄悄向敌军两翼猛插，突然展开坚决而有力的反击。

这时，敌军才如梦方醒，无奈阵脚大乱，根本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纷纷后撤逃命。红11师乘势发起冲锋，歼灭援敌1个团，残敌连夜逃回宋埠。敌人第一次增援黄安的行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

18日，不甘心失败的敌人组织了第二次增援。

这次敌人出动了3个旅共6个团，以黄陂第33师的2个旅和宋埠第30师的1个旅，从歧亭、宋埠之线，分两路大举北援。右路之敌猛攻大小峰山，左路之敌猛攻独山、研子湾高地，先后占领了桃花、五云山等地。

20日，援敌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从午后起猛攻嶂山红军阵地，并突破前沿，逼近红11师指挥所。红11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当即组织手枪队、通信队、机关人员及红31团一部与敌激战、肉搏，情况万分危急。

眼见援军进展顺利，马上就要撕开红军的包围圈了，黄安城里的赵冠英欣喜若狂，立即组织部队准备冲出城外，来个里应外合。

下午4时许，方面军指挥部驻地已能听到两面敌人的枪声。很明显，若不把增援的敌人击退，让它与城内守敌会合，黄安战役就要功亏一篑。

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命令总预备队红30团由嶂山以西倒水河向敌左侧迂回，调红12师第35团配合红33团从嶂山以东王家湾向敌右翼包抄，红32团协同红31团由嶂山正面向敌猛烈反击。

战斗极为激烈，红军将士与敌人展开肉搏。成败在此一举。徐向前果断地将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手枪营拿了出来。手枪营装备精良，官兵每人配备一长一短两支枪，外加一把马刀，是方面军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时任手枪营第2连连长的秦基伟，许多年后在《故乡的战斗》一文中，生动地叙述了当时的战斗情景：

我军经过了十多天的穿插、分割的外围战斗，敌人城外的整个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打乱。敌曾两次前来增援，都被我军击退……一天拂晓，敌人集中其全部兵力，趁我一个前卫排一时的疏忽，突破了我军阵地……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全连刚跑出村庄，便远远地看到徐向

前总指挥带着几位参谋和警卫人员，骑着马，向着枪声最密的一个山头飞跑。我们二连经常跟随徐总指挥活动，因此不论干部和战士，都非常熟悉总指挥。特别在战斗中，我们都摸到了一个规律：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总指挥就出现在哪里。

……我们一口气赶到打援部队的最后一个山峰背后，……唯有总指挥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几棵马尾松下，用望远镜向前瞭望。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打在马尾松上，飞到他的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总指挥这种在紧急情况下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的情形，我们看到过无数次了。

……忽然，总指挥身子向右一侧，右胳膊上流出了鲜血。我马上跑过去，总指挥看我想去照顾他，左手向山下指，高声向我喊着：坚决把敌人压下去！徐向前回忆道：



英勇的红军战士

战争年代，我们都把死伤置之度外，毫不在乎。有次吃饭，一发迫击炮弹落在我们的房顶上开了花，大家照样吃饭，谁也没给炸着。又有一次，我站着指挥战斗，一发炮弹打来，在前面距我三四米的地方开花，但没炸着我。巧不巧？我站的地方，前面是个坑，坑边有埂子。炮弹落在埂子那侧炸开，弹片都飞向前方。我的指挥位置要是再向前一点，准保不死即伤。大概是一九三二年初打仁和集，一颗子弹

打在我背上。我把衣服扒开一看，弹头在衣服上。因为前面有层麦秸挡了下，我穿的又是棉衣，所以没打进背里去。还有一次，警卫员在我后面走，飞来颗子弹，把他给打死了。走在前面的人没吃上子弹，走在后面的倒吃得上。战争就是这样，说说笑笑，嘻嘻哈哈，一个弹头飞来，就能把你打死。战场上，子弹、炮弹经常落在身边，怕死还行？怕死就不能打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沉着坚定，从容不迫，很重要。遇到危险，你自己首先慌张起来，怕得要命，部队不乱套才怪呢！

徐总指挥亲临前线指挥，还挂了彩，极大地激起了红军将士的昂扬斗志，个个奋勇争先，向敌人展开猛扑。附近的群众和赤卫队、游击队也纷纷投入战斗。

一时间，漫山遍野，红旗招展，杀声震天。红军各部队的掌旗员高举着红旗，哪里敌人多就冲向哪里；红旗指向哪里，战士们就杀向哪里。

在英勇的红军战士面前，敌人终于支撑不住，掉头逃窜，第二次增援黄安城的行动又以失败告终。此战，红11师打退了敌人6个团的疯狂进攻，毙1000余人，俘800余人。

赵冠英又空欢喜了一场。而陈赓指挥红12师和黄安独立团步步紧逼黄安城，包围圈一天比一天缩小，守敌已到了“拆毁民房当柴烧，杀猫宰狗做口粮”的境地。赵冠英真正成了瓮中之鳖，插翅难逃，不禁哀叹道：“危城绝地，孤军挣扎，天寒地冻，人尽夏衣，困处重围，粮弹俱绝。”

在此情形下，红军对被围之敌开展强有力的政治瓦解工作。许世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战士们把标语牌插到了阵地最前沿，用自制的小弓箭把传单射向黄安城内。有几个心灵手巧的战士还在标语牌上画上了醒目的漫画。

各个宣传小组更加活跃，经常蹲在前沿工事里向守敌喊话：

“白军弟兄们，穷人不打穷人，不要替国民党当炮灰！”

“红军优先俘虏，缴枪不杀，立功有赏，回家发大洋！”

“你们的援兵被打垮了，再抵抗就是死路一条！”

……

每到夜晚，歌声四起，句句歌词触动着白军士兵心头的隐痛：

“白军弟兄真可怜，

官长拿你不当人，

张口骂来动手打，

饿死他乡无人问，



参加黄安战役的“列宁号”

哎呀呀，好可怜，

又何必为他卖命？！”

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敌人的军心更加动摇。虽然黄安城高沟深，仍有不少士兵夜里翻墙下来投降。当这些饿得皮包骨头的士兵围着火堆，吃着我们端来的稀饭、糍粑时，禁不住泪流满面，放声痛哭。

徐向前、陈昌浩等认为时机已成熟，于12月21日向全军发出了总攻黄安城的命令。

22日，一场大雪过后，天气格外的好，碧空万里无云。

上午10时，黄安城上空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嗡……嗡……嗡……声音由远而近，由小变大，城内的敌人纷纷从白雪覆盖的工事里跑出来，向空中张望，只见一架飞机正向黄安城飞来。

敌人们顿时欢呼雀跃，呐喊呼叫。正在指挥部里愁眉不展的赵冠英闻讯也赶忙跑到院子里，举目向天边远望。可不是飞机吗！

赵冠英如同打了一针强心剂般，高声命令手下人赶快摆设标志，好让飞机空投。

正当敌人爬上屋顶，手忙脚乱地摆引导标志时，飞机扔下了两个黑乎乎的东西，紧接着是雪片似的传单。奇怪的是，那两个黑乎乎的东面上没有降落伞，而且带着凄厉的呼啸声。几秒钟后，地面上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硝烟带着泥土腾空而起。

原来，飞机扔下的不是黄安守军们望眼欲穿的大米白面，而是炸弹、迫击炮弹和红军传单。顷刻之间，十几个敌兵当场送命，其余的人乱作一团，四散奔逃，躲避轰炸。

这架飞机正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说起“列宁”号，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那是1930年1月的一天中午，一架双翼德国容克式高级教练机降落在宣化店东南的陈家河。驾驶员还以为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坐在驾驶舱里一动不动，不断向围拢来的人群吆喝：

“赶快去报告当官的，想办法给弄点汽油来。”

等他看清围着他的都是苏区赤卫队员时，才明白自己稀里糊涂地降落在苏区，同飞机一起当了红军的俘虏。

驾驶员叫龙文光，飞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刚从美国买来不久。这天，龙文光从南京驾机回四川，因迷航油料耗尽而被迫降落。

经过教育，龙文光愿意留在根据地为红军服务。

1931年2月新集解放后，徐向前命令把飞机运到新集，并由龙文光、钱钧和其他几个懂得机械的人把飞机安装好，重新涂上一层灰色的油漆，机翼两端漆上了两颗耀眼的红星。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

为了表示对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敬意，特区苏维埃把飞机命名为“列宁”号，成立了航空局，修建了飞机场，并通过被俘的敌师长岳维峻，从国民党方面弄来了汽油。

1931年8月9日傍晚，“列宁”号远征到武汉，进行侦察和示威飞行，吓得武汉的敌人赶快实行灯火管制。事后，敌人的《扫荡报》刊登消息说：“共军‘列宁’号飞机近日曾连续骚扰潢川、汉口等地，我方幸无死伤。现有关军方，已通令各地严加防范。”

再说黄安守敌遭“列宁”号轰炸后，更加慌乱，斗志全无。红12师第35团乘敌惊魂未定，一举攻下城北制高点课子山，歼守敌1个营大

部。

当晚22时，红军发起了总攻。红35团从城西北角首先突入敌阵地。

别看赵冠英只有一只眼，另一只眼视力也不好，可赵瞎子心里却比谁都看得都明白：这次红军大举围城，势在必得，黄安城肯定是保不住了。与城共存亡，那是说给手下人听的，惯匪出身的赵冠英才不会为党国成仁呢。

于是，赵冠英把仅有的一点机动兵力组编成所谓“敢死队”，亲自训话，给他们打气鼓劲，许愿突围冲出去的，当官的高升一级，当兵的升为官长，另有丰厚的赏金。

“一定坚持到最后五分钟，不成功便成仁，誓与黄安共存亡！”

当这些替死鬼向南门突围后，狡猾的赵冠英并没有立即逃跑，而是让一个随从装扮成他的模样，骑着他的大白马向东门跑。他自己却悄悄脱掉军装，穿上大褂，利用夜暗，偷偷从西门溜走。



群众武装使用的武器

果然，突围的敌人刚一出城，就遭到红11师1个团和红12师2个团的坚决打击。除少数敌人突围逃跑外，大部被红军消灭在城西南郊倒水河两岸。红军随即攻入城内，与少数残敌展开巷战，很快将敌全部歼灭。

城外赤卫队员和乡亲们也自动拿着长矛、梭镖、铁铲、木棒，高喊着：“活捉赵瞎子！”从四面八方追赶逃敌。

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机关算尽的赵冠英刚刚溜出西门，迎面正巧撞上一队赤卫军，只好乖乖地举起双手，当了俘虏。历时43天的黄安战役胜利结束了。

此役，红四方面军共歼敌1.5万余人，其中俘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缴获各种枪7000余支（挺）、迫击炮10余门、电台1部，使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苏区连成一片。苏区人民载歌载舞放声高唱：

我们工农红四军，

南下胜利大得很，

夺取了黄安城，

消灭匪军一师整，

活捉赵冠英，

反动派一网打尽，

……

商潢战役

【交战时间】1932年1月19日～2月9日

【交战双方】红四方面军；国民党军3个师另1个旅

【指挥将领】徐向前；汤恩伯等

【战果】红军歼敌5000余人

1932年新年刚过，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降，把鄂北大地装点得银装素裹，真是瑞雪兆丰年。

就在一个多月前，红四方面军取得了黄安战役的胜利，攻占了鄂北重镇黄安县城，使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苏区连成一片，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经过短暂的休整，红四方面军士气旺盛，决定在商城、潢川地区发起攻势作战，打击鄂豫皖苏区北部的国民党军，以打通鄂豫边同皖西两块苏区的联系。

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红4军北上向北亚湾开进，同时命令皖西的红25军第73师西进。抵达商潢地区后，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立即召集作战会议，分析当面敌情。

当时敌人以商城至潢川的公路为基干，南经商城及其以南地区、麻城东北地区直至麻城，构成一条隔离地带，将鄂豫皖苏区分割成东西两块：东边为皖西苏区，西边为鄂豫边苏区。敌人在商城、潢川地区共驻有3个师另1个旅。具体部署是：

陈耀汉的第58师主力驻商城，一部驻城北龙头桥、河凤桥；曾万钟的第12师主力驻潢川，1个团驻城南北亚港；汤恩伯的第2师和唐云山的独立第33旅防守商（城）潢（川）公路的傅流店、豆腐店、江家集一线。另有戴民权的第45师位于固始地区，与上述各部国民党军成掎角之势。

敌人沿商潢公路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商城就像个蛇头伸入苏区内。按常理应当是“打蛇先打头”，但考虑到商城守军兵力集中，设防坚固，若开始即攻打商城，一时难以攻克。第2师集结于商城、潢川之间，如果不将该敌消灭或驱逐，势必对红军进攻商城不利。

第2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但因在商潢公路一线配置，驻地分散，无坚可守，反而成了商潢地区整个国民党军布防体系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

师长汤恩伯，生于浙江武义。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军事教官，期间著有《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校长蒋介石的赏识。加之与蒋校长是老乡，且同在日本留学，自此成为蒋之心腹爱将，平步青云。平心而论，汤恩伯指挥打仗确实不怎么样，徐向前称其为志大才疏。

于是，会议决定发起商潢战役，集中4个师的兵力，首先歼灭汤恩伯的第2师，切断商城与潢川两城守军的联系，尔后再相机夺取商城。具体作战方案是：

先以红11师向第2师和第12师的接合部进攻，切断两敌联系，而后红73师在东，红12师和红10师在西，对第2师实施分割包围，予以歼灭。

1月19日凌晨，红11师借助大雪和夜色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北亚港。北亚港驻有第2师师部和1个团，北门外的十里头驻守着第12师的1个团。

拂晓时分，待红军各团都进入了进攻出发阵地后，王树声命令通信员发射了两颗红色的信号弹。

顿时，北亚港的南北门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枪声夹裹着呼啸的风雪，一下子就把北亚港的守敌给打醒了，同时也拉开了商潢战役的帷幕。

当副官急匆匆跑进来报告时，刚从睡梦中惊醒的汤恩伯还以为是遭到“赤匪”游击队的骚扰，连声呵斥副官要保持镇静。

然而，紧一阵密一阵的机关枪声和时而响起的迫击炮声，很快令汤恩伯清醒了。他马上判断出这是红军的主力部队把自己包围了，一面组织兵力进行抵抗，一面用电台呼叫援军。



汤恩伯

激战三日，红11师先后在十里头歼灭守军第12师1个团大部和前来增援的第2师1个团一部，并将这2个团余部包围在北亚港。

眼见围城的红军越战越猛，北门和南门相继告急。汤恩伯自知以1团兵力是抵挡不住红军几个主力团的围攻，而援军至今未到，还是趁红军没有攻进城来，赶紧脚丫子抹油开溜吧。

被徐向前称作是志大才疏的汤恩伯，撤退时倒表现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留下民团和一小部兵力虚张声势，给红军造成继续

固守北亚港的假象。然后，自己率部从人们意想不到的西门突围，逃回了潢川县城，从而躲过了王树声事先在北门外公路设下的伏击圈。

22日，国民党军第12师和第2师一部约3个团，分别由潢川、傅流店出发，南北对进，再次增援北亚港。红11师在红10师一部的配合下，击溃了援敌，并进占北亚港。

第2师和独立第33旅见红军攻势猛烈，慌忙沿商潢公路向南收缩到豆腐店、江家集、双椿树一线，企图与商城地区的第58师靠近。

但为时已晚。徐向前令刘英率红25军第73师于23日进至上石桥，从东面向第2师压来；令陈赓率红4军第12师、陈奇率第10师一部配合，由西向河凤桥、江家集、豆腐店一带进逼。

汤恩伯见势不妙，趁着红军尚未完成包围之际，北出何集，绕道经潢（川）固（始）大道，仓皇逃往潢川。

26日，红73师在红12师配合下，从西南和东北两面夹击河凤桥、龙头桥，迫使守军退回商城，并切断商城与固始间的联系。

至此，红军切断了潢川与商城之间的联系，除两端的商城和潢川被国民党军占领外，其余全被红军所控制。商城与固始国民党军之间的联系，也被红73师和商城、固始的地方武装所切断，从而使商城守敌第58师处于红军包围之中。

商城位于群山环绕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大别山区的要地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军事重镇，敌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红军虽初战告捷，但并未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商城守敌兵力集中、工事坚固，不利强攻。红四方面军总部遂决定运用黄安战役的经验，继续采用“围城打援”战法。具体部署是：

以红73师和红10师第30团在赤卫军的配合下包围商城，发动群众大量制造云梯、木炮，大张攻城声势，吸引潢川敌军增援；以红10师第29团抵近潢川，监视守敌，如敌出援，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方面军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商潢公路两侧待机。

敌人果然中计，商城守将第58师师长陈耀汉害怕重蹈赵冠英在黄安城破被俘的覆辙，频频告急，声称“城内食粮缺乏已达顶点，多有断炊者”，电示南京求援。

潢川守军虽有两个师，但因刚遭红军打击，心有余悸，不敢出援。

眼见商城危在旦夕，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坐不住了，急忙命

令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兼第76师师长张钫率第76师由信阳赶赴潢川，准备会同第2、第12师援救商城。

2月7日，聚集潢川的国民党军3个师另1个旅共19个团，分路大举增援商城。右路为汤恩伯第2师、张钫第76师，夹商潢公路前进；左路为曾万钟第12师及唐云山独立第33旅，经潢固大道之高店南下。

红四方面军总部分析敌情，认为时值大雪弥漫，道路泥泞，敌军装备笨重不易展开，如我军占据有利地形，集中力量乘敌在运动中实施勇猛的突击，可能歼其一部，溃其大部。于是决定以红12师在豆腐店一带高地构筑阵地，担任正面阻击；以红10、红11师担任左翼包抄，调围城的红73师担任右翼迂回，商城守敌则由地方武装包围监视。

8日，敌右路军与红12师在豆腐店地区接触交火，左路军亦向豆腐店以东进逼。

豆腐店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东依春河支流，西临白露河，南接一片森林，北连一条高岗，四周道路曲折，冲洼起伏，易守难攻。

红12师据守阵地顽强阻击，数次与敌展开血战。时任红12师第34团团长的许世友回忆道：

我团阵地前面，大约有三个团的敌人正在步步逼近。我们的火力虽然给敌以大量杀伤，但并不能制止敌人的前进。不一会儿，敌人就涌到了阵地前沿。战士们一跃而起，奋不顾身地扑向敌人。



刘峙

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格斗，在冰天雪地里展开了。嘹亮的军号声、震耳的呐喊声、兵器的撞击声、敌人的嚎叫声和暴风雪的呼号声混在一起，震撼着阴沉的天穹。在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在大大小小的池塘旁，在荆棘丛生的柴林里，到处都是生死搏斗的战场。战士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与敌人厮杀着、扭打着、周旋着、追逐着……

一场白刃格斗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的对比，而且取决于士气的高低。在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自觉牺牲精神的红军战士面前，敌人终于渐渐不支，稀里哗啦地退了下来。

此后，我们又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一直打到中午，敌人见捡不到便宜，暂时停止了进攻。

下午一时，隆隆的炮声又拉开了激战的序幕。敌人把两个师的兵力全投入了进攻。战斗越来越残酷，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了。

当时，担任右翼迂回的七十三师遭到敌左路纵队的阻击，相持在罗家一带。担任左翼迂回的十师和十一师还没有消息。我们十二师三个团抗击敌十个团的轮番攻击，任务是异常艰巨的。我们的伤亡在不断增加，阵地多次被敌人突破。我们硬是用手榴弹和大刀把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赶了下去。同志们只有一个决心：人在阵地在，决不能让敌人突破防线。

激战至下午5时，红10、红11师从左翼迂回成功。红30团以迅猛动作直插刘寨，包围了敌军指挥部；红32团抢占了傅流店渡口。

见后路被断，右路敌军陷入混乱，军心不稳，纷纷后退。右路的动摇，也使左路敌军全线慌乱，无心恋战。红军乘势全线展开猛烈反击。

敌第2师旅长范龙章见部队难以控制，电话询问另一位旅长王仲廉：师座在哪里？

王仲廉回复：早跑了。

范龙章二话不说，扔下电话就跑。王仲廉随后也跑了。这下，数万敌军犹如雪山崩溃，争先向北溃逃。红军乘胜追击，锐不可当。仅在傅流店附近就俘敌1000余人。

战后，红军获悉汤恩伯、曾万钟、张钫三个师长当时就被困于刘寨，藏身在农家的磨坊内。由于战况纷纭，红军急于追歼残敌，才得以逃脱。

夜幕降临，天地一片昏暗，残敌乘机向潢川溃逃。红军将士冒着漫天大雪，跟踪追击，直逼潢川近郊。



红军的机枪阵地

商城守将陈耀汉见援军溃败，乘红四方面军主力尚未回师之际，令手下人将炮拴卸掉，扔下大炮和笨重物资，乘夜幕掩护弃城突围，经商南逃往麻城。红军不战而克商城。

徐向前回忆道：

这次战役，我军发扬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猛打猛追的战斗作风，以十多个团的兵力击败优势装备的敌人十九个团，打断了蒋介石嫡系第二师的脊梁骨，很有意义。汤恩伯因此而被撤了职，北线的敌军龟缩潢川、固始等据点，不敢再轻举妄动，我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此役，红四方面军以4个师12个团击败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19个团，历时15天，歼敌约5000人，缴获枪支2000余支，打破了刘峙苦心建立起来的隔离地带，使整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更广阔的区域内连成了一片。

苏家埠战役



旷继勋

【交战时间】1932年3月21日～5月8日

【交战双方】红四方面军第10、第11、第73师；国民党军第46师等部6个旅12个团，第7、第55、第57、第12师等部15个团

【指挥将领】徐向前、陈昌浩；厉式鼎等

【战果】红军歼敌3万余人，其中俘1.8万余人

1932年年初，商潢战役后，鄂豫皖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在遭受红四方面军沉重打击后，处于守势。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写道：

当时敌军对我们这个区域，大体是采取守势的。蒋介石的剿共方针，重点似是放在江西苏区，尚未重视鄂豫皖区。我们周围大多是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部队，他们的将领有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

3月中旬，皖西大别山区已是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召开了有师长、团长和地方独立团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徐向前主持会议，红25军军长旷继勋介绍敌情：

敌人以苏家埠为枢纽，沿淠河东岸的韩摆渡、青山店、马家庵，北迄六安城，南至霍山，摆下了6个旅12个团的兵力，企图阻止红军向东发展。具体部署是：

第46师师部率第137旅、警备第2旅各1个团及第55师第163旅驻六安；第137旅（欠1个团）驻马家庵；警备第2旅（欠1个团）驻韩摆渡；第138旅及第136旅（欠1个团）驻苏家埠；第136旅另1个团驻青山店；警备第1旅驻霍山城。

根据当前敌情，徐向前指出：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是国民党军防堵和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的前沿据点，既可做进攻的依托，又可做退守的堡垒。因此，红军想进一步向东发展，就必须要拔掉这三个据点。而地处六安和霍山之间、淠河东岸的苏家埠首当其冲，又是敌人在皖西的前哨。皖西国民党军防区辽阔，兵力薄弱，尤其是淠河一线后方存在很大空隙，利于我军机动作战，实施突然打击。且国民党军第55师（欠1个旅）、第57师和第7师等部，分驻合肥、潜山、蚌埠等地，均距六安、霍山较远。因此，我军完全有可能歼灭皖西地区的国民党军。

听完徐总指挥的精辟分析，在座的红四方面军将领们不住地点头称是，并对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提出自己的见解。

最后，会议决定发起苏家埠战役，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援

掩护下，主力全部东渡淠河，从侧后包围苏家埠、韩摆渡和青山店，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以“围点”为诱饵，吸引六安、霍山，以及合肥、蚌埠方面的救援之敌，在陡拔河布下“口袋阵”，将援敌歼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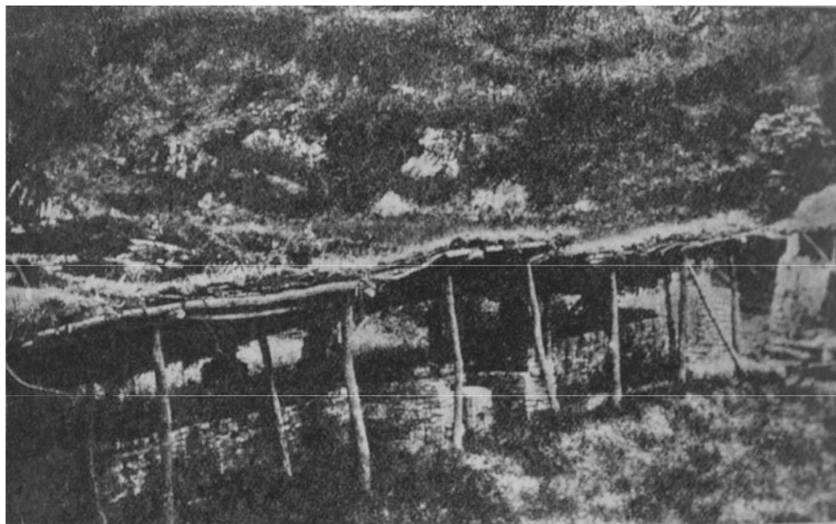
具体部署是：陈赓率红4军第12师留在商城、川潢地区，牵制豫东南之敌；陈奇率红4军第10师包围苏家埠，若战斗发起前苏家埠守敌向青山店增援，则在青山店以北地域选择有利地形，坚决打击之；倪志亮率红4军第11师对韩家渡守敌发起攻击，并准备阻击从六安方向出动的援敌；刘英率红25军第73师返回皖西，与霍山独立团等地方武装，配合围攻青山店，并准备阻击从霍山方向出去的援敌。

作战命令下达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即率领红10、红11师从固始出发，东进皖西。

3月20日，红10、红11师在独山镇与先期返回皖西的红73师、霍山独立团胜利会师了。

21日，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指挥部政治部专门下达了《为红军东下告群众书》，号召工农群众配合红军行动，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国民党军阀。

当晚，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地方武装掩护下，率红10、红11、红73师，以迅速、隐蔽、突然的动作，从青山店以西的两河口渡过淠河，向各自的预定作战地域前进。



红军构筑的临时野战工事

22日，苏家埠战役打响了。

拂晓时分，红73师和霍山独立团率行向青山店地区守敌第163旅第271团发起猛烈攻击，在夺取古楼山、刘老庄山后，将青山店团团包围。

果不出徐向前所料，青山店被围后，苏家埠守敌立即派出第136旅第272团和第138旅第275团火速增援。结果，援敌刚刚行进至芮草凹以南地区时，正好与红10师先头部队第29团遭遇。

狭路相逢勇者胜。红29团先敌抢占了大花尖高地，死死地挡住了敌人的前进道路。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虽然红军占据有利地形，但毕竟是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又是以一抵二。在敌军的疯狂进攻下，形势万分危急。

关键时刻，红10师第28、第30团拍马杀到。师长王宏坤立即命令这两个团向敌人左翼侧后迂回包抄，配合正面阻击的红29团展开攻击。

红军3个团对敌军2个团，战场形势立即发生了逆转。

国民党援军见红军大部队冲杀过来，顿时乱了阵脚，抱头鼠窜。红军趁势一阵猛冲，歼敌1个营，余敌逃回苏家埠。

红10师乘胜追击，包围了苏家埠。

与此同时，红11师向韩摆渡、马家庵逼近，驻守这两个据点的敌军已被红军吓破了胆，生怕被围歼，遂弃城而逃。红11师第31团勇猛追击，一直追到六安城附近。

第一天的战斗，三路红军皆高奏凯歌。国民党军失地损兵，无不惊慌失措。驻守六安城的第46师师长岳盛瑄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苏家埠乃六安西南的大集镇，西濒淠河，位于水陆交通要道，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乃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闻讯，急令人马相援。岳盛瑄自然清楚苏家埠的重要性，于是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命令第137旅第274团和警备第2旅的1个团从六安经马家庵沿淠河南下，火速增援苏家埠。

红军早就有所准备。当援敌刚刚接近苏家埠时，便遭到红10、红11师的有力夹击。一阵激战过后，第274团被围于韩摆渡，警备第2旅1个团逃入苏家埠。

至此，国民党军第46师和警备第2旅共6个团，分别被围于苏家埠、青山店、韩摆渡。在苏家埠，守军构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北、东、西三面环绕一道高约5米、厚约4米的寨墙，环墙筑有9个7米多高的碉堡，墙外还有一条深2米、底宽3米的寨壕，设置了5道栅门、5座吊桥、5座炮楼，寨壕外还设有竹围等附属防御设施。韩摆渡和青山店两个据点同样也构有类似的坚固工事。

鉴于红军缺乏攻坚器材和装备，又没有重火力，强攻不易奏效，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采取持久围困，消灭守敌；吸引六安、霍山之敌出援，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具体部署是：

红10师主力围困苏家埠；红11师1个团和六安独立团围困韩摆渡；红73师和霍山独立团继续围困青山店，并相机歼击霍山援兵；红11师主力置于六安西南平头岗、樊通桥一线占据有利阵地，准备歼击六安援兵；红10师1个团为总预备队；方面军总部驻于苏家埠以东的朱大院墙，徐向前率前线指挥部驻苏家埠东南一里多路的永慧寺。同时将六安、霍山两县赤卫军分布于六安、霍山县城附近，开展游击活动，侦察情况，迷惑敌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担负围困任务的红军各部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昼夜抢筑工事。仅用一周，环绕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据点的密如蛛网的交通壕、盖沟、掩体等工事便构筑起来。在红军坚固工事和严密火力封锁下，守军如瓮中之鳖，只能坐待救援。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苏家埠这个重要市镇，驻有陈调元部两个旅，这是我们上次占领麻埠独山后，最接近我们东面的一个敌军据点。敌军在这市镇周围，筑有永久性的工事，有些系城堡。我军在苏家埠外围，同样挖掘交通壕和建筑防御工事，并利用交通壕，逐渐缩小包围圈。

眼见包围圈一天比一天小，如同勒在脖颈上的绳索越来越紧，苏家埠等据点的守敌六神无主，惶惶不可终日。看红军的阵势，他们都清楚仅凭现有的这点人马是根本不可能冲出红军的重围，唯一可行之计就是求助于援军。于是，求援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发出去。

守军们天天登高，伸长脖子，朝六安方向眺望。然而，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过去了，仍不见援军一兵一卒。气得守军们破口大骂，从岳盛瑄、陈调元，一直骂到蒋介石。

其实，六安城里岳盛瑄的日子同样也不好过。几天前派出去增援的2个团非但没有解了围，反倒是自己也被红军围了起来。现如今他

手里只剩下不足6个团的兵力，就算是倾巢出动也解不了苏家埠的围，毕竟红军的战斗力他早已领教过了。

可如果不出兵救援，又怎么向陈调元解释呢？几天来，除了被围据点的求援电报外，陈主席的急电也是一封接一封，内容大体都一样——命令岳盛瑄不惜一切代价解围苏家埠，措辞却越来越强硬。

左思右想，岳盛瑄最终还是不敢抗命，于31日亲率第163旅和警备第2旅、第137旅各1个团共4个团的兵力，在数架飞机的掩护下，分成前后两个梯队杀出六安城；同时命令警备第1旅从霍山出援，企图以南北夹攻，解救被围各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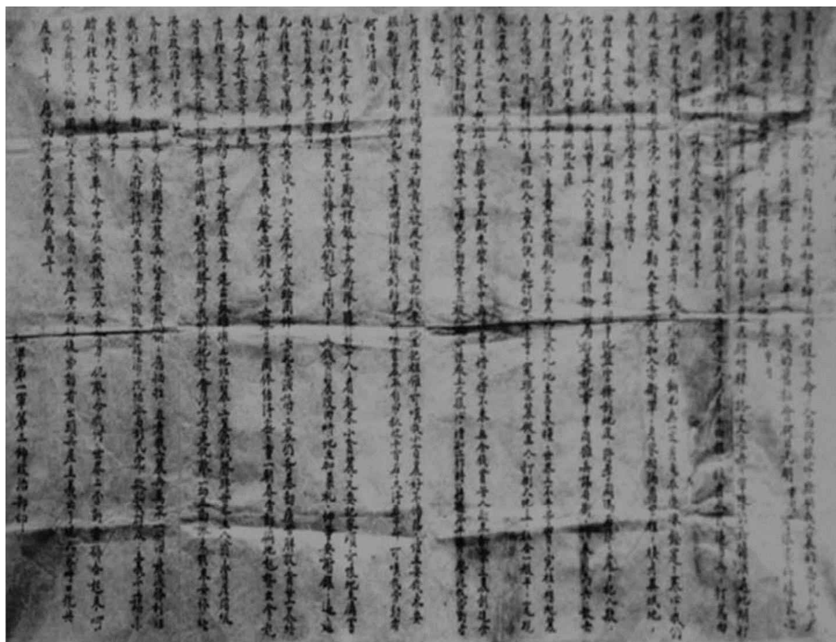
第一梯队警备第2旅1个团和第137旅第273团经十里桥，突破了红11师在马家庵、平头岗的一线阻击阵地，先头部队向苏家埠东北的凉水井等地猛插过去。苏家埠、青山店守军以为时机成熟，当即组成敢死队突围。

当援敌进至苏家埠以北的凉水井、桂家老坟时，担任红军总预备队的红10师第29团从东面发起攻击，红11师第31、第33团从西面猛烈进攻。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敌人突遭红军主力3个团的东西夹击，被打得措手不及。没用多长时间，红军便全歼第273团，并活捉团长陈培根。警备第2旅所属的1个团慌忙窜入韩摆渡，同前几天窜入此处的第274团一道陷入红军的包围中。

敌人的第二梯队见状，无心恋战，仓皇退回六安。由霍山北援的警备第1旅进至十里铺时，被红73师击溃，窜返霍山。

由苏家埠、青山店突围的敌军受到红军坚决打击，大部被歼，余部逃入苏家埠，另有部分逃往舒家庙之敌也被地方武装消灭。

至此，苏家埠、韩摆渡被围之国民党军已达6个团。红四方面军总部鉴于被围困的敌军据点仅剩下苏家埠、韩摆渡，决定以红10、红11师各一部紧缩包围圈，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守军；以地方武装和赤卫军监视六安、霍山两城守军；集中红10、红11师主力和红73师于机动位置，休整待机。同时判断六安、霍山之敌已无力再援，新的援兵可能来自合肥方向，便在戚家桥、樊通桥以东陡拔河两岸地区勘察地形，制订了打援作战方案，并进行了战场准备。



红军编印的宣传品

果然，六安、霍山守敌被打得心惊胆战，无力再救苏家埠。岳盛瑄一连两次增援，均损兵折将，不仅没有解围，反而连青山店据点也被红军拔掉了。见手中兵力越来越少，岳盛瑄生怕六安被围，终日惶恐不安，干脆于4月4日率余部撤退到六安东的金家桥据点，六安城里仅留下少数兵力驻守。

被围困的敌军日子更不好过了。到4月下旬，苏家埠、韩摆渡守军已被围一个多月了。据点里储备的那点可怜粮食早就吃光了，老百姓家里的粮食也被抢光了，就连军马也杀了吃掉。最后，士兵们只能靠吃树叶、树皮、麻苗充饥，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警备第2旅一个团副哀叹道："被围达二十余日，外绝援军，内乏粮秣，马匹食尽，皮制之马鞍与皮鞋等，亦都视为珍品。共军则白饭大肉，隔壕举碗相呼，军心沮丧。"

红军不失时机地展开政治攻势，让炊事班多做些饭菜送到阵地前，连里的宣传组以民歌小调编成歌曲宣传：

老乡老乡，快快交枪。

放下武器，红军有赏；

若不交枪，困饿死光。

来当红军，前途亮堂；

愿回家乡，发给光洋。

优待俘虏，人身保障；

早日来归，早见天光。

开始，敌军士兵不敢过来。不久，有几个士兵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趁天黑爬过来，结果受到红军的热情款待，饱餐而归。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许多敌军士兵都跑到红军阵地讨吃的。有人竟一日三餐都在红军这里吃，有情况再回寨子。一旦两军交火，保证枪口朝天放，不打红军。

苏家埠守军命若游丝，皖西国民党军也是智穷力竭，无计可施，只能向蒋介石求援。

在陈调元的频频告急下，蒋介石于4月下旬任命第7师代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领第7师5个团、第55师4个团、第57师2个团，以及新由潢川调来的第12师2个团，共13个团2万人，自合肥大举西援，企图再次解救苏家埠、韩摆渡之围。

敌军重兵压境，红四方面军背后是淠河，此时正逢梅雨季节，河水上涨，附近只有韩摆渡一个渡口，如果打不退敌军，后果不堪设想。

徐向前回忆道：

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如果打不垮他们，附近只有韩摆渡一个渡口，又逢河水猛涨，我军没有退路，弄不好要被压下淠河“放鸭子”。打仗，要想困难的一面，不能只想胜利的一面。把不利条件，有利条件，败的可能性，胜的可能性，通通估计清楚，才好下决心。敌众我寡，背水作战，决心不好下。

果然，张国焘不想打了，主张撤退。但徐向前力主迎战，分析归纳出此战我军必胜的四大原因：

一是援敌虽多，但除第7师未经我打击，战斗力较强，其余的第12、第55、第56师等部队，均曾遭受过我军的打击，里面有不少人是我们放回去的俘虏，士气不振。二是敌远道而来，为疲惫之师，我军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兵力虽少，胜敌一筹。三是在丘陵地带作战，具有发挥我军野战、近战长处的地形便利条件。四是有地方武装

和人民群众的配合。我军的士气高涨，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不打，仓促撤退，被敌追击，或是打了吃不掉敌人，而被援敌和苏家埠、韩摆渡的守敌两下夹击，后面只有一个渡口，你士气再旺，也会吃大亏的。这一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

徐向前的意见得到了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支持。这样，张国焘也就只好同意了。

六安以西的樊通桥、戚家桥一线丘陵起伏，林木茂密，中有陡拔河贯通南北，被红四方面军选为运动歼敌的战场。

徐向前命红73师于樊通桥地区构筑阵地，担任正面阻击；红10、红11师主力分置于红73师两翼，伺机迂回包抄；红73师第218团1个营和六安独立团进至陡拔河以东，佯作抵抗，诱敌深入。

5月1日，红218团1个营与敌先头部队第7师第19旅接火，边打边退，于黄昏撤至陡拔河以西。

2日拂晓，细雨变成了大雨，河水猛涨。

敌第19旅逞强渡河，进攻红73师阵地。红73师先是利用工事予敌军以重大杀伤，随后出击。第19旅溃败，敌后续部队不明情况，继续前进，前退后拥，十分混乱。红73师乘势猛攻，将第19旅大部歼灭。

陡拔河东岸的敌军见势不妙，抢占老牛口、婆山岭等高地，企图稳住阵脚。

徐向前命红33团拿下麻婆岭。不到一个小时，红33团便攻取麻婆岭。战后，红33团因战绩突出，被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授予一面红旗，命名为“共产国际团”。

徐向前率红11师主力和六安独立团，从六安城南向敌军右侧后包抄。红10师主力从戚家桥、庙岗头向敌左侧后包抄。红29团进至七里桥，这里有一条干河，因山洪暴发，河水涨了几丈高，淹没了七里桥，挡住了逃敌的去路。

双方一经接战，战斗就异常激烈，在20里长的地区，到处是枪声、炮声，震天动地。

援敌被包围在陡拔河两岸，指挥系统又被破坏，2万人马乱作一团。红四方面军各部、游击队、赤卫军和参战群众排山倒海，势如破竹。

战至下午17时，援敌除少数漏网外，全部被歼。历式鼎急忙换上便服准备逃跑，然而最后仍然没有逃出红军布下的天罗地网。关于这位总指挥被俘情况，时任红217团第3营营长的徐深吉回忆道：

五月三日上午，军部大院门前的空地上坐满了人，大家高高兴兴地前来参加打援战斗的总结大会，我刚走进会场，就听军首长问各团政委："在俘虏中好好查一查，有没有抓到历式鼎？"我们团洪美田团长问我说："老徐，你们营冲在最前面，打乱了敌人的指挥部，先查查你们那里有没有吧？"

团长这一问，倒是提醒了我，我想起九连抓住一个来历不明的"买卖人"。我把九连指导员张振才同志叫到跟前，他汇报了捉"买卖人"的经过：昨天，二一七团三营九连在追击途中先截获历式鼎坐过的滑竿，再往前追，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买卖人"。此人有三十多岁，留着两撇八字胡，头上戴一顶黑缎子瓜皮帽，穿着一件深灰色"爱国"布的长大褂，脚上穿一双沾满了黄土泥巴的便鞋，是个富商的打扮，他满脸的汗水，胡子上都沾着水珠，一副十分惊恐的狼狈相。

九连指导员张振才判定：这人不是历式鼎，也是个大官化装的。于是，将其看押起来。

洪团长听完汇报很高兴，就派政治处敌工股长去查问。敌工股长一见那人，便问："叫什么名字？"

"叫李义清。"

"不要胡说！你是历式鼎！"

历式鼎变了脸色，低下头说："是，是，我有罪！"

敌工股长说："我给他交代了政策，叫他不要害怕，红军宽待战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詹才芳

專電

鄂豫皖紅軍空前大勝利

繳獲步槍一萬五千餘枝 機槍一百九十架
迫擊炮三十餘門 無綫電机七架 飛机一
架 活捉師長二名 旅長二名 團長七名

湘鄂贛十三日專電：鄂豫皖紅四方面軍，在六霍行動，獲得兩次空前大勝利，計繳獲步槍一萬五千餘枝，機關槍一百九十餘架，迫擊炮二十餘門，無綫電七架，飛机一架，並活捉白軍五七師師長梁鴻恩，七師師長厲士鼎，第十九旅旅長李世諡，二十一旅旅長李文彬，及團長七名。

《红色中华》刊载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的消息

洪团长听了喜笑颜开，对九连指导员说：“伙计，你们连打得好，处理得好，应该受表扬。”说完立即去报告刘士奇政委，刘政委立即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被我二一七团三营九连活捉了！”

援军土崩瓦解，苏家埠守军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红四方面

军对其下达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守敌派代表来到红10师第30团。

一进团部，敌军代表就要吃的。红军以炒饭、炒蛋、油炸豆腐招待。

多日未见粮食和油星的敌军代表们顿时来了精神头，狼吞虎咽地猛吃起来。一名40多岁的代表边打着饱嗝边带几分轻蔑的口吻对红30团团长兼政委詹才芳说：“我要找你们负责人，有要事相谈。”

詹才芳说：“有事你就说吧，我是团政委。”

那个代表有些吃惊，从头到脚扫了詹才芳一眼，追问道：“你们团长呢？”

“团长、政委暂时都由我负责。”詹才芳平静地回答。

那个代表立刻挺直身子，毕恭毕敬地说，上司叫他出来问问，要是投降了，红军杀不杀当官的。

詹才芳告诉他，红军的政策是，只要缴枪投降，当兵的不杀，当官的也不杀，就是蒋介石来投降我们也欢迎。

5月8日，苏家埠守敌7000余人投降，受降地点在镇东南新安会馆前面的广场上。敌兵把枪支按指定地点分类放好，各部按建制排列成阅兵队形，举行了一个颇为壮观的投降仪式。国民党军队就是这个样子，投降也讲门面。

第136旅旅长王藩庆是个“矮个子，黑乎乎的脸膛，是个鲁莽汉”，第137旅旅长刘玉林是个“高身材，大方脸，白净面皮，倒有几分文人气质”。

只见两位国民党军少将，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穿着笔挺的将军服，带着雪白的手套，迈着同一步伐，走到红10师师长王宏坤面前，举手敬礼。与此同时，韩摆渡被围之敌也向红11师投降，战役遂告结束。

此战是红四方面军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缴获最多、代价最小、战果最大的一次伟大胜利，也是开创了万名敌军列队缴械投降的先例。在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下，历时48天，红四方面军共歼敌3万余人，其中俘虏敌总指挥厉式鼎和5名旅长、12名团长及营以下官兵1.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6万余支，机枪250挺，各种炮44门，电台5部，击落飞机1架，占领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

苏家埠战役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以六安、霍山两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了红74、红75师，归属红25军，活动于皖

西。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与红军战士在中央苏区

【交战时间】1933年2月～3月21日

【交战双方】红一方面军；国民党军25个师又2个旅、2个航空队

【指挥将领】朱德、周恩来；陈诚等

【战果】红军歼敌近3个师，俘1万余人

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短短十个月的时间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三次“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然而却无一例外地遭受重创，败下阵来。就连蒋介石也无奈地哀叹：

“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30万兵，打不过他们3万兵。赤匪实在是太厉害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撤到关内，短短几个月，日本帝国主义便侵占了整个东三省，3000万东北同胞在日寇铁蹄下惨遭蹂躏。

1932年3月，日本扶植清朝废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东三省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浪潮在国内日益高涨，而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也此起彼伏。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对中央苏区采取守势。但他不会轻言认输，纵观其一生，他的性格的确像一根高强度弹簧，千拉万扯也难改其顽韧。

4月，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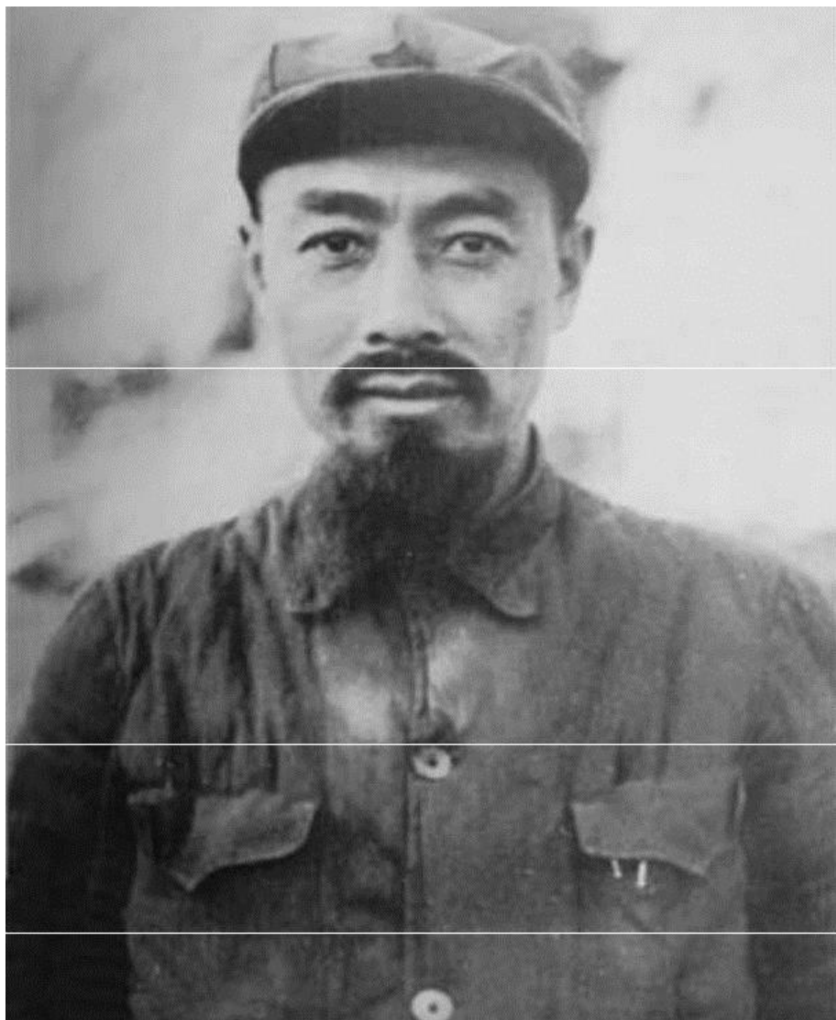
5月，国民党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将坚持“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参加“剿共”。

6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军事会议，部署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会上，蒋委员长大谈“攘外必先安内”之策：“现在，我们的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过来说，如果能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么外边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

客观地讲，蒋介石能够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一系列的讨伐军阀的运动，使此前一盘散沙的中国得到了空前的统一，说明他绝非庸碌之辈。在接连经过三次大规模“围剿”中央苏区的惨痛失败后，蒋介石已能抓住问题的要害了，强调此次“围剿”作战“务必稳扎稳打，曾文正公所谓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就是这个道理”。

庐山会议后，蒋介石增调新的“围剿”力量，筹集经费，加紧修筑道路和碉堡，加强训练地主武装，派遣探子，并采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战略方针，进行欺骗宣传，同时加紧对中央苏区左右翼侧的赣东北、湘鄂赣苏区的进攻，妄图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彻底摧毁中央苏区。

12月，蒋介石成立了湘鄂赣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任命何应钦为“剿共”总司令，以贺国光为参谋长，陆续调集25个师又2个旅40万兵力，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具体部署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周恩来

以第18军军长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和驻福建省部队共6个师又1个旅为左路军；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指挥的广东省部队6个师又1个旅为右路军，分别担任福建和赣南、粤北地区的“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第23师为总预备队。另有4个师又2个旅分布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第3、第4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作战。

为一雪前三次“围剿”失利之耻，蒋介石此番可谓不惜血本，一改

往常“围剿”作战让杂牌军打主力的做法，任命其心腹爱将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指挥他的嫡系精锐12个师近70个团16万之众，担任“主剿”任务。陈诚将中路军编成3个纵队。第1纵队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宜黄、棠阴地区集中；第2纵队指挥第10、第14、第27（后任守备）、第90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集中；第3纵队指挥第5、第6、第9、第79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并以一部出资溪；第43师为预备队。

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再次来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指挥这次“围剿”作战，企图将朱毛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

然而蒋介石并不知道，此时的朱毛红军里已不见了毛泽东。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执掌了中共大权，开始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这年10月，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由于坚决拥护和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跃而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负责人。

一年后，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祸起萧墙。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全体会议，这便是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毛泽东再次被解除了军职，离开了他创建的红军，从前方调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兼任。

1933年2月上旬，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打响了。

这时，红一方面军约7万人，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指挥下，主力活动于黎川地区。2月4日，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朱德、周恩来，“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提出在国民党军“围剿”部署尚未就绪时，应实行进攻作战，击溃国民党军，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城和南丰。

9日，红军开始向南丰地区开进。

南丰城濒临抚河西岸，地势十分险要，是抚河战线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不仅城高墙厚，还有陶峙岳的第8师等部共5个团的重兵防守，且修建有巩固的防御工事。这对于缺乏攻城装备和重武器的红军而言，无疑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1日，周恩来和朱德对攻打南丰作出部署：红3军团和红5军团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城，红12军在城东扶河右岸配合行动，红1军团

集结于城西准备打敌援兵。



蒋介石心腹爱将——陈诚

12日，红军完成了对南丰的包围，于黄昏时分发起全线进攻。

战斗打响后不久，天降大雨。红军官兵冒着凄冷的冬雨，向南丰城西北面的外围阵地发起进攻。由于守敌工事险要坚固，红军虽连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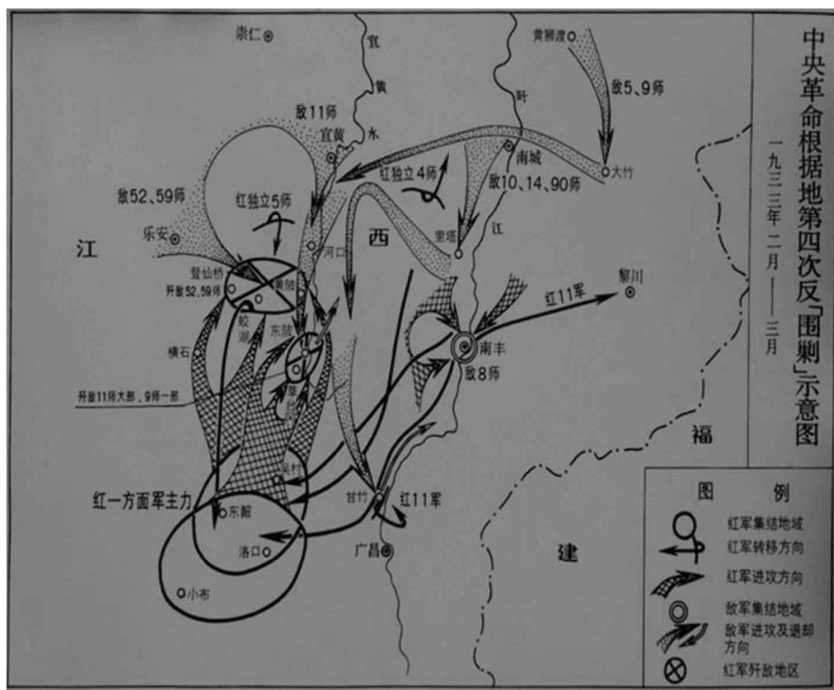
猛攻，战至次日晨仍未能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消灭敌军不足1个营，自身损失400余人，红3军团第3师师长彭鳌和2名团长牺牲。

陈诚获悉红军围攻南丰后，深知南丰城地势险要，是以后“进剿”赣南的重要支撑点，立即电令陶峙岳据城固守，同时急令驻南城的许克祥第24师驰援，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特别要求罗卓英率第1纵队第11、第52、第59师迅速向宜黄地区集中，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

周恩来、朱德发觉南城国民党军增援，认为如果继续强攻南丰城，红军必吃大亏。于是当即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留下一部分兵力佯攻南丰以迷惑敌人，主力则秘密转移至南丰、里塔圩以西地区，准备打援。

22日，红军获悉敌中路军第1纵队准备由宜黄、乐安地区增援南丰，第2纵队主力集中于南城，企图在第3纵队策应下，与红军在南丰地区决战。

周恩来、朱德鉴于国民党军兵力密集，打援无胜利把握，而留在南丰地区与敌决战更为不利，遂决定撤围南丰，诱敌深入苏区。具体部署是：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和里塔圩之间东渡抚河，将中路军第2、第3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南团、吴村地区隐蔽待机。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示意图

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重新又夺回了战场主动权。毛泽东对此决策十分赞同：“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果然，急于同红军主力决战的陈诚被红11军的行动所迷惑，误以为红军主力撤回黎川地区，遂以第1纵队于宜黄以南地区集中，然后出广昌、宁都，堵截红军归路；第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第3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企图合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24日，为配合第2、第3纵队的行动，第1纵队总指挥罗卓英亲率第11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的第52师和陈时骥的第59师由乐安地区东南方向推进，准备在黄陂同第11师会合。

这样，中路军的三个纵队被分隔在两个相距比较远的地区，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时，朱德、周恩来已率红军主力回到东韶、洛口一带。在东韶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上，朱德、周恩来等认为陈诚已被红军的行动所

迷惑，其中路军第1纵队态势孤立，戒备也不严密，尤其是向黄陂推进的第52、第59师已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不仅同第2、第3纵队相距较远，已成单独冒进之势，而且还被高耸绵亘的大山岭——摩罗嶂拦腰隔断，使他们之间的联系、协同都极为困难，彼此首尾不能相顾，正是将这两个师消灭在运动中的大好时机。由乐安向黄陂开进所必经的登仙桥以东地区，山高林密，层峦叠嶂，道路崎岖，地形险要，适于伏击。

朱德边看地图边说："我们距黄陂不足一天的路程，正好可以在这里打个伏击。"

周恩来点点头，果断地说："这次我们要搞一个大兵团伏击，把可以调动的全部兵力都投进去。"

经过反复对比权衡，会议最终决定集中主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利地形，预先设下埋伏，打一个大兵团伏击战，求歼第52、第59师。具体部署是：

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为左翼队，隐蔽集结于金竹、大坪地区，待第52师进入蛟湖、桥头一线时，突然发起攻击；以红5军团、红22军为右翼队，隐蔽集结于横石、侯坊一线，准备占领黄陂、霍源地区，歼灭由固岗、西源向黄陂前进的第59师，并保障左翼队翼侧安全；以江西军区独立第4、第5师分别在永兴桥至杨坊之线和河口西北上源、下源地区活动，牵制第11师，并保障右翼队翼侧安全；以红12军为预备队。

周恩来和朱德在下达命令时还特别指出：各部队在行进途中和进入伏击阵地后，一定要严密隐蔽伪装，封锁消息，务必做到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取得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红军主力兵分两路向各自预定的作战地区进发。时任红1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道：

二十五日，左翼队分别进抵金竹、郎源一线，二十六日沿金竹、王都、竹坪之线，采取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逐次以由左向右的顺序，迅速消灭敌五十二和五十九师。这几天适逢连日阴雨，山野昏暗，浓雾侵没山头，傍晚更甚，夜间漆黑，道路泥泞，滑得很，我们带着队伍为了取得采取平行路线前进的军事效果，有时根本走不上路，只能披荆斩棘，向着黄陂圩、蛟湖、登仙桥——预定的作战地域前进。

27日拂晓前，红军左翼队各部先敌进入伏击地域，隐蔽在崇山密林中。

此时，第52师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之线向黄陂前进；第59师沿固岗、西源、霍源向黄陂前进。

天上正飘着蒙蒙细雨，四处云雾遮障，数米外的景物都难以看清。骄横狂妄的敌人自恃装备精良、给养充裕，气焰十分嚣张，横冲直撞地向黄陂一带闯来，又加上误以为红军主力远在黎川，行军途中几乎全无侧翼警戒，对隐蔽在道路南侧高地上的红军主力竟毫无察觉。

聂荣臻回忆道：

直到上午九点多钟，远远地听到一些人喊马嘶的声音。侦察员来报告说，敌人已经朝我们阵地前面过来了。日出雾散，果然看见敌人一队队过来了，隔不远还有坐轿子的，是他们的军官。敌五十二师共两个旅，每旅两个团。我们看清楚敌人的时候，前面已经过去一个旅，这个旅后来在大龙坪东边被三军团消灭了。过了一个团又一个团，一共过了四个团。敌人大摇大摆地，毫无戒备，显得很了不起。我说，我们沉住气，再沉住气，敌人这样大的部队进根据地来，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果然，最后来了辎重部队，还有一个团在后面掩护，没有进入伏击圈。这样直到敌人四个团加辎重部队确实已进入口袋，我们才发出总攻信号……

刹那间，枪炮轰鸣，杀声四起。红1军团以一部兵力向蛟湖攻击，将第52师行军纵队拦腰切断；主力向大龙坪、小龙坪发起猛攻；红21军也迅速赶到登仙桥附近地区，截断了敌军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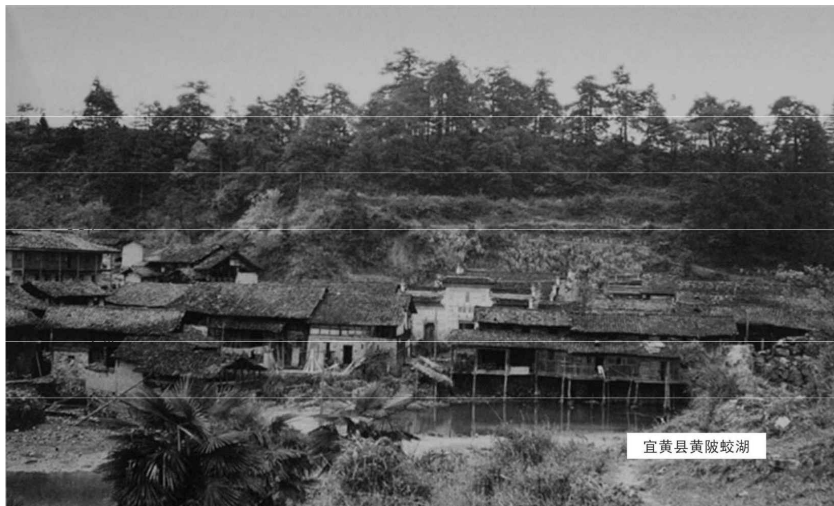
毫无防备的第52师被犹如神兵天降的红军杀了个措手不及，顿时乱了阵脚，四散奔逃，根本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师长李明吓得魂飞魄散，带着手下的残兵败将像没头的苍蝇，东突一下，西冲一下。红军以压倒之势发起猛攻，敌人丢盔卸甲，纷纷举手投降。

战斗中，有一股敌人倚仗着强大的火力，企图从西北面突围逃跑。驻守西北面谷口山头的是红11师第32团。聂荣臻亲自赶到该团的指挥阵地，对团政委杨成武说：“这是紧要关头！”

杨成武扬起手中的驳壳枪，跃出阵地，高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冲呀！聂政委刚才讲了，这是紧要关头，冲呀！”

见团政委身先士卒，战士们倍受鼓舞，个个奋勇争先，挥动着手中的武器，冲出阵地，迅速将这股敌人赶入谷底。

聂荣臻回忆道：



宜黄县黄陂蛟湖

这时，我手头只有一个特务连，就带着他们也冲了下去，徐彦刚同志（红1军团参谋长——作者注）在阵地上看到我，连连向我大声喊着，你不能来，你不能来，意思是要我注意安全。当时这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我顾不得这些，带着那个特务连冲了下去。只见敌人的军官到处东奔西窜，嗷嗷乱叫，一个个束手就擒，那真是痛快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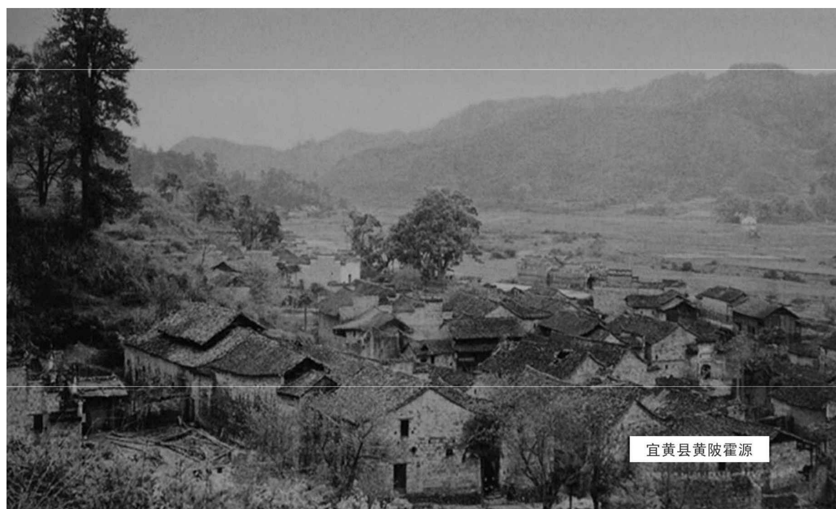
只经过短短三小时，第52师师部和第154旅第309团就被红军全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不久即死去。取道大龙坪、坪口、跃龙坪向黄陂前进之第155旅1个团，也遭到红军的歼灭性打击。第155旅主力得知大龙坪和黄陂方向发生战斗后，即就地转入防御。18时，红3军团主力赶到，将第155旅主力合围于桥头，28日上午将其全歼。接着，红3、红1军团各一部协同作战，将第154旅主力歼灭于蛟湖。

至此，第52师全军覆没，红军共缴获步枪3000余支、机枪80挺、迫击炮10余门，还有7台无线电机。

就在红军左翼队围歼第52师之际，红军右翼队进至黄陂、秀源一线，发现第59师正从霍源一带向黄陂前进。

霍源位于黄陂西北，山高林密，地势十分复杂，在群山之中有一条峡谷是通往黄陂的唯一道路。右翼队即以红22军第64师向霍源方向急进，先机占领黄陂西北一带高地，红15军在霍源以南占领阵地，求歼第59师于黄陂、霍源地区。

13时，红15军同第59师前卫部队接战，迅速将其击溃。第59师第175旅第351团主力和独立团就地转入防御，第175旅主力增援。战至黄昏，双方形成对峙。



宜黄县黄陂霍源

28日上午，红军右翼队向第59师发起全线进攻。经整日战斗，将该师主力大部歼灭在摩罗嶂东麓的山谷中。师长陈时骥率残部数百人向蛟湖方向突围，企图同第52师会合。当发现第52师已被红军歼灭后，陈时骥转头向乐安方向逃窜。但为时已晚，红军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陈时骥插翅难逃。没过多久，战斗便结束了，第59师除在西源地区1个多团逃脱外全部被歼。

黄陂之战，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一次规模最大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经过两天的激战，红军歼敌2个师，俘虏上万人，缴枪万余支、火炮40余门，并击毙第52师师长李明。然而令红军将士感到困惑不解的是，第59师师长陈时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难道让他逃跑了不成？

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　紅色中華　第一版

紅色中華

第五十八期　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

在完全粉碎敵人大舉進攻的前面

在粉碎敵人大舉進攻的決戰中

我紅軍空前光榮偉大的勝利

全部消滅敵五十二師五十九師

敵新編五軍潰不成軍大部消滅

兩天內活捉敵師長兩個

《红色中华》刊载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军分头在摩罗嶂一带搜山抓俘虏。这一带山上山下到处都是敌人的溃兵。有些溃兵自动把武器架起来，请红军派人去收缴。战斗到最后，敌人有些成建制的部队也被败阵下来的溃兵冲散了，乱成一团，失去了战斗力，都当了俘虏。最后清查俘虏时，没有发现敌人的第五十九师师长。我们知道，五十九师师长叫陈时骥，是个麻子。于是发动部队继续搜查。后来军团部电台班上山砍树回来架天线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抓到了一个俘虏，是个当官的。我问脸上有没有麻子，说是有，就这样把他从俘虏中清查出来了。

此役，红军缴获了大量的弹药、粮食、银圆，以及红军极为缺少的药品、通信器材等。

朱德后来说："那都是最精锐的兵，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还都是一枪未发过的。"聂荣臻也回忆道："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农民前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搬了一个星期才搬完。"还有红军战士风趣地说："这么好的武器，咱得好好感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哩！"

3月1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全体指战员，祝贺黄陂战斗的胜利："这次方面军的空前伟大胜利，是给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掌拳的回答。"

黄陂战斗刚刚结束，第1纵队第11师主力就已赶到河口、南源地区。红军准备乘胜继续围歼该部，但因第2纵队的3个师兼程来援，企图从新丰截击红军主力的退路。为避免被敌军重兵包围，朱德、周恩来命令红军主力迅速转移到小布、洛口、东韶地区休整待机。

接到前方战报后，陈诚像是被当头狠狠地打了一记闷棍，半天也没缓过神了。李明的52师、陈时骥的59师都是中央军的嫡系部队，黄陂一战几乎全军覆没，损失了近2万人，两个师长一个战死，另一个被俘，至今生死未卜。这在历次"围剿"中还不曾有过，他如何向蒋校长交代。

思来想去，陈诚感到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找到红军主力再战，一定要给自己挽回些颜面。

为避免重蹈黄陂之战的覆辙，陈诚改变了作战方式，将原先三路"分进合击"改为一路"中间突破"，将中路军原来的3个纵队缩编为前后两个纵队，并调整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1纵队余部和第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共6个师的兵力，梯次轮番向广昌地区搜索前进，务必找到红军主力，与之决战；以第3纵队第6师守备抚州，第79师在宜黄地区为预备队。

急于雪耻的陈诚没有意识到自己又犯了一个兵家大忌：他在宜黄至广昌的甘竹一线，由西北转向东南，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以6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前锋与后尾相距达3天以上的路程，正好给红军寻找薄弱环节、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良机。

朱德、周恩来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当即命令红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积极开展活动，摆出要保卫

广昌的姿态，吸引中路军前纵队加快南进，以拉大其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同时率方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侧击力量较弱的中路军后纵队。

陈诚果然中计，误认为红11军是红军主力，意在保卫广昌，遂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第5师配属前纵队指挥。

20日，中路军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带，后纵队第11师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相继跟进，第9师进至东陂附近。这样，前后两纵队相距已近百里。

战机终于出现了。

朱德、周恩来认真研究敌情，反复查看地图，发现草台岗一带地形复杂，周围峰峦叠起，谷深林密，敌人的重装备难以展开，空中火力也难以支援。而装备轻便、善于山地运动战的红军，却容易发挥优长。草台岗无疑是一个设伏的理想场所。于是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第11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尔后相机各个歼灭其他进攻之敌。“我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一师，再突破东陂、五里排之敌。”具体部署是：

红5军团、红12军和宜黄2个独立团为右翼队，以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嵊一带国民党军，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第9师，并向新丰市方向警戒，阻止中路军前纵队回援；红1军团、红3军团、红21军和独立第5师为左翼队，以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地区国民党军，以一部兵力切断第9师与第11师的联系；红22军为预备队。

20日黄昏，第11师相继由徐庄地区南进，其前卫部队遭到红军袭击后，就地转入防御，第32旅占领霹雳山、龙咀寨、黄柏山阵地，第31旅2个团占领龙咀寨以北及黄柏山、草台岗南北之线，师部和预备队1个团驻徐庄。

入夜后，红军各部队陆续进入攻击位置。

21日拂晓，红军发起总攻。左翼队红3军团向霹雳山、黄柏山进攻；红1军团向草台岗、黄柏山、徐庄进攻；红21军向大公田、西岭进攻，牵制东陂第9师，并切断该部与第11师的联系。右翼队红5军团向龙咀寨、雷公嵊进攻；红12军进至东陂至侯坊大道东侧山地，阻止东陂第9师由侯坊大道南援。

10时，红3军团突破霹雳山阵地，并迅速包围了徐家堍第11师一部。12时，红1军团将第11师师部和预备队分割包围于徐庄。

毕竟第11师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陈诚的起家部队，不仅齐装满员、装备精良，而且战斗精神也相当顽强，号称从没有打过败仗，因此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红10、红11师虽然反复向黄柏岭发起猛攻，并与敌人展开肉搏。但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凭借强大的火力负隅顽抗，红军几次进攻都没有取得大的进展，伤亡反而不断增加。红10师第28团政委沈联雄阵亡，红10师师长周昆身负重伤。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来助威，到处扔炸弹，当时我和林彪还有七师师长彭雄同志和一个管理科长在前线阵地指挥位置，林彪正在写作战命令，一个炸弹下来，气浪把他吹到了山坡下，管理科长负了伤，我和彭雄也被吹倒在地。我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指挥战斗。

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红军终于攻占了徐庄、徐家塅，歼灭第11师师部及1个团，击伤师长肖乾，旅长黄维、莫与硕。黄柏山守军2个团也在突围中大部被歼。右翼队攻占了龙咀寨阵地，歼守军约2个团。

战至下午3时，陈诚的精锐主力第11师基本被歼，仅有很少一部分得以逃脱。



蒋介石视察“围剿”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军

在清查俘虏时，红军发现第11师士兵每人身上都带着一条绳索。红军官兵很奇怪，一再追问为什么。俘虏回答说：“是出发前发给的，长官让我们用它捆绑红军回去领赏的。”

草台岗激战正酣时，国民党军第9师一部和第59师残部企图增援第11师，在雷公嵊以南遭到红军阻援部队的迎头痛击，仅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其他各部早已成惊弓之鸟，纷纷后撤至南丰、南城、宜黄、乐安、永丰以及抚州等地修筑堡垒，转入防御。

红军连斩陈诚三个“手指头”，令蒋介石暴跳如雷，大骂娘希匹，在给陈诚的手谕上，痛心疾首地写道：“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将馁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

一向以“天子门生”自居的陈诚颜面尽失，更是诚惶诚恐，写下了“诚虽不敏，独生为羞”。罗卓英也叹息着写下了“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陈诚因“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遭到政敌各方面的群起攻讦，被降一级，记大过一次。

至此，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被粉碎。此役，红一方面军共歼国民党军近3个师，毙俘2名师长，毙伤16名师旅团长，俘虏1.6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火炮40余门，最新式机枪300余挺，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交战时间】1933年11月1日～1934年9月底

【交战双方】红四方面军；国民党军四川军阀110多个团

【指挥将领】徐向前、陈昌浩；刘湘等

【战果】红军歼敌8万余人

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后，又接连取得仪南、营渠战役的胜利，声威大振。

这时，川陕革命根据地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达营山、达县，北至陕南的镇巴、宁强，东西500余里、南北400余里，控制着通、南、巴、仪、营、宣、达、万等8座县城，人口500余万。红军若渡嘉陵江西上，可横扫川西平原，威逼成都；若东下两开，可据万县、夔门，扼全川咽喉；若南下渠县、蓬安，则涪陵、重庆岌岌可危。

红四方面军的壮大，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直接威胁到川中第一枭雄、刚刚爬上“四川王”宝座的刘湘。

刘湘，又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1890年，刘湘生于四川大邑。1907年考入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期间，同盟会在速成学堂开展活动，不少同学议论时事，慷慨激昂。刘湘却只顾埋头出操上课，从不过问政治，加上眼皮染病，久治不愈，被同学们戏称为“刘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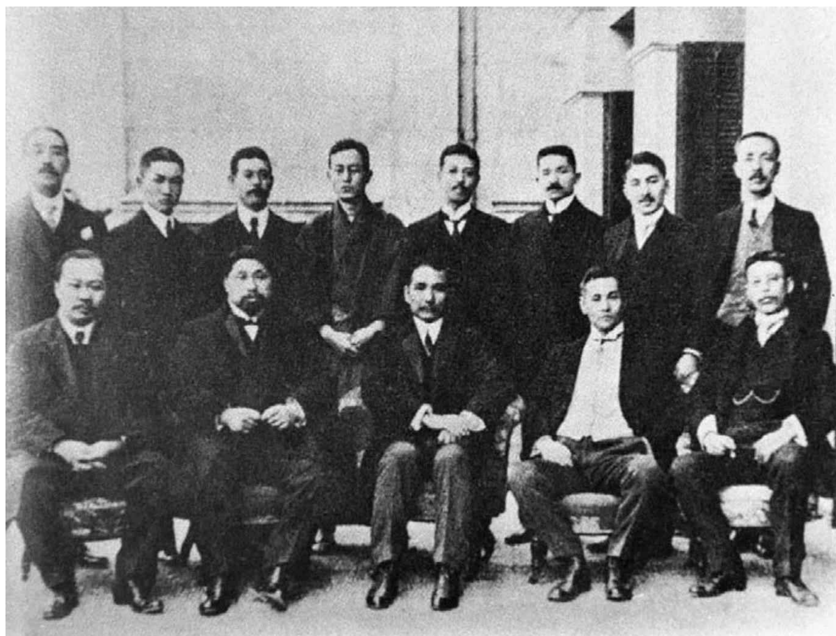
可谁也不曾想到这位“刘瞎子”对政治时势的洞察竟是如此的深邃，20年后便打败了所有的对手，成为声名显赫的“四川王”。

1911年，刘湘任第17镇68标1营前队排长。次年升任第1师第2营营长。1913年8月，川军第5师师长熊克武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率兵攻打泸州。由于第1师拥护袁世凯，刘湘的同学前来策动他倒袁，但他不置可否。战斗打响后，刘湘高呼“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率部打退了讨袁军，升任团长。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蔡锷随即以护国军第1军总司令的名义，取道四川讨袁。刘湘率部突过长江，截断护国军归路，大败

蔡锷。袁世凯龙心大悦，于1916年3月特发布命令：“刘湘奋勇督战，连克要邑，肃清江岸，勤勇可嘉，着授陆军少将，并授以勋五位”。嗣后，又授予三等嘉禾章。

刘湘的骁勇善战，不仅得到袁世凯的器重，也引起蔡锷的关注，决心要收服这员虎将。蔡锷通过刘湘的同学向其传话，许以川军第2混成旅旅长的职务，力邀刘湘一同参加讨袁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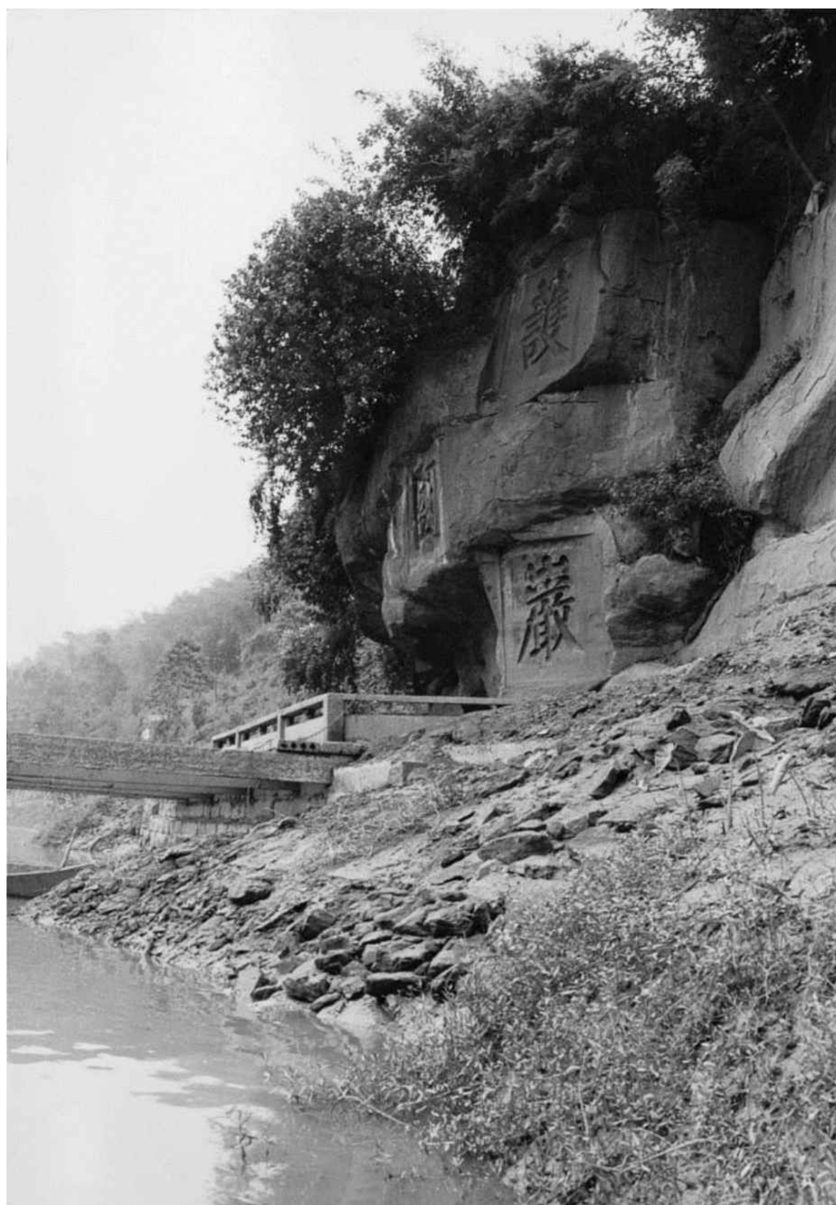


参加上海军事会议、研究讨袁事宜的革命党人合影

拥袁者和反袁者都在极力拉拢刘湘，也都想拥有刘湘。

这时，“刘瞎子”可不瞎了，表现出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见袁世凯气数将尽，便暗中接受了蔡锷的条件。

果然不出刘湘所料，袁世凯没过多久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蔡锷率兵攻克了成都，出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刘湘因“讨袁有功”，当上了第1师第1旅旅长。黎元洪大总统随后授予他陆军中将衔。



护国战争遗址之——护国岩

1917年，刘湘率部支援前川军师长刘存厚对滇黔靖国联军作战。次年2月，靖国军攻占成都。刘湘见北京政府对四川已失控，立即倒向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发出响应“护法”通电，被熊克武委为川军第1师师长，后改任第2师师长，管辖永川、荣昌、铜梁、大足、壁

山、合川、武胜七县。

从此，刘湘有了固定的立足地盘，开始建立速成系集团，举办军事传习队和军官传习所，加紧培训军中骨干。

1920年4月，唐继尧通电讨伐熊克武，以川军第5师师长吕超为总司令，刘湘为副总司令。刘湘见电后勃然大怒，决定拥熊讨唐，出任第2军军长兼讨唐军前敌总司令，与熊克武联兵将滇黔靖国军逐出四川，一时声势大振。

川滇黔军混战结束后，刘存厚、熊克武分别在成都、重庆打出了北洋政府和广州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公署的招牌。一时间，四川境内出现了两个督军。

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手握重兵的刘湘做起了调解人，分别致电刘、熊二人，正式提出四川自治主张。

熊克武复电表示赞同，同时宣布解除自己的四川督军职务，退居幕后操纵，而刘存厚拒不作答。

1921年1月，刘湘伙同第1军军长但懋辛联名发出通电，宣布四川自治，声讨刘存厚违反民意，是四川自治之一大障碍，应予驱逐。随即举兵将刘存厚驱逐出成都。同年6月，川军各将领在重庆召开善后会议，刘湘被推选为四川各军总司令，旋任四川省长。

短短几年间，刘湘与熊克武一起驱逐滇黔军，赶走刘存厚，力量膨胀，地位显赫，成为速成系的首脑人物。

有道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熊克武见刘湘羽翼渐丰，大有取代他而掌握四川军政大权之势，便煽动川军各部联合起来与刘湘为敌。熊刘这对曾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转眼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面对不利局面，刘湘再次显现出超人的沉稳，阳若无事，阴则密谋采用整军手段，逐步削弱第1军力量，然后乘其驻地分散，相机各个击破。

谁知事情败露，各军群起谴责刘湘。鉴于川军各部多已站在熊方，刘湘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通电辞去本兼各职，仅带随身卫队，回到大邑县安仁镇老家“归隐”，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机会很快就来了。

1923年春，川战再起。刘湘亲自出马，重整旗鼓，击败熊克武四

川讨贼军。北京政府鉴于川情复杂，认为刘湘还有一定潜力，便按照他的建议，对四川军政首脑进行调整：

委任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四川所有部队；杨森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免去邓锡侯省长之职，由赖心辉继任；免去田颂尧帮办之职，由刘文辉继任；又任命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这样，刘湘策划的“三刘一赖”联盟隐然形成。

刘湘重掌大权后，即联合黔军击败杨森部，随后又驱逐了贵州军阀袁祖铭，更加巩固了其在四川的地位。

此时，北伐战争激战正酣。

“刘瞎子”又一次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敏感嗅觉，宣称愿出师参加北伐。10月，刘湘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

在新旧军阀混战中，这个当初被讥讽为“刘瞎子”的刘湘纵横穿梭于各种势力的夹缝里，硬是熬出了一副火眼金睛。与蒋介石的关系即是一例。

刘湘与蒋介石并无历史渊源，甚至未曾谋面，但他却在宁汉分裂时，公开拥戴蒋介石。



四川军阀----刘湘

1927年3月23日，刘湘同时收到了两封电报。一封是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决议：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另一封是蒋介石等人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会名义的通电，解散武汉党政联席会议。

刘湘看过两封电报，当众高举起蒋介石的那份通电，高声

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蒋介石立即升任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仍兼第21军军长，并特送给他一部短波无线电台用于联络。当时这种无线电台全国只有三部。一部在南京蒋介石总司令部，一部在上海龙华白崇禧司令部，一部在重庆刘湘司令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刘湘毫不含糊地支持蒋介石，与赖心辉、刘文辉合力围攻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军。随即，在所属各师及辖区各县普遍成立“清共”委员会，大肆搜捕和杀害共产党人。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的第二天，又是刘湘领衔，与川中各军长联名发出通电，表示拥护。

刘湘支持蒋介石得到的丰厚回报远远不止升官，在他统一四川的关键时刻，得到了蒋介石的鼎力支持。

统一四川是刘湘长久的梦想。刘湘比刘文辉大4岁，辈分上却是刘文辉的侄子。他与刘文辉联手，打跑了四川最强悍的军阀杨森、罗泽洲，四川遂成为“二刘”的天下。

但世界上最难均分的莫过于天下，哪怕是父子，还是叔侄。当时刘湘和刘文辉各自拥兵十余万人，都想自己统一四川，独揽权力。叔侄二人的关系日益恶化。

刘湘知道要战胜刘文辉，非得有蒋介石的支持。恰逢蒋桂战争爆发，刘湘便通电拥蒋，被委为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出兵讨伐桂军。而刘文辉则没有他的侄子看得准，先是与唐生智联名通电讨蒋，后又在中原大战中支持冯玉祥、阎锡山反蒋，在政治上接二连三地陷于被动。

刘文辉为自己的“政治近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原大战一结束，刘湘即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善后督办，对四川各军全权编遣。1932年8月，二刘的争雄之战爆发了。蒋介石则毫无保留地支持了刘湘。

这场叔侄大战，是四川军阀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混战。战争持续了一年之久，战线连绵千里，双方投入兵力数十万人，伤亡6万多人，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熟谙韬略的刘文辉未能取胜，先是退出了泸州、宜宾，后又退出了成都。他的10万之众，更是土崩瓦解。最后，刘文辉带领残部2万余人退到雅安。刘湘见大势已定，顾念叔侄情分，不忍置刘文辉于绝路，遂令各军停止追击。

还在刘氏叔侄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张国焘、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进入川北，创建了以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蒋介石慌忙促成四川各派军阀停战言和，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调集川军主力“围剿”红四方面军。

起初刘湘并不当回事，认为红四方面军只是“过境”，不会在川北扎下根，因而扬言“先安川、后剿赤”，迟迟不肯就职。对红军采取的“围剿”策略是：摆开阵势，扎稳阵足，既须硬打才能把红军送走，又不作围歼打算，红军一日不走，则持久一日，决不强求所谓“最短期内”的速战速决，以免过度消耗川军实力。

如今刘湘打败了刘文辉，统一了四川，蒋介石立即来电催促刘湘全心“剿赤”。

刘湘眼见“赤匪”越剿越多，大有在四川生根开花之势，始觉情况不妙，急忙召集诸将商议：“诸位，‘剿匪’乃目前当务之急，但本总司令认为这与过去一般战争‘能战则战，不能战则不战，不因一时胜负而决定个人一生命运’的情况大为不同。因为‘剿匪’之战一旦发动，就是生死存亡所系，有我无‘匪’，有‘匪’无我，是决不能随便得了的事情。因此，只有拒‘匪’于川外，才是万全之策。”

刘湘语无伦次，说了一大堆因果混乱、前后矛盾的话，令在座诸将听得一头雾水，好在他们听懂了刘总司令最为关键的一句话，那就是拒“匪”于川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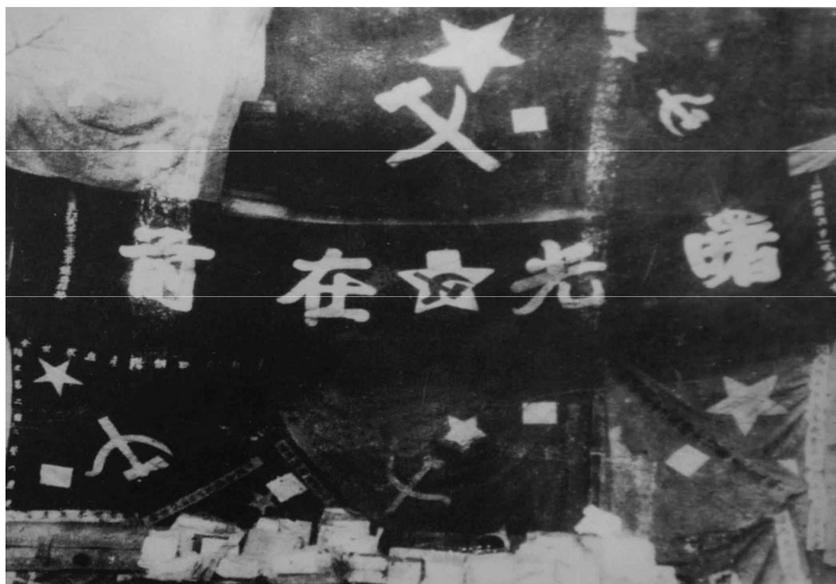
其实，“刘瞎子”清醒得很，早就看出蒋介石不怀好意，欲借“剿匪”削弱川军实力，然后借口防堵红军，派重兵入川，以达到掌握川局的险恶用心。于是，他也打起了自己的如意小算盘，一面对红军采取“驱”而不是“灭”的策略，既保存实力，又防止红军在川境扎根；一面与蒋介石虚与委蛇，防其趁机入川。

不料，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竟真如扎下了根，迅速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并建立了22个县、1个市苏维埃政权。

川军屡战屡败，刘湘一筹莫展，便想金蝉脱壳，通电辞职，以保川军实力。

蒋介石希望看到的正是川军与红军拼得两败俱伤，他好去收拾残局，染指四川，所以川军损失越大，他的心里就越高兴，督令也就越严，此时又怎会善罢甘休，当即致电刘湘：“兄为乡为国，均应负责到底，虽至一枪一弹，亦必完成任务。”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苏区，在通江县召开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

为了收到川军替他卖命"围剿"红军之奇效，蒋介石不惜血本，给刘湘一次拨发了200万元军费、万余支枪和500万发子弹，要其"分发各军，一战功成"。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红军在四川扎下根，直接危及统治，刘湘急红了眼。

10月4日，刘湘在成都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通电宣称"谨拜新命，克日前驱，誓扫赤氛，用奠邦国"。随即召集各路诸侯，筹划"剿赤"大计。

面对红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一向钩心斗角、相互拆台的四川军阀暂时"团结"起来，决心"痛定思痛，通力合作，剿灭赤患"。

很快，刘湘就拿出了他的"决战"计划，集结全川各路军阀的部队共110多个团、约20万兵力，编为六路大军：

第一路总指挥邓锡侯，率所部第28军18个团出广元、昭化，在西线北翼向木门、南江方向进攻；第二路总指挥田颂尧，率所部第29军24个团出间中，在西线中段向巴中方向进攻；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率所部新编第6师和副总指挥罗泽洲的第23师共15个团出南充，在西线中段田颂尧部以南向巴中东南的曾口场方向进攻；第四路总指挥杨

森，率所部第20军12个团出蓬安，在西线南翼向营山、玉山场、通江方向进攻；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率刘湘第21军主力24个团出开江、开县，向东线南翼宣汉、达县方向进攻；第六路总指挥刘存厚，率所部第23军12个团及土匪王三春部6个团共计18个团出开江、城口，在东线北翼向万源方向进攻。

另有飞机18架参加作战，采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对川陕苏区实施三面合围，并制定了三期作战目标。

第一期：东线（第五、第六路）部队攻占万源、宣汉、达县，西线南翼（第三、第四路）部队攻占江口、营山、仪陇、恩阳河、曾口场，西线北翼（第一、第二路）部队占领旺苍坝、木门；第二期，各部进占通江、南江、巴中；第三期，六路大军合击苦草坝，将红四方面军消灭或者赶出四川。

此番围攻红四方面军，刘湘下了血本，自然信心十足，声称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赤匪”，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正当刘湘精心炮制的六路围攻计划墨迹未干之际，红四方面军即率先发起了宣达战役，进攻矛头直指四川老牌军阀、第23军军长刘存厚。

此人资历甚老，可谓四川军阀演化史的活化石。早年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先是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任四川第四镇统制、重庆镇守使、四川督军、靖川军总司令等职。1924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川陕边防督办，组建川陕边防军，管辖原绥定（达县）府属各县。川陕边防军被南京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3军，刘存厚出任军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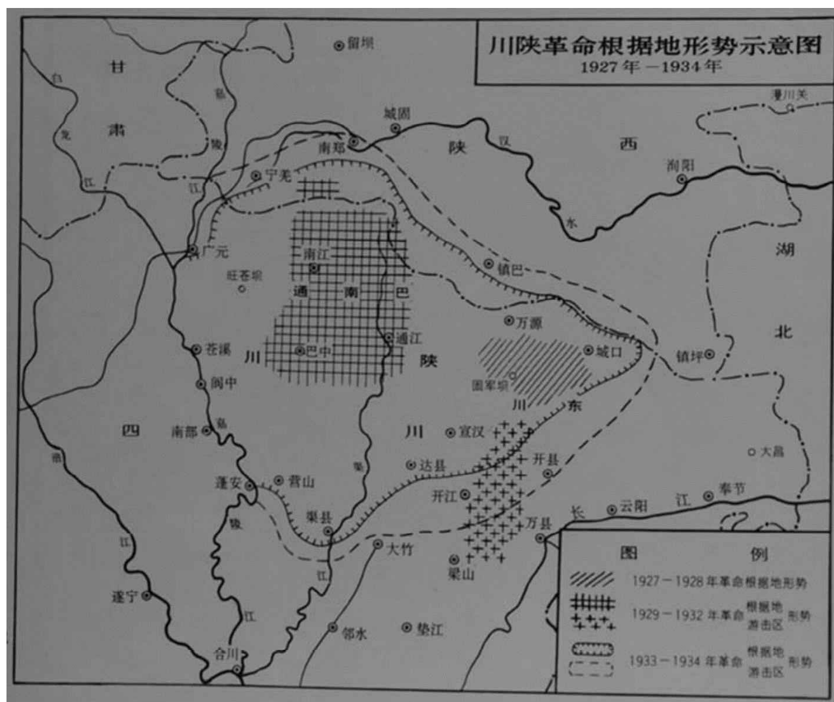
《国闻周报》曾载文这样写道：

这位老将军名义上虽是最早接受了国民政府委给他的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是在脑海中依然憧憬着‘吴玉帅’统治时代的他，所用的国徽依然是‘五色’的，不是‘青天白日’的。他在题赠绥属联合中学的匾额上煌煌题着‘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禾章，崇威上将军’的荣衔。不但在形式上，就是在精神上他也完全继承着北洋时代的典章文物的。

这位吴佩孚的“崇威上将军”升官有道，治军无方，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屡遭败绩，最后不得不退守川东北的万源、宣汉、达县（绥定）、城口一带，苟延残喘。

别看刘存厚指挥打仗不行，可论起搜刮民脂民膏来却是一把好

手。他在达县经营十年，“毫无善政可记，搜刮款项，最为厉害。……征敛之苛虐，则父死子押，兄逃弟囚”。当地百姓痛恨地称他为“瘟牛”（牛是刘的谐音）。



川陕革命根据地形势示意图

对刘存厚，红四方面军并不陌生。刚入川时，红军就曾几次给他写信，要他严守中立。刘存厚非但不予理睬，反而在红军攻打田颂尧部的关键时刻，出兵抢占竹峪关，妄图配合田部夹击红军。

当时，刘存厚的第23军辖2个师另1个独立旅，共15个团2万余人。主力13个团部署在万源至达县以西300余里的防线上，兵力极为分散，纵深防御薄弱，后方空虚，仅有1个旅和指挥部位于达县地区。

10月的川北，天高气爽，云淡风轻。在通江县东南的得胜山，红四方面军总部召开各军领导干部会议，研究制订宣汉战役计划。

根据刘存厚呈一线式的兵力部署，红四方面军决定采取集中兵力，中央突破，直捣敌后，并在两翼实行辅助攻击的战法，力争全歼刘存厚部。具体部署是：

担任主攻的中路以红30军第88师和第89师1个团为第一梯队，红9军第25师为第二梯队，突破敌刘肇乾第1师土地堡阵地后，向宣汉、达县纵深发展。右路以红4军第11师东渡巴河向江陵溪和达县城方向进攻，协同中路红军围歼可能南逃之敌。左路以红4军第10师和第12师1个团进攻草场坝地区敌廖震第2师，得手后向罗文坝、毛坝场发展，并相机占领万源县城。

为迷惑敌人，达成战役发起的突然性，红四方面军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命活动于营山、仪陇、蓬安地区的红9军4个团，苍溪、阆中、南部地区的红30军一部，广元、昭化地区的红31军主力，先沿嘉陵江佯动，造成西进的态势。

10月16日，红军各部按指定地点集结完毕。次日拂晓，随着徐向前下达总攻击命令，宣达战役打响了。

第一梯队红30军第268团在军政委李先念的率领下，采取极其隐蔽的行动，悄悄通过陡峭难行的山路，直奔土地堡要隘烟打寨。

烟打寨四周悬崖矗立，林木丛生，人迹罕至，川军做梦也想不到红军的突破点会选在这个地方。红军利用绳索、葛藤、铁钩、砍刀，攀越上5丈多高的悬崖，突然出现在川军刘肇乾第1师阵地前沿。

敌人还在做着美梦，忽然听到枪声，立刻乱成一团。许多人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少数人负隅顽抗，也被迅速消灭。

烟打寨要隘失守，川军防线犹如河堤决口，不可收拾。

红268团趁势猛插猛进，红9军第25师在副军长许世友率领下迅速跟进，一天内即攻下土地堡、凤凰观、邱家堡、马渡关，歼第6团，击溃第5团，胜利摧垮第1师的防御阵地，残敌如大水冲了蚂蚁窝一样，乱糟糟的，一刻不停向宣汉、达县逃窜。红军沿通往宣汉、达县的大道长驱直入，一口气追出了100多里。

18日拂晓，红25师占领隘口场、双河场后，向宣汉方向挺进。当晚一举攻克宣汉城北要点大明垭。宣汉城守敌惊恐万分，红军先头部队十余人刚接近县城时，守城部队便弃城东逃。

19日，红25师兵不血刃占领宣汉县城。红30军占领了达县城北的双庙场、蒲家场和罗江口，控制了达县通往宣汉的大道。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左一）在行军途中

与此同时，左路红4军第10师和红12师1个团摧毁第2师阵地，占领了镇龙观、余家坪，歼敌1个营。18日又攻占草场坝，守敌1个旅另1个团仓皇逃窜。当行至五龙台时，被红军追上。早已成惊弓之鸟的敌人毫无斗志，纷纷举手投降。红军没费多大力气，便将这股敌人全歼，俘敌旅长以下2000余人。

见红军攻势凌厉，万源守敌廖雨辰等部5个团生怕被歼，便弃城而逃，经黄金口、峰尘场向南一路狂奔。红4军遂进占万源，东向逼近城口。

战役刚打响时，刘存厚认为红军主力仍在嘉陵江沿线。当土地堡、马渡关等地被红军占领，他还错误地判断是川东游击军在“骚扰”，命令部下不用惊慌。直到宣汉失守，才发觉上当，一面调兵加强达县城北要点凤凰山的防守，一面扶乩求神保佑。

然而为时已晚。

李先念亲率红88师第263团攻打凤凰山。红263团是原红10师划归红88师的一个老团，能攻能防，号称“铁锤团”。团长陈锡联是一员虎将，有勇有谋，屡建战功。

凤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陈锡联带2个营进行佯攻，李先念则率1个营出敌不意，绕过凤凰山，沿宣汉大道直取达县城。

正巧，有一批溃散之敌和老百姓向达县城里逃去。李先念灵机一动，马上命令战士们把红旗卷起，帽徽摘下，机枪包好，分散下山混

入进城队伍中，一道行进。

当时川军的服装很杂，红军的服装也很杂，走在一起，敌人竟没发觉。就这样，李先念带着1个营的红军没费一枪一弹，便混进了达县城里，随即向守敌发起猛攻。

城里的敌军猝不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也搞不清有多少红军攻入城里，纷纷四散奔逃。正在府中饮酒扶乩的刘存厚听得城内枪声大作，顿时魂飞魄散，慌忙收拾多年搜刮来的金银细软，带上家眷在卫队的保护下向城南逃去。

此时，城里早已乱成了一锅粥，四周枪声不断，到处都是溃军逃兵。慌乱中，银箱跌落在地上，滚得街道上到处都是银圆，但刘存厚无暇顾及，逃命要紧。

渡河后，刘存厚马上令人烧掉浮桥，径直逃往重庆。一路上刘存厚马不停蹄，慌不择路，总算是跑到了重庆，等待他的是蒋介石“革职查办”的命令。《国闻周报》对这一经过进行了详细描写：

在绥定（达县）危急那几天，刘存厚向刘湘求援的电也不亚于雪片。他在电中，一面告急，一面却也毫不示弱地表示他要“誓死坚守”。刘湘一面赶急派他在梁山的三师去应援，一面也明白老将军只是在虚张声势，未必坚守得住绥定，所以坦白地向他说，如守得住固然很好，万一守不住，而所有的武器也来不及运走的话，至少也得把它们毁了再走。然而我们老朽昏庸的老将军，在那紧要关头，偏偏还那样好整以暇地饮酒扶乩，连搬运要紧东西的大事都想不到，表演了那么一幕仓皇逃走，又厚赠了赤匪一笔礼物的丑剧。

战役期间，川东游击军在总指挥王维舟的率领下迅速响应，主动出击，围堵逃敌，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作战。宣汉解放后，川东游击军将南逃的敌人一部包围于南坝场地区，并及时通报红四方面军。

方面军总部当即决定，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并派许世友率红9军第73团和红4军第28团前往增援。

25日晚，红军和川东游击军在手持鸟枪、大刀、梭镖、棍棒和锄头的数千农民的配合下，分三路向南坝场敌人进攻。经过一天一夜战斗，川军开始多路突围。一路敌人经杨柳关向开江逃窜，被红军追杀至开江宝塔坝。另两路敌人从福禄、东安突围，一路被游击军第1、3支队追杀至开县高桥；一路被游击军第2支队配合红军追至杨柳关。

红军和游击军歼敌1个团，击溃7个团，俘敌500余人，缴枪千余支。



红军兵工厂的工具和制造的子弹

至此，宣达战役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把刘存厚的“绥定王国”端了个底朝天。达县城中各类物资琳琅满目，让出身贫寒的红军官兵难免头晕目眩。

据当时资料记载：

有人把皮鞋油、油墨当罐头吃，弄得满嘴乌黑，洗都洗不掉；有人把袋装的面粉当白灰，扛到城墙上垒工事；无线电台、电话局的玻璃水电池打得满屋粉碎。汽油、洋油亦分不清的乱搬乱弄。电报局的

电报机亦被破坏无余，电报纸满房满路都是，电话用的铁丝抛着没人收拾。图书馆翻得满地稀烂。刘逆的督办署弄得满地满堆是地图文件军事书籍，有的竟用地图揩屁股包东西。

其中，缴获的刘存厚的兵工厂让红军收获巨大。兵工厂有工人1000多人，机床100多台，铜砖800多块，每块重90～100斤。另外，还有浓硫酸、硝酸100余缸，钢材1万多斤，焦炭2万多斤，硫酸和土硝2万多斤，杂铜2万多斤，可以为红军制造大量的枪炮弹药。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

经十一天战斗，我解放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根据地向东扩展200余里，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了一片。敌川陕边防军六个团全部或大部就歼，我毙敌千余，生俘敌旅长以下三千余人，缴枪八千余支，子弹五百余万发，银圆百余万，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余套，还有兵工厂、被服厂、造纸厂、印刷厂及库存的大批粮食物资。这是我军入川以来的一次特大丰收，运输都成了问题。

为了运输这些物资，通江县动员劳力6万多人，昼夜不停地搬了一个星期。

反“六路围攻”作战的第一仗是一场遭遇战。10月底，徐向前率领红4军第10师等部向南追击廖雨辰部，准备乘胜进占开县和开江。当时两开比较富庶，有利于红军获得更大的补充。

当红军进至开县以西的杨柳关地区时，不料与川军第5路第3师王陵基部遭遇。徐向前回忆道：

那天晚上，我们的宿营地和敌人的宿营地挨着不远，互相都不知道。我派一个通讯员给部队送信去，他摸错了路，跑进敌人营地的伙房里去了。要了碗水喝，抬头一看，人家的帽子不对，就赶紧往外跑。敌人发现后，乱打了一阵枪，没伤着他。他回来报告情况，我们才知道敌人就在眼前。既然与敌遭遇，那就狠打一家伙吧！

第3师是刘湘的主力部队，武器装备好，战斗力较强，还未受过红军的打击，加上刚刚在与军阀混战中获胜，又有飞机大炮的掩护，气焰甚为嚣张。双方展开一场激战。

战斗从11月1日开始，一直持续了五六天，红军虽歼敌5000余人，但始终未能击溃敌人，而敌人的后续部队又源源不断地增加。战局对红军越发不利。徐向前命令红军后撤，转入防御，节节抗击，逐步向后收缩阵地。

面对川军大规模围攻的严重形势，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开会研究对策，决定继续采取反“三路围攻”的作战方针，先以运动防御，收紧阵地、节节抗击，消耗、疲惫川军，尔后集中兵力，伺机实施反击，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

具体部署是：以东线为主要方向，由徐向前指挥红4军全部、红9军和红30军各2个师及红33军部队共20多个团，配置于由万源以东至宣汉、达县地区，抗击川军第5、第6路；西线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红31军主力和红9、红30军各1个师共10多个团，配置于由广元沿嘉陵江东岸至营山、渠县以北地区，牵制和抗击川军第1、第2、第3、第4路；另以红31军2个团分散配置于苏区北部一线，负责警戒监视陕南，保障苏区侧后安全。

这时，各路川军先后出动，向根据地进逼。12月中旬，刘湘发动第一期总攻，企图攻占宣汉、达县、仪陇等县城及旺苍地区，压迫红军退向大巴山脉，进而围歼。

东线是敌人“六路围攻”的主要方向，也是红军作战的主战场。

12月16日凌晨，浓雾弥漫。川军第5、第6路在飞机掩护下强渡前河、州河。红4军一部和红9军主力奋起抗击，并乘敌前渡之际发起反击。

嘹亮的军号声骤然而起，各种火器一起开火，密集的枪弹暴风骤雨般倾泻在河面上。刚才还平静的河水顿时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乱作一团的敌军在河中绝望地挣扎着，中弹死伤的被冰冷的河水吞噬了，幸存的狼狈地逃回对岸。

川军第5路总指挥王陵基，四川万县人，骄横跋扈，人称“万县王”。此次围攻红军，颇想一显身手，以便早日爬上军长宝座。见渡河失败，气急败坏的王陵基一面命飞机大炮向红军阵地疯狂轰炸，一面组织部队在火力掩护下继续强渡。

经过两天血战，红军在宣汉城东三河场、城西南曾家山分别给王陵基第3师和廖雨辰部重创，歼敌3000余人。红30军在达县城东南雷音铺阻击第5路范绍曾第4师。战斗中，红88师师长王烈山不幸中弹牺牲。

第5、第6路都是刘湘的主力部队，不仅装备好、火力强，而且作战相当凶猛。为保存有生力量，红军主动撤出宣汉、达县城，在其以北据险阻击。

至1934年1月中旬，红军凭借有利地形，多次挫败川军进攻，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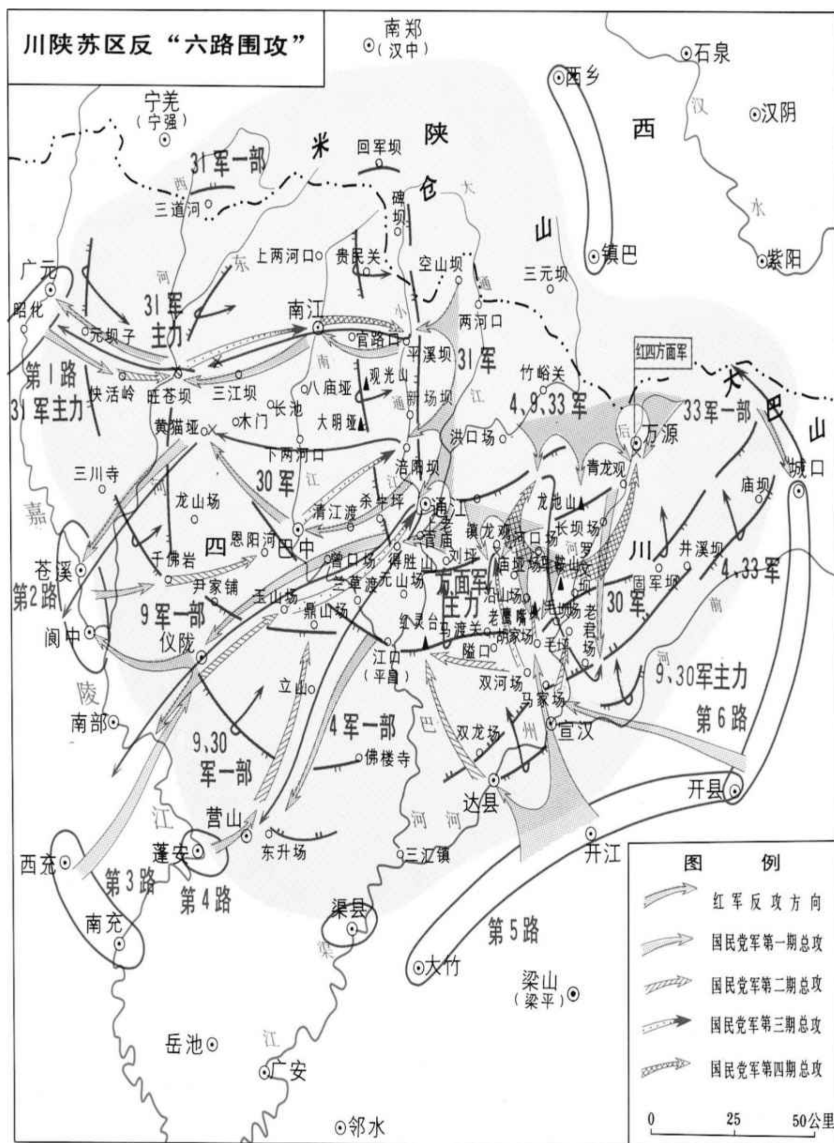
量杀伤敌人，并击落一架飞机。为诱敌深入，骄纵敌人，造成更有利的反击态势，红军左翼阵地收缩至沿山场、罗大湾、固军坝、罗文坝一线，右翼则继续坚守北山场、马渡关等山险要冲地带。

见红军“全线溃败”，王陵基不禁喜上眉梢，连忙下令所部发起猛攻。19日，他亲率手枪大队赶到前方督战，指挥所部第8旅进攻马渡关。

马渡关，地势险要，山高林密，路险涧深，是通往城口、万源的必经之地。许世友率红9军一部在此据守，徐向前的指挥所也设在这里。

时天降大雪，阴沉的天气，棉絮般的雪花，使整个大地变得混沌迷茫。双方在马渡关展开了一场激战。徐向前回忆道：

仗打得很凶恶，敌人把机枪营、炮兵营都拉上来，向我猛烈射击，掩护步兵冲锋。敌我双方，不断肉搏。我们有些阵地，被敌人夺去，部队马上组织反击，又夺回来。



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示意图

激战4天，红军在毙伤敌2000余人后，退至大垭口地带。

这一期间，在西线，川军第1、第2、第3、第4路由北起广元南至营山的嘉陵江东岸发起全线进攻。红31、红30、红9军在王树声的指挥下，有力抗击，予敌以重大杀伤。红31军在广元的快活岭歼第1路近千人，在阆中的鸡山梁击溃第2路3个旅；红9军第27师在红271团

的配合下，在仪陇城南至佛楼寺一线实施阻击，对第3、第4路沉重打击，共击溃4个团，歼敌600余人。随后于1934年1月11日主动放弃仪陇城，收紧阵地，在北起旺苍坝，南沿东河至千佛岩，东向尹家铺、鼎山场一线，继续抗击，与川军对峙。

在两个多月的防御作战中，东西两线红军充分利用地形之险阻击敌人，消耗敌人；同时积极捕捉和创造战机，充分发挥近战、夜战优势，主动出击，夺取防御作战的主动权。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少川军初次同红军作战，不晓得夜摸夜袭战术的厉害。每当太阳落山，攻势停顿，他们便拿起烟枪，横躺竖卧，在一起过烟瘾。这时，我军派出少数兵力隐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攻击，往往以极小代价歼敌制胜。黑夜来临，各部队和地方武装分别组织小分队，越敌防线，摸敌岗哨，袭敌驻地，四处击敌扰敌。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胆战心惊，疲惫不堪。

许世友是这样回忆的：

每到夜晚，一支支小分队就像一把把尖刀，越过敌人的防线，插入敌人纵深，打击敌人，袭扰敌人。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当时闻名全军的“夜老虎团”——三十军二六五团。他们夜袭庆云场，把敌人一个团全部歼灭，使敌人闻风丧胆。有一次，我们搞到敌人的一匹马，夜晚在马背上绑了一个煤油筒，筒里放上一些爆竹，点燃后把马放回敌阵。敌人以为是我军夜袭，又是打枪，又是开炮，折腾了半夜。以后我们采取类似的办法，用牛、用羊进行“夜袭”，搞得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就这样，至2月上旬，第5路各部均遭受沉重打击，且天寒地冻，供给困难，攻势顿减。

时临近旧历年关，川军各路将领群集成都过年，欢庆胜利。王陵基也瞒着刘湘，私自离开前线，溜回万县与家人团聚去了。

这一重要情报迅速被红四方面军总部掌握。自东线防御战打响后，徐向前就一直等待着反击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

东线各军领导被紧急召到指挥部。徐向前兴奋地对大家说：

“开战以来，总是敌人打我们，现在我们要打敌人了！王陵基回家过年去了，敌群龙无首，范绍曾的第4师远在东岳庙、石龙场，敌第3师被阻于马渡关及其以东的花池山一线，均不可能于近期向我军发起进攻。我军防线北翼，敌第23军郝耀庭部冒进至马鞍山，与后面两个旅脱离。我们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反击，争取一举歼灭郝部，然后

掉头向西，席卷敌第3师和第4师，用胜利庆祝春节！”



红四方面军在通江的总指挥部旧址

一席话说得众将热血沸腾，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反围攻作战已经打了3个月了，一直在打阻击，大家早就憋足了一股劲儿，要打个反击战，痛痛快快地收拾一下敌人。

2月10日，小雨夹雪下个不停。按照事先拟制的作战计划，红军各反击部队从沿山场至罗文坝约40里的正面上分多路插向敌阵。敌人做梦也想不到，在这个年终岁尾的风雪之夜，红军会发起反击。

夜幕降临时，红88师一部经马鞍山右侧，突袭楼门口，迂回马鞍山，歼敌2个营。师主力则在马鞍山东南歼敌1个团，乘胜直插毛坝场。

次日拂晓，在红4军一部配合下，红88师发起全线总攻，迅速攻占毛坝场，全歼郝耀庭部2个团，郝耀庭被当场击毙。

与此同时，红25师在许世友的指挥下西出毛坝场，直插马鞍山以南的胡家场，准备捣毁第5路主力第3师师部，求歼该师第7旅。许世友回忆道：

我们以七十三团为前卫，沿着一条山间小路向胡家场疾进。半夜

时分，马鞍山方向响起激烈的枪声，八十八师夜袭马鞍山成功，歼敌两个团。胜利的枪声好似冲锋的号角，鼓舞我们一口气登上一千多米高的老鹰寨。前卫七十三团乘敌不备，一举攻占敌三师七旅一个营盘踞的红岩高地。

红岩是胡家场北部的制高点，从这里向南延伸出两条山脊——鸡公岭和锣鼓山，像一把巨钳从东西两面把胡家场紧紧夹住。我们以七十四团沿鸡公岭、七十五团沿锣鼓山向胡家场攻击前进，对胡家场形成三面包围。守敌第七旅仓促占领村周围之高地进行抵抗，我复以七十三团从右翼插向敌人侧后，并发起总攻。顿时，胡家场周围的山坡上红旗四起，杀声震天，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冲杀过去。中午时分，敌第七旅和三师师部大部被歼，正在师部的第九旅旅长张邦本被我军活捉。

面对红军凌厉的反击攻势，川军慌忙调整部署，令第6路位于马渡关以东的2个旅迅速西移，第5路第3师位于马渡关以南的1个旅东伸，以巩固胡家场、毛坝场、隘口一带阵地。

红军遂停止反击。马鞍山战斗历时5天，红军歼敌1个多旅，在宽约40里的正面上向前推进60多里，达到了反击目的。

正在成都城里过年的刘湘接到战报后，气得浑身发抖，立即将擅离职守"私自返回万县"的王陵基召回成都撤职查办，第5路总指挥之职由第1师师长唐式遵接替，许绍宗接任第3师师长，并从后方抽调4个旅和边防第1路、独立第4团增援第5路。

就这样，刘湘的第一期进攻草草收场。红军缴获了敌人预备过节的鱼、肉、罐头等食品，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新年。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3月3日，刘湘下达第二期总攻令，企图在1个月内，东线占领万源，迫近洪口至竹峪关之线，封锁川北至陕南通道；西线攻占巴中至通江一带地区，逼迫红军向东北后撤。

战斗首先在西线打响。

4日，第1、第2、第3、第4路分别向旺苍坝、恩阳河、玉山场、鼎山场推进。红军依托有利地形，节节抗击，不时实施反击，与敌以沉重打击。战至19日，红军主动撤出阵地，放弃木门、巴中城，向东收紧阵地。

在东线，川军虽投入60多个团的兵力，但全面进攻受挫，不得不改为重点进攻。从12日起，川军猛攻红灵台，企图在红军东、西接合部打开缺口。

新任第5路总指挥的唐式遵本想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刘总司令面前露一小手。不料，这把火却烧到自己身上。4个旅的川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连续发起了三次进攻，均被据险而守的红军将士击退。战至14日，川军伤亡过千，仍未能前进一步。

无奈之下，唐式遵只得下令暂停进攻，转入休整。

22日，战事再起。见红灵台阵地固若金汤，唐式遵把攻击目标转向红军东线中段老鹰嘴、毛坪一线。这次，唐式遵投入了5个旅的重兵，妄想一雪前耻。

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一连攻了3天，川军再遭重创，损兵2000余人。唐式遵无可奈何地致电刘湘诉苦道：

职部当面左翼为老鹰岩，右翼为罗大湾，数十要隘，形如肝叶，昔王三槐据此一线，附者数万，清兵相持数载，不得寸进，因罗斯举引导，清兵由保宁、南、巴进攻通江，破匪老巢，乃告崩溃，形势所关，今古同辙。

坐镇成都指挥的刘湘见第二期总攻仍未达到预期目的，恼羞成怒，于4月初又开始第三期总攻，计划在东线夺取万源后，向西推进；在西线夺取南江、通江，尔后东西相向合围，消灭红军。



红军标语——“活捉刘湘”

为进一步集中兵力，红军再次收紧阵地。东线先后撤至刘坪、镇

龙观至成源城南一线，西线撤至贵民关、观光山至得胜山一线。

4月23日，第5路1个师又3个旅连续向红军东线中段之镇龙观一带发起猛攻。红军顽强抗击，杀得川军人仰马翻，仅镇龙观附近就歼敌4000余人。至28日，川军因损失惨重，被迫后退。

5月15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各路总指挥会议，决定发起第四期总攻，企图先进占通江、万源，尔后西线主力沿川陕边界东进，与东线主力合击。为一举成功，刘湘孤注一掷，将总预备队暂编第2师、教导师第2旅、模范师1个旅全部投入战斗，使参加围攻的部队达到140余个团。

这时，刘湘对红四方面军的围攻，已历时5个月，虽占领了大片苏区土地，“收复”了营山、仪陇、巴中、南江诸县城，但红军主力并没有被消灭，川军却损兵3万，军心动摇。各路总指挥杨森、田颂尧、邓锡侯等人对刘湘颇有疑虑，生怕“剿灭”红军后，刘湘会调转枪口收拾他们，因此在会上大倒苦水，不愿再战。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是对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象表述。有谁能想到，最先懂得这个道理的却是20世纪初中国的军阀。

在那个年代，有兵有枪就能割据一方，就意味着权势、金钱和美女。因此，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首要任务就是保住自己的地盘，不被敌人吞掉。这个敌人，除了“共匪”外，自然也包括刘湘在内。

刘湘急得焦头烂额，一面安抚众将，拨出300万元军饷、200万发子弹分发各部，并表示在“剿灭”红军后确保各路川军的“安全”；一面又请“刘神仙”出山，担任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其在前方指挥。

“刘神仙”何许人也？

此人名唤刘从云，原是民间一个测字算命先生，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后创立了“一贯先天大道”，自封道主，发展道徒万余名，人称“刘神仙”。别看刘从云出身市井，却善于走上层路线，结识并拉拢了不少在四川的达官贵人，其中就有“四川王”刘湘。

说起来可笑，这位刘上将政治眼光高深得很，却是相当迷信。自经人介绍认识刘从云后，便对这位“刘神仙”的“神力”深信不疑，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仅尊其为军师，还自愿入了“一贯先天大道”，道名玉宪。

刘湘的手下诸将自然也紧随其后，纷纷入道。最多时，刘湘所部营以上军官竟有80%是道徒。以致有报载文称刘湘是“以神治军，以军干政，以政扰民”，更有人写文章嘲笑刘湘有了“陆、海、空、神”四大兵种，“只怕是世界第一！”

无独有偶，川军统帅刘湘信奉道教，而湘军首领何键则归铱佛道，曾率湘军集体剃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的确是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刘从云神气十足地来到南充“登台拜印”，扬言“只需三十六天，我把三十六天罡遣齐之后，不费吹灰之力，共匪自然消除。”



红四方面军在万源留下的标语石刻

消息在四川和全国的报纸上登出后，有人便撰文预言：“刘从云即世人所谓刘神仙，一片神话，毫不知兵。识者预测剿匪前途，将遭受意外之挫折。”

为集中兵力，迷惑敌人，创造战机，红四方面军于6月中旬主动放弃得胜山一线阵地。21日，又撤出通江城，在城北沿小通江东岸至万源城南进行阻击。

这下，刘从云更加得意，大肆吹嘘他“占卜有灵”，狂妄叫嚣“三十六天内消灭共匪”。

刘湘对此深信不疑，判断红军将出巫溪、奉节，直取云阳、万县，急忙将第5路主力及第6路一部由通江东调万源。

红四方面军总部审时度势，立即调整部署，令红9、红4、红30军各一部坚守东线阵地，在西线集中10余个团的兵力位于贵民关、观光山间的分水岭地区，待机实施反击。

22日，川军第四期总攻开始。这次，刘湘把总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集中50多个团重点进攻东线万源至通江一线的红军阵地。

此时，红四方面军已退到苏区后部窄小地域，东起万源以东的甑子坪，西至通江，北迄川陕交界的米仓山，纵横不过百余里，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由于根据地越来越小，粮食、盐巴、药品、弹药等物资有耗无补，难以为继。方面军总部遂决定坚守万源，以有利地形顽强抵抗，伺机反攻。著名的万源保卫战就此打响了。

红9军和红4、红30军各一部在6月上旬退守万源城南一线阵地后，即利用当地山势陡峭、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依山势自下而上，筑成数道堑壕盖沟，设置层层竹篱、鹿砦等防御障碍物，并准备大量的滚木礌石，严阵以待。

徐向前回忆道：

要造成有利的反攻条件，还必须经过一个艰苦消耗敌人的阶段。东线是敌主力第五路重点进攻的地区，要下决心在这里实施决战防御，把前沿阵地变成埋葬敌人的坟场，造成反攻的有利形势。熬垮了刘湘的精锐之师，其他军阀势必“树倒猢狲散”，我军反攻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从地形条件上说，东西两线比较，东线反攻更有利些。因为西线山脉多南北走向，利于敌人节节抗击；东线地形南低北高，我军居高临下，反攻开始后可顺着山脉走向，直捣敌人后方，大纵深迂回歼敌。我们要求各部队继续发扬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顽强精神，硬着头皮顶住，准备力量，适时转入反攻。口号是“誓死保卫万源！”“活不缴枪，死不丢尸，人在阵地在！”“紧急关头，准备反攻，进行决战！”

7月11日，川军开始以万源为主要目标的全线猛攻，企图完成第四期总攻任务。

16日，唐式遵自恃后备兵力雄厚，同时命令第5、第6路的8个旅24个团，向万源城东南孔家山、大面山及以西的南天门等红军阵地发

起猛攻。

是日拂晓，唐式遵亲临大面山前线，指挥攻击，决心一举突破红军阵地，进占万源城。

坚守大面山的是许世友所率的红25师，指挥所就设在大面山山顶的一座茅棚里。

红25师奋起抗击，利用短促火力和滚木礌石，大量杀伤敌人。在督战队的驱使下，敌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密集进攻。指挥这次战斗的许世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敌军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进行波浪式的冲锋，一上午就有五六次之多。敌人是赶鸭子战术，冲锋时像看大戏一样人山人海。我军依托阵地沉着应战，待敌人冲到阵地前几十米处，各种火器一起开火，滚木礌石倾泻而下。陷入我火网之中的“双枪兵”就像鸭子炸了群一样四散奔逃，抱头鼠窜。

见攻击部队连连受挫，唐式遵暴跳如雷，请求飞机支援。

不一会儿，随着越来越近的轰鸣声，8架机翼上涂着青天白日徽标的飞机穿梭在硝烟里，不时俯冲下来肆虐地扫射投弹，浓黑的硝烟从红军阵地上四处升起。轰炸过后，川军士兵又狂呼乱叫着，漫山遍野地冲上来。

红军将士也早已杀红了眼，与川军拼得惊天动地。阵地前，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

气势汹汹川军连续多次冲锋受挫，打了大半天也没有攻下一个山头。唐式遵的脸气得发青，重新组织空袭和炮轰。

大面山的战斗进入到更加残酷的阶段。

英勇的红军将士发扬以一当十的大无畏精神，用血肉之躯抵挡住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但在川军连续的冲击下，红军伤亡也不断加大。

激战至下午，川军终于突破红军第一道防线，爬到山腰。

危急关头，红军指战员拔出背后的大刀，挥舞着冲入敌阵，猛追猛杀，硬是用大刀把敌人杀下山去，夺回了阵地。

红25师从师长到战士，每人都有一把系着红布的大刀，纯钢打造，锋利无比，连砍十几个铜板都不卷刃。可从天亮一直血战到天黑，大刀砍卷了，刺刀捅弯了，直杀得川军血肉横飞，胆寒心裂。川

军终于招架不住，丢下一堆堆尸体，狼狈地败下阵来。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老鹰寨、青山，我仅有三个连的兵力，加上些地方武装，就抗住了两旅敌人的轮番进攻。徐深吉同志带着个一百二十来人的总部教导队，对付敌人一个团，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可敌人还是攻不动。

22日，经过5天休整，唐式遵再次指挥川军各部发起了进攻。这次，他以5个旅进攻大面山，3个旅转向万源以东，攻击红88师第265团坚守的花粤山、抓子坪，企图从后面威胁万源。

血战又开始了。

一阵又一阵炮火猛轰，一轮接一轮冲锋突击，川军大有三两下就把红军阵地翻过来之势。红军将士勇猛顽强，与敌血战至黄昏。川军除了在红军阵地前留下了大量尸体外，一无所获，形成对峙局面。

入夜后，激战一天的敌人早已累得睁不开眼，东倒西歪地躺在阵地里呼呼大睡起来。第265团是红四方面军有名的夜老虎团，善打夜战，自然不会错过这种夜袭敌阵的好戏。时任红88师师长兼政委的程世才回忆道：

敌人的旅部在我军阵地对面的山头羊跳岩一带，虽然那面高呼这边即可听见，但一下坡一上山，却有一二十里地。由于不几天前下了一场雨，所以潮湿的山上升腾着一层薄雾，使悬挂在高空的明月，朦朦胧胧。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和政治部主任带领该团五个连出发了。战士们一个个像蹿山的猛虎，沿着山势起伏，在山林中迅速隐蔽地前进着。在午夜一点钟前，我军已到敌旅部前沿，但愚蠢的敌人，一点儿也没发觉。

夜间一点多钟时，我军突然对敌发起猛烈袭击，清脆响亮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敌人在睡梦中被惊醒后，连裤子也来不及穿，光着身子赤裸裸地乱跑乱叫，我军趁敌惊魂未定之际，已迅速攻进敌人旅部。战士们大砍大杀，猛甩手榴弹，很快将敌人旅部及所属部队打了个稀巴烂。

战斗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敌人七八百人，缴枪数百支，俘敌近200余人。为防止其逃跑，用绳子绑着胳膊带回来。还缴了大量子弹、布匹、衣物、香皂、罐头等物品。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通江王坪修建的烈士墓碑

27日，唐式遵在刘湘的电责下向大面山、抓子坪发动了又一次猛攻。但在红军的英勇抵抗下，最终还是败下阵去。

刘湘见连攻不克，于8月初颁布重奖严惩条款，宣布攻下万源赏大洋3万元，擅自弃阵逃跑者军法从事，长官不临阵指挥者处死。

这次，刘总司令动了真格的，唐式遵自然不敢怠慢。

8月6日，经过长达9天的准备，唐式遵倾全力向万源城外花萼山、甑子坪、孔家山、大面山、南天门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唐式遵亲临前线指挥，发誓“要在日内将万源攻下”。他以第1师和王三春、陈国枢等部进攻花萼山、甑子坪，迂回万源东侧；以第6路之廖雨辰、汪铸龙部进攻南天门，迂回万源西侧；以第2、第3师主力进攻万源正面的孔家山、大面山。

川军进攻前先以炮火猛轰，然后发起波浪式的密集冲锋。一次冲锋被打退，接着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1个团攻不动，就投入2个团、3个团、4个团。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红军前沿阵地不时被敌人突破，许世友将营敢死队、团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同敌人反复争夺，寸土不让，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就连一向善打恶仗的许世友后来回忆说：“万源防御战，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极为残酷激烈的坚守防御作战。”

激战一天，红25师阵地屹然不动，敌人虽然付出惨重代价，仍未能前进一步。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留下的标语

次日清晨，隆隆的炮声又拉开了战幕。

川军依旧是老战术，炮火过后，步兵发起冲锋。敌人真是拼了死命，尤其是抽足大烟后借着“烟劲”冲锋，相当厉害。川军中还有一批“要钱不要命”的土匪、亡命徒，为了领赏钱、烟土，一个个光着膀子，手持短枪，嗷嗷叫着冲向红军阵地。

这是关系到川陕苏区生死存亡的一场血战。红军将士们也杀红了

眼，抱着人在阵地在的决心，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

战斗越是激烈，指挥越要靠前。我们师指挥所转移到离前沿阵地只有二百多米的老鹰寨，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在进攻中，以营以下军官组成敢死队，由旅团指挥官赤膊督战，对畏惧不前者就地枪决。飞机炸，大炮轰，集团冲锋就像滚肉球一样，一批又一批地涌了上来。

傍晚时分，敌人的进攻力量终于消耗殆尽了，红25师趁势发起了全线反击。许世友也带着师直属分队杀向敌人。

早已精疲力竭的敌人溃不成军，干脆整团整旅地后逃。一时间，唐式遵布于大面山前的6个旅，全部动摇，各自落荒而逃。红军一直追杀了七八里，把敌人赶到白沙河才得胜而回。

万源保卫战历时20多天，歼灭川军1万余人，缴获步枪千余支、机枪30余挺、迫击炮30余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成为反“六路围攻”战役的转折点。

这时，敌我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川军虽人数占优，但同去年发起“六路围攻”时已今非昔比。大量部队被红军歼灭，一些部队由于被歼、逃亡或向红军投诚，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加上时值炎夏，酷暑难耐，万源地区山高路险，补给困难。川军上上下下都笼罩在浓厚的悲观、厌战情绪之中。第2师师长廖雨辰在写给刘湘的报告中称：

崇山峻岭，溽暑炎蒸，疫病丛生，遗尸载道。伤亡既众，无法补充，勇气消沉，兵无斗志。官长恒多自戕，士兵日益逃亡，考查各连兵员情况，多者不过三十名，少者仅十余名，加以千里馈粮，师不宿饱，怨气四起，哗溃堪虞……

8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万源前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万源西南地形险要、守军兵力薄弱的青龙观为东线反攻的突破口，寻歼第5路主力。具体部署是：

以红4、红9军主力和红31军一部共14个团为第一梯队，担任突击；以红30军主力和红33军一部共8个团为第二梯队，协同第一梯队向纵深发展；以红4、红9军各一部坚守万源以东以南阵地；红31军主力和红30军一部坚守通江东岸一线阵地，待机反攻。

会后，方面军总部在嘉奖万源前线部队的通令中向全军庄严宣告：“乘胜反攻的时机业已成熟了！”号召全军加倍努力，消灭敌人，

为彻底粉碎敌人围攻英勇战斗。

10日夜，红军东线部队开始反攻。红31军突击分队经南天门直插青龙观，隐蔽接敌，歼敌1个营部。随后，先头部队全部投入战斗，一连打退敌军10余次反扑，歼敌1个旅部，攻占青龙观要隘。

次日拂晓，红31军一部乘胜向纵深发展，红4、红9军主力同时从左右两翼发起攻击。经数日奋战，至16日，进至河口场、庙垭场地区。

川军撤至东起井溪坝，西经东升场、马家场至双龙场一线，与红军形成对峙。

红军东线反击作战共歼灭川军3个旅又3个团，并对其他几十个旅以不同程度的打击，仅第5路就被歼约15000人。

西线各路川军见东线主力损失惨重，慌忙调整部署，企图依托小通江西岸山地抵御红军。

8月下旬，东线红军除留红33军及红4、红9军各一部牵制当面敌军外，主力迅速西进。

28日，红30军及红4、红9军主力由通江城南上老官庙渡过通江，乘夜进击，一举突破第3、第4路接合部得胜山附近阵地，迫敌后撤。

9月8日夜，红军突然发起攻击，突破川军青江渡阵地，继向巴中疾进。

见红军攻势迅猛，西线川军各部力图自保，纷纷溃逃。

徐向前指挥红30军和红31军一部，乘势追击，于9月11日占领巴中。随即实施大纵深迂回，昼夜兼程，直插第1、第2路后方，位于旺苍坝东南的黄木垭（又称黄猫垭）。

从巴中城到黄木垭，足有150里山路。自东线大反击以来，红军官兵昼夜行军作战，已十分疲惫，加上天气炎热，山路难行，供应困难，行军途中，掉队者甚多，有的人一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

徐向前传令给刚刚升任红30军副军长的程世才：要分秒必争，能带多少人到目的地就带多少人到目的地，截住敌人就是胜利！

程世才回忆道：

拂晓，群山弥漫着潮湿的冷雾。我领着队伍，沿着高低起伏弯弯曲曲的山路，向黄猫垭方向飞快地前进着。

中午，当我到距黄猫垭只有20多里的九龙场以西的山梁时，二六三团来人报告说：“黄猫垭尚未发现敌人。”我命令二六五团就地迅速做午饭吃。因为情况紧迫，我顾不得吃饭，当即带领着警卫连又继续前进了。

我让骑马前进的警卫员，用望远镜不断向四方观察，并命令警卫连的董连长，派人沿途搜索前进。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离黄猫垭不远的五观寨。

“副军长，发现敌人了！”警卫员沈德叶同志突然向我喊着。

我顺着警卫员手指的方向看去：在敌人尖兵排后面，灰压压一大片敌人，就像群饿急了的羊群，你挤我钻地顺着山路爬了过来。

这正是从木门方面溃退下来的田颂尧第2路的部队。此时，程世才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还没有占领阵地。他急令警卫连抢先占领垭口，向敌人开火，同时派人分头通知第265、第263团，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务必要挡住敌人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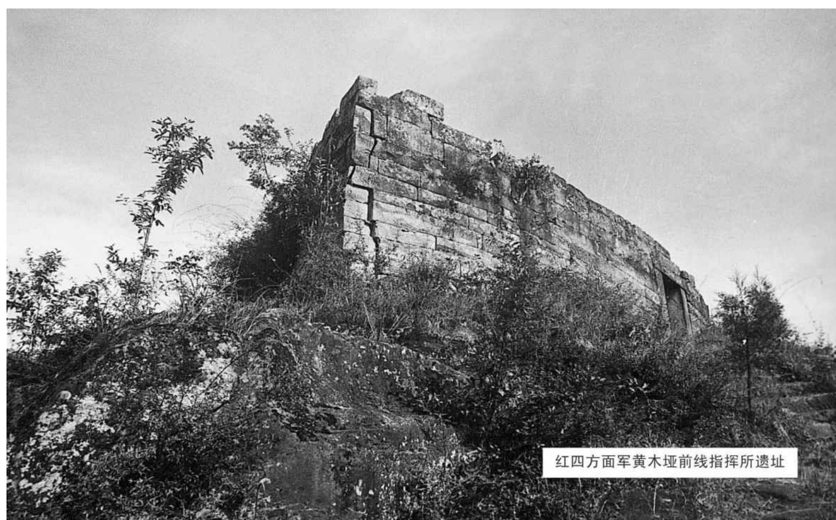
逃敌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出现在他们的大后方。枪声一响，前面的部队往后跑，后面的部队逃命心切，却往前涌，一时前后部队拥成一团，潮水一般向据守垭口的红军发起猛攻。

黄木垭以山上有块岩石发黄，形状似猫而得名。周围皆是崇山峻岭，是敌军西逃的必经之路。敌人越聚越多，竟有10多个团14000余人，被围困在一条山谷里，前进不能，后退无门，只能冒死冲锋。

红军死死扼住制高点，与敌人展开肉搏血战，整整打了一夜，牢牢控制着阵地。

次日拂晓，徐向前率大部队赶到。为夺路西逃，敌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以整营整团规模发起猛攻，战斗打得更加残酷。

随着红军后续部队赶到，包围圈越压越小。总攻的号音在黎明的曙色里响起来，红军从四面八方杀进山谷，将敌人分割成数段。



红四方面军黄木垭前线指挥所遗址

激战至中午，全歼该敌，共毙伤俘旅长以下官兵14000余人，缴获迫击炮20多门、长短枪7000余支、电话机80余部、电台7部、子弹数十万发。

与此同时，红31军主力在分水岭一带向第1路进击，歼其一部。17日收复南江城，随后继续西进，于19日在三江坝、旺苍坝地区再歼第1路一部，前锋直逼广元城。

在红军势如破竹的攻势面前，川军全线崩溃，拼命往后跑，只恨爹妈少生两只腿。红军乘胜追击。红30军向南疾进，于22日攻克苍溪城。红9军一部向西追击，先后收复仪陇、阆中。红4军一部尾追第4路，直至兰草渡西南地区。

至9月下旬，川军第1、第2、第3路大部溃逃至嘉陵江以西，第4路撤逃至营山、渠县地区。这样，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基本被红军占领，刘湘精心炮制的“六路围攻”宣告彻底失败。

兵败如山倒，“刘神仙”也无力回天，只得“通电辞职”。刘湘更是悲愤交加，致电蒋介石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和陆军第21军军长等职，电文中声称此次围攻“耗资一千九百万，官损五千，兵折八万”。

在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中，红四方面军共毙伤俘川军8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万余支（挺），火炮100余门，击落飞机1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突破乌江

【交战时间】1935年1月1～5日

【交战双方】红一军团；国民党黔军第25军教导师

【指挥将领】林彪、聂荣臻；侯之担

【战果】红军击溃黔军1个师，占领遵义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红军长征进至乌江南岸。

同日，军委纵队经瓮安县的老坟嘴，到达猴场。这时，博古、李德反对红军转兵贵州，坚持要返回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

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元旦，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猴场召开，做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从而彻底改变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说了算的不正常状况。

据此，红军必须首先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但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横亘着一道天险——乌江。

从西南到东北斜贯贵州全省的乌江，奔流在两岸深灰色的坚硬山岩之间，水深流急，是贵州最大的一条河流，也是黔北各线的一条天然屏障。关于乌江之险，明朝游记作者谢鸿在《夜郎蒙拾》一书中写道：

黔地多川，乌江为右，水如奔箭，浪涛惊魂，险滩如麻，滩滩相接，渔人不见踪影。两岸峭岩陡壁，猿不可攀，河谷狭窄如肠，往下俯瞰，人如蚁点，往上仰视，窄窄一线青天……

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强渡乌江，其中第1师由军委直接指挥，第2师由林彪和聂荣臻率领，分别在龙溪、江界渡口突破。

防守乌江天险的是黔军第25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为阻止红军渡过乌江，侯之担调兵遣将，将驻川南、黔北的大部分兵力向遵义集中，并召集所部旅、团长到遵义开会商议对策。

会上，侯之担信誓旦旦地称：“教导师奉令防守乌江，必须堵截红军越过。如有玩忽职守，军法从事。”

但手下诸将却没有那么乐观，纷纷摇头叹气，表示：红军战斗力非同一般，蒋介石数十万中央大军尚且不能阻挡，也不敢迎头截堵，乌江又何能阻止得住？况且乌江河防战线过长，万一被突破一点，全线动摇，部队难以集中。

诸将判断红军不会久留贵州，便建议侯之担不如兵分两路撤离遵义，一部撤至赤水、仁怀，保住地盘，并拱卫川南；一部撤至绥阳、正安，以避红军之锋，俟红军走后，可就近收复遵义。

侯之担自恃有乌江天险，并没把红军放在心上，坚持要据守。他判断：袁家河和孙家渡位于瓮安、余庆、湄潭三县边境交界处，河面宽广，水流较缓，背面山势又不太陡峭，可能是红军强渡的目标，据此做出如下部署：

教导师第1旅旅长刘翰吾任右路指挥，率第1、第3团防守乌江的江界河一带渡口及河岸沿线，重点放在江界河；川南边防军第1旅旅长易少荃任中路指挥，与副旅长任骧率第6团防守袁家渡一带河岸，并与防守湄潭的直属第8团衔接；教导师第3旅旅长林秀生为左路指挥，率第5团及机炮营防守孙家渡、茶山关一带，与第3团切取联络；教导师副师长侯汉佑为前敌指挥，率特务第2营进驻猪场指挥；川南各县留川南边防军第2旅侯之玺部防守，由川南边防副司令岑炯昌指挥；赤水、仁怀留第2、第7团驻守，作为总预备队，由邹瑾在赤水坐镇指挥；侯之担亲率特务第1营驻遵义指挥。

最后，侯之担又给部下打气：“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致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

12月31日，先头部队红2师第4团在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飞速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渡口。

耿飚和杨成武亲自化装来到江边侦察。乌江果然名不虚传，但见湍急的江水滔滔奔腾，浪花如雪，犹如万马奔腾，大有一泻千里之势。两岸到处是数十丈高的悬崖绝壁，岁月风雨早已把它冲刷成蜂窝状，其间怪石凸起，甚是狰狞。

1935年元旦，红军先在渡口佯渡，以吸引敌人注意力，同时组织以3连连长毛振发为首的八位擅长游泳的勇士，冒着严寒和急流，在上游老虎洞悄悄泅水过江。但由于准备架桥的绳索被敌人的炮火打

断，只得又游了回来。

当夜，红军又组织十八位勇士乘竹筏偷渡。由于水深浪急，只有毛振发率四名战士所乘坐的第一筏渡河成功，悄悄潜伏于黔军罗玉春团防线内岩石脚下。

2日9时，红4团紧急动员，绑扎了60多个竹筏，以3个竹筏为先头，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进行强渡。当红军逼近北岸，敌人正在拼命阻击时，突然发现在自己阵地岩石脚下埋有伏兵。红军五勇士犹如同天兵天将，刹那间便冲到黔军阵地上，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

黔军仗着人多势众，且居高临下，拼命抵抗。这时敌人的预备队也杀了过来，红军被迫退守江边。危急关头，红1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亲自操炮，一连发射三发炮弹，把正向红军滩头阵地猛冲的敌人给打蒙了。

红军趁势反击，黔军招架不住，纷纷溃逃。机炮营营长赵宪辉督队反扑，当场被击毙。黔军兵败如山倒，乱作一团。罗玉春见指挥失灵，急得嘶声嚎叫：“我不走，我要死在这里！”

卫兵们只好拖着他仓皇逃命。

强渡成功后，红4团迅速架设浮桥，保证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过江。

当天下午，红1师在龙溪回龙坝渡口组织强渡成功。第二天上午，渡过乌江后的红1团向湄潭进发。

由于罗玉春团迅速崩溃，震动了林秀生旅的整个右侧阵地。

3日下午，林秀生旅纷纷溃退，逃窜至珠藏被副师长侯汉佑收容，后经遵义、鸭溪向长干山退却。



红星报

伟大的开始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胜利

开展胜利的反攻，开展顽强的战斗，争取全线反攻的胜利！

战场上的第四连

一个模范班长

《红星报》报道的红军强渡乌江的英雄事迹

惊闻江界河失守，易少荃即率欧阳文、刘安祯两团仓皇撤到龙坪、深溪水设防堵击，在与红军交战数小时后惨败，伤亡及被俘者甚众。易少荃率残部绕过遵义城，向桐梓狼狈逃跑，其残部由刘翰吾收容。

与此同时，扼守茶山关的右路指挥刘翰吾，被林秀生、易少荃两旅相继惨败的消息吓得失魂落魄，江界河、孙家渡相继失守，慌不择路往桐梓退却。

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夺取茶山关，乘势突破乌江天险，从而扭转了不利局面。

对此，国民党军史专家、时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总司令部顾问的胡羽高不禁哀叹道：

乌江为黔中第一大水，有天险之称。而今朱、毛到此，天堑本难飞渡，然竟易渡。1934年算是过去了，而抗日必先“剿匪”的口号，又成为过去。不料贵州的乌江竟成为朱、毛的过年洗礼，中央军“剿匪”之成就等于零也。

许多年后，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将此段历史改编成了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突破乌江》，搬上了银幕。

突破乌江天险后，中央红军乘胜追击，分三路浩浩荡荡地向侯之担部所驻扎的黔北重镇——遵义前进。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贵州军阀赖以发迹的地方。它北通重庆，南接贵阳，东有武陵山，西有大娄山，四周山峦起伏，形势雄峻，为黔北重镇。战国时属夜郎国，汉时设县，到唐代改名遵义县。遵义城以一条穿城而过的小河为界，分为新城和老城。它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汉、苗、布依、回、彝等各族商旅云集的场所，也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大城镇。

遵义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代郑珍编撰的《遵义府志》称：“水国重津梁，山国重关隘，二者遵义兼之。”又说遵义“地介川、湖、贵竹之间，西北则堑山为关，东南则附江为池。”“昔归蜀郡，止南界之边裔；今属黔疆，实北门之锁钥。”

得知红军进逼遵义后，黔军惊恐万状。

1月3日，黔军第25军教导师副师长、江防指挥侯汉佑，将防务交给部下第3旅旅长林秀生，于4日仓皇逃回遵义。

而此时的遵义城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在得知前线一连串败讯后，侯之担成了惊弓之鸟，急忙收拾多年来搜刮的金银细软，准备弃城而逃。他刚刚坐进汽车，侯汉佑就气喘吁吁地跑来，请示撤退路线和集中地点。

侯之担不耐烦地说："我要去重庆会刘湘再转赤水。你赶快收容部队到仁怀、茅台一带集中听候命令……"并将遵义城防任务交给川南边防军第2旅旅长兼城防司令侯之玺。

话还没说完，城内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密集的枪声。随即有人高喊："不好了，快跑呀！共军打进城了！"

侯之担顿时脸色大变，也来不及向侯汉佑交代任务，就命令司机："快、快、快开车！"

在刺耳的喇叭声中，汽车一溜烟向城外驶去。

其实，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枪声是逃进城内的散兵所放的。

侯之玺知道等待他的命运怕是和侯汉佑一样，但他无人可推，只好接手。他将1个团配置在深溪水一带前哨阵地，两个团分别担任遵义新、老城防，寄希望于川军援兵速到，"绝处逢生"。

6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到红6团，立即召集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研究攻打遵义的方案。

刘伯承说："这次打遵义有很大的意义!你们是主力部队，一路上打的仗都很漂亮，要求你们这一炮要打得更响！虽然王家烈的部队是地方部队，但遵义城比较大，城防也较严密，黔军3000多人，咱们才1000多人，困难还是有的。打仗嘛，就是豆腐也要当成石头去切它!"

正说着，师侦察科科长梁兴初报告：距遵义30里的深溪水发现黔军的外围据点，驻有1个营的兵力。

刘伯承指示红6团务必要全歼，不许有一个漏网，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攻城的困难。

朱水秋、王集成当即表示：一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这股黔军，不使一人漏网。

刘伯承望着两员猛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啰!"

这时，参谋送来一封电报，是朱德发来的：

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

军委命令三军团渡江后以一个师兵力截断遵义与贵阳之间的交通，另派一个师加入攻占遵义的行动，并暂归刘伯承统一指挥。

朱德

刘伯承看后不禁喜上眉梢："这下可真好了。三军团截断了贵阳到遵义的交通，我们就不必顾虑黔军来援兵了。还派一个师来协同作战，我们就更有把握拿下遵义城了。"

说话间，警卫员领进来一个人。来人是"遵义青年反帝拥苏同盟"的交通员罗君彝。

罗君彝报告称：遵义地下党受遵湄绥游击队委托，派他前来告诉总参谋长，遵义人民已经做好准备，联系组织了许多进步人士，迎接红军进遵义城。并交给刘伯承一份遵义城防的布置图，以及写有遵义周边地区的土豪地主武装的名字和分布的一份名单。

真是双喜临门！刘伯承非常激动，握住罗君彝的手连向遵义人民和地下党表示感谢！

这时天降大雨，给红军的行动增加了麻烦，但同时也麻痹了驻守深溪水的黔军，以为不会有情况，便尽情地打起麻将、推起牌九，一点儿防备也没有。

下午3时，红6团第1营在营长曾宝堂的带领下，以迅雷般的动作，冒雨奇袭深溪水。当红军如天兵天将般打进来时，毫无防备的敌人顿时乱成一窝蜂，许多人还没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当了俘虏，敌营长企图逃窜被当场击毙，这股敌人无一漏网。

红6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迅速隐蔽插到了遵义近郊。

为详细了解遵义城防情况，王集成亲自向俘虏宣传红军的政策，讲清红军是打倒军阀地主，是为了穷人翻身解放而战斗的部队，并说："我们今天就要打遵义，谁了解遵义的情况详细报告，说得对的事后有赏。"

俘虏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出了遵义的城防工事和守军位置，还画了一张草图。

摸清楚了遵义城的底细，又掌握着一批俘虏，王集成和朱水秋决定化装成黔军，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

天黑后，曾宝堂带着第3连和团直属侦察排、司号员等，换上黔军的服装，并由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带路，冒雨向遵义进发，其余部队随后跟进。红6团做了两手准备，争取诈开城门，如诈不开城门，就实行强攻，迅速夺取遵义。

午夜时分，曾宝堂带领这支"黔军残部"来到遵义城下。被俘的军官按照事先安排向城楼守敌喊话。敌军盘问了半天，问不出什么破

绽。为了慎重，他们用几只手电往城下照来照去，就是不开城门。

曾保堂悄声说：“稳住，别慌，给他们来点硬的，别露馅了。”

俘虏军官顿时来了精神，破口大骂：“婊子养的，老子在前面和共匪拼命，你们他妈的却在城里睡大觉。如今我们被共匪撵来了，你们他妈的却见死不救。”

他边说边拉动枪栓，“横竖是个死，不如先打死你们这些王八蛋，再到王主席（王家烈）那里去理论。”

守军见状只好说：“等着，别吵，这就给你们开门。”

曾保堂小声命令战士悄悄上好刺刀，子弹上膛，准备冲锋。

又高又厚的城门打开了。战士们飞速冲了进去，首先割断电话线，下了敌人的枪，城楼上的所有哨兵很快都被俘虏了。

随行的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后续部队开始冲锋。震天的号声和喊杀声中，城里守军不知多少红军杀进城来，胆战心惊，好多人在被窝里就成了红军的俘虏，其余人无心抵抗，狼狈地从北门向娄山关、桐梓逃窜。

1月7日凌晨，红军胜利地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城。

四渡赤水

【交战时间】1935年1月19日～5月9日

【交战双方】中央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等部

【指挥将领】毛泽东；薛岳、刘湘、王家烈、龙云

【战果】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此时，蒋介石纠集川军、滇军、黔军及中央军共150多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扑来，企图将红军压迫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的狭小地区，然后企图聚而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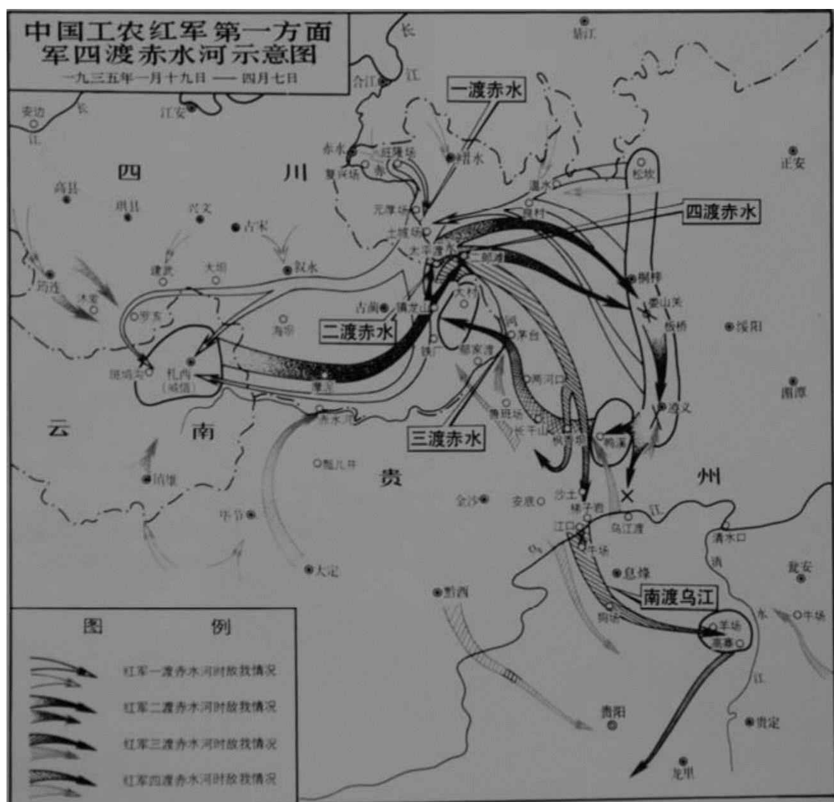
红军面临的形势仍是极其严峻的。东面有湘军刘建绪的4个师，西面有滇军孙渡的6个旅，南面有中央军薛岳的2个纵队，北面有川军刘湘的12个旅。

对于刚刚重新确立领导地位的毛泽东来说，真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要想率领3万红军摆脱30万敌人，犹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而，毛泽东却以他博大精深的战争艺术，导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战争活剧——四渡赤水。

●毛泽东原本打算在土城吃掉“郭猫子”，没料到川军如何难啃

为粉碎国民党的围歼计划，争取战略主动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中革军委决定，乘敌军尚未形成合围之前，向遵义西北地区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并在川南泸州至宜宾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入四川西北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月19日，红军分兵三路北上。红1军团由桐梓集结地西进，红3军团经仁怀向北，红5、红9军团和军委纵队随后跟进，准备渡江入川，创建川西北苏区。



四渡赤水示意图

由于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把党的路线转移到正确轨道上，红军经过休整、缩编，增强了机动性和战斗力，士气振奋，战士们边行军边哼着贵州小调：“川军像条牛，我们牵着游；黔军像条狗，我们打着走……”

22日，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分别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告以中央红军渡江北上计划，指示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西进攻”，威逼重庆，吸引和钳制川东之敌；令红2、红6军团积极向东出击，威胁长江交通，牵制湘鄂之敌，配合中央红军北上。

国民党军正分路进行围追堵截，并且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其中，黔军占领遵义、湄潭；川军以一部兵力防守宜宾、泸州，以8个旅分路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等地推进。

就这样，一个要大举合围聚歼，一个要大踏步前进；一个气壮如牛，一个用兵如神。黔北地区顿时成为一个巨大的棋盘。国共双方都

在调兵遣将，步步逼近，剑拔弩张，一场血战势不可免。

24日，红1军团没费吹灰之力便进占了土城，黔军侯之担部惊慌失措逃过赤水河。

土城，地处黔西北，东、南、北三面为险峻山岭，是赤水东岸重要渡口，黔北大道要冲，也是西渡赤水的最佳地域。

倚河而建的土城镇不大，名声却不小。一是酒名，与紧邻的茅台镇几乎并驾齐名。二是盐名，这是川盐入黔的一个码头。川盐用木船从产地沿赤水河运至镇上，然后由苦力用背兜背负着，爬坡上坎，穿山越岭，运往黔北各地销售。故有“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赤水河）”之语。

红1军团稍作休息，即在军团长林彪的率领下，向土城以北不远的赤水城急速推进。

赤水，地处川黔交界，东南部山高坡陡，西北部河谷开阔，公路毗连附近的川黔各县，更是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必须通过的要点。

土城和赤水，一南一北，中间为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广大地域，是实现北渡长江进而赤化四川的关键。



土城红军驻地遗址

林彪料想战事会比较顺利，因为赤水城里一个小军火库的工人曾在几天前举行过一次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示威，这可能会对红军攻城有所帮助。红1军团有4000余人，都是久经战火洗礼的精兵强将。他们

为能见到赤水城而兴奋不已，因为早就听说城里有电灯，而战士们大多数从未见过电灯。

但是，当红1军团抵达距赤水县城30里的黄洞陂村时，川军章安平旅已先一步赶到，并在道路一侧筑有坚固的碉堡，在另一侧的小山顶上修筑了强大的工事。

原来，红军占领土城后，蒋介石大为恼怒，急电薛岳及王家烈追究罪责，认为土城不守，红军势必经赤水入川南，下令将作战不力擅自离职的侯之担缉拿归案。同时急调重兵加强堵截力量。

红军先于川军占领了土城，取得西渡的有利地位；川军却先于红军占领了赤水城，阻碍了红军的北上。双方虽各有得失，但红军渡江北上的作战计划，一开始就打了折扣。

无奈之下，红1军团开始强攻赤水。激战了整整一个白天，双方依然处于胶着状态。擅打恶战的红1军团竟打不开前进的通路。

红1军团坚持打到黄昏，然后主动撤出战斗。林彪连夜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

26日，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刚刚到达土城，川军模范师副师长郭勋祺率2个旅即尾追而至。



土城渡口遗址

郭勋祺，原名郭劭，字翼之，绰号“郭猫子”。1895年生于四川华阳。1915年投效川军潘文华部，因作战勇敢，由文书逐级递升至团长。1921年随潘文华投靠刘湘，深受刘湘的器重，不久即升任第7旅旅长，成为刘湘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

郭勋祺虽对刘湘忠心无二，但与刘湘积极“清共”不同。这位在川军中闯荡多年的“郭猫子”不仅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而且与川籍共产党人杨闇公（杨尚昆的哥哥）、刘伯承、陈毅等都有很深的交往。



土城战役中青杠坡战斗遗址

郭勋祺的进步活动，引起了刘湘的不满和猜疑。刘湘考虑到郭勋祺骁勇善战，同潘文华的关系非同一般，且与共产党有关系，日后或许有用，便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段，撤掉了他的旅长职务，改任副师长，不让他掌握实权。

1935年1月，蒋介石命令刘湘派3个师入黔阻击红军。刘湘考虑再三，决定除了先期入黔的廖泽旅外，再派2个旅入黔，但这2个旅既要在表面上积极行动以应付蒋介石，又能暗中保存自己，不主动攻击红军；如果红军真要入川，则又要能打硬仗以阻之。

最终，刘湘选中了郭勋祺，认为他既对自己忠诚可靠，作战勇猛，同时又曾与共产党有交情，由他率军入黔，相机行事，一定能完成“剿共”又“存共”的任务。

刘湘的眼力果然不错，在阻止红军入川方面，郭勋祺的确不遗余力。

1月27日，军委纵队与红3、红5、红9军团全部抵达土城一带。此时侦察获悉川军4个团尾追红军而来。

“刘湘的川军反应并不迟钝嘛，他们追到了哪里？”

川军行动之神速，的确有些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不禁微微蹙起了眉头。几天来，这股敌人一直尾追着红军总部，开始时并没有引起毛泽东多大的注意，而任凭敌人穷追不舍，等拖疲他们再回头收拾就行了。

刘伯承边指着地图边答道：“据现在掌握的情况，尾追之敌是川军的2个旅4个团，由副师长郭勋祺率领。此人是刘湘的心腹干将，十分狡猾机警，人称‘郭猫子’。他本来想从良村截断我们，没有得手，现在又紧紧咬上来了，前锋已经占领了据此约8里的青杠坡一带高地。”

“他们的战斗力如何？”

刘伯承回答：“四方面军在川北一举破了刘湘的‘六路围攻’，川军的许多部队都是重新组建起来的，战斗力好不到哪里去，具体如何我也说不清楚，不过估计要比王家烈的‘双枪兵’难对付得多。这些年，四川军阀内争不断，几乎天天都在打仗，磨也磨出来了。”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蜀地多兵勇，自古亦然，但不管它是虎还是猫，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是吃不下的。”

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各级指挥员在思想上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过低，对刘湘阻止红军入川的决心也估计不足。

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在川军田颂尧部对红四方面军的“三路围攻”失败后，撰文称川军“全部瓦解”，“战斗力全无”，甚至一支妇女赤卫队也“缴了一团白军的枪”，对川军极其轻视。

长征入黔后，红军的对手是一手步枪、一手烟枪的王家烈的“双

枪兵”。红军击之如秋风扫落叶，随之产生了轻敌思想。既然黔军如此不堪一击，川军也强不到哪里去，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官兵吸食鸦片，纪律涣散，只会打家劫舍，奸淫妇女。对川军装备优良、注重训练、各级均设军官教导团或教导队的情况，以及作战经验相当丰富的情况，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人却不了解，以为红四方面军已在川北牵制了川军主力，川军“不可能及时地以优势兵力在沿岸各处封锁长江”，进而提出要北上入川，“争取四川赤化”。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毛泽东决心要在土城打一场歼灭战，吃掉“郭猫子”。

当晚8时，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我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应以迅速、干脆的手段，消灭进占丰城坎、青杠坡之敌，九军团及红二师应担任这一战斗预备队的任务。”



红军在四川通江留下的标语

这类战术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像猫捉老鼠一样，盘软了再吃。盘的过程就是疲惫敌人，使其向不利态势转化的过程。成功后红军就可摆脱数十万追兵，在蒋介石尚在梦中时神速地到达长江北岸。

然而，战争犹如一座大雪山，风云变幻莫测，常有判断失误的时候。红军在土城不仅没能吃掉“郭猫子”，反而为此改变了北上入川的计划。

28日凌晨5时，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3、红5军团向距守枫村坝、青杠坡高地的川军发动了猛烈进攻。

毛泽东在位于土城西北侧的白马山建立了指挥所。照以往经验，

这类战斗通常只需几个小时，便可全歼衔尾紧追的敌军。

然而，从连年战火中一路拼杀出来的川军悍将，与迷恋烟灯鸦片的黔军“双枪兵”大大不同。

战斗一打响，便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状态。

红军集中了所有能调动的几门山炮和迫击炮，对川军主阵地进行了短暂的轰击；川军立即还以炮击，在红军的进攻出发阵地前布成了一道炮火网。

川军的确是虎不是猫。他们依托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拼命阻击。担任主攻的红3军团被压制在尖子山、石羔嘴、老鸦山、猴子垭一带较低的山头上，在火力掩护下仰攻。这是一种以血肉作代价的攻坚战，战局极其艰苦、惨烈。经数番冲击，红军仅夺得川军阵地前的一些小山头和表面工事。

土城渡口纪念碑



土城渡口纪念碑



朱德向红军指战员讲话

红军打虎不成反伤己。彭德怀也没有料想到这股川军竟是块如此难啃的硬骨头。部队伤亡不断加大，进攻却成效不大，他发火了，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把用作预备队的两个团全部压上去，实施不间断地冲击。

这一招果然产生了效果。中午时分，红4师攻占了川军右侧主阵

地银盆顶，残敌退至韩棚坳一带。

正当红军准备一鼓作气拿下韩棚坳时，突然从韩棚坳垭口钻出了川军的大队人马，数量之多，当以旅为单位计。他们很快遏制了红军的攻势，并组织强大的火力发动反攻。红军不敌，银盆顶阵地得而复失。

激战数小时，川军显然没有仓皇溃逃的任何迹象。红军固然打得很英勇，川军打得也相当顽强。实际上郭勋祺部反而越战越凶了，在优势火力掩护下，步步进逼土城。局势对红军愈发危急起来。

中午时分，白马山红军总部指挥所里，毛泽东和军事指挥员们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战斗。

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朱德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连吸了几口烟，没有答应。

朱德把帽子一脱，狠狠地摔在桌上，大声说："老毛，不能再犹豫了。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放心吧，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毛泽东丢掉烟头，紧握住朱德的双手，动情地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

为扭转不利局面，毛泽东急令林彪率红1军团主力火速回援土城，同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红军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冲锋。

红军干部团是红军大学、特科学校和两所步兵学校合并组成的，学员都是从战斗部队选拔上来的班、排、连长及政工人员，军事素质好，作战经验丰富，是一支过硬的力量。这也是红军最后的老底子。

此时，土城恶战已进入到白热化状态。双方将士都杀红了眼，冲锋与反冲锋犬牙交错。川军一直攻到了白马山红军总部指挥所前沿。红军险象环生，连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贺子珍等老弱及女同志组成的军委干部休养连都未及撤离，陷入敌阵。

危急关头，幸得干部团猛打猛冲，很快改观了战场局势，才使休养连脱离敌人的火力拦截，撤出险境。干部团一鼓作气夺回了银盆顶阵地，但当乘胜直追时，垭口又有川军大队人马突涌出来，炮火也更加猛烈。双方再一次僵持不下，成难解难分之势。

原来，红军对敌人参战实力侦察出现了大偏差：青杠坡的郭勋祺部，不是红军原先估计的四个团六七千人，而是六个团1万余人，川军还有几个旅正朝土城疾进。

红4师政委黄克诚回忆道：

当时张宗逊师长已住进了卫生所，我又赶上害病，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适逢朱总司令前来督战，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朱总司令非常恼火，对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朱德这位素以宽厚著称的总司令，对躺在担架上带病指挥部队的指挥员发火，可见当时战局之紧张危急。

下午3时，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红军伤亡越来越大。

中革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红军在战斗进行中召开的唯一的一次紧急会议，可见形势的危急。

现在情况清楚了，战场上的敌人比原来侦察的要多，而且援军即将赶到，红军的命运可能危在旦夕。究竟敌人增援部队有多少？红军能不能顶住？事关重大，谁也不敢说。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下午4时，从赤水城方向调回的红1军团第2师又投入了战斗，但川军也如蚕子吐丝，源源不绝。战况仍在恶化，红军仍然没有打退敌人的疯狂反扑，而且伤亡依旧在持续增加……

土城之战打到这时，总的趋势难以遏制。红军的总攻变成了川军的反攻，进攻作战变成背水作战。前有敌军猛攻，后有波涛滚滚的赤水河，若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红军将面临难以估量的后果。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毛泽东当机立断：“土城不能打了。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众多；二是敌人的兵力和战斗力都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大得多，而且敌人的援军已快赶到了；三是这一仗若再打下去，就是一场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得不偿失。”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紧急会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于黄昏时停止战斗，迅速毁掉赤水河上的桥梁，由红5、红9军团在两翼掩护，红1、红3军团迅速撤离战斗。



元厚渡口纪念碑

至于中央红军究竟能不能，以及何时才能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则要看事态的发展。眼下他们不得不推迟入川，暂时进军云南，以便调动敌军，然后再寻新的战机。

29日拂晓前，红军结束土城战斗，分三路从猿猴（今元厚）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紧急情况下的临时决定，竟成为永载世界战争史册的四渡赤水作战的开始，在此后70多天里上演了“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千古绝唱。

红军一渡赤水，改向川滇黔边发展，是在敌情严重、战斗失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为迅速摆脱追敌，红军再次轻装。笨重的物资、机器被统统抛进赤水河中。当时红3军团还有全军最后一门山炮，但这门连湘江封锁线都闯过来的山炮，也被迫投入河里。这是自中央苏区出

发以来，中央红军被迫第二次大轻装。

30日，郭勋祺率部进占土城。得知红军主力转兵云南，并未北上入川后，便借口休整部队，停止前进。土城之战，川军受到了沉重打击，共损失1000多人。但红军也未能取得胜利。红3、红5军团损失较大，红3军团团长欧阳鑫、红1军团团政委赵云龙牺牲。

红军主动结束土城战斗，遵义会议制定的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渡过长江的计划无法实现了，便西渡赤水，分左右两路同时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求机动作战，准备从宜宾上游渡过长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

但这一计划却也无法维持太久。因为红军的战略方向正好与川军的作战原则迎头相撞。

刘湘当初与潘文华商定的作战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入川或入川只是借道，便虚与周旋，保住实力，绝不对消；如果红军真要深入四川腹地建立根据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蒋介石的控制，与红军硬拼到底，抱着不惜同归于尽的决心去求幸存。所以当他看到红军反复寻找渡江地点，大有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趋向，便开始硬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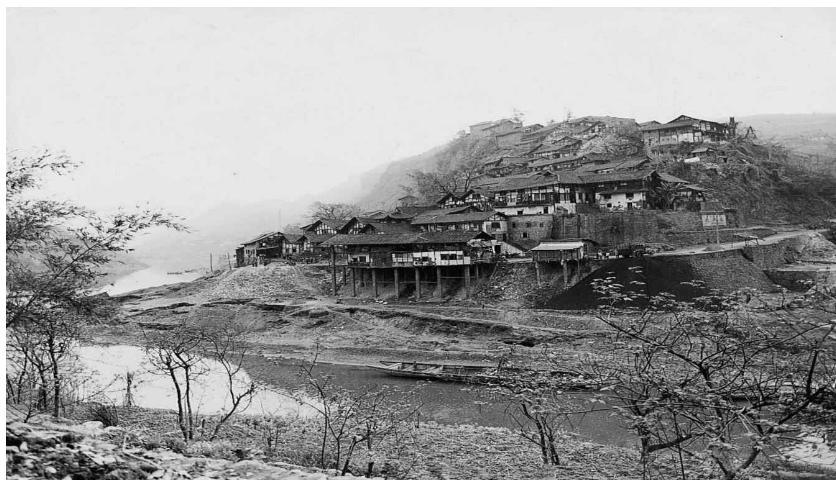
川南“剿总”潘文华将所部12个旅36个团，沿长江南岸赤水、古蔺、叙永一带布防，严密封锁长江，并在宜宾至江津、宜宾至长江上游金沙江滩头的北岸，以及川南各县的要隘，赶筑了大量的碉堡和工事，动员当地民团和地方武装，全力阻拦中央红军北渡长江。

1月底，红军主力由猿猴场迅速通过川南边区的古蔺官山老林，经叙永东面的大寨，直逼叙永县城。

叙永、古南、古家原属于川南边防军的黔军侯之担部的防区。中央红军到达黔北时，侯之担部被红军击溃，全部瓦解。叙永县招安团团长黄树猷率残兵败将逃回老家，县长岑炯昌则席卷财物仓皇逃回贵州。川军第一路指挥范子英奉刘湘之命率部进驻叙永。

红军突袭川南，刘湘大惊失色，因为郭勋祺、潘佐、廖泽、穆肃中、达凤岗等川军主力各部均已被拖得精疲力竭，落在了红军后面，而古蔺、叙永兵力单薄，仅有范子英部1个旅和章安平旅留置叙永县城的周瑞麟1个团。

刘湘急电潘文华令入黔各部火速回援叙永、古蔺，并电令入黔增援的刘兆藜旅、周成虎警卫大队立即回撤至叙永、古蔺边区的桂花场、登子场一线防堵；同时调尚未进入黔北的陈万仞师袁筱如旅和魏楷部配备在江岸设防的部队，也分别集结驰赴叙永共同防御。



红军二渡赤水旧址——太平渡渡口

这样，刘湘配备在南路约10个旅以上部队均驰援叙永。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还呼吁追入黔北的薛岳等部与在川滇边区镇雄、威信等地设防的滇军孙渡所部，共趋叙永，妄图困守叙南六属地区。

川军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

2月1日，红军进至叙永城郊。

叙永县城不大，分东西两城。东城为商业区，城垣低矮，城外联结丘陵小山，有路通向古蔺。西城分行政机关所在和居民住宅区，城垣比较坚固，周围开阔，地势较宽。东西两城中通小河，名永宁河，上有石桥两座，连接相通。因西城容易防守，东城地形复杂，红军来攻容易接近，范子英决定将布防重点放在东城。

2日拂晓，红军分兵包围了叙永东城，进攻红岩嘴高地。

红岩嘴高地俯瞰东城，为防御的主要支撑点。川军拼命抵抗，战斗甚为激烈。

自古蜀地多兵勇。川军的战斗力丝毫不亚于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尤其此次是在家门口作战，更是恶如狼虎。在四川军阀的反动宣传教唆下，川军士兵认为红军是来抢占他们地盘的，共产党共产共妻，见人就杀……并不真正了解红军的川军士兵竟都有了一种“保家卫国”，“保卫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悲壮感。战斗打响后，一个个红着双眼，嗷嗷直叫，恨不得一口把攻城的红军全部吃掉。3日，红军虽时有冲锋来攻，已不如头一天的猛烈。

守城川军判断红军必另有企图，他们既未能一举攻占叙永县城，可能不会在叙永城边持久作战。

果然到了4日晚，红军攻势更缓，而通向泸县、赤水大道的马岭方向却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原来，前来增援的周成虎警卫大队与红军交上了火。

当夜，红军主力越过叙永，取道金鹅池、大坝在川滇边界渡赤水河过雪山向云南而去，围攻叙永县城的红军也在拂晓前撤围而走。

经过土城、叙永之战后，红军方才知道，川军的战斗力绝不弱于蒋系中央军，气焰尤其嚣张，一个团也敢上来向红军挑战。

6日上午，红1军团第2师一部行至天堂坝，竟被尾追的川军1个团三面包围。

红3军团第5师迅速赶来支援，从两翼对敌军实施反包围。红3军团后续部队1000余人于当日下午也赶来增援。激战一天，向敌阵地反复冲杀十余次，竟未能解决战斗。

入夜，该团敌人乘机突围。此时，川军另一个团已在增援途中，红军被迫撤出战斗。

面对川军的顽强阻击，从宜宾上游渡江入川的原定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朱德即电令红1、红3军团向扎西靠近："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娄山关

7日，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向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

中革军委当即接受了这一建议，命令各军团暂缓渡江，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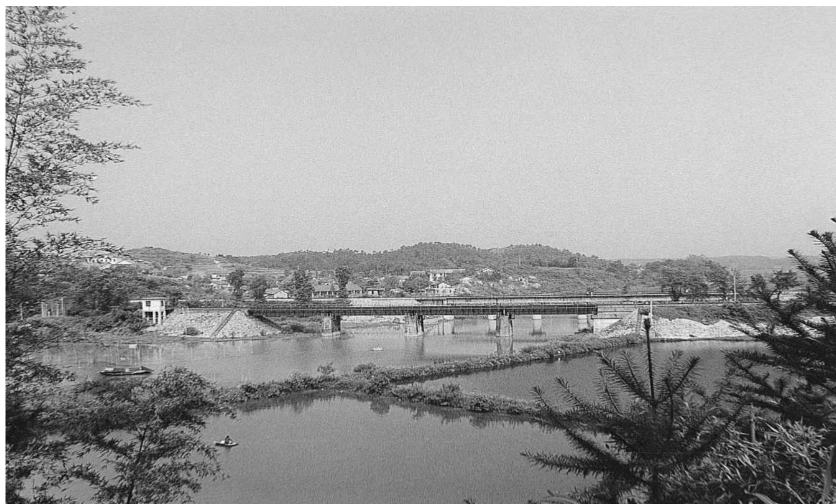
●吴奇伟不是项羽，乌江畔倒地大哭……

2月9日，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时，第二路军各纵队分向扎西迫近。为了迅速脱离川、滇军的侧击，红军挥师东进，于18～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河，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桐梓地区急进。

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外。川军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3个团从遵义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1纵队2个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疾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24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第1团重新占领了桐梓，随后以强行军速度向遵义疾进。

26日晨，王家烈率部从遵义出发，企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将红军截住。



汀泗桥战役战场遗址

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的最高峰，为黔北门户。关上茅屋两间，石碑一块，上书“娄山关”三个遒劲的大字。周围山峰，峰峰如剑，万丈矗立，直插云霄，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成为必争之地。

彭德怀命令红3军团跑步前进。这是同时间赛跑。当日下午3时许，红军先敌几分钟占领了娄山关，连续击溃黔军的多次反扑。在夜幕降临前，红军牢牢控制住关口，取得了战斗胜利。

接着，红1、红3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27日，在遵义以北的董公寺、飞来石地区击溃黔军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西南的老鸦山、红花岗一线高地。

红军坚决迅速攻克娄山关和遵义的行动，使前来增援的薛岳所部吴奇伟纵队陷于被动。

吴奇伟，字晴云，别号梧生。国民党陆军中将。1891年生于广东大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毕业后，吴奇伟南下广东，任粤军第1师第1团副营长。1925年随部参加广东革命政府二次东征，升任团参谋长。北伐战争中，他曾与著名共产党人蒋先云并肩作战，在进占平江、夺取汀泗桥和攻克贺胜桥等战斗中战功卓著，升任第4军第12师参谋长、副师长。南昌起义时，他驻防九江沙河镇，因感张发奎提拔之恩，遂稳住沙河，站在了反共阵营。不久又提拔为师长。从此他就卷进了各派军阀争夺地盘的纷争里。

1928年1月中旬，第4军与陈铭枢东路军和黄绍竑西路军激战，结果战败被赶出了广东。吴奇伟随部投靠蒋介石。

无奈蒋介石压根没有把杂牌军放在心上，先是调第4军参加讨伐张宗昌和奉军的作战，然后借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裁军”之机，把第4军降为师。吴奇伟也由师长降为旅长，对蒋介石的独裁和翦除异己的做法大为不满。

半年后，蒋桂战争爆发，第4师奉调移防陇海路对桂军作战。蒋介石不但规定起程时间，而且指定行军路线，企图在路经武汉时由嫡系部队予以缴械。幸亏消息走漏，吴奇伟才免于难。9月，第4师集中枝江后，恢复第4军番号，通电反蒋。吴奇伟由此脱离了蒋介石，又投向了张发奎。

11月，第4军到达广西，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组织张（发奎）桂联军。1930年5月，张桂联军参加中原大战，在衡阳遭粤军蒋光鼐、

蔡廷锴部重创。第4军一败再败，元气大伤，部队只剩下十之二三，退回广西。

1931年，吴奇伟率部驻防柳州，蒋介石又以开赴东北支援马占山抗日为名，诱使吴奇伟率第4师离桂北上，密令何键在湖南境内予以解决。这时的吴奇伟对于纵横捭阖之术已经是颇有经验的人了。他派了一个能舌善辩之士游说何键，晓以两败俱伤之害，此事竟一举成功。何键不仅未加害于他，反而赠送了1万元“送行”。这是吴奇伟在个人奋斗史上的一件突出成就。

然而，成就归成就，没有有力的主子作为依靠还是不行。走投无路的吴奇伟便通过同乡罗卓英联系上了陈诚。又通过陈诚，再次投靠了蒋介石。这次投蒋可比上一次要顺利的多，吴奇伟立时得到5万元的军费，第4师恢复为第4军，并正式当上了军长，而其代价则是全力投入剿共战争。

1933年春，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第4军被编入中路军。吴奇伟任第2纵队指挥，服从这个曾经通电反对过的人的命令，把枪口对准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

直到进入江西苏区，他才觉察到同共产党作战比以前同任何敌人作战都更为吃力。因为这个敌人不单顽强异常，而且变幻莫测，不要说打他，你连摸清他的影踪都很困难。而当你不注意的时候，他却突然从天而降，将你团团包围，一切呼救都已迟了。在第四次“围剿”中，他亲眼看到“中央军”成师成军地被歼，深感同红军作战简直像眼前布满了陷阱，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跌进去。

是年秋，吴奇伟又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任北路军第二路军第7纵队副指挥官。后任北路军第六路军副总指挥兼第7纵队指挥官，配合薛岳，沿永丰、沙溪到古龙冈一线逐步推进。

红军离开江西长征后，吴奇伟率领第4军就开始了长途“追剿”。但一直是送客式追击，沿途没有和红军发生大的战斗。

在遵义城外的忠庄铺，他碰到逃出遵义的王家烈。此时，王家烈身边只剩下一个手枪排，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吴奇伟纵队所辖第4军是蒋介石亲自授命长期尾追红军的中央军嫡系部队，不仅人员齐整，而且装备精良，倚仗着“追剿”数千里的气焰，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一见面，吴奇伟便信心十足地说：“我带的第4军两个师正在行进途中，大约再过一两个小时就可赶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反攻遵义，

应协力作战。”

尝够了红军苦头的王家烈却一点儿信心也没有。

吴奇伟脸上露出一副不屑的神情，分明在嘲笑王家烈是被红军打怕了，不容置疑地说：“我们现有两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足够反攻。王主席，你看怎样打法？”

王家烈别无选择，只得苦笑道：“依当前地形，我们的主力应由西侧隐蔽地向桃溪寺前进，首先将红花岗占领。”

28日清晨，唐云山第93师进至忠庄铺地区，前锋伸至距遵义南门仅5里的洛江桥；韩汉英第59师已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急进。吴奇伟计划以第59师2个团和第93师1个团为主攻，经桃溪寺向遵义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发动攻击；另以黔军2个团为配合，自忠庄铺向北助攻；第93师主力和第59师1个团为预备队，集结于忠庄铺地区。

根据敌情，中革军委决定乘吴奇伟部孤军冒进之机，集中兵力，求歼其于遵义城以南地区。具体部署为：以红3军团部署于红花岗、老鸦山一带高地阻敌；红1军团则出遵义东南，从敌侧后迂回，达一举全歼之功效。

上午9时许，战斗打响了。韩汉英见右翼地形于己十分不利，即向吴奇伟建议应率先占领前面不远的老鸦山和红花岗。

一场激烈的战斗便围绕着红花岗右侧主峰老鸦山展开。双方皆拼尽全力争夺，敌人摆出猛打猛冲的态势，一口气夺得了红花岗、老鸦山前几座山头。红军随即组织反攻，也一口气夺回了几座山头。不久，敌人又组织兵力反扑，把红军逼迫下去；红军复组织反攻，再将几座山头的敌人赶了下去……如此拉锯一般，双方在山上山下反复争夺，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激战至中午时分，敌人见一下难奏奇效，遂改变部署，以2个团的兵力牵制红花岗方向的红军，其余4个团均集中于老鸦山，企图先攻下老鸦山，再行扩展，以获全功。

防守老鸦山主峰的是红3军团主力第10团，这是一个善打硬仗的团队，面对强敌丝毫不惧。双方又一次重演了阵地上反复争夺的一幕。好几次，敌人离主阵地只有几十米了，但又被红军指战员的大刀和石块赶了下去。

血战至下午6时，在敌优势兵力、火力和不计伤亡的轮番冲击下，红10团损失严重，团长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牺牲，老鸦山

主峰丢失。敌军不仅居高临下威胁红花岗阵地，而且直接威胁遵义城的安全。

正当红3军团与敌反复争夺老鸦山，打得不可开交之时，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在遵义城东山包上一言不发地用望远镜观战。红1军团正隐蔽集结在这一带丘陵地区待命出击，敌人全然不知晓。

待战局已是千钧一发之际，山谷里突然响起嘹亮的冲锋号声，红1军团第1、第2师像两只猛虎，迎着公路排山倒海般冲杀下去，尖刀一般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

这是遵义战役的关键一刀。一刀直取敌人心脏。

战局就此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已经得手的吴奇伟部竟又突然失手。正在公路上运动的敌人最先掉头往后跑，整个阵线随即发生动摇。吴奇伟把全部力量重心都压向老鸦山、红花岗的红3军团阵地，指挥部周围没有剩下多少部队。林彪这一招整得他实在是苦，只有丢下部队，带着身边少数人员狼狈逃窜。



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



北伐时期，“铁军”一部正在进军

占据老鸦山主峰之敌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发现指挥部突然溜走，料想事情不妙，调转身沿着来路向乌江狂奔。

林彪自然不会放过战机，立即下令：以乌江为界，红1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红2师向南追。红军排山倒海的追击开始了。

林彪也许并不知道，他在这支被他杀得丢盔卸甲、四处乱窜的部队里曾任过见习排长。

吴奇伟的第4军，就是当年颇负盛名的北伐劲旅“铁军”残留下来的部队。北伐战争期间，吴奇伟与林彪同在铁军第12师中奋勇作战。吴任第34团团长，林彪任独立团见习排长。

虽同为铁军，但也有共产党、国民党之分。共产党人叶挺率铁军一部举行南昌起义，国民党人吴奇伟、李汉魂率铁军另一部镇压南昌起义。铁军四分五裂，在随之而来的新军阀混战中更是九死一生。打剩下的一点老底子由吴奇伟统辖，编成第59、第90师，参加“围剿”与追击红军。

遵义城外，林彪给他老部队的礼物是侧面迂回、正面猛追。

红1军团一口气追至懒板凳，将第59师击溃，接着又追至刀靶水，将第93师打得溃不成军。这两个师据说参加第五次“围剿”以来从未败过。这回被红1军团追得全军溃乱，建制崩溃，丧魂落魄，连师部指挥所和后方机关都来不及撤掉，文件、武器和物资更是丢得满地都是。

吴奇伟率第93师残部最先逃到乌江边。那里有一条长长的浮桥搭在江面上，正是他们来时搭设的。只要过了这座桥，便一切都会变得安全。他立即与南岸联系，命令欧震率第90师速来支援。该师本属第4军建制，此番被薛岳留在贵阳，得到前线吃紧的消息，才刚刚上来。

谁知，欧震认为北岸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背水为阵太危险，便一口拒绝，回复说只能在南岸占领阵地，掩护收容败兵。

北岸局面无法收拾，南岸老部下又不听话，吴奇伟面对滚滚的江水，看着这条通往安全之路的浮桥，颓然地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我也不过江了，就在此死了算。”

卫士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原来，吴奇伟想起了当年项羽因8000子弟无一回返，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的典故，不禁万念俱灰，也想效仿“楚霸王”。

但吴奇伟不是项羽，他也不做项羽。这条乌江也不是项羽当年自刎的那条乌江。几个卫士连拖带拉地把吴奇伟挟过江南岸。

南岸，是一面比较陡的山坡。吴奇伟一行人向山坡上攀登着，爬到半山，刚坐下来想喘息一下，只听江北岸枪声大作，红军已经到了对面山顶，又是打枪，又是喊话。山下渡口处麇集的残兵败将，像蜂巢里的蜂群，乱哄哄地一齐向浮桥涌去，为了争先抢渡，人喊马嘶，乱成一团。

这时，吴奇伟变得格外清醒。见红军追兵直逼江岸，不待其余部队过江，果断令工兵营斩断浮桥。

江面上发出一片震天撼地、撕裂人心的惨叫，浮桥断了，正在蜂拥过桥的官兵带着哭声、骂声纷纷落入水中。尽管那哭声和骂声是如此震人心魄，但为时不久便为乌江的浪涛声所代替，恢复了平静。

跟在吴奇伟屁股后面突围而逃的第93师残部1800多名官兵被甩在北岸，连同大批辎重都做了红军的俘虏和战利品。该师另一部数百人向南逃窜几十里，另找竹筏渡过乌江，但重兵器及伙夫担子行军

锅，一律掉光。第59师残部则向打鼓新场逃窜。

吴奇伟带过乌江2个师，仅带回来1个团。他实在不愿再看这种场面，痛苦地用双手捂住了脸……

王家烈回忆道：

是日上午11时，攻击开始。红军昨夜已入据遵义城，并已占了红花岗险要阵地。红花岗屏障着老城，居高临下，瞰制各方，是历来用兵争夺的关键。中央军仰攻该地，在红军的火力瞰制下，伤亡很大，进展极难。公路以东各高地，筑有工事，双方拉锯争夺，无多大变化。全线经过6小时的激烈战斗，蒋介石派飞机两架来向阵地投弹助攻，红花岗的红军仍屹立未动。正当中央军沿红花岗山麓冒死钻进谷地，大受伤亡之际，红军另一部由公路以东的甘堰塘、南公山向我右后方（忠庄铺的后方）迂回；又一部由官田垭抄公路，直射指挥所；同时向阵地较薄弱的方面——第二十五军第八团进行侧面进攻，与该团短兵相接，反复肉搏，以致全线动摇。……更狼狈的是吴奇伟的两个师（韩汉英、唐云山）大部分已经钻进口袋——红花岗山麓谷地，即将逼近老城的城垣之际，忽受红军由右翼包围，想退又退不出来。此时，红花岗的红军，俯瞰着全局情势，同时由正面出击，将韩、唐两师歼灭大半，接着衔尾追击，一直追到乌江边。该两师在溃不成军的败逃下，自己把乌江浮桥砍断了，以致许多退不及的人马溺死江中。

战后，吴奇伟向蒋介石报告：因士兵拥挤抢渡，将浮桥压断。私下里对部属则强调受王家烈之累，砍断浮桥是战略行动，不这样做，如果红军南渡乌江，贵阳兵单，大局必受影响。

好一个顾全大局之人。

遵义战役历时5天，红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支（挺）以上，漂漂亮亮地打了一场大胜仗。这也是红军脱离根据地被围追堵截1万余里以来最大的胜仗。

毛泽东怀着胜利的喜悦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作《忆秦娥·娄山关》词：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红军三渡赤水，挥师川南

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再战遵义，打了国民党军一个措手不及，也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

吴奇伟部在遵义战役中遭受重创，立即引起了国民党各军的强烈震动，对朱毛红军来去无定的机动神速都畏之如蛇蝎。滇军说红军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红军完全是“太极图形，神出鬼没”；黔军认为红军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蒋介石更是连声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在1934年12月10日开幕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因为对中央苏区的全面占领和湘江一役战果辉煌，蒋介石好不风光。出席会议的国民党中执委、中监委纷纷表示：希望委员长率领国军“再接再厉”，将共匪“根本歼灭”。

可三个多月过去了，不但没有“根本歼灭”，反而让红军一口气吃掉了五六千人，打垮了十几个团。尤其是遵义一役，吴奇伟惨败，简直把中央军的颜面都给丢尽了，蒋介石又怎能不窝火生气，致电薛岳要其查明罪责以申军纪。

为了掩饰败绩，薛岳在向蒋介石上报时，故意把伤亡损失的数字减少了近四成，并为开脱嫡系吴奇伟、韩汉英之责，而嫁罪于王家烈、唐云山，将过失推在他们身上；同时也自请处分，以求得委员长的宽恕。

几天后，蒋介石下令将唐云山撤职，调到陆军大学第13期“深造”去了；韩汉英虽撤职却得以留任；而身为战役指挥官应负主要责任的吴奇伟更是只记大过了事。最倒霉的当数王家烈，没过多久就被蒋介石免去了军政各职，给了一个有职无权、吃闲饭的差事——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灰溜溜地离开了贵州。



红军总参谋部在遵义时的作战室

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蒋介石感到十分不安和震惊。鉴于黔北形势严重，3月2日，他带着陈诚由汉口飞抵重庆坐镇指挥，决定改以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南北夹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具体部署是：

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第9军2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进攻遵义；第2纵队周浑元率中央军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进攻；第3纵队孙渡率滇军4个旅进至大定（今大方）、黔西地区防堵；第4纵队王家烈率黔军主力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1纵队吴奇伟率中央军4个师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第53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红军东进。

蒋介石还一连给薛岳下达两封手令。

一封手令强调今后在前线“剿匪”的部队长，无论追剿截堵或防守，如不与城池共存亡，未奉命而私自逃亡者，一律治以失土“纵匪”之罪。

另一封手令则说，由于遵义战役失败教训，今后对飘忽无定的共军在战略上虽要猛追猛截，在行动上要稳扎稳打；追剿部队每进一地，在宿营前，一定要修碉，碉未修成不许入营。围剿堵截部队也依此行事。各部队长应告诫官兵，不得有丝毫疏忽，切切毋违为要。

同时他还把红军作战已改飘忽无定、要分外慎重的亲笔信空投给了吴奇伟。

兵败遵义使蒋介石再一次清醒了。清醒归清醒，对红军的战略方向，却依然判断不清。红军下一步到底往哪里走，当时有三种估计：

一是趁刘湘的兵力尚未集结之前，渡赤水直趋长江边，从泸州、叙永地区渡过长江，另辟川西南战场，策应川北红军，或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二是渡赤水仍向川滇边，穿越大凉山西上，绕道滇北经西康间道入松潘、懋功，支援红四方面军，背靠康藏建立根据地，赤化西川，然后进图西北；三是进入川康不易，入滇另辟战场，而多民族地区也不易发展，最后仍是回转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东与红2、红6军团会合，此策就红军言虽可暂安于一时，但出路不大。

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对此众说纷纭，各持己见。

龙云认为共军不会入滇，理由是共军多是江西客籍，除朱德、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其余基本不熟悉地方民情。且云南民风强悍，组织严密，共军在云南生根不易。此次如入滇，过路是上策，久据为下策。

刘湘则认为共军必然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再下川南渡江。因为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都是四川人，早年都在川军中任过职，尤以刘伯承对泸州一带了如指掌，此次既入黔北，不会再回湖南。因为如要与贺龙合股的话，又何必南辕北辙，在穷山恶水的贵州境内兜圈子。

薛岳基本同意刘湘的观点，认为共军入滇入川均有可能，而在贵州久据的可能性最小。因为贵州不比江西，是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贫穷偏僻山区，久据不易；若再东下回湘，则是不得已的下策。自从薛岳率十万中央军入黔后，就把贵州看作自己的地盘了，当然从心底里不愿共军长据黔境。

军委 3月五日廿三时卅分于鸭溪司令部

1. 判断周纵队肖谢两师共七个团明六日有由长干山枫香坝向白腊坎前进，万师六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模样，黔敌何知重部三个团将由石坑坳口向大黑水前进。

2. 我军有首先消灭肖谢两师之任务，明六日部署如次：

甲. 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纵队，于明六日拂晓取道花苗田向长干山枫香坝之周敌出击，第一师应绕至侧流水寺村地域突击敌侧尾，以第二师向青坑地域之敌侧击，干部团随第二师前进，受林聂指挥。

乙. 三军团为左纵队，以主力三个团经温水塘跳过温水大山向场间侧流水青坑前进，由南向北突击，以一个团扼守九龙山白腊坎正面吸引敌人来进攻，军团应派出小部至太平场以南迷惑并钳制何敌。

丙. 五军团为总预备队，进至白腊坎附近待命。

3. 明六日各兵团须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肖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4. [illegible]方在鸭溪花苗田至[illegible]地域。

5. 前敌司令部随一军团司令部前进，明六日在白腊坎。

附记：通讯连络除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规定烧烟火为号：大胜利烧三堆火，小胜利烧二堆火，相持或不利烧一堆火。

司令员 朱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毛泽东在遵义西南的鸭溪下达的作战命令电文

陈诚不愧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早已揣摩透委员长最怕中央红军向东威胁其中枢的心思，便判断朱毛残匪入川与张国焘、徐向前股匪会合，或回湘与贺龙、萧克股匪会合，是战略上必然的腹案；川滇地处西南边陲，久据可能性不大，不足为虑；最应注意的是东返回湘与贺、萧股匪会合。如此追剿较难，影响也较大。

入川，入滇，还是回湘，红军到底会去向哪里，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陈诚、薛岳、刘湘、龙云虽各执己见，但都一致认为红军图黔的可能性极小。

可事情偏偏不以他们的好恶为转移，红军就是要图黔。尤其是在取得遵义大捷痛击吴奇伟纵队后，红军士气高涨，图黔决心更加坚定。

为彻底实现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根据地设想，中共中央决定寻找战机，求歼蒋介石的另一支嫡系部队——周浑元纵队，争取更大的胜利。

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红1、红3军团向鸭溪、枫香转移，吸引驻扎在仁怀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向遵义增援，以求在运动中消灭之。

3月4日18时，中革军委在遵义老城下达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鉴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这是毛泽东宁都会议被剥夺红军领导权后，在军内的第一个任职。

5日3时，前敌司令部下达各军团集中鸭溪和作战部署令后，6时半开赴鸭溪前线，但未果。

次日，毛泽东计划在白腊坎以西迎击周浑元纵队。具体部署为：以红1军团由北向南抄其后路，红3军团由南向北迎头堵击，红5军团在白腊坎为预备队，红9军团警戒大渡口；先以猛烈动作解决周浑元部萧致平第96师、谢溥福第5师后，再解决万耀煌第13师。

谁知，周浑元纵队根本未进入红军的预伏地域。

同一天，军委纵队撤出遵义城，经忠庄、金刀坑、鸭溪、枫香，于11日进驻苟坝。期间，红军几次欲进攻周浑元纵队及黔敌犹禹九部，均因敌畏缩不前没有打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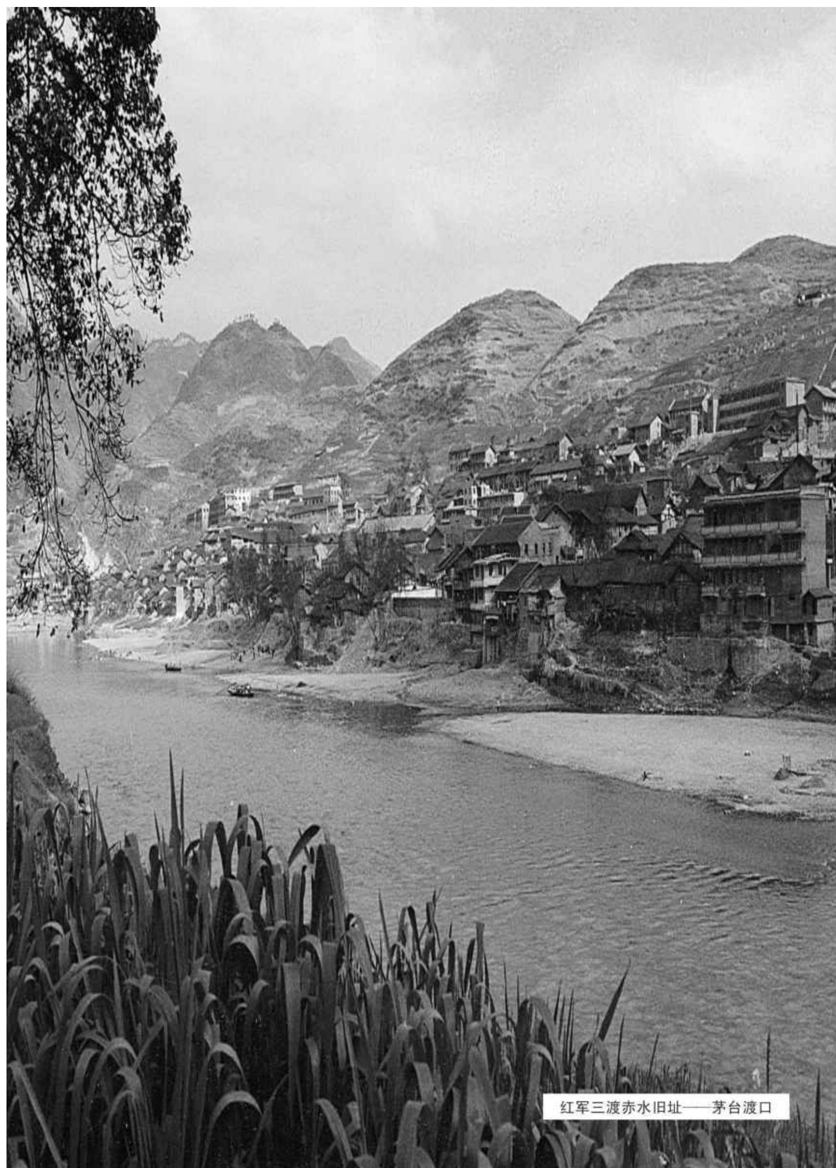
11日至14日，周浑元率所部3个师先后进抵鲁班场，立即伐木砍树，在周围山上修工事、挖战壕、筑碉堡。

12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扩大会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代表中央指挥军事。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3日20时，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以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

14日21时，中革军委发出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命令。

15日拂晓，战斗打响了。红军向敌阵地展开正面进攻，但均被敌猛烈火力所压制，屡攻不克。



红军三渡赤水旧址——茅台渡口

13时，数架敌机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压得红军抬不起头，伤亡不断增加。激战至15时，红军原定夺取的目标均未得手，双方形成对峙。红军共歼敌400余人，击落敌机1架。

天黑后，周浑元部乘夜幕向红军右侧迂回。此时，战局发生重大

变化。黔军两个团尾追红军至鲁班场东南永安寺附近，第1纵队吴奇伟部已过乌江进至东南约80里的枫香、花苗田一带。

在鲁班场阵地强攻不克、援敌又已逼近的情况下，为避免受敌夹击，红军遂撤出战斗，连夜转移到茅台、仁怀地区。

红军在鲁班场虽未取胜，但客观上起到了牵制和调动敌人的目的。

对中国革命来说，每一次失败，都蕴含着成功。土城战斗的失败，不得不放弃赤化四川的战略方针；鲁班场战斗的失败，又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正是从这些失败中，中国革命不断修正着前进的航向，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

16日晚至17日12时，红军全军在仁怀茅台镇的山羊坳、朱砂堡、银滩三个渡口由东向西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

红军三渡赤水河后，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向西北核桃坝方向走30里隐蔽休息待命；红3军团向西南走30里隐蔽休息待命；中革军委、干部团和红9、红5军团依次过河，走15里待命。

中革军委的意图是：红军主力暂时隐蔽在四川古蔺南部的大山中，隐藏自己的企图，谋划调头向东，第四次渡赤水河，钻敌人的牛角尖，跳出敌包围圈。

19日，红军攻占镇龙山，接着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蒋介石判断红军再入川南是要北渡长江，急令所有部队向川南进击，自以为“歼灭红军于川、黔、滇间胜利在望”。

●红军四渡赤水，兵临贵阳逼昆明，蒋介石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红军神出鬼没，飘忽无定，两个多月内三渡赤水，与敌人玩起了捉迷藏。这下可苦了数十万国民党“追剿”大军，如无头的苍蝇，整日里疲于奔命，结果却是四处扑空。

蒋介石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三令五申地命薛岳迅速把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侦察清楚，并派飞机空中侦察，但一连数日都得不到要领。气得蒋委员长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薛岳：“娘希匹！你在前线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连共军主力趋向何方都搞不清楚。”

蒋介石侍卫后来回忆：当时蒋气得发昏，把电话机的听筒都扔在地板上，顿足大骂不止。

3月中旬，滇军已由清水塘西渡赤水河进至摩尼；周浑元部从鄢家渡过赤水河进至石宝寨、镇龙山；川军郭勋祺旅进至茅台。

四周的敌人距红军不足30里，跳出敌包围圈的战略环境已形成。

根据敌情变化，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做出调出滇军主力，假道云南，巧渡金沙江，甩掉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战略决策。

20日，红1军团派出红2师第5个团伪装成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县城方向前进，公开摆出要西进北渡长江的态势，以迷惑敌人。而以主力在镇龙山附近山沟森林内隐蔽集结，待机行动。

这回薛岳可算是“摸清”了共军的行动方向，如获至宝，忙向委员长报喜。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接到了空军的侦察报告。据此判断红军必然西进，北渡长江，急电令川、滇、黔军各部一齐向川南追击，妄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

见蒋介石中计，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进，于21日晚至22日15时，分别经古蔺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中央红军主力则秘密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日夜至22日15时，分别从古蔺二郎滩、太平渡、淋滩、九溪口等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过河后，中革军委电令各部队：迅速南移，先敌到遵义、仁怀之间地区，寻求新的机动。同时要求红1军团过河后向桐梓方向前进，造成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袭占遵义城的错觉。

23日，红军急行军向南，经过大坝、火石岗、回龙寺、马桑坪等地。

红军声东击西，再次回师黔北，使敌人无法判明红军的行踪：是“东窜”还是“西窜”“尚待证实中”。

24日，蒋介石在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何成濬、晏道刚、吴忠信等一班文臣武将的陪同下，从重庆飞抵贵阳督战，行营就设在前贵州省主席毛光翔的公馆里。

蒋介石命令各部队首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25日，军委纵队进至小箐。全军隐蔽意图，以机敏行动夜行军穿

过敌东西两侧仅30里距离的缝隙，集结于长干山地区。

26日，红军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

27日，红军放弃原定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围的计划，改从鸭溪、白腊坎向西南转移。红9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金沙县沙土镇，实现跳出包围圈的第一步。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29日，中革军委进一步明确红9军团的任务：仍照27日24时电令不变，但需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布消息，伪装主力，以此来诱敌向北进发。

31日8时至14时，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在梯子岩、江口、大塘顺利南渡乌江，将敌人大部甩在乌江北岸。

4月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直逼贵阳，并将围堵红军的国民党各路大军甩在乌江以北地区。

红军冲过乌江南岸，前锋直逼贵阳的消息，犹如一声霹雳，震动了整个贵阳城，也吓坏了正在城内督战的蒋介石。因为此刻贵阳只有郭思演的第99师所辖4个团的兵力，而且大部在外围担任守备，别的部队又均隔在乌江北岸，一时无法调过来；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2个团，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

3日，蒋介石急忙召集手下诸将商议对策。

会议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中进行。顾祝同首先作了敌情报告：“据息烽、开阳县长的电话，敌人的主力由乌江下游南渡，前部已过开阳县境，有进犯贵阳的企图。”

在座诸将判断红军此举，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一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案之中以后者公算较大，但两者又都威胁贵阳的安全，故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要务。

蒋介石随即令第5纵队指挥官李云杰率湘军第23、第63师火速由镇远星夜兼程经施秉、黄平西进，限6日前到达余庆，于清水河东岸阻击共军；令第3纵队指挥官孙渡率滇军第2、第5、第7旅即由毕节、大定取道黔西，昼夜兼程，经鸭头河直开清镇，限先头于4日到达，巩固贵阳外围防务；令第1纵队指挥官吴奇伟、第2纵队指挥官周浑元、第4纵队指挥官王家烈、第7纵队指挥官李韫珩各率所部，沿敌后分途猛追，不许停留；另分电刘建绪、徐源泉在铜仁、酉阳、秀山防止共军东下，布置迎击；并电廖磊率桂军第7军进出独山、都匀一

线，以防共军南移。

贵阳城防的坚固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他本人的安全，蒋介石自然格外重视：命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指挥1个宪兵营、2个消防连及警察400余人负责城防，并在三天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竣事；命萧树经的别动队警卫行营，严查户口。

会后，蒋介石特意把王天锡留下，神情严肃地问："三天把碉堡修好有把握吗？"

王天锡信心十足："只要一天一夜就可以完成。"

"不能草率啰！贵阳的得失，关系国际视听哩。"

"明天天亮以前就可以修好，请委员长派人视察，如果还要不得，可以再修。"

蒋介石显然对这个回答十分满意，脸上露出了难得的一笑："贵阳你很熟悉，希望你辛苦一点，把了解到的情况随时告诉墨三（顾祝同）、辞修（陈诚）。你们都是熟人，不要拘束。你可以搬到行营住宿，便于联系。"

王天锡受宠若惊，忙道："谢谢委员长的关心，卑职一定照办。"

事关生死，蒋委员长终竟放心不下，一夜无眠。次日天刚放亮，就在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等人的陪同下，亲自跑到城上视察工事。

王天锡果真说到做到，连夜将工事修筑一新。蒋介石连声称好，亲自把王天锡带到他的办公室，大加赞赏了一番。

这时，顾祝同神色仓皇地走进来，匆匆行了一个军礼，连帽子也忘了取下："报告委员长，刚才水田坝有电话来，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

蒋介石腾地从沙发椅上站起来，盯着王天锡问道："水田坝距离贵阳有多少路程，在哪个方向？"

"在东北角，距贵阳大约30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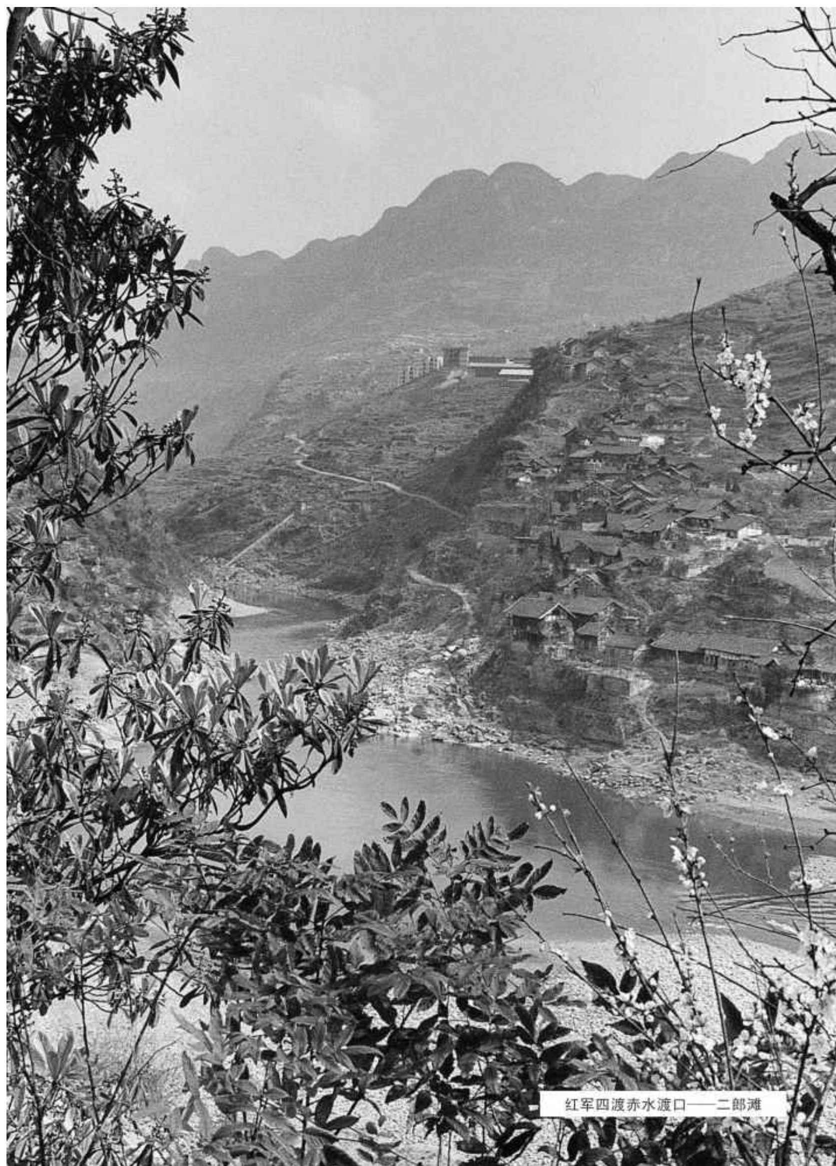
蒋介石把脑袋昂起，眼珠朝上翻了翻，想了一下又问："距清镇飞机场多远？"

没等王天锡回答，陈诚也慌里慌张地跑进来："乌当来电话，敌人已过乌当。清镇也来了电话，报飞机场附近发现敌人便衣队，第25军有一部分叛兵在机场附近滋扰。"

蒋介石脸色阴沉，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把两手背在后面，在屋里走来走去。沉默很久，两眼盯住王天锡，突然问道："不经清镇，有便路到安顺吗？"

"有。从次南门出去，经花仡佬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平坝到安顺只有60多里了。"

蒋介石命令道："你去准备一下，挑选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12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



红军四渡赤水渡口——二郎滩

嗅到死亡味道的蒋委员长准备逃跑了。

“是。”王天锡一路小跑出去，为蒋介石准备逃跑用的车马和向导。

就在这时，蒋介石接到第7纵队指挥官李韫珩的报告：该纵队在

息烽的黑神庙与红军遭遇，打了一仗，红军先头已过息烽。

蒋介石立即传令嘉奖并犒赏李韫珩，同时召集顾祝同、陈诚、晏道刚等人商量对策。

诸将皆认为，红军距贵阳仅百余里，判断红军急求东进，估计在优势兵力跟踪尾追下，顿兵攻坚难免受挫，可能不致进攻贵阳城；即便有接近贵阳的行动，也只是虚张声势，掩护主力东移。在贵阳的守城部队虽兵力单薄，但只要坚持一天，追击部队即可赶到。为此必须妥为安定人心，并加强城防工事。此外，为保障委员长的个人安全，应组织有力部队确保清镇飞机场不得有误。

4日，红9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

5日，贵阳城东南几十里外的地区不断发现有小股红军在活动，城内人心惶惶，鸡飞狗跳。

蒋介石自然心神不安，径直走出行营查勘城区工事。却见第99师官兵一个个神色慌张，毫无斗志，一副大难临头的模样；所修工事更是草草了事，用几个沙袋胡乱堆砌，七扭八斜，不成样子。

蒋委员长越看越生气，不禁龙颜大怒，当场大骂师长郭思演督责下属不力，玩忽职守。事后，郭思演被撤换，师长一职由傅作芳接充。

以往每当军情变化时，蒋介石总要彰显他的临危不惧，以示其大将风度。这次在贵阳城，他却一反常态，接二连三地暴怒，不是训斥这个，就是大骂那个，弄得手下诸将一个个提心吊胆，大气也不敢出。

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只好写了一张条子交给蒋夫人宋美龄，请她规劝委员长要“制怒”。

当夜，贵阳城外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介石又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尤其关注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彻夜不安，竟遗屎于床上，张皇失措的丑态一览无遗。

次日清晨，蒋委员长破口大骂侍卫副官蒋孝镇：“娘希匹，给我住透风的房子！”

蒋孝镇自是不服，知道“老头子”是因为红军逼近心里害怕所致，嘴上不敢吭声，心中却大发牢骚：“受惊了怪房子。”

其实，红军并不是真心想取贵阳，在离贵阳三四十里处便转向西南急进。这只是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迫使蒋介石调滇军来保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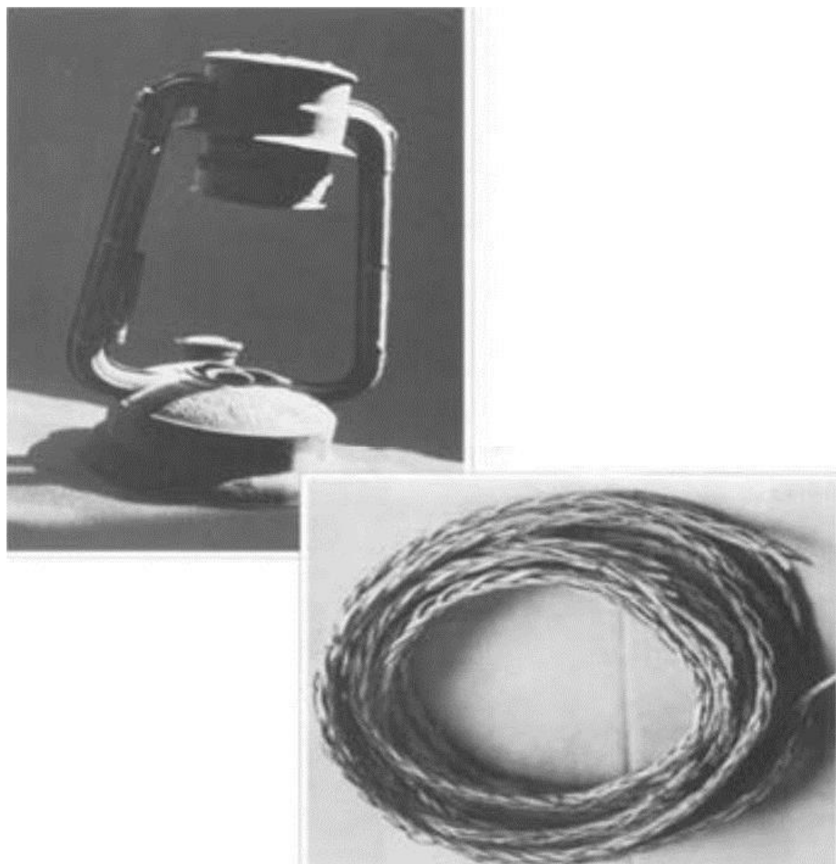
9日，红军以一部分兵力围攻贵阳东南的龙里县城，主力全部跨过湘黔公路向兵力空虚的云南挺进。至13日，连克贵州定番、广顺、长寨、紫云等县。23日，分别由盘县响水和兴仁县西北之黄泥河等地全部胜利离开黔境，进入云南。至此，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统统甩在乌江以北。

随后，红1军团前锋直指昆明。由于滇军主力悉数调入川黔，昆明城内只有一些团防及警卫部队，坐守空城的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惊恐万分。

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各军团："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其中，红1军团为左纵队，红3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三路大军向金沙江南岸疾进。

蒋介石并不是草包一个。这次，他迅速发现了红军意图，判定红军又在声东击西，真正企图是强渡金沙江无疑，便急令增援昆明的薛岳率各纵队调头向北追击；同时电令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兼第24军军长刘文辉派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将船只悉送北岸，严加控制。并严令各部要"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



红军渡赤水河时用过的竹绳、马灯

蒋介石的电令让雅安城里的刘文辉愁眉不展，连声哀叹："共产党找上我这穷光蛋来了。拼也完，不拼也完，走着瞧吧！"

刘文辉，字自乾，法号玉猷。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895年生于四川大邑。1908年入四川陆军小学，后入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1中学。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2期。毕业后在川军第2师任上尉参谋。

刘文辉比刘湘小4岁，却是刘湘的堂叔。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派系林立的旧军阀中，裙带关系自是不同。当时出道较早的刘湘在川军中声名显赫，位居中将旅长，在他的大力扶植下，刘文辉步步高升，短短几年间便当上了第1混成旅旅长，成为"川中枭雄"。

可惜好景不长。1922年6月，熊克武联合川军各部赶走了时任四

川省省长的刘湘。刘文辉只好率部退守宜宾。

1923年年初，川军内讧又起，刘文辉升任第9师师长兼成都卫戍司令，乘机将成都兵工厂、造币厂、四门统捐局税收、成都关监督税收全部接管，下令兵工厂昼夜开工，制造了大量的枪支弹药，源源不断运往宜宾，装备新成立的5个团的步兵；同时铸造大量银币、铜币，据为己有。

这时刘湘也东山再起，打败了熊克武。刘文辉则趁机收编了熊克武残部，并接管富顺、江安、屏山、雷波等地。从此，刘湘在川东，刘文辉在川南，互为声援，形成“二刘合作”。



刘文辉

北伐战争开始后，刘文辉与刘湘、杨森、刘成勋、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等四川军阀宣布易帜，将“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刘文辉被蒋介石委为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长，旋兼川康边防总指挥。

1928年年初，杨森、李家钰、罗泽洲联合向驻重庆的刘湘进攻。

刘文辉明确表态援助刘湘。刘湘相继打败了杨、李、罗各部，统一了下川东，而上川东便成了刘文辉的防区。

刘文辉自宜宾起家，十年之间，部队发展到12万人，防地除西康十几县外，占了大半个四川共计60余县，且是盛产盐糖的富庶地区，盛极一时。

1931年2月，刘文辉出任四川省主席，爬上了事业的巅峰，野心也愈加膨胀，要攫取四川霸主的宝座。

为实现独霸全川的梦想，刘文辉开始对各军采取威胁利诱、蚕食鲸吞的分化政策，企图先彻底解决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州等人，然后兼收刘湘，次第达到统一全川的目的。

于是，刘文辉竭力怂恿邓锡侯讨伐李家钰。在这次战争中，他又扩大了防地，收编了部队。随后又与刘湘联手，打跑了杨森、罗泽洲。最后整个四川就剩下刘氏叔侄两大派了。

刘湘也早就看上了“四川王”的宝座。当时，叔侄二人各自拥兵十余万人，都想自己统一四川，独揽大权，矛盾自然无法调和，只有兵戎相见了。

1932年8月，二刘争雄之战爆发了。这是四川军阀最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混战，持续了两年之久，战线连绵千里，双方先后投入兵力数十万人。

在这场叔侄争雄的大战中，刘湘笑到了最后。



驻守川康地区的国民党第24军刘文辉部官兵

刘文辉一败再败，先是退出了泸州、宜宾，后又退出了成都。他的十万之众土崩瓦解，手下诸将纷纷叛变倒戈，有的被刘湘改编，有的自谋出路。

刘湘见大势已定，顾念叔侄情分，不忍置刘文辉于绝路，同意停

止军事冲突，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为第24军的防地。就这样，刘文辉得以率残部退到川南地区，分驻西昌、雅安、康定三地，苟延喘息，真是好不痛煞愁煞人也。当初的十万雄师如今只剩下2万来人，编成4个师8个旅20个团，装备不齐，缺额严重，士气低落。

刘文辉在这种暗淡的日子刚刚过了一年多，忽报朱毛红军已经由贵州进入川南古蔺、叙永一带，准备渡江。

消息传来，全军上下无不胆战心惊。后来听说红军又返回贵阳，刘文辉一时轻松了许多。不料到了4月下旬，红军突现金沙江南岸，面对的正是自己的地盘。他就开始睡不好觉了。

从内心讲，刘文辉是很怕拼掉自己手里的这一点儿小资本。这点儿兵力一拼掉，也就永难东山再起，甚至连雅安这块地盘也难保住。然而不打又如何呢？红军是要打土豪分田地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翻来覆去地考虑，彷徨无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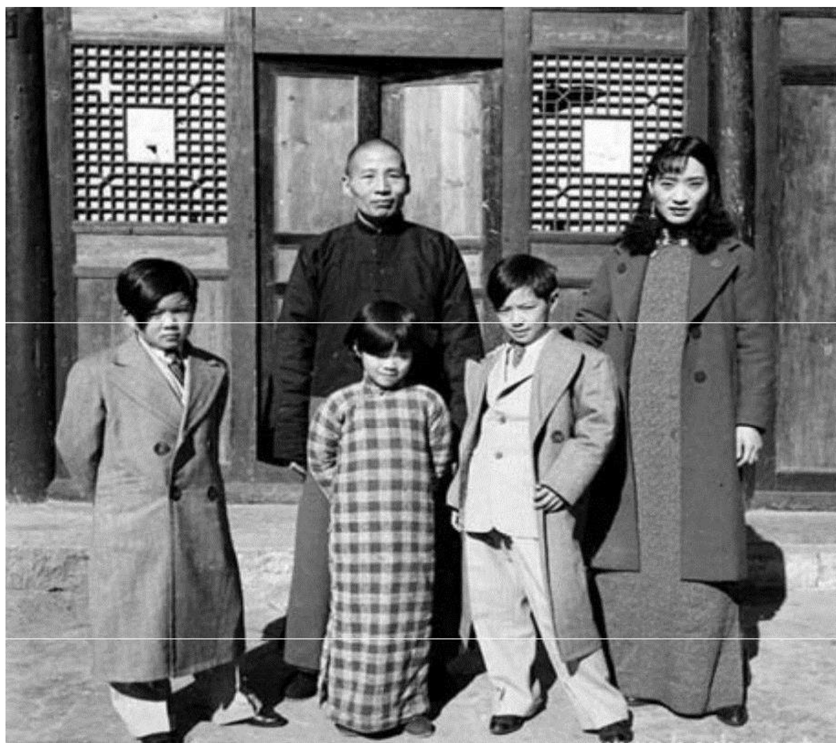
这时，刘文辉的驻京代表又来电警告：必须作好抵抗准备。大势判明，红军北上抗日，可能经过川康地区，我们便首当其冲，如不抵抗，将被蒋介石消灭；如果抵抗，则以卵击石，会被红军消灭。

刘文辉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有谋士献计："古人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共军入川康，并非是件坏事。其一，雅康两地，地瘠民贫，物产不丰，供应困难，我们困守此地何时才是出头之日？现在共军一来，我们正好向老蒋要枪要钱，扩充实力。其二，这一带山川阻隔，地形险要，共军走的正是当年石达开的覆亡之路，只要我们严加防堵，薛岳他们从南面一压，朱毛不难就擒。其三，据闻云南的龙云对共军入滇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让'之策，我们何不效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放'，以保存实力为首要。"

刘文辉一听，果然有理，憔悴的脸上微微露出久已不见的笑容，遂即打起精神，部署兵力，以金沙江为第一道防线，大渡河为第二道防线，严密防堵红军。具体部署如下：

以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指挥刘元瑭旅、刘元琮旅、许剑霜旅、邓秀廷旅，以及新由汉源调到西昌的刘元瑄旅和一些直属部队，共计12个团，并发动地方武装，扼守金沙江，确保西昌地区防务；以新编第5师师长陈光藻指挥袁国瑞旅，并发动大渡河沿河地方武装，确保大渡河河防；以驻在康定的余松琳旅之一部，进驻泸定与康定间的瓦斯沟，封锁大渡河的最上游；军部率警卫旅和直属部队位于雅安，统

一指挥军事行动，相机策应。



1938年，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和家人摄于康定

当然，他还不忘东拼西凑地谎报番号，以便向蒋介石多要些军饷械弹。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上接通天河，从昆仑山、横断山奔腾而下，穿行在深山峡谷中。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极为险要。

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意图已经被蒋介石发现，若不能及时掌握渡口，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必将陷入险境。

防守金沙江渡口的是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瑭。

刘元瑭原任川康边防军第6师师长，因在“二刘之战”中作战失利，部队编制缩小，改任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兼第1旅旅长，下辖4个步兵团和1个手枪营、1个工兵营，驻防会理、西昌一带。

早在1个多月前，刘元瑭就接到军部指示，说进入滇东北的红军有渡金沙江入西康攻会理的企图。

当时，川军中流传着一种谣言，说红军对白军的俘虏，士兵可以留用做苦役，军官一律残杀，家眷编为“慰劳队”用以慰劳有功人员。

因此，刘元瑭部官兵存在很多顾虑，认为如果与红军硬拼，当了俘虏，要被杀戮和受苦；避战或败退，又要受军法制裁，真是避退两难！

刘元瑭自知本旅斗志脆弱，难敌红军而惊惶万状。这时，又闻贵州省主席兼第25军军长王家烈自中央军追击红军到达贵州后，即被蒋介石撤职，部队也被蒋吞并，上层被贬，中层被斩，下层被遣。于是，更加惴惴不安，不知如果红军来了，是战还是退。

好在没过多久，刘元瑭探得红军已回师贵州，准备进攻贵阳，才松了一口气，大言不惭地声称：他早就判断出红军不可能渡金沙江走石达开覆灭的老路。

有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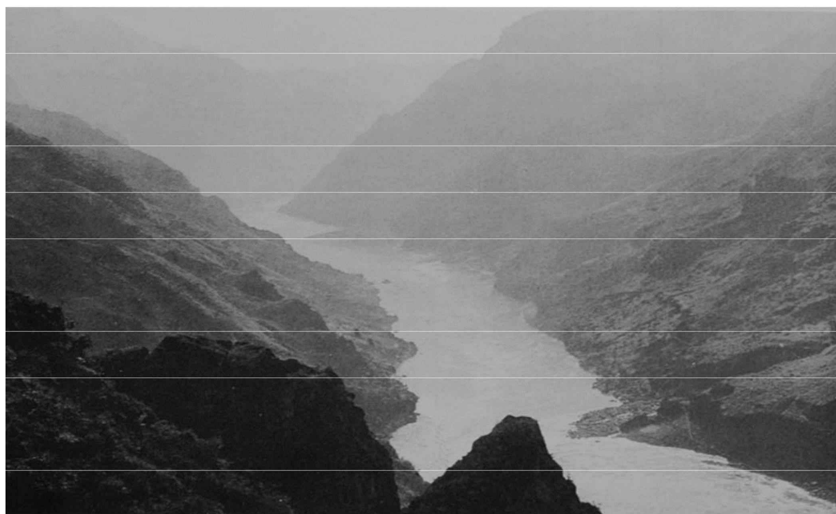
到了4月下旬，刘元瑭又接到军部命令，称红军已向金沙江逼近，此刻正与滇军在江南岸激战中，有向西康流窜的明显企图，令他率部迅速沿江布防。

刘元瑭如同寒冬腊月掉进了冰窟窿，浑身上下凉透了，立即召集全旅少校以上军官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闻听红军将至，诸将面面相觑，呆若木鸡，心中暗自叫苦：第1旅力量脆弱，编制太小，而且多缺额，加之会理地区幅员辽阔，纵横二三百里，金沙江防线又太长，如果被突破一点则全线崩溃。

刘元瑭见诸将一个个哭丧着脸，一副大难临头的模样，只得强打起精神，给部下打气："诸位，共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西康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后面又有追兵，必不能久支，只要我军据险阻击，待中央军到来，再转守为攻，可以夹击制胜；西康崇山峻岭，悬崖陡壁，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不利于大军运动，共军必蹈石达开覆灭的老路。"

话虽如此，但当具体布防时，刘元瑭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判断红军主力不可能走会理南面的通安渡江。因为通安位于川滇交通正道，约有300户人家，为川滇通商的第一市镇，便于大军堵击。红军极有可能由云南巧家渡江，经宁南攻西昌。



金沙江

基于以上判断，他决定把第28团摆在会理东路，与宁南守军配合，形成兵力重点，沿金沙江西北岸防堵。考虑到红军可能以一部兵力由姜驿方面直攻会理，遂把第30团摆在会理西路的姜驿、黎溪一带，沿金沙江北岸布防，并发动当地沙家、自家土司力量，协同防堵。他本人则亲率旅部和第29团，以及旅直属手枪营、工兵营驻守会理城，作为预备队。

部署完毕后，刘元瑭又考虑到红军向来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为确保万无一失，还是决定加强通安方面的防堵力量，除派第29团第2营刘北海部在此防堵外，又委派江防大队长汪保卿协助封锁渡口并检查过往行人。

汪保卿就是通安人，其队丁也都是两岸的农民和船夫，非常熟悉两岸的情况，这也正是刘元瑭选中他的主要原因。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问题恰恰出在汪保卿身上。

这位汪大队长不知道红军的厉害，所以当接到刘元瑭的命令后，竟满心欢喜，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他把两岸的30多只渡船统统拉到北岸，只留下一只船在南岸用于摆渡。如果有人要渡江，单客一人收银圆一元，肩挑客商加收半元，空马一匹收一元，驮子收两元，甚至连抬滑竿的轿夫和邮差都照收不误。

听说红军要来，在通安一带渡江“逃难”的民众剧增，汪保卿果然大大发了一笔横财。但还没等他消受这笔横财，一场灾祸已悄然来

临。

5月3日夜，江防大队的队丁大都在大烟馆里睡觉，有的还在烧烟。忽然，寄宿人群中站出几个人，手中端着长短枪支，高喊：“不准动！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原来，红军先头侦察部队扮作“逃难”民众，由通安渡过江来了。



毛泽东指挥红军巧渡金沙江时住过的岩洞

正在家里做着发财美梦的汪保卿，听说红军在烟馆里出现，并已把江防大队缴了械，顿时吓得魂不守舍，带着几个心腹，仓皇而逃。

此时，通安渡口枪声大作。红军先头部队已将川军第29团第2营击溃，大部队正源源渡江。

刘元瑭得知通安已失、红军正在渡江时，并没有过于着急。因为他估计该地水流湍急，仅靠几只小木船，红军大部队不可能一时全渡过来，已渡江的只是少数先遣部队。便亲率第29团第1营、第3营、迫击炮连和旅部手枪营、工兵营，向通安方向飞奔，妄图夺回渡口，压迫红军退回南岸。

途中正遇第2营营长刘北海率残兵从通安败回，刘元瑭将其臭骂一顿，即令一同反攻赎罪。可当他率部到达一把伞高地时，正与宋任穷率领的红军干部团第3营相遇。干部团是红军精锐，第3营又是政治

营，军政素质皆强。宋任穷命令吹起冲锋号，红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杀向敌阵，展开肉搏。

仅一个冲锋，刘元瑭部便败下阵来，手枪营第2连连长熊联勋当即被红军刺死，排长庞云等数十人被俘虏，余部争先恐后地向会理败退下来。望着满山遍野的溃兵，刘元瑭急得放声大哭。

台湾编纂的战史这样写道：

共军人枪虽少，但行动极为灵活，一路向西窜进，国军既拦截不到，亦尾追不及，迄5月9日，于武定以北地区渡过金沙江，其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康之会理，追剿军正分途向金沙江南岸推进。黔滇地区之追剿作战，于焉结束。

红军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聂荣臻曾回忆：

“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当薛岳率领几十万“追剿”大军杀气腾腾地赶到金沙江畔时，已经是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以后的第七天——5月16日了。

望着波涛汹涌的金沙江，薛岳无可奈何，叹息不已。数十万大军日夜兼程赶到金沙江，却都是来与红军送行的。

与此同时，在乌江以北地区活动的红9军团也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

新中国成立后，萧华在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写道：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

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

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四渡赤水战役，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北上，至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历时72天，粉碎了蒋介石在川、滇、黔边围歼红军的计划，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是红军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1960年5月27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对毛泽东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嘉陵江战役

【交战时间】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

【交战双方】红四方面军；国民党川军第28、第29军

【指挥将领】徐向前、陈昌浩；邓锡侯、田颂尧

【战果】红军歼灭国民党军12个多团约1万人，攻占县城8座

1935年3月，为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境地区的作战行动，红四方面军决定发起嘉陵江战役。

嘉陵江是巴蜀四大名川之一，起源于秦岭山脉，由北向南，自广元起汇合白龙江水流，一泻千里，直下长江。南部以上为深山峡谷夹持，水流汹涌，湍急难渡，堪称天堑。守备嘉陵江防线的是刘湘的两员大将邓锡侯和田颂尧，二人都曾是红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

邓锡侯，号晋康。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与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田颂尧并称为“四巨头”。1889年生于四川营山。1906年入成都陆军小学堂第一期。1909年入南京第四陆军学堂。1910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辍学返川，入川军刘存厚第4师，出任副官、连长等职。

护国战争爆发时，邓锡侯随部配合蔡锷领导的护国滇黔军作战，奉命坚守要隘马鞍山，凭借险要地势和自身的英勇机智，重创北洋军，荣立战功，升任川军第2师第3旅团长。1918年升任川军第5旅旅长。1920年又升任川军第3师师长，逐渐形成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

1922年年底，邓锡侯联合北洋军阀支持的杨森等部，通电拥护北京政府，受到嘉奖，被委任为国军第30师师长，并加“骠威将军”的头衔。1924年5月被委任为四川省省长。次年改任四川清乡督办。

时任四川督理的杨森野心勃勃，妄图独霸全川。1925年秋，刘湘、邓锡侯、袁祖铭、刘文岛、田颂尧组成倒杨联军，一举将杨森赶出了四川。邓锡侯任联军副总司令，率部进驻成都，掌握了盐税专收权，并占据华阳、南充等广大地域。此时，他的实力仅次于刘湘，成为四川军阀“四巨头”之一，独霸一方。

1926年，北伐战争激战正酣。邓锡侯派出代表前往南昌，联络易

帜，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28军军长，借机在自己的驻防区内就地筹饷，预征田赋，抓丁派夫，扩充部队；在松（潘）茂（县）等藏、羌民族地区，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还一度控制了设在成都的四川造币厂，大量铸造银洋铜币，以保障日益增长的军需供应。

1932年秋，“二刘之战”爆发了。邓锡侯率部支持刘湘打败了刘文辉，四川军阀最后一场混战宣告结束。

就在这时，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邓锡侯随即出任四川“剿总”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进攻川北苏区，结果大败而归。

上海二十三日電，孫科談，此次全會表現黨內之意見，一致集中於對外救亡，深望黨內與黨外，政府與國民，均能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將態度誠懇，對設立民意機關，及促成……

……俄大使，已得對方同意，一俟中政會通過，即發表，至俄駐華大使，聞由駐巴西大使調任，全會對東北問題，已有具體辦法，行政院各部無甚變更，本人決即就立法院長職，日期尚未確定。

劉文輝否認失成都

二十四軍部仍設成都

劉與田頌堯業已妥協

大水二十二日電，劉文輝否認成都失守，現二十四軍部仍設成都，由副軍長向傳義主持後方軍務，與田頌……

韓復榘昨離濟

沈鴻烈宋式顏等同來

山東主席韓復榘，本定昨晨離濟北來，因在濟候青島市長沈鴻烈同行，改於昨日午後離濟，昨晚據確訊，沈鴻烈葛光庭，於前晚八時由青島乘膠濟車離青，昨晨十時抵濟南，沈葛下車稍有停留，定下午二時左右同乘專車離濟與韓同車，隨員有濟南市長聞承烈，參議張聯陞張受爲，軍官教導團校長宋式顏等，韓氏擬適禹城時，檢閱駐軍，預定今日到津，停留一日，並與在津養疴之宋哲元及冀省主席于學忠晤面，昨晚東北海軍……

《军事日报》关于二刘之战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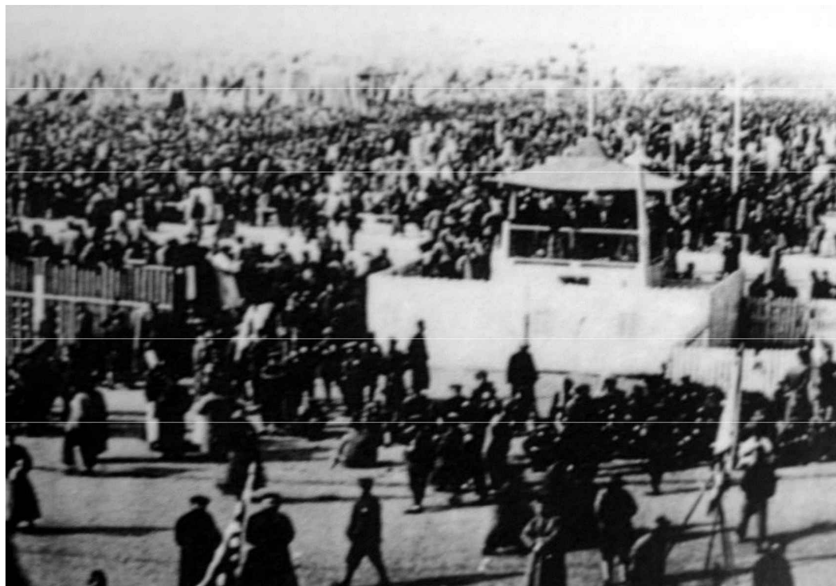
比邓锡侯大一岁的田颂尧，也是四川军阀“四巨头”之一，又名见龙、光祥，国民党陆军上将。1888年生于四川简阳。1908年入四川陆军小学第1期，后升南京第4陆军小学。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川任陆军第4镇参谋、第2师营长等职。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在云南通电起义，率护国滇黔军取道四川讨伐袁世凯。田颂尧宣布起义，出任护国川军第2路第3支队长。自此官运亨通，相继任川军第2师骑兵团团长兼成都城防司令，第21师旅长、师长。

1924年5月，田颂尧被北京政府授予陆军上将衔。1926年5月，任四川军务帮办兼川西北屯垦使，并打出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的旗号，加紧扩充实力，扩大防地，全部人枪发展到3万以上，据有川西北26县之多。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各地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田颂尧宣布愿意参加北伐，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

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田颂尧和邓锡侯一样，都在“拥蒋”与“反蒋”间摇摆不定。



武汉各界民众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田颂尧和邓锡侯与刘湘、刘文辉等川军将领联名通电拥护蒋介石。1930年4月中原大战

爆发后，田、邓二人却随刘文辉联名发表鱼电逼蒋介石下野。半年后，蒋介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田、邓二人见风使舵，于1931年1月派代表赴京，面见蒋介石，请求谅解。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乘“二刘”混战之际，由陕南突进川北，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1月，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拨发子弹近百万发，军费20万元，派飞机4架助阵。田颂尧亲赴阆中，指挥对红军的“三路围攻”。此战历时4个月，田颂尧被杀得丢盔卸甲，损失兵力三分之--，残兵败将退守嘉陵江沿岸。

同年10月，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四川“剿匪”第二路军总指挥，率部由阆中、南部向仪陇、巴中方向进攻。结果依旧是全线溃败，所部曾起戎、胡开莹两旅被全歼。这下，田颂尧算是知道了红军的厉害，收集残部，沿嘉陵江北岸凭险固守，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考虑到嘉陵江自南部县以北的上游，湍急难渡，邓、田二人把所部53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广元至南部长约300公里的西岸，企图凭借嘉陵江及其西侧后剑门关险要地形，扼住红四方面军西进发展的通路。具体部署是：

邓锡侯第28军共21个团防守广元以北陈家坝至昭化射箭河以北地段。其中，以15个团守备江防，第3师第7旅周世英部防守昭化及其以北地区，第4师第12旅林翼如部防守广元地区，第1师第3旅李竞芳部防守朝天驿地区，第3师第8旅刘乃铸部防守陈家坝东北地区，第5师第14旅冯鉴部防守朝天驿、陈家坝沿江地区。以6个团为预备队，宪兵司令刁文俊率3个团配置于昭化东南的剑门关，另3个团配置于广元西北的车家坝。

田颂尧第29军共32个团防守昭化以南至南部新政坝地段。其中，以25个团守备江防，第1地区司令、第4师师长王铭章指挥该师3个团及李炜如扼守阆中河溪关以右至南部一线江岸地区；第2地区司令、第3师师长罗乃琼指挥该师7个团、第2师第5旅及王志远路防守河溪关至百里坝地区，并固守阆中；第3地区司令、独立师师长刘汉雄指挥该师5个团、何德隅路防守自百里坝到青牛庙一线江防；第4地区司令、第1师副师长税梯青指挥该师4个团及覃世科第13旅防守青牛庙亘江口一线，左与第一路军衔接。以7个团为预备队，配置于阆中以西的衣思场地区。

根据当面敌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决定

集中主力，选择守军防御薄弱部位实施多路有重点的突破，尔后向两翼及纵深发展，进占嘉陵江、涪江间广大地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敌，为向甘南发展创造条件。

时任红30军副军长的程世才回忆道：

渡江能否成功，关键之一是渡江地点的选择。嘉陵江是长江上游一条支江，宽800至1500公尺，水深而流速较大，两岸多大山，有些地方是陡岩、急坡和小路。虽是一水之隔，对面大声叫唤就能听见，一举一动也能看到，可是，渡过去得半天的时间。想找到对我方渡江方便，又是敌弱点，打过江后又便于扩大战果的地方，真是困难。

徐向前亲率参谋人员翻山越岭，沿嘉陵江东岸行进三四百里，了解敌情，查看地形，寻找渡口，选择战机。在反复勘察地形后，最终确定将苍溪县东南20多里的鸳溪口至阆中以北地段作为突破口。

这一地段正面宽约60里，东岸地势较高，利于红军隐蔽待机，居高临下组织火力，掩护强渡；江面虽较宽，在150～400米之间，但水势平稳，流速缓慢，只有3～5米深，岸滩比较平坦，纵深为丘陵起伏地，利于红军抢占登陆场，展开兵力，实施两翼迂回，扩大战果；敌军江河弯曲，突向我方，防守兵力相对薄弱，仅部署了3个团，一线地区只有4个营，且是屡遭红军重创、士气低落、装备又差的田颂尧第29军刘汉雄师的部队。

据此，徐向前制定了渡江作战部署：

中路以红30军实施主要突击，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突破，消灭江防守敌后向剑阁方向进攻，并协同红31军消灭剑门关守敌；

右路以红31军从苍溪以北鸳溪口突破，尔后消灭剑门关守敌，并迅速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主要打击邓锡侯部，并阻止位于甘肃南部的国民党军第11师南下，保障右翼安全；

左路以红9军于阆中城以北涧溪口突破，尔后以一部协助红30军发展进攻，另一部消灭南部县守敌，保障左翼安全；

以红4军为第二梯队，相机支援第一梯队，待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于苍溪渡江，一部协同红9军消灭南部县守敌，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

方面军总炮兵营配置于苍溪塔子山上，掩护红30军强渡。

徐向前选择的强渡突破口无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事后证明是个最佳选择。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共军竟乘虚进攻，真可谓善于

选择弱点。”

然而要成功渡过嘉陵江，摆在红四方面军面前的困难仍然不少。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渡江工具。江上没有桥，所有的船只不是被敌人劫持到西岸，就是被焚毁。

但这些困难难不倒英勇的红军将士。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动员一切力量，自己动手造船。当地群众也积极行动起来，加入到造船大军中。程世才回忆道：

经过调查研究，如以一次渡过一营兵力计算，一只船坐10个人，就需40只左右，再加上每排一只预备船，则需造50余只才够用。造船任务限在20天左右大部完成。要造这样多的船，困难是很多的。可是，在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都办到了。当时，采伐了造船树，随即锯成木板，木板太湿，即用火坑烘干，然后开始造船。为保守秘密起见，指定在隐蔽地点进行。工作开始后，军队、群众、木匠、工农兵在一起，飞快地动起手来，按照分工，砍的砍、锯的锯、拉的拉、抬的抬、烘的烘、造船的造船，工作效率很高，不几天，眼看着大批的战船造成了，过了几天，船上油干后，战船下水，一排排的战船在东河的水面上漂动着。造船工作的顺利进行，大大地鼓舞和坚定了部队渡江的信心，有这样的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谁都坚信：江是可以过去的，敌人是可以打败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劳动，红四方面军赶造出可以同时运载3个团的船只，并用毛竹扎了三座浮桥。

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强渡江河作战，各部队认真开展准备工作，根据所担负的任务，研究敌情，侦察地形，制订周密的具体作战方案。担任强渡任务的部队利用支流河汊，苦练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

期间，为扫清渡江障碍，红四方面军于3月5日和11日占领仪陇、苍溪，歼敌2个整团和另2个团大部，俘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0余支，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河溪关的嘉陵江东岸。

到3月下旬，强渡嘉陵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已万事俱备，只等令下。

28日晚，嘉陵江战役打响了。

由红30军第88师第263团的2个营和方面军教导队组成的突击队在苍溪城南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

渡江的勇士们一股劲地向前划行，哗哗的流水声淹没了浪花拍打船板和船桨击水的声音。大约过了45分钟，当战船进到离敌江岸碉堡五六十米的地方时，敌人的哨兵发觉江里有大批船只驶来，就大声喊道：“你们是哪来的？干什么来呀？”

红军战士并不理睬，继续沉着划行。

敌哨兵拉动枪栓，高喊：“再不回答我就开枪啦！”

这时，战船已经迫近岸边。敌哨兵见是红军渡江，慌乱开枪射击。顿时，枪炮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奇袭立即转为强渡。红军数十门迫击炮和几十挺机枪一齐向敌前沿猛烈射击，密集的火力构成道道火网，映红了嘉陵江上空。

突击部队在炮火支援下成功登岸，全歼守敌1个营，击毙敌团长陈登朴，迅速抢占了滩头阵地。随后击退了左右两翼敌人的反扑，占领了李社坝、老君堂、胡家场一带的登陆场。

次日拂晓，红军第一梯队分三路开始渡江。

左路，红9军一部在阆中城北涧溪口顺利渡江，于31日攻占阆中；中路，红30军主力在塔子山渡江，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退援军1个旅；右路，红31军在苍溪城北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对岸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守军1个旅，向前扩展。

红军第一梯队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敌人，在占领西岸要点后，迅速向敌人纵深及两翼发展进攻。第二梯队红4军从苍溪渡江投入战斗。红9军一部击溃敌2个旅的阻击后向南疾进，并在红4军一部配合下，于4月2日攻占南部县城。红30军及红9军另一部于3月31日攻占剑阁后，红30军一部和红31军进攻战略要冲剑门关。

剑门关位于横亘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上，是出入川陕的必经隘口。站在关外由北往南看，整架山的地势北高南低，72峰峰峦绵亘，如72头雄狮面北而卧，日夜警惕地守护着蜀国大门。这里地势险要，两旁峭壁如利剑砍成，中间只有一个隘口，悬在几丈深的绝壁中，自古便有“插翅难渡”之说。三国时蜀国大将姜维曾在此驻守，唐代大诗人李白路经此地，留下了“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叹。

驻守剑门关的是邓锡侯第28军3个团，由宪兵司令刁文俊指挥。

4月2日，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红31军军长王树声率部抵达剑门

关，对敌形成三面包围。刁文俊深知如果红军拿下了剑门关，嘉陵江与涪江之间便无险可守，川西平原的门户由此洞开，成都将岌岌可危。于是，他指挥守军据险顽抗，拼命反扑，妄图凭借天险和坚固工事阻止红军西进。

王树声早就知道“一关失，半川没”、“打下剑门关，犹如得四川”的千年名言，亲自指挥抢占剑门关的战斗。根据当面敌情，王树声决定集中使用迫击炮和机枪，掩护突击队对敌各个集团工事实行逐点攻击。

时任红274团2营营长的陈康回忆道：临近十一点多钟，天空乌云由淡变浓，毛毛细雨越下越大，地上的水顺着山沟往下淌。我们的攻击部队，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又一次向主峰发起攻势。眼看快要完蛋的敌人，把集中在主峰上的火力，不歇气地向我攻击部队倾泻。由于我们的迫击炮打得不准，压制不住敌人的火力，使得攻击部队一次又一次被迫退下来。

……

我把对敌人的仇恨化为力量，向部队作几句简短的动员：“同志们，只要拿下主峰，剑门关就破了。”我接着高喊：“同志们，冲啊！”

我们全营同志，立即跃出隐蔽地，端头刺刀，以泰山压顶之势，似雷霆万钧之力，沿着选择好的冲锋道路，一鼓作气冲上山顶。手榴弹的白烟，立刻汇成一片浮云，在敌人阵地上升起。溃退的敌人，一群一群放羊似的乱跑乱窜。

激战半日，红军全歼守敌3个团，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

徐向前回忆道：

那里“汉柏”很多，又粗又壮，据说是张飞令蜀军栽的。王树声说笑话：山上树太多，我们的马尾手榴弹扔出去，挂在树上掉不下来。一发迫击炮弹打响，把树上的马尾手榴弹都震到地上，四处爆炸，吓坏了敌人，部队趁势一冲，就拿下了山头。

剑门关这个江防支撑点失守，邓锡侯部慌了神，沿江溃逃。红军乘胜追击，星夜兼程。红30军和红31军一部由剑门关直扑昭化，于次日攻占昭化县城，歼灭守敌1个团。红31军主力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阻击胡宗南部南下，并包围了广元。

至此，红军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约400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敌人的沿江防线悉数被摧毁，战役第一阶段遂告结束。

红军胜利突破嘉陵江后，当地百姓中流传着一首歌谣：

红军过了河，

羊子（杨森的绰号）奔索索，

冬瓜（田颂尧的绰号）遍地滚，

猴子（邓锡侯的绰号）摸脑壳，

矮子（李家钰的绰号）挨鞭，

刘湘怕活捉。

请问委员长，

看你又如何？！

蒋委员长自然是暴跳如雷，于4月2日发布电令：

查嘉陵江向称险要，苍、阆、南部一带，原属二十九军防地。一年以来，迭次通令构筑碉堡，加强工事，严密布防，以遏残余徐匪之窜扰，不啻三令五申。该军负责守备经年，糜饷实钜。律以救国救乡之大义，应如何激励军心，力图报称。乃连日据报：该军防守不严，徐匪一部遂于俭晚突渡嘉陵江；继复作战不力，苍溪、阆中、南部亦竟相继撤退。弃藩篱而不守，陷人民于涂炭！实属玩忽命令，贻害地方，断难再予宽容。

在一番严词训斥后，蒋介石宣布将川陕边防“剿匪”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第29军军长田颂尧撤职查办，副军长孙震因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戴罪立功。

蒋介石此举无非是杀鸡给猴看，使川军将领有所恐惧。但川军遭此沉重打击后，早已斗志全无，一败千里。

沿江防线被红军突破后，第29军退守射洪、盐亭、三台，第28军主力退缩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以一部布防梓潼、江油、中坝等地，企图构成新的防线。

8日，红31军主力继续扼守羊模坝、三磊坝并围困广元；红30军第89师出青川、平武，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阻击胡宗南部南下；红30、红9军主力进逼江油，红4军主力则向梓潼展开猛烈攻击。

10日，红9军渡过涪江，包围江油，前锋直逼战略要地中坝。与此同时，红4军攻占梓潼，直接威胁成都、绵阳。

邓锡侯慌忙拼凑18个团的兵力，亲自率领10个团在飞机的掩护

下，经中坝向江油增援。

红四方面军总部当即决定采取围城打援战术，令红9军第27师继续围攻江油，集中红9军第25师、红30军第88师和红4军第10、第11师各一部，在江油城南塔子山、雉关山一带布下阵势，打击援敌。

激战两天，红军歼灭援敌4个团，并乘胜追击，于17日攻克中坝，18日占领彰明，就连邓锡侯也差点被活捉。

同时，红30军第89师溯白龙江而上，在攻占青川后，继续北上摩天岭，歼胡宗南部1个营，于14日占领平武。红4军一部向西挺进，于21日攻克北川。至此，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历时24天，红四方面军共歼川军12个多团约1万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各100余公里的广大地区。

强渡大渡河



川中名将——刘伯承

【交战时间】1935年5月24～25日

【交战双方】红1师第1团；国民党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

【指挥将领】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刘文辉、杨学瑞

【战果】红军击溃国民党川军1个营，渡过天险大渡河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把蒋介石几十万追兵甩掉一周之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不料，红军在会理地区耽搁太久。从5月8日到14日夜，以整整一周时间强攻会理城，其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开了两三天。待15日决定放弃对会理的围攻挥师北进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时，优势已然耗光。

更为关键的是大渡河乃天险，当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便全军覆没于此。蒋介石很有可能切断红军的退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过藏族山区突围，而这是非同小可的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红军无线电侦听到的消息表明，蒋介石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部队。红军又要开始和时间赛跑了。

为了迅速北上，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先遣队，由熟悉这一带风土人情的两位川籍将领刘伯承、聂荣臻率领。

事后证明，由刘伯承担任红军开路先锋，是何等的明智。

5月16日，红军主动撤围会理，先遣队沿大道向西昌方向前进，当日进入了德昌县境。

德昌，位于雅砻江支流安宁河河谷中，地处要冲，是西昌的第二道门户。驻守此地的原为川康边防军第16旅的1个营。川康边防副司令刘元璋最初不想守德昌，以免分散兵力，后来考虑到德昌比较富庶，因此派第16旅旅长许剑霜率1个团加强防守力量。

许剑霜，原名许颖，早年加入共产党，曾是刘伯承的旧部，跟随刘参加过泸顺起义，出任团长。后因起义失败，自动脱党，投靠了四川讲武堂的同学刘元璋。

刘伯承给许剑霜写了一封信，大意说：红军要北上，必须假道西康，没有争城夺地的要求，愿与贵部互不侵犯等语。

终究是当过几天共产党的缘故，许剑霜比较易于了解红军的意图，深信红军只是借路，不会要别的。在他看来，让路实乃两全其美之举。红军既可以顺利通过西昌地区，刘元璋又可以保存实力，说不定日后都是有好处可捞的。因此，他派人将此信送到西昌交给刘元璋，并主张接受信中意见。

这本来就符合刘元璋保存实力的意图，但又不便明确表态，只是叮嘱许剑霜相机处理。

许剑霜心领神会。

17日，红军进攻德昌。许旅和红军刚一接触即撤退下来，退回西昌。

经会理北上的红军在距西昌西南15里的马道子分路，绕过西昌取捷径，挥师北上，完成北渡大渡河的计划。

但这一计划已被蒋介石猜了个正着，于5月10日发出电令：“‘匪’既渡江（金沙江），我第一第二两纵队与李师（李韫珩），即由薛总指挥亲率渡江，兼程向会理急进。”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要向大渡河前进，深入四川腹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此制订了一个“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的“聚歼”计划。

12日，蒋介石急忙飞临昆明，策划和指挥实施“聚歼”红军的新计划。

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滇军统帅龙云熟知历史典故，向蒋委员长献计道：像72年前清军消灭石达开一样，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

大渡河，岷江的一大支流，上源名大金川，发源于青藏高原，由北向南奔腾在横断山中，流入西康后同小金川汇合，经过泸定桥至安顺场，突然掉头向东，形成一个90度的大转弯，流至乐山入岷江。两岸都是崇山峻岭，仅沿河有一条羊肠小道，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红军长征过会理纪念碑

红军把渡河地点选在位于大渡河拐弯以西20公里处的安顺场。

安顺场，原名紫打池，是大渡河南岸的一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场镇，也是通往冕宁的要道。渡口处河宽300多米，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乱石嵯峨，形成无数漩涡，俗称“竹筒水”，可让鹅毛沉

底，人不能泅渡，失足落水即有灭顶之祸。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沿河渡口只有小木船作为来往行人横渡之用。船横渡时不能直达对岸，必须先把船上划一二里再行放船，要有经验的艄公掌舵，十余名船工篙橹齐施，与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船体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对岸渡口有石级，如对不正，碰到两侧石壁上，则船毁人亡。

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五六万人到达安顺场，忽遇大渡河上游发大水，河上的铁索桥已被拆断，不能渡河。前有大渡河，后有清军，左为山崖绝壁，右为彝民区，且当时彝民比现在人数多得多。石达开全军被困47天，最终全军覆灭。

崇尚曾国藩的蒋介石自然也熟知这段历史，兴奋无比，狂妄断言："共军过得了金沙江，过不了大渡河，共党必蹈石达开覆辙，全军覆灭。"

为此，他精心炮制了"大渡河会歼战"计划，要把滇、黔、川三省的部队，加上薛岳所率的中央军，数十万大军通通协调起来，以实现聚歼"今日之石达开"的美梦。并准备在川军将领中物色一位战场指挥官，充当"骆秉章"。骆秉章就是当年在大渡河围歼石达开的清朝四川总督。

蒋介石对川军的印象经历了一个由坏变好的过程。

起初，"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对红四方面军的"六路围攻"打得一塌糊涂，那时他对川军的印象是很糟的。然而，自中央红军"窜黔"以后，土城一仗，郭勋祺打得很不错；潘文华在川南的江防也是十分得力，迫使红军两度不能"窜渡"长江；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兼第24军军长刘文辉打得也不错，先是刘元瑭死守会理，竟使红军主力围攻7日不克；随后，刘元璋在西昌用"亮城"的办法对付红军，使他更加相信川军"剿匪"的诚意和战斗力。

但在"骆秉章"的人选问题上，蒋介石遇到了麻烦。刘文辉与刘湘虽为叔侄，却宿怨极深，人所共知。若由刘湘出任总司令，大渡河所在地区却是刘文辉的地盘；若由刘文辉做总司令，刘湘又是冷落不得的。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因为这个战役的指挥官本来就是一个虚设，真正的指挥官是蒋介石本人。

其实，最大的麻烦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北进的方向判断错误。虽然他大讲70多年前的历史，大作"石达开覆亡"之梦，却始终不敢相信毛泽东会真的走石达开的老路。曾对手下众谋士讲："毛泽东这个人，我是有些了解的，他不可能不晓得石达开的教训。他肯定会走东

边的大道，取道汉源、荥经，图谋在雅安附近同徐、张一股会合。”

基于这种判断，蒋介石就川康地区“围剿”红军的战略方针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

一、此时我军主要战略，第一在防止朱、徐两匪会合，第二在防止残匪向西康逃窜。故现不必防徐匪东回，而在防徐匪南下。应急令第五与第三路主力限期向邛崃、懋功、宝兴一带移动。而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应急派队布防，压止徐匪南窜，并希在此地带聚歼徐、朱两匪也。以此两匪必谋在雅安附近会合。故吾人既知其目标与方向所在，应即照此预备，不必零星分防，随匪转移，而须急谋立于主动地位也。

二、残匪最后不能北窜必向西窜。故泸定、康定、雅安之防备尤为紧要……

最终，蒋介石还是决定由刘湘率邓锡侯、唐式遵、李家钰等部专心对付红四方面军，而把大渡河会歼中央红军的重担交给刘文辉和杨森二人，具体部署如下：

以川军第20军全部及第21军之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令刘文辉将第24军大渡河以南的部队统归刘元璋率领，受薛岳指挥，堵截红军北上，掩护薛岳部主力北进；刘文辉率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严密封锁。

在电令中，蒋介石特别指出：大渡河乃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并以清朝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勖勉。

为确保河防，困厄红军，蒋介石还三令五申各河防部队：收缴南岸渡河船只以及可作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到北岸；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扫清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接近河岸者，悉加焚毁。

于是，在那样一个蛮荒之地，蒋介石竟投入了近20万大军，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把毛泽东变成“石达开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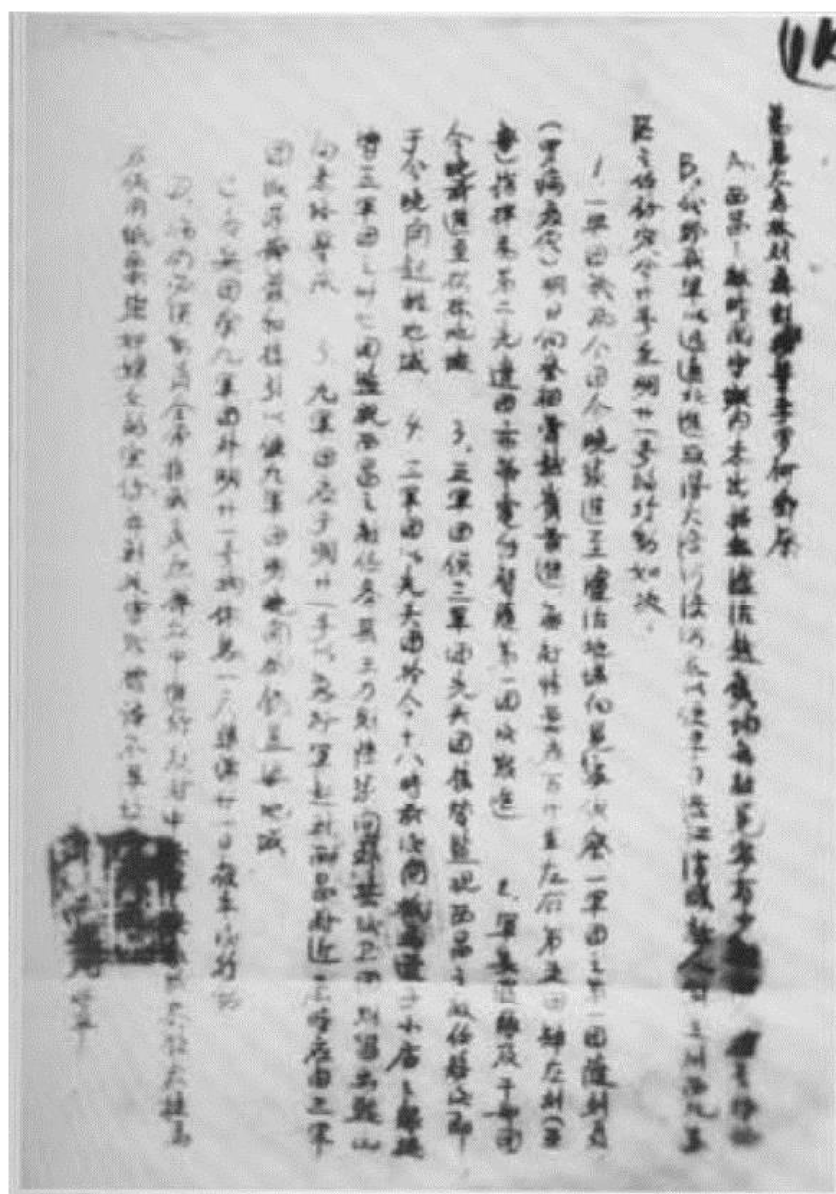
部署完毕后，蒋介石坐上飞机，两次飞到川康边境前线视察，望着蓝天白云下的险山恶水，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共匪要想渡过大渡河，除非插上翅膀。”

蒋介石想要刘文辉、杨森做骆秉章，毛泽东却不是石达开。

红军再一次陷入危难境地。中革军委的电报上反复出现“迅速”前进，“迅速”占领，“限令”到达等字眼，足见统帅部的急迫心情。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抢在各路敌军到来之前渡过大渡河，以免重蹈石达开的覆辙。红军将士们不畏艰辛，每天行军120里路，但仍未能赶到敌军的前面。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刘文辉将第4、第5旅组成第5师，开赴大渡河布防，其中第5旅守富林至安顺场一带，第4旅守泸定桥附近；杨森率第20军防守富林以下至金口地区。





朱德下达的强渡大渡河的命令

5月13日，第24军第5旅旅长杨学瑞到达富林，随即部署防务：

以4个营为守河固定部队，其中第7团余味儒部3个营布防于安顺场北岸至大冲之间，第28团唐灼元部1个营，布防于大冲至富林间；

第21团肖绍成部游弋于第7团与第4旅间，作为机动部队；第28团（欠1营）及旅部特务连为预备队，随旅部驻富林。

杨学瑞回忆道：

五月下旬，我率第五旅的全部到达富林。经过四五天的布置，将三个团展开在河防线上。防线太长，地形复杂，交通困难，通信不便，处处感到薄弱空虚，使我忧心忡忡，彷徨无主。

当时大渡河沿岸有两大恶势力：一为富林的屯殖司令羊仁安，势力范围在安顺场下游至富林一带；一为安顺场的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势力范围从安顺场起至上游河道七场。

这两个封建霸主，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为所欲为，生杀予夺，说一不二。大渡河每年雨季都要冲刷出不少香杉，这是沉埋于地下的一种杉木，经水土千百年侵蚀渐渐变成一种异常坚硬的木质，永不腐朽，是做棺木的理想材料，被称为“建板”。这种价格极为昂贵的天财地宝，只有羊仁安、赖执中两人才能享用。不管在何处发现，都必须报缴他们，在未运走前，还要看守好，损失要赔。

自红军向大渡河进军以来，羊仁安就坐不住了。为了保住自己这个小小王国的安全，他忙得手脚不沾地，慰问来往军队，商讨地方势力如何与军队配合，真是不遗余力。凡是从这里经过的军官，他总要宴请一番，席间必以石达开覆亡故事来鼓励军心。

21日，第21军第6旅王泽浚部抵达富林，增强防务。

王泽浚系四川军阀王缵绪之子，出身将门，少年得志，跋扈专横，常以马鞭抽打部属，就是团长亦在所难免。该旅下辖3个团6000人，不仅兵员充实，且装备精良，配备的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掷弹筒均为新式。此番又是蒋介石亲自点将，商得刘湘同意，任命其为成都城防司令，率所部星夜驰赴富林。

这样，在安顺场至泸定桥一线，已有敌军3个旅重兵防守，形势对红军愈发不利。

有道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24日夜，红军先遣队第1师第1团冒雨急行军160多里的赶到了安顺场。这时，红军面临的形势极端险恶。西面，有滇军孙渡部沿着雅砻江的布防；东面，有川军杨森的第21军和郭勋祺、陈万仞等部的联合阻截；后面是薛岳指挥的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等部数十万大军的追赶；前面，则有川军第20军主力和刘文辉的第24军一部扼守着大渡

河所有渡口。红军被挤在一个狭窄封闭的地域里，一旦被大渡河所阻挡，就可能无法摆脱被围歼的命运。

防守渡口的是刘文辉的第24军第5旅第7团韩槐堦营。韩槐堦是四川名山百丈场哥老会首领，曾在安顺场流浪多年，酷好赌博，与当地豪绅恶霸混得最熟。团长余味儒将其部署在此，就是想利用他这点关系，把当地地主武装组织起来，填补右翼空隙，与第4旅取上联系。当时第4、第5旅间约有200余里空隙。

为“确保河防，围厄红军”，韩槐堦下令坚壁清野，将南岸渡河船只与粮食统统收缴集中到北岸；为扫清射界，强迫老百姓搬家，并在安顺场遍街堆放柴草，准备纵火烧街。

尽管做了周密准备，但韩槐阶并不认为红军会在此渡河。因为就在一天前，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红2师政治委员刘亚楼率红2师第5团攻占了离安顺场20余里的大树堡，造船扎筏，大造在那里渡河的声势，并扬言要打到雅安、成都。

当晚，红1团第2营在团政治委员黎林的率领下佯攻渡口下游，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其中，1连攻正面，从安顺场西面冲；3连从西南面冲；2连和营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冲并负责找船。



安顺场渡口

川军压根就没有料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面对红军的突然进攻，一败涂地。赖执中看到大势已去，和几个卫士化装成老百姓在一片混乱中翻墙而逃。经20多分钟战斗，红军全部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

附近发现一只小木船。

这只木船是赖执中的地方部队留下的。

原来，韩槐墡营驻防安顺场后，赖执中应率部向北岸撤退，但不愿在红军未到前即弃家园逃走。他判断红军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西越路线，由西昌经越西到富林，这是宁雅正道；另一条是西冕路线，由西昌经冕宁到安顺场。万一红军走宁雅正道而不到安顺场，岂不是庸人自扰，白受损失。

于是，他便与韩槐墡商量，允许其率部留在安顺场，并留下木船两只，待红军快到时再过河也不迟，这样南岸消息不至于断绝，还拍着胸脯保证说："请韩营长放宽心，我已在安顺场通往冕宁的大道上，配备了十余个哨所，共军远来道路不熟，只要远远发现共军，哨兵会由捷径向我飞报。到时候，我慢慢收拾过河都不会误事。"

殊不知红军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杨学瑞回忆道：

从战后拾得红军行进路线略图来看，沿途大小路径里程多少，村落所在，居民多少，注解得非常准确，好像未来以前，即派有人实地勘察过一样。同时红军一到，即得到汉、彝人民热情支援，担任向导，尤其是反动统治者一贯认为"不可理喻"的彝人，都能和红军打成一片，更是韩、赖等预料所不及。因之红军先头部队完全越过赖执中所安设的哨所，神不知鬼不觉地于五月二十五日拂晓进入了安顺场。赖执中此时还高卧未起，直到红军把他的公馆——也是他的营部门口的卫兵缴械，赖才由梦中惊醒翻墙逃走。他翻墙时把脚跌伤，由其卫士把他背往彝区隐匿起来。此时北岸韩营还不知道对岸情况。

战斗打响时，川军一个班的守船士兵正在河边碉楼赌钱、喝酒，听到枪声后慌忙押起船工向对岸逃跑。恰好这时，红2连指导员黄守义带着战士沿河搜寻渡船，发现水面上有黑点移动，又隐隐约约听到划水声，忙追上去，但发现船已离岸十几米远了。

黄守义立即命令战士用机枪向空中打了一排子弹，跳入河中奋不顾身地冲向船只。逃跑的川军怕死，乖乖地将船划回来了。

时任红1团第1营营长的孙继先回忆道：

别看这么一只平常的船，得来可实在不容易……要是我们的动作再晚几分钟，船划过中流就不好办了。据俘虏说，所有的民船都拢到对岸去了，这是南岸仅有的一只船，只为听说红军要来，因此五天中只有一天停在这里。今天正遇上我们，可算巧极了。

按照计划，红军夺得渡船以后就立即渡河，当地的老百姓劝阻道："大渡河急漩涡很多，河底尽是暗礁，对岸又是峭壁，晚上万万不能过河，要过河必须在晴朗的白天，把船拉到上游渡口，让当地水性好的船工帮忙，才能把船划到对岸。"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

只见河面上雾蒙蒙的，大约有300多米宽，水流湍急，涌起的漩涡一个接一个，在此架设浮桥根本没有可能，游过去更不可能。河心里还有几块礁石，急浪撞在上面，激起很高的浪花，刹是惊人。

对岸是几十米高的峭壁。石壁被劈开，用石块砌成一条孔道，这便是渡口。有一条立陡的台阶直通上去，阶梯约有一间房子那么宽，共40多级，每层有二尺高、一尺宽。

阶梯的顶端，有3个独立房屋，四周是半人高的围墙，4个碉堡俯视着整个河面和台阶，周围满布着散兵壕。韩槐堦营就据守在这里。

为确保渡河战斗成功，孙继先亲自挑选了17名官兵组成渡河突击队，由4名当地船工摆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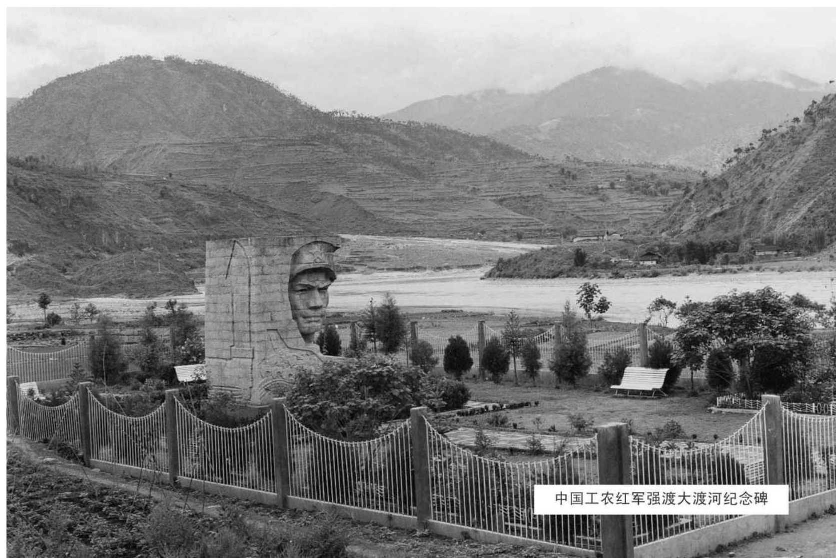
共和国的历史上永远记下了这17位勇士的名字：

2连连长熊尚林，2排排长曾会明，3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4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4名船工是：帅士高、王有能、简成荣、郑本源。

在熊连长的带领下，勇士们每人领取了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和8颗手榴弹，这是他们能够拥有的最强火力了。

红1团则把6挺重机枪全部集中在了渡口旁的突出部，把其他武器都集中起来做好火力掩护准备。军团炮兵连也在神炮手赵章成的带领下赶来助战，不过遗憾的是炮弹太少，总共只有4发。但这几发炮弹，关键时候起了大作用。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

7时许，强渡开始。

嘹亮的冲锋号中，木船离开岸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岸上红军轻重机枪火力一齐向对岸川军进行压制射击。川军也不甘示弱，拼命还击。

小木船在急流和弹雨中艰难前行。眼见船一头撞向河中的礁石，经验丰富的船工跳下水，脚踏礁石背靠船帮，用力将船推进水里，在颠簸中继续前行。

岸上的刘伯承心急如焚，大声命令重机枪手李德才封锁川军的火力点，命令炮手轰击川军的碉堡。

李德才轮换着使用两挺重机枪扫射着敌人，赵章成的迫击炮也准确地掀翻了川军的两个碉堡。川军的火力顿时弱了下来，河中央的勇士们拿起了船桨和木板拼命划船，木船又开始向对岸移动。

木船被激流冲向下游数百米处靠了岸。熊尚林带领战士们跳下船，淌着齐腰深的河水，向岸上冲去。

川军慌手慌脚地把滚雷和手榴弹乱扔下来。但渡口很陡，台阶又高，正好成了红军战士们隐蔽的死角。敌人的滚雷、手榴弹从战士们的头上、身旁滚过，在岸边爆炸。

就在突击队快要接近碉堡时，从北岸小村庄阻击工事中拥出200

多名敌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顺着山坡上的小路冲下来。

情况万分危急，刘伯承和聂荣臻不约而同地冲着赵章成和李德才大喊道：“打，打，快打呀!”

“轰……轰……”两颗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不偏不倚正中敌军中心。同时，机枪子弹如同雨点般射向敌阵。

敌军乱作一团，四散奔逃。十七勇士迅速冲进碉堡，控制了主要工事。

这时，孙继才亲自带领2连2班的8名战士作为第二梯队乘船登上对岸，会同十七勇士牢牢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趁势发起攻击，一举击溃了韩营，巩固了渡河点。

大渡河北岸全是横断山脉，沿岸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右翼韩营一溃，第7团全线动摇，沿河岸羊肠小道三三两两向下游逃窜，有的气喘吁吁，折臂跛腿，有的歪戴帽，横挂枪，骂声不绝，一概不听制止。甚至连尚未参加战斗的预备队，也伙同第7团溃兵向下游逃跑，第5旅随之兵败如山倒。

蒋介石精心构筑的大渡河防线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为纪念此次战斗，1983年5月，当地人民政府在安顺场大渡河畔修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

飞夺泸定桥

【交战时间】1935年5月24～25日

【交战双方】红2师第4团；国民党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

【指挥将领】王开湘、杨成武；李全山、袁国瑞

【战果】红军击溃国民党川军2个营，夺占泸定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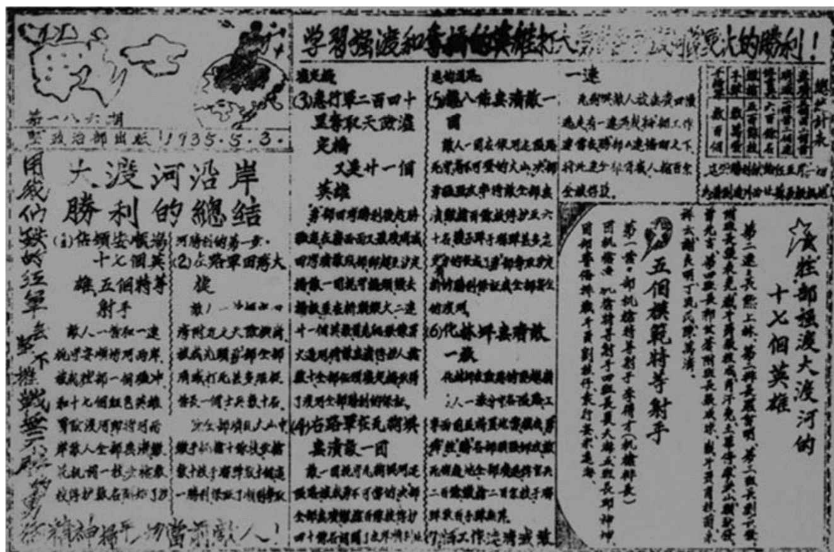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形势依旧万分险恶。

安顺场渡口水流湍急，无法架桥。红军仅找到4只小船，1条船一次仅能运送30人左右，往返一次需要近一个小时。如果将全军2万余人渡过河去，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而此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第53师已经到达西昌北部，正向安顺场疾进；川军杨森的第20军等部离安顺场也只有不到5天的路程。

前有大渡河拦路，后有敌军重兵尾追，红军若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渡过大渡河，就极有可能成为“石达开第二”。红军必须渡河，一刻也不能耽误。

在奔腾汹涌的大渡河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红1军团第2师和红5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南岸前进，突袭夺取距安顺场320多里的泸定桥。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过河后组成右路纵队，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北岸向泸定方向前进，以接应从泸定桥渡河的红军主力；其他部队和中央纵队随左纵队前进，从泸定桥过河。

泸定桥位于泸定城西，是来往川康的咽喉要道。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为打通北京至成都、成都至拉萨通道，清廷下令在大渡河上架桥。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碗口粗细的铁索组成，其中9根为桥面，4根为扶手，桥面上铺有木板，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报道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油印报

泸定桥是大渡河的唯一交通枢纽，也是中央红军北上的必经之地。

26日，中革军委下发了一道破釜沉舟的命令：

A.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有三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遏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率一军团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循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C.一军团之第一师应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日由安靖坝先后经瓦狗坝、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二十七日于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

D.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已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五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瓦沟之线。

E.三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者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足五天粮米。

F.第五团仍留大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二十八日向海棠、洗马姑转移。

G.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

H.军委明天集中安顺场。



大渡河畔的泸定桥

面对变幻莫测的前景，毛泽东提出，若泸定桥不能过河，刘伯承和聂荣臻将单独率领部队，“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到四川去搞个局面”，看似简单一句话，却道出了当时红军的极端凶险处境。

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兼第24军军长刘文辉获知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叫苦不迭，生怕蒋介石治罪，急令袁国瑞率第4旅火速增援泸定桥。

袁国瑞不敢怠慢，立即率部队出发。当行进至达龙八铺附近时，

获知红军正夹江而上，遂命李全山的第38团沿大渡河南岸抢占泸定桥，阻止北岸红军主力过河；以杨开诚的第11团沿北岸向下游摆开阵势，阻止在安顺场过河后沿岸溯流而上的红军；第10团谢康洪部为预备队；旅部进驻龙八铺。李全山派周桂三营由冷碛跑步增援泸定桥。

就这样，敌我两军开始与时间赛跑，目标指向同一个地点——泸定桥。谁先到泸定桥，谁就将取得战场先机。

28日傍晚，周桂三营先遣队20余人赶到泸定桥，将所携带的全团连以上旗帜插遍全城，虚张声势，同时动手拆除泸定桥的桥板，构筑工事。

时天降大雨，又是晚间，敌军官兵早已疲劳不堪，加上鸦片烟瘾又犯了，拆除桥板进度极为缓慢。

此时，周桂三率营主力正在泥泞道路上沿河北上，突然发现对岸也有部队打着火把疾进。黑夜中的大渡河，竟有两支部队在南北两岸同时出现，像两条火龙齐头并进。

周桂三急忙令手下人询问，并用军号联络，对方回答是退下来的友军。周营长这才放下心，继续前进。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对岸部队正是红军右路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

红4团是在27日6时由安顺场出发的。路上，有的是绝壁上硬凿出的栈道，有的是蜿蜒缠绕、忽起忽伏的羊肠小道，路边就是汹涌澎湃的大渡河，令人心惊目眩，随时有失足落入万丈深渊的危险。

走了大约30里，河对岸敌军发现了红4团，便开枪射击。为避免无谓伤亡，红4团决定绕路爬山。这一下绕出10里路，花费了不少时间。

又走了约60里，红4团先头连与川军一个连遭遇。这个连正在此搜集粮食运往北岸。先头连一个猛冲，川军稍做抵抗就败退下来。

下午时分，红4团来到了菩萨岗。这是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是从大渡河西岸由安顺场去往泸定桥的必经之地，敌军1个营在此驻守。

团长王开湘和政治委员杨成武侦察地形后发现，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像座天梯，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右边靠河，无路可绕。左面也是凌空直立的悬崖，崖顶连接着更高的山峰。

为了抢时间，王开湘和杨成武决定强攻菩萨岗。由于山口正面和右面难以攻取，二人商议采取爬上左面悬崖抄川军侧背的方法，从后

面袭取隘口。令3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带一个连从左边迂回，其他两个连则从正面佯攻。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红军全歼守军，俘虏200多人，缴获枪支100余支、机枪10多挺，大大增强了红4团的火力。

当晚，红4团在距菩萨岗北面10里的什月坪宿营。一天下来，红4团只走了80多里路。

次日拂晓，红4团刚刚启程，就收到军团长林彪写的一份十万火急命令。

王、杨：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第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王开湘、杨成武看后，都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因为此时红4团距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要在一天内走完平时两三天的路，而且途中还有敌人的堵截，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时间已不允许他们多想，立即下令全团加速跑步前进，同时传达命令：一定要在明天6点前赶到泸定桥。

猛虎岗是一座上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面是更高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咽喉，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川军扼守。红4团赶到时，大雾弥漫，川军在工事里恐慌盲目地向外放着乱枪。

红4团军立即发起攻击，先头营利用大雾掩护迅速抵近防御工事，然后就用刺刀、手榴弹攻击敌军。没费多大力气，敌军开始向后溃逃。红军战士们猛打猛冲，一直追到一个叫摩西面的村落。先前溃逃的敌军和原在此防守的敌军会合成两个营的兵力，企图进行阻击。

但他们哪里是红军的对手，没多大工夫便被冲得七零八落，抱头鼠窜。敌人在溃逃时将村东河上的大桥破坏，红军不得不重新架桥，耽误了两小时。等赶到大渡河岸一个约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时，已是傍晚7点了。杨成武估算，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110里。

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但因对岸有敌情，不能点火照明，部队只得摸黑前行，速度明显慢了下来。突然大雨倾盆而至，山路湿滑泥

泞，一脚踏空就会掉下深渊，简直是寸步难行。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每个人的体力都透支到了极限，一旦倒下就可能再也爬不起来。

坚强的意志支撑着英勇的红军将士。在黑暗的大雨中，他们相互搀扶，坚持前进，饿了嚼口生米，渴了喝口雨水……

尽管战士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雨也渐渐停了下来，但王开湘和杨成武仍是万分着急，照这样的速度，部队天亮时肯定无法到达泸定桥。

忽然，河对岸山坳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经辨认原来是增援泸定桥川军在点着火把赶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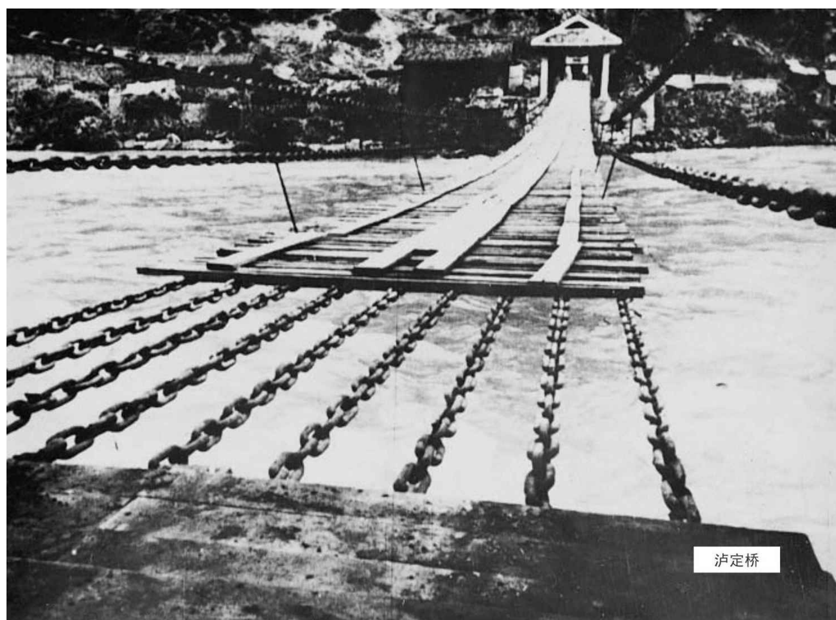
王开湘和杨成武急中生智，命令部队也打起火把赶路，如果对岸联络，就利用被消灭和打垮的川军番号伪装自己，欺骗对方。

就这样，红军和川军在黑夜中的大渡河两岸一道走了二三十里。雨又下了起来。深夜时分，对岸川军那条火龙不见了。红军司号员赶紧吹号询问，得知川军忍受不住大雨和劳累，就地宿营了。

红4团官兵极为高兴，一个跟着一个拼命向前赶路。历经千难万险，在东方微微发白时，红4团赶到了泸定桥，很快消灭了桥西还在睡梦中的川军自卫队，占领西桥头和沿岸阵地。

聂荣臻回忆道：

他们以急行军的最大速度，二十七日晨从安顺场出发，还要一边走，一边消灭路途上碰到的敌人，真是行走如飞。他们在路上接二连三地打了几次胜仗，俘虏了敌人的营长、连长等数百人，日夜兼程，冒着大雨，黑夜点起火把，第二天用的是“一天二百四十里”的速度，于二十九日早晨六时，抵达泸定桥西岸。



泸定桥

与此同时，李全山率李昭营也赶到了泸定桥，命先期到达的周桂三营以守桥为主要任务，李昭营位于周桂三营左翼阵地。

天渐渐亮了，杨成武放眼望去，只见铁索桥东端便是泸定城。城的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近10米，西城门正堵在桥头，过桥后必须通过城门才能进城，别无他路。敌军已在东桥头构筑了工事，架着轻重机枪，并把靠近东岸的桥板拆掉，剩下空荡荡的铁索，桥下奔涌着激流令人毛骨悚然。

许多年后，杨成武回忆道：

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敌军凭据天险，自然不把红军放在眼里，一面向河对岸胡乱射击，一面挑衅地叫喊着：“共军弟兄们，你们飞过来吧！”



飞夺泸定桥

王开湘和杨成武制订了夺桥方案：2营和3营负责火力掩护，特别是阻击增援之敌；1营分三个梯队实施正面进攻，以2连为主挑选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连长廖大珠任突击队长；3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锋，担任铺桥面任务；1连为三梯队，随3连发起最后冲锋。

下午4时，22名突击队员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敌军密集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对岸冲击。

霎时间，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惊心动魄的夺桥战斗打响了。

多年后，杨成武对当年的战斗场景记忆犹新：

当事先准备好的全团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冲锋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川军开火，枪弹像旋风般刮向川军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拍岸，山摇地动。这时，二十二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员，包括从3连调来的支部书记刘金山、刘梓华……他们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同志的率领下，冒着对岸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索向对岸冲去。

当突击队刚刚接近桥头时，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火光照红

了半边天，映红了陡壁万仞、波涛汹涌的峡谷。原来，敌军想用大火阻止红军。

突击队勇敢地穿过火墙，冲进泸定城，同敌军展开巷战。

敌军集中全力进行反扑，突击队员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紧要关头，3连连长王有才带领第二梯队及时赶到，后续部队也不顾一切地冲过桥去!

守军渐渐不支，李全山忙召集周、李两个营长研究对策，并在电话上向旅长袁国瑞请示怎么办，说泸定城已很难防守。

此时，驻守龙八铺的第4旅旅部正遭到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1师和干部团的猛烈攻击，袁国瑞自顾不暇，只答复“我们这里也很紧张”，就挂断了电话。

李全山惊慌失措，认为既然龙八铺的情况不妙，红军夹江而上，自己腹背受敌，决难久持，遂率残部退守天全。

经两个小时的激战，红4团占领了泸定城，俘虏敌人百余名。傍晚时分，红1师和干部团在击溃袁国瑞部后胜利到达泸定桥边，协助红4团在桥上铺设门板。

深夜，刘伯承和聂荣臻率红3团冒雨从大渡河东岸赶到泸定城。二人不顾鞍马劳顿，坚持要去看看泸定桥是否已被敌人破坏，大部队还能不能从桥上通过。

杨成武提着马灯，陪着二人从桥东走到桥西，又从桥西走到桥东。刘伯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

当他走回到桥中央的时候，停住脚步，抚摸着铁索，俯视着大渡河里咆哮翻滚的激流，用力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道：“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6月2日，中革军委在泸定桥头召开庆功大会。周恩来为红4团颁发了写有“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的锦旗，为夺桥的22名勇士发了奖。

奖品是：写着“中革军委奖”的列宁服一套、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这是当时中央红军官兵中所能得到的最高物质奖励。

“泸定桥二十二名勇士”的大部分姓名已经无从查考，在《中国工

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留有姓名的仅有5人：红1军团2师4团2连连长廖大珠、政治指导员王海云、党支部书记李友林，3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副班长刘梓华。

随后，中央红军主力浩浩荡荡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蒋介石南攻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和他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宣告彻底破产。

当时有人撰文断言：“自朱毛西窜，曾渡贡水、章水、来水、潇水、湘水、清江河、乌江河、赤水河、白层河、黄泥河、金沙江，然无有过大渡河之奇妙者。洪杨之役，翼王石达开西行至此，天有意绝洪杨之运于此。今朱毛至此，安全通过，此天有意保留朱毛残部，不欲根绝，必有好戏在后面。”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有人所评说的：红军在此夺取的不仅仅是光溜溜的13根铁索，而是夺取了整整一个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们曾用电影、电视、歌曲、舞蹈、小说、诗歌等不同形式的作品，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浓墨重彩地描绘。

包座战斗

【交战时间】1935年8月29～31日

【交战双方】红30军；国民党军第49师

【指挥将领】程世才、李先念；胡宗南、伍诚仁

【战果】红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大部约5000人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根据全国形势和当时情况，中共中央提出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主张继续向青海、新疆或西康等偏远地区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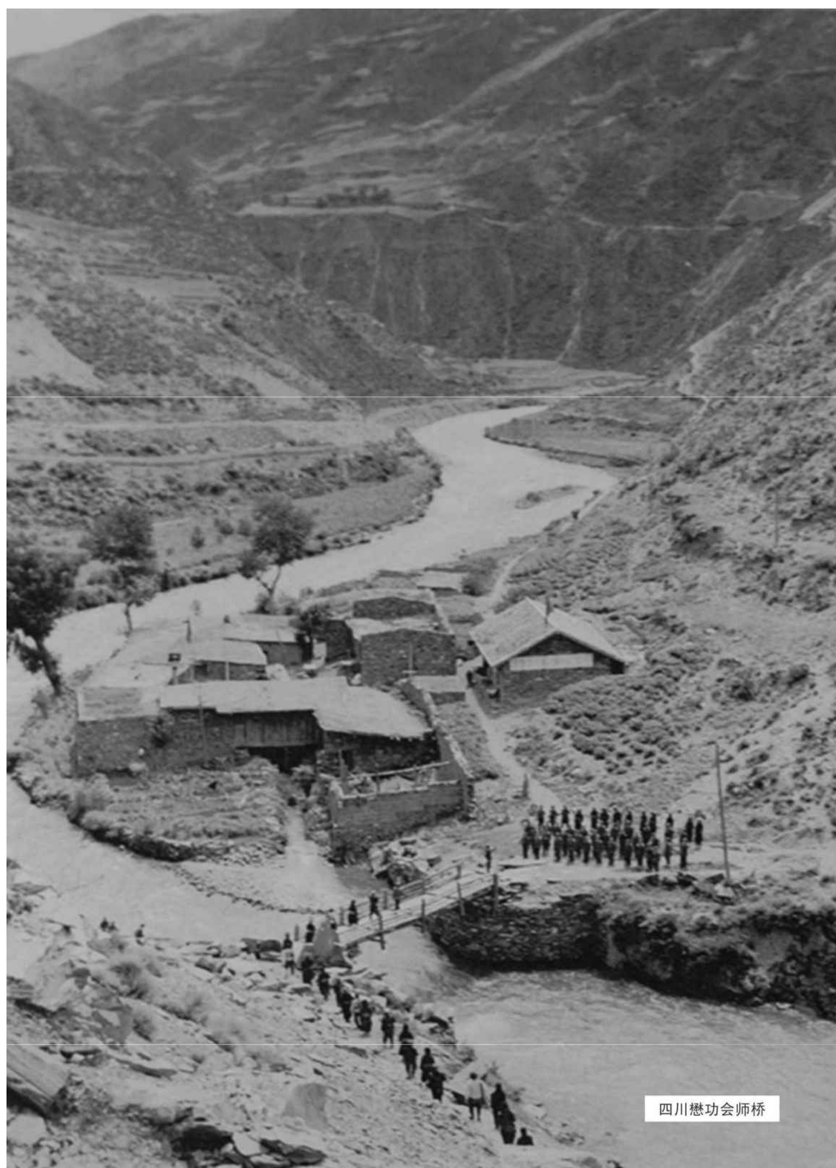
为统一战略思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据此，中革军委制订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

7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另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改编为第1、第3、第5、第32军，与红四方面军互相协同，迅速夺取松潘，以利向北作战。

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成都召集薛岳所部师长以上将领开会，讨论新的“围剿”作战部署。



四川懋功会师桥

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迭经多次追堵围攻，总兵力不过6万人，而分据千余里山岳地区，东扼岷江，西迄丹巴，北至松潘、叠溪，南至懋功，处处布防，处处薄弱。且川康边陲地区内多是游牧为生的番民，宗教迷信浓厚，不事耕种，粮食只有玉米、高粱、青稞，加之气候奇寒，夹金山以北有终年不化之雪山，松潘草

地乃北面天然地障。红军在此地区生根不易，困守殊难，必将转移。

根据情报：红军先头部队已抵毛儿盖，其主力有向西北运动的迹象。他判断红军突围路线只能有两条：一条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但综合全局情况看，走第一条路线的可能性更大，因在甘陕边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的红25军有进出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的迹象。

进入7月下旬，红军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徐海东部撤出凤县、两当游击区，直趋甘南。同时，在绥靖的杨森部也报来情报，会合后的红一、红四方面军正纷纷备粮，北上的态势已经了然。为此，蒋介石接受杨永泰等人的建议，紧急调大军入甘陕。

首先，他调第七路军毛维寿率由第十九路军改编的第49师伍诚仁部、第60师陈沛部、第61师杨步飞部，分别从皖南、开封、保定会集甘肃，归朱绍良指挥。当这几个师进抵甘肃后，即免去毛维寿之职，统统拨归胡宗南指挥，南调至松潘担任堵截。另从河北调第2师补充旅钟松部，江西调第1补充旅王耀武部至甘肃，也悉数拨入胡宗南部，组成第三路军第2纵队。至8月上旬，这些新调西北的部队除第61师、第1补充旅在途中尚未到达外，其余均到达松潘上下包座地区，连同第1师，共约18个团4万余人，合编为“西北追剿纵队”，以胡宗南为纵队总指挥，归入薛岳的第二路军序列，部署在松潘、漳腊方向防堵。

这一部署透出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薛岳在川甘边的堵截兵力相当于13个师10余万人，几乎是当时蒋介石能调动的所有中央军，部队中的各级主官十有八九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且武器装备均属一流。

其次，他从豫皖边调第3军王均部到甘肃以保兰州安全，并于7月底在洮河两岸的和政、临洮、渭源、陇西、武山、天水之线构筑第二封锁线。

此外，他还从江西调第37军毛炳文部到甘肃会宁、华家岭、静宁、隆德地区构筑第三道封锁线。

至8月中旬，他又调东北军张学良所部骑兵军何柱国师进驻平凉，第51军于学忠部进至甘肃天水，一部挺进兰州；其余第57军董英斌部、第67军王以哲部已进入陕西，一部进至平凉、固原地区作最后堵截准备。最后，他还电令宁夏马鸿逵第15路军派兵进出固原及甘陕边之环县布防。



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一部

这样，部署于甘陕地区的总兵力达8个军计30万人之多，加上川康地区的30万人马，追堵总兵力达60万之巨！

同时加紧经济封锁，规定了两项禁令：一是前线军民有偷运粮食到红区者处死刑；二是藏民有参加红军及供乌拉者以“通敌罪”论处。蒋介石把他的家底统统拉到西北，暗想：“如此强大的围剿兵力，加上地利条件，只要南追北堵，集中主力封锁，共匪必将插翅难逃。”

胡宗南率纵队主力集结松潘后，即按照蒋介石、薛岳的命令，展开堵截部署，具体为：

以第49师为先锋，抢占毛儿盖地区，继向包座开进，试图迫使红军转向东南；以第60师布置于漳腊附近堵截，阻止红军北进；以第61师控制松潘南之西宁关；以第1师主力布置于松潘西南，先头进至日则寺草地边缘，准备正面堵击。当时第1补充旅王耀武部尚未到达，留第2师补充旅钟松部在城厢附近，东与吴奇伟纵队第4军联系。

胡宗南的这一部署主要在于迫使万里迢迢且精疲力竭的红军，在无法通过渺无人烟、空气稀薄的松潘草地时，进入他的预定包围圈，达一举全歼之效。

可是，想法虽好，事实却不如人愿。

7月上旬，正在推进途中的胡宗南接到进至毛儿盖的第1师加强营李日基部急电，说他们正与红军激战，对方火力十分强猛。

胡宗南余悸犹在，连忙发电：电到后该营即刻撤回并将电台砸毁；回来士兵一人赏洋10元，带回武器一支赏洋20元。

李日基求之不得，将电报译到“并将电台砸毁”，就没往下译，砸了电台撒腿便跑，慌乱之态可想而知。

几天后，先头第4团也发来急电，他们在松潘方向西南30余里处遭到了红军的突袭，第一线阵地随时有被突破的危险。胡宗南又赶忙派部驰援，但援兵赶抵时，红军却结束了他们的攻击行动。第4团死伤300余人。

胡宗南接连吃了两记闷棍，元气大伤，胆子更小。

就在这时，薛岳接杨永泰来电称：据报共军日食野菜，久缺食盐，饥寒交迫，行将瓦解；希转告前线将领最后坚持，“完成八年茹苦含辛，安邦定国之丰功”。

薛岳当即电告胡宗南。胡宗南欣喜若狂：“此乃天助我也，为党国建立殊勋的时刻到了！”



建于四川松潘的红军长征纪念碑

他即把第1师部队全部停留在松潘一线，就地赶筑防御工事，准备和红军决战。因为在他的构想中，红军绝不可能走草地自取灭亡，必取道松潘附近北上甘陕，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然而，事与愿违，胡宗南这一着棋还是失算了。

因为他并不知道，刚刚会师的两大红军主力内部出现了裂痕。张

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公然向党中央争权夺利，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行动，致使红军丧失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

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改道经草地北出甘南，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为继续贯彻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尔后向东发展。其中，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第9、第31、第33军编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第4、第30军编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15日，左路军从卓尔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越过人迹罕至、鸟兽无踪、气候变幻无常的茫茫草地。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记述了红军过草地的艰难情景：

从8月22日起，我们率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辽阔的草原，起伏的山丘，湛蓝的天空，交织成一幅壮丽而神秘的画卷。行进的队伍，逶迤蛇行，忽隐忽现，像是漂泊在浩渺无际的绿色海洋里。

这是军事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同自然界的殊死斗争。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力量的凶猛无情，更表现着具有高度觉悟的人——红军指战员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中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达零度以下，冻得人们瑟瑟发抖，彻夜难眠。

黑色的泥沼，被深草覆盖着，一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里面，就会被吞没。水塘不少，但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

一方面军的部队减员尤多。因为他们长途转战，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经不起恶劣环境的折腾。为减少死亡和发病率，党中央、前敌指挥部和各军领导同志，想了些办法。如令前锋部队在沿途标上安全路标，指示道路；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个人不要乱挖乱

吃；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供宰杀食用；夜间组织联欢会，大家围坐在一起，边活跃情绪，边取暖御寒；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团结友爱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准丢弃伤病员，从绝境中求胜利；等等。“人定胜天”。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觉悟和坚强毅力，我军终于通过了人迹罕至的大草原。由此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确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难不倒的英雄队伍。这样的队伍，是永远不可被战胜的。

草地行军的艰苦丝毫没有减低红军指战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到休息点或宿营地，大家照样开展文娱活动，唱歌，朗诵，做游戏，讲故事，说笑话。有的人一边行军，一边编顺口溜，抒发豪迈的气概：

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

天上无飞鸟，地上无人烟，茫茫草原，蓝蓝的天，只有红军亲眼见；

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

翻雪山，过草地，锻炼红军真本事；

同志们鼓足劲，前面就是宿营地；

……

经过近一周的艰苦行军，至8月底，右路军终于走出被视为生命禁区的茫茫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接到情报后，胡宗南顿时惊呆了。

上下包座位于四川省松潘县的北部，距离巴西、班佑100多里，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流域，在今若尔盖县东南端。“包座”藏语意为枪筒，因地形得名。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包座河纵贯其间，松（潘）甘（肃）古道蜿蜒于包座河沿岸，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包座河水深流急，两岸石崖陡峭，地形十分险要，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

胡宗南部进占松潘后，松甘古道成为其运粮的主要通道。为此，他命令补充旅第2团约2400人进驻包座，另以张孝莱支队约300多人协同前往。

第2团团长康庄派3营驻守上包座大戒寺及其附近山头阵地，团部和1营、2营驻守下包座求吉寺（救济寺），张孝莱支队驻守下包座附近的阿西茸。守军利用山险隘路，修筑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

区。

在得悉红军北上的消息后，胡宗南深恐包座有失，急调伍诚仁的第49师驰援，企图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击红军。

攻占包座，开辟北上前进通路，成为红军右路军的当务之急，否则就有被逼回草地的危险。

据此，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赶在国民党军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攻取上下包座，然后集中兵力打援。具体部署是：

红30军第89师第264团攻击大戒寺之敌；红30军第88师2个团和第89师另2个团位于上包座西北丛林中，准备歼灭伍诚仁第49师；红4军第10师攻击求吉寺之敌，主力控制各要道，并随时准备出击，消灭来犯之敌。红1军主力作为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待机，并负责保护中共中央的安全。

8月29日傍晚，红264团突然向大戒寺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进攻。红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和第89师师长邵烈坤在包座河西岸边指挥战斗。

战斗打得非常艰难，敌人凭借险要地势和强大火力，固守待援。激战一夜，红264团歼灭守军2个连，击毙少校营长陈嘘云以下数十人，残部逃至大戒寺后山碉堡继续顽抗。

30日上午，红军除以少量兵力继续包围监视包座守敌外，将红88师和红89师主力埋伏在第49师必经之路的西南山上，并派1个连控制了东山制高点。这座险峻的山冈，西可俯视来援之敌，北可对包座之敌形成包围。

是夜，第49师先头团抵大戒寺南。红军略作抵抗后，主动后撤，诱其深入。

31日，第49师主力向包座地区大举开进。

起初，伍诚仁十分狡猾，不肯轻易冒进，只以一部兵力搜索前进，待与红军接触，经过局部战斗，夺取有利地形后，才命令主力前进。

程世才和李先念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命令主力部队隐蔽好，只以正面的红263团一部在一些非重点防御的小山头上抗击，给敌以大量杀伤后就节节撤退，诱敌进入埋伏圈。同时命令红264团加强对大戒寺的围攻。

很快，大戒寺国民党守军团长康庄急呼第49师迅速来援。胡宗南

也严令第49师火速增援，务必于当晚进驻包座。

这下，伍诚仁不敢怠慢，命令包座河东岸的第294团（缺第3营）和包座河西岸的第291团附第294团第3营，夹河并进，向北攻击；河西岸的第289团在第291团以南向西北方面警戒，掩护师之侧背，师部进到大戒寺以南。第49师排成5路纵队，向包座方向蜂拥疾进，加快了行动。

下午3时，红军各部按部署一齐向进入包围圈的第49师发起全面攻击。

红268团首先来了一个“中心开花”，从正面插入河西岸敌军南北两团接合部，并以一部夺取包座桥，切断了东西两岸敌军联系，将敌军一下子分割为三部分。

为打通联系，敌军疯狂地向红268团反扑。

红268团两面对阵，连续打垮了敌人数次冲击，战斗异常激烈。一时间，包座河两岸，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连续猛烈突击。第49师渐渐不支，遂向沿岸森林退缩。

激战至当晚，红军将第49师大部歼灭。程世才在回忆文章中生动地描述了包座战斗的激烈场面：

在总的地势上，我们是居高临下，但敌人是纵深配置，并占据着许多小山头。尤其是漫山遍野都是大桦树和灌木丛，敌人运动兵力我们看不到。我军冲到哪里，那里的敌人就利用树林、山包或河坎作掩护，拼命地守卫，拼命地反击。我们把军部的几门迫击炮用来支援八十八师，用仅有的几十发炮弹轰击敌人集群。战士们用手榴弹、刺刀和大刀片同敌人厮杀。有的马尾手榴弹挂在树上，杀伤不了敌人，战士们就端着刺刀或挥着大刀片扑上去。前边的倒下了，后边的又冲上去，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一个山头也要经过几次争夺，敌人抢占了，我们就再把它夺回来。有一位烈士，一只胳膊打断了，另一只手里还紧紧握着大刀片，这种情景是多么令人感慨啊！他们在草地上吃的是野菜、树皮，为人民贡献出的是宝贵的生命和鲜血!

师、团掌握的所有预备队及其机关和军的通信连、警卫连、保卫排等都投入了战斗；军部的机关干部、宣传队员以及有的炊事员和饲养员，也都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师、团指挥员都在第一线，我们军的几个领导同志也都到了前边。

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七八个小时。我军终于把截成三段的敌人，一段段啃掉了。敌师长伍诚仁胳膊打断，被我军俘虏。战士们押着他来

见郑维山政委。这个刚才还神气十足的敌师长，现在却吊着个受伤的胳膊，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郑维山同志报告了我，并派人把他押来军部。但后来由于天黑下大雨，伍诚仁乘着战场混乱跳河跑了。敌人的一个团长和副团长也做了俘虏。

得知第49师在包座被围，胡宗南急得在屋里团团转，对参谋长于达说："派部队救援吧，不但时间上来不及，徒劳无益，而且怕在半途被共军拦路吃掉；不去吧，又恐校长责怪我坐视部队受危不救。"

苦思冥想了一晚上，他才决定派第1旅旅长李铁军率所属3个团前去救援。



包座战斗遗址

不巧的是，部队出发后不久，就遇上了坏天气。大雨倾盆而下，草地上烂泥成浆，第1旅可吃尽了苦头，根本不是在走，而是在"滚"，官兵个个浑身泥污，有的丢了帽子光着头，有的走烂了鞋子光着脚，简直成了一支乞丐大军。足足"滚"了两天，才走了百余里路，不足一半行程。

这时，包座方向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第49师已被红军击溃，装备也损失殆尽。

胡宗南生怕第1旅中途遇袭，急电李铁军："49师在毛儿盖全部被红军缴械，该旅严加警戒，并限星夜赶回松潘原住地待命。"

李铁军自然不敢稍迟，当即率部返回松潘。

伍诚仁真的是"无成仁"，侥幸从红军包围中只身脱逃出来。在松

潘，他对李铁军谈及和红军的作战经过，仍是谈虎色变，惊魂未定。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会通过几百里荒无人烟的草地，更没有想到红军在包座击溃第49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震怒之下，分电薛岳、胡宗南将伍诚仁撤职查办，遗缺由副师长李及兰升代。同时又致电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令鲁大昌率新编第14师扼守岷县及腊子口，另电令王均率第3军在岷县及天水、武山地区利用已构筑之工事布置堵截。

围歼国民党第49师的战斗即将结束时，李先念命令预备队第269团主力直插大戒寺，协同第264团消灭包座守敌。

战至次日2时，红军歼灭了2个多连的敌人，攻占了大戒寺的北山，并从西南面攻入寺内。国民党守军抵挡不住，便放火焚烧寺内粮库，残部400余人趁着大雾从东南方向逃往南坪。困守大戒寺后山高地的200余人，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投降。红军占领上包座。

包座战斗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中革军委指挥下的第一次战斗。此役，红军共毙伤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以及大批粮食、牛羊，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腊子口战斗

【交战时间】1935年8月29～31日

【交战双方】红军陕甘支队第4团；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第6团

【指挥将领】王开湘、杨成武；鲁大昌

【战果】红军击溃国民党军1个团，夺占腊子口

1935年8月的最后一天，由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取得包座战斗胜利，打开了北进甘南的道路。

此时，由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第9、第31、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下，进至阿坝地区。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抓住甘南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迅速北上，执行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

然而，张国焘制造种种借口，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命令已进至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随后又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的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并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于9月10日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第1、第3军和中央直属队一部先行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两天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迭部县的俄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坚持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

为便于指挥，会议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3个纵队：红1军团编为第1纵队，红2军团编为第2纵队，军委直



腊子口战斗旧址

属纵队和干部团编为第3纵队，全军共7000余人。

13日，陕甘支队从俄界出发，沿白龙江东岸，爬高山，穿密林，继续北上。

这时，甘肃军阀、土匪出身的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接

到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电报：

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匪先头部队已由松潘以北毛儿盖进入草地，有经甘南藏区向洮岷北上企图。除夏河、洮岷地区部队密警戒外，由贵师速调集兵力进驻腊子口附近构筑工事固守，并相机截击。另派唐淮源第十二师前来岷县支援。

16日，先头部队红4团击溃鲁大昌部第6团的阻截，于当日下午逼近岷山脚下的甘南要隘腊子口。

“腊子”为藏语，意思是高山谷口。腊子口宽约30米，两面悬崖峭壁高达500米，仿佛是一把巨斧把一座山从中劈作两半。中间是腊子沟，腊子河由北向南咆哮奔腾而过，水深虽不没顶，却很难徒涉。河上横架着一座小木桥，把两边绝壁连接起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如此险要的地形，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故称“天险”。

驻守腊子口的是鲁大昌部两个营的兵力。守敌在山坡上修建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个连驻守，内设4挺重机枪，并囤积了大批粮食弹药。从腊子口往里，直到岷县，鲁大昌纵深配置了4个团的兵力。同时，岷县县城的国民党部队还可随时增援腊子口守军。

在鲁大昌看来，腊子口这道天险绝对可以阻断红军北上道路，红军就是长上翅膀也飞不过去。

中央為貫徹戰略方針再致張国燾令其即行北上電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

国燾同志：

一、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国燾政委立刻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

二、中央已決定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並已令一三軍在羅達鵝界集中。

三、左路立即答覆左路軍北上具体部署。

中央 十一日

中共中央反对张国焘南下方针，主张北上的部分电文



被红军打烂的腊子口敌军碉堡

的确，形势对红军极其险恶。拿不下腊子口，红军就要被迫掉头南下，重回草地。或者是西进绕道出青海，东进川北取道三国时孔明六出祁山的旧地——汉中，但无论哪种方案都会踏进国民党军早已布下重兵的口袋，对红军极为不利。正如聂荣臻所说的：“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是军事上政治上，都

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16日，毛泽东、林彪、聂荣臻联合署名，电告彭德怀。电报开头说：“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彭德怀等人冒雨赶到红2师，带上师长陈光、政委萧华连同红4团干部，一边看地形，一边研究打腊子口的部署。

下午4时，红4团先头营求胜心切，率先向守军发起了攻击。由于是白天，周围都是石山，战士们无法隐蔽，连续进攻十几次，被守军猛烈的火力挡了回来。

躲在碉堡里的敌人狂妄地叫嚣：“你们就是打到明年今天，也别想通过我们鲁司令的防区腊子口。”

强攻不成，只能智取。

红2师第4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利用战斗的间歇，到前沿仔细观察战场地形。通过侦察发现，或许是构筑时间仓促，或者是自恃天险，扼守在要道的敌军碉堡上面竟然没有顶盖。如果距离合适，把手榴弹投进碉堡没有任何障碍。

王开湘和杨成武认为，从侧面迂回是有可能的。因为敌人根本不相信红军能爬上耸入云霄的峭壁，而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正面，两侧几乎没有防守。

但右岸敌军碉堡旁的悬崖峭壁大约有七八十米高，既直又陡，别说爬上去，就是看着也让人头晕。

关键时刻，一个绰号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毛遂自荐，说他能爬上去。这位小战士从贵州苗区入伍，没有名字，参加红军走过了云、贵、川，大家都叫他“云贵川”。他从小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练就了一身攀登陡壁的本领。

王开湘和杨成武立即制订了新的作战方案：由杨成武指挥一个连从正面进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由王开湘率领两个连，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军侧后方，发动突袭，占领隘口。

林彪、聂荣臻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严肃地对杨成武、王开湘说：“事关全军命运，腊子口就是刀山也要拿下来!”



腊子口战斗纪念碑

黄昏前，红4团的绑腿收集到一起，拧成两条长绳，用做爬山的工具。负责打迂回的红军战士们背挎冲锋枪，腰缠十多颗手榴弹，在王开湘的率领下开始渡腊子河。

最初试图徒涉，但下去两个人还没到河心就被激流冲走，只好改用几头骡子来回骑渡。为加快渡河速度，王开湘命令战士们砍倒两棵大树放倒在河上，作为两座独木桥。等两个连全部渡过河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只见“云贵川”赤着脚，腰上缠着用绑腿接成的长绳，手持一根绑上钩子的长杆，用它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两脚用脚趾抠住石缝、石板，一段一段往上爬。这里离守军虽然只有200来米，但石壁向外突出，是敌人观察的死角。

就这样，“云贵川”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像猴子那样攀上险峻高耸的绝壁，然后从上面放下绳索，迂回部队便顺着这条绳索一个一个地攀上去。

在王开湘率领部队渡河、攀登时，杨成武正在对担任正面突击的6连官兵进行紧急动员。

6连所属的2营原是红四方面军第294团，在开辟川陕根据地、进

军川西北中，打过许多胜仗，有着光荣的历史。改编后编入红2师第4团，缩编为第2营，原来的团长张仁初改任营长。

入夜时分，攻击开始，主攻连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向隘口独木桥运动。狡猾的敌军凭借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碉堡以重机枪构筑密集狙击火力，加上从石壁工事投掷的手榴弹形成的巨大火网，致使突击队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

杨成武和张仁初心急如焚：已经打了半夜，再有三四个小时天就亮了。驻岷县的鲁大昌4个团，离腊子口只隔着一座大山。如果再延迟下去，敌人倾巢增援的话，几个小时就可以赶到，局面将更加严重。可是王开湘率领的迂回部队还没有动静。

原来，迂回部队爬到山顶后，找不到道路。1连连长毛振发摸黑探路，不幸摔进一个深坑，头部负伤，最终花了大半宿的时间，才找到一条出击的道路。

此时已是17日凌晨，6连在火线上召集党员会议，决定再接再厉，挑选15名战士组成3个突击小组轮番向桥头发起攻击。就在这时，右岸高峰上突然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紧接着又升起一颗绿色信号弹。这是事先约定的进攻信号。杨成武喜出望外，命令立即发三颗红色信号弹，山上、山下同时吹响了冲锋号。

右面悬崖绝壁上的迂回部队在王开湘指挥下，看准下面敌军没有盖的碉堡和工事，扔下去一颗颗手榴弹。所有的机枪和冲锋枪也一起开火，打的敌军死伤狼藉，四散奔逃。

突击队员趁势冲向独木桥，抡起雪亮的大刀，向敌军猛砍猛杀。刹那间，峡谷中刀光闪闪，鲜血四溅。没多久，就占领独木桥，控制了隘口上的两个碉堡。

总攻部队随即分兵两路，沿着河的两岸向峡谷纵深扩大战果。经过两个小时的冲杀，红军突破了敌军设在腊子口后三角地带的防御体系，占领了几个国民党军的预设阵地和几个堆满弹药、物资的仓库。

敌军退至峡谷后段的第二道险要阵地后，又集结兵力，顽固抵抗，企图固守待援。在红军的猛烈冲击下，敌军一部被歼，残部向岷州方向溃逃。拂晓时分，红4团占领了天险腊子口，并乘胜追击90里。

此役，红军共缴获粮食10万斤，盐2000斤。这对刚刚走出草地、早已断粮多日的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云贵川”为战斗胜利立下了关键功劳。十分可惜的是，在这次战斗中，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只有十六七岁，连真实姓名都没留下。

战后，聂荣臻来到腊子口桥头，面对半尺深的手榴弹破片层，伫立良久，慨然长叹：“关非不险，路非不难，倘若换成红军部队在此防御，纵有10万敌人也难夺取关卡！还是我们红军的部队太勇猛、太机智了！”

许多年后，萧华曾赋诗一首，描述当年红军勇夺天险腊子口的战斗：

峭峰插云一线天，陇蜀千嶂狭道连。

秋风夜雨腊河吼，关险防固敌凶顽。

绝壁岷岩挡不住，神兵飞下万重山。

横打白军葬深谷，征师高歌进甘陕。

吴起镇战斗

【交战时间】1935年10月21日

【交战双方】红军陕甘支队；国民党军第35、第32、第36师各1个骑兵团

【指挥将领】彭德怀；何柱国

【战果】红军击溃国民党军3个骑兵团

1935年9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改称，下辖3个纵队，共7000余人）攻占甘南天险腊子口，继续北进，翻越岷山。

岷山是青海、甘肃、陕西和四川分界的大山，上山下山各50余里。翻过山就是大草滩，红军终于走出了藏族聚居区。

18日，先头部队占领哈达铺。

哈达铺地处岷山东麓丘陵之中，四面丘陵起伏，山势平缓，中间地形狭长，开阔平坦。镇中只有一条小街，两侧大都是青瓦房，街心有一座古老的戏楼和一座小关帝庙。当地物产丰富，盛产药材当归，居民以回民为主，占一半以上。

当时，哈达铺物价十分低廉，一块大洋可以买五只鸡。刚刚经过雪山草地的红军官兵身体都很虚弱，急需营养补充。为迅速恢复体力，全军不论官兵民工，每人都发了一块大洋作为个人津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把改善伙食、加强营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

为联络与地方群众的感情，总政治部还通令各单位，请驻地周围的老百姓一起会餐，同时还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这个守则条款很多也很细，规定红军官兵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不得在回民住家中杀猪、吃猪肉。

于是，各部队都有一桌至两桌的“回民饭”，请当地的回民群众来吃，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会餐的时候，大家伙你劝我，我让你，气氛十分融洽。

19日，聂荣臻和林彪随红2师进驻哈达铺，找到了一张国民党的

《山西日报》，意外发现上面载有一条关于阎锡山的晋绥军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并刊有一张所谓《“匪区”略图》。

聂荣臻兴奋地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参加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部分同志合影

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里召开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到陕北去。自从江西出发后，中央红军长途跋涉2万多里后，终于有了明确的落脚点。参加此次会议的聂荣臻回忆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经过休整的红军热情高涨，斗志昂扬。但形势依旧十分危急。

得知红军突破腊子口、进驻哈达铺后，蒋介石十分震惊，害怕红军东进天水，威逼西安，遂调嫡系主力胡宗南部向天水集结，并以一

部兵力占领渭河附近的武山、漳县两城，防止红军东进。

几天后，蒋介石又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陕甘宁青四省20多万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其中，朱绍良、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第十七路军）在陕甘地区；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马家军”在宁夏、青海和甘肃边境一带；岳井秀、高桂滋等地方武装在陕北地区。

23日，陕甘支队由哈达铺地区出发，以一部兵力东进闾井镇，佯攻天水，以调动敌人向该地集中，主力乘机以急行军突然折向西北，摆脱敌军重兵阻击，顺利地通过了敌武山、漳县间的封锁线，并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渡过渭河，于27日到达榜罗镇。

榜罗镇是通渭县南部的一个集镇，有几百户人家。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正式决定率领陕甘支队迅速北上，同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和徐海东领导的由鄂豫皖苏区长征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合，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28日晨，灰蒙蒙的天空飘着零星小雨。陕甘支队在榜罗镇小学门前的打麦场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榜罗镇会议精神，部署与陕甘苏区红军会合。

次日，部队由榜罗镇出发，继续沿陇东高原北上，并于当天攻占通渭城，消灭国民党军鲁大昌部和保安团300余人。

通渭县位于定西地区东南部，东邻静宁，西接陇西，北靠会宁，南临武山、甘谷等县。城滨渭水支流，以南通渭水而名。通渭是陕甘支队进入甘肃后攻占的第一座县城。在这里，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吟诵了《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为迅速通过西（安）兰（州）公路，陕甘支队兵分三路，平行向静宁县的界石铺前进。



六盘山

10月2日，陕甘支队在静宁以西击溃敌军一部，缴获汽车10余辆，控制了西兰公路东西10余里。次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界石铺。5日，陕甘支队进抵隆德县的单家集，击溃敌军1个营。

挡在红军面前的是海拔3000多米的六盘山。

六盘山，雄踞西北，位于甘肃、陕西和宁夏的交界地带，由此向南逶迤240余公里，为陕北和陇中高原的界山，渭河与泾河的分水岭，素称“河陇之咽喉，关中之项背”。主峰山路曲折险窄，盘旋六道才达顶峰，故名六盘山。

时值深秋，树木落叶，花草凋零。英勇的红军战士一鼓作气攀越六盘山，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已经在望。登上山顶的毛泽东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越过六盘山，红军遇到了一个新的对手——国民党军的骑兵。聂荣臻回忆道：

十月七日，在青石嘴打了一仗，打的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六盘山驻有何柱国的一个骑兵军，驻青石嘴的是它的第七师第十三团的两个连。当时，他们在村里休息，我和林彪、左权在山上拿着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把马鞍子卸在地下在那里休息，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他们跟前。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个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起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



红军骑兵

按照作战部署，红军三个大队如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迅速冲进村子里。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突然杀来，想抵抗已经来不及了。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就宣告结束，红军缴获了300余匹军马、10多辆马车的子弹和军服。原来是国民党“西北剿总”运来的物资。

毛泽东决定利用缴获的战马，组建中央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把原来的侦察连改为骑兵侦察连。被红军俘虏的在国民党军骑兵团中钉马掌、修马鞍的士兵以及马医官、马术教官等，愿留下抗日的，都成了红军战士。第一任骑兵侦察连连长便是日后在朝鲜战场上大显神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军长梁兴初。

19日，这是一个十分晴朗的日子。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军将士们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吴起镇。

进入镇里，红军看见一间窑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顿时百感交集。自离开中央苏区，整整转战了一年多，今天终于到家

了。“长征四老”之一的林伯渠也抑制不住喜悦之情，写下了《初抵吴起镇》一诗：

一年胜利达吴起，陕北风光慰所思。

大好河山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

坚持遵义无穷力，鼓励同仁绝妙诗。

迈步前进爱日永，阳关坦荡已无歧。

然而，刚刚过了两天，敌人的骑兵部队就尾追而来。

自从过了哈达铺，红军为保全和发展力量、迅速北上抗日，一般不与敌人死拼硬打。但进入陕北的黄土高原，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追红军。还有在腊子口交战的败军之将鲁大昌也紧随而来，妄图“报仇雪恨”。蒋介石更是发来密电，称：“朱毛赤匪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命令小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

毛泽东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红军和苏区都极为不利。于是决定“砍尾巴”，给追敌以沉重打击，便电示彭德怀到吴起镇来商量行动方针，同时派聂荣臻去了解敌情。

聂荣臻回忆道：

当天下午我们跑到前边阵地上看了看，看究竟打得赢打不赢。我心想，把敌人带到陕北去也确实不好呀！傍晚回来，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我说：我们应该出击。敌人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别看他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他就不行了。他一定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

20日上午，中革军委召开有各纵队领导参加的军事会议。毛泽东指出：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到陕北，就要和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和从鄂豫皖苏区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合了。现在，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和东北军的何柱国却对我们穷追不舍。我们的到来，把狼也引进边区来了。我们只能给边区人民带来胜利和幸福，一定要狠狠打击这些恶狼，决不能让敌人进入边区。

经研究，会议决定把反击地点选在吴起镇西北方的头道川。

头道川，位于吴起镇东北面约4里，夹在两座山之间，是一条由西向东流向的季节河流冲刷而成的干涸河道。这一带地势平坦，弯弯曲曲，时宽时窄，是一个便于发扬火力、大量杀伤骑兵的好战场。

21日晨，国民党军第35师骑兵团2000多骑兵浩浩荡荡地直奔吴起镇西北部而来。敌人自恃装备精良，一个个趾高气扬、跃马横刀，气焰十分嚣张。

气势汹汹的敌人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已经进入了红军预先设好的伏击圈。随着彭德怀的一声令下，第二纵队在左翼，第一纵队在正面，发起猛烈出击。

红军阵地上的所有轻重武器一起开火，冲在前面的敌军骑兵“扑扑通通”坠落地上，刚才的马嘶人叫刹那间变成阵地前的一片人仰马翻、鬼哭狼嚎。川道上荡起了滚滚黄尘，弥漫了整个战场上空。

只见敌军阵营里人踏人，马撞马，乱作一团。受惊的战马狂奔乱跳，骑兵纷纷被甩落。有的腿还套在马镫里，硬是给惊马拽着飞奔。敌人阵脚大乱，前面的妄图往前冲，被红军拦腰猛打；后面的紧急驰援，又被自己的败骑冲散。

敌军很快就被击垮了。随后，红军又在杨城子以西、齐桥和李新庄之间，分别击溃敌军第32师和第36师各1个骑兵团，取得了长征中粉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最后一仗的胜利。

此战，红军共击溃敌军骑兵3个团，歼敌数百人，俘虏200余人，缴获战马200匹。

毛泽东紧握着彭德怀的手，兴奋地说：“步兵打骑兵，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啊！”随后赠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劳山战役

【交战时间】1935年10月1～25日

【交战双方】红15军团；国民党军第110师（欠1个团）、第107师1个团附1个营

【指挥将领】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何立中、高福源

【战果】红军歼灭国民党军4个多团约7000人

吴起镇战斗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935年11月初到达甘泉地区，同红15军团胜利会师。

红15军团是一个多月前，才由鄂豫皖苏区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与陕甘苏区的红26、红27军合编而成的。

红25军最早组建于1931年10月25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抽调红4军第10、第11、第12师各一部，在安徽省六安县麻埠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仅辖第73师。11月编入红四方面军序列。至1932年5月先后组建了第75、第74师，参加了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战役。

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25军损失惨重，军长蔡申熙牺牲，第74师撤销。10月，第73师随红四方面总部向川陕边转移，军部特务营和第75师留在苏区继续坚持斗争。11月3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湖北省黄安县檀树岗重建红25军，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下辖第74、第75师和特务营，共7000余人。

1933年4月8日，红28军改为第73师，编入红25军序列。这时，红25军下辖3个师，共1.2万余人。但在随后进行的七里坪战斗和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中，再次遭受重大损失，锐减至3000人。10月，军长吴焕先率第75师和第74师一部约2000人进入鄂东北地区活动，副军长徐海东率另一部1000余人返回皖西北地区。

1934年4月，两支部队在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会合，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继续转战于鄂东北、皖西北地区。

窑工出身的徐海东，生于1900年，湖北黄陂人。早年曾在国民党第4军中任排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徐海东回到家乡，拉起了湖北省的第一支“工农军队”。

徐海东素以骁勇善战而著称，历经百余战，仅在鄂豫皖的十年间就负伤八次，身上留下了十几处伤痕。别看他平时由于身体不好常常躺着，可打起仗来就如同猛虎下山，虎虎生威。指战员们都亲昵地称他为“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毛泽东也听说鄂豫皖苏区有个“徐老虎”，称赞他是“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蒋介石对“徐老虎”又恨又怕，说他是“文明的一大害”，曾经悬赏十万大洋买徐海东的项上人头。这个赏金与彭德怀是一样的，可见蒋介石对徐海东的痛恨。

这年春，蒋介石调集16个师又4个独立旅，大举“围剿”鄂豫皖，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把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率红25军2900余人实行战略转移。16日，红25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成为人数最少的一支长征大军。

12月，红25军进入陕西省雒南县庾家河地区，进行开辟苏区的工作。至1935年5月，打破了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创建了鄂豫陕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

7月2日，红25军在山阳县以西的袁家沟口突袭陕军警备第1旅，毙伤300余人，俘旅长以下1400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的行动，13日，红25军翻越终南山，威逼西安。16日又从长安县丰峪口出发，继续长征。

红25军的西进，使蒋介石大为不安，连电国民党军各部加强西安、宝鸡、汉中碉堡封锁线，严防红军“流窜”进入甘肃境内。

8月21日，红25军在途经甘肃省泾川县四坡村时突遭国民党军袭击。战斗中，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

9月7日，红25军到达陕北苏区的保安县豹子川。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代理省委书记。

15日，红25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次日，与在陕甘苏区坚持斗争的红26、红27军会师。

红26军前身是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1931年10月，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的陕北支队转战至陕西、甘肃两省边界的南梁地区，同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后组成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改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月在宜君县转角镇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说是1个军，实际上人少得可怜，只编有1个团，才200来人。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至1934年2月，红26军发展到1个师，人数也增至500余人，并相继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栒邑、淳化、耀县、三原、宜君五县边界根据地和以南梁为中心的吴起、保安、甘泉、鄜县、合水、华池六县交界地区根据地。

6月，红26军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部队发展到4个团2000余人。11月，成立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以刘志丹为主席的陕甘边军事委员会。

相比红26军，红27军组建的时间更晚，人数也少得多。从1932年起，中共陕北特委将农民武装组成红军游击队，在横山、清涧、延川等11个县境内游击战争。至1934年上半年，先后开辟了安（定）延（川）、绥（德）清（涧）、葭（县）吴（堡）、神（木）府（谷）四小块根据地，并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935年1月30日，由陕北游击队发展起来的3个独立团在安定县白庙岔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仅辖1个师700余人。

出于对西北革命形势发展的极度不安，蒋介石从1934年10月起，调集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四省国民党军队5个师（旅）共4万余人，采取围堵结合，分区“清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针，对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当时在这两个苏区坚持斗争的革命武装有红26、红27军和3000多人的游击队。虽号称两个军，但总人数不过4000人左右，武器装备也极为落后，弹药更是奇缺。

面对强敌大举压境，为打破敌人的“围剿”，2月5日，中共陕甘边和陕北两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苏区的中共组织和红军、游击队。

会议通过了刘志丹向南发展，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以与陕甘苏区打通的建议；同时决定集中红26军第42师一部和红27军第84师主力在陕北作战，首先打击深入陕北苏区中心但对陕北人生地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第84师，尔后再向南、向西发展。

5月1日，红26军一部与红84师在白庙岔会合，成立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

在刘志丹等人的领导下，红26军一部与红84师密切协同，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的战法，连战连捷，至7月，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先后取得安定南沟岔、清涧阎王砭、延川贺家湾、安塞兴隆寨等战斗的胜利，连克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使根据地扩大到东临黄河，西接环县，南至淳化、耀县，北接长城的广大地区，把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连成一片，并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红军主力发展至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这时，中央红军长征就要到达陕北，蒋介石为了使中央红军无立足之地，同时也为报两次“围剿”陕甘苏区失败之仇，于7月中旬调集东北军4个军11个师及晋绥军5个旅和高桂滋的第84师、井岳秀的第86师等部，向陕甘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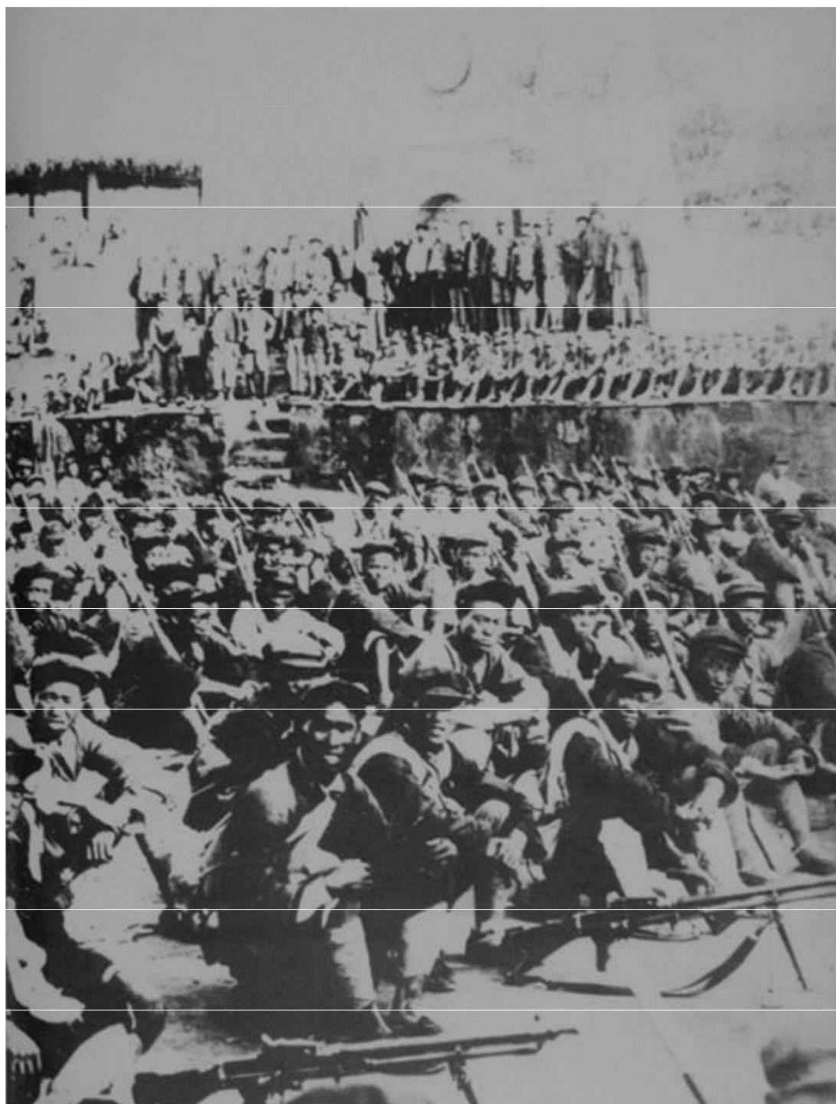
此次，蒋介石投入10余万大军，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妄图一举摧毁这块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同时这也是蒋介石惯用的一箭双雕之计：借“围剿”红军之机，既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又要进一步削弱地方军阀势力。正如时任东北军第67军参谋长赵镇藩所回忆的：“一方面对红军进行‘围剿’，另一方面让东北军与西北杨虎城争地争食，两虎相斗，消灭杂牌。”

敌强我弱，死打硬拼肯定不行。刘志丹决定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趁国民党军部署尚未就绪之前，先发制人，于8月中下旬，在东线吴堡慕家塬、绥德定仙墕地区，首先击溃了刚刚西渡黄河入陕的晋绥军2个旅，接着转兵进攻北线国民党军。

恰在此时，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传来——由鄂豫皖苏区长征的红25军在徐海东的率领下，经陕甘边已到达陕北。刘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派习仲勋等人前往保安瓦子川迎接。

9月18日，两支部队在永坪镇胜利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75、第78、第81师，共7000余人。

红15军团的成立使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力量得到加强，但形势依旧十分严峻。除原在陕北的4个师外，东北军7个师也从豫陕一带调到陕北，各路“围剿”大军正一步步逼近。



1935年9月5日，由鄂豫皖长征的红25军与红26、红27军在陕北永平镇会师，成立红15军团。图为会师时的情景

19日，陕甘晋省委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敌作战方案。会上，有人提出先打北路，吃掉米脂方向井岳秀师的第86师或高桂滋的第84师，然后出横山，与神（木）府（谷）根据地连成一片，再向三边发展。有人则认为应先打东北军，如果打掉东北军一二个师，就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徐海东也主张先打东北军，毕竟他们是红军的老对手，“脾气”摸得很透；而且刚经过长途行军，跋山涉水，十分疲劳，大多数官兵又都希望打回东北老家去，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斗志不高，打起来比较容易。只要打垮东北军一路，陕北形势就能发生变化。

当时东北军分为两路，一路在甘肃境内，由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率4个师经合水进攻；一路在陕西境内，由第67军军长王以哲率3个师由中部（今黄陵）北进，军部率第107师进驻洛川，第619团1个营进占羊泉；第110师、第129师（欠第685团）沿洛川至延安公路推进至延安；第685团驻甘泉，负责维护南北交通。这样，67军摆了一个长蛇阵，兵力相对比较分散，便于红军分割歼灭。

甘泉以北15里的大小劳山地区，有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路两旁群山连绵、树木茂密，把延（安）甘（泉）公路夹在中间，如同一条口袋，是个设伏的理想地方。会议经过研究，决心采用围城打援的惯用战法，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县城，发起佯攻，调动延安之敌回援甘泉；红军主力秘密进至大小劳山地区埋伏起来，伺机歼灭援敌。

21日，红15军团从永坪地区南下，于23日进至甘泉西北的王家坪集结，并下达了具体的作战部署：红81师师部率第241团位于甘泉县城以北白土坡地域，担任正面阻击；红75师师部率第223、第225团位于劳山东西两侧；红78师师部率第234、第232团位于小劳山东西两侧；骑兵团位于卢家村、土黄沟地域。

28日，红81师第243团和地方武装包围了甘泉县城，虚张声势，冒充红军主力，摆出一副攻城架势。29日拂晓，红15军团主力悄悄进入伏击地域，隐蔽待机。

敌人果然中计了。

10月1日晨，国民党军第110师从延安出发南下，按628团、629团（欠1营）、师部、630团序列行进。上午11时，后卫团630团李东坡部行抵延安西南四十里铺时，师部侦知前方有敌情，但不甚详细，师长何立中还是比较谨慎的，遂命令630团停止前进，警戒后方，并向延安联系，自己则亲率师部和其余2个团直扑甘泉。

中午时分，110师行抵离延安40里、距甘泉20里的地方。这里零零散散有几家住户，只见家家都有做熟的小米饭。老百姓说是红军刚刚做好的，没来得及吃就走了。110师先头268团立即派出侧卫和侦察搜索前进。

14时许，110师到达大小劳山地区，一头撞进了红军预设的伏击

圈里。红81师第241团立即发起攻击；红78师骑兵团从侧后出击，断敌退路；红75师和红78师主力从两侧发起攻击。

时任西北“剿匪”总部粮秣处长的张政枋回忆道：

只见四山均有阵地和零星人往来，鸡不鸣，狗不叫，异常沉寂。正行走中，忽见各山竖起红旗，开始向我们射击，才知道已入口袋战术中。锣鼓声、枪声混在一起，震动大小劳山，并齐声大喊大叫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枪口应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不应对着抗日的红军”，“红军是帮助你们打回老家去的朋友”。全体官兵闻听后，触动内心，呆若木鸡，无心迎击，六二八团团长裴焕彩，下令就地展开还击，但地形低下，众寡悬殊，兵无斗志，乱成一团，兵看官，官看兵，面面相觑。六二九团团长杨德新素有善战之名，占领几个小山头，企图抵抗，终因兵心涣散，在隘路中被截成数段。前后不相衔接，师长找不到团长，团长找不到营长，相互践踏，束手无策。正在全师人慌马乱的时候，红军漫山遍野一拥而至，枪声、手榴弹声、喊叫声、锣鼓声弥漫了战场。

徐海东回忆道：

指挥部设在西山上一棵大树下，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原来估计，敌人要是两路行军，必有两个团钻进来，如果再追一下，可以搞到他两个多团。谁想，敌人一露头，是四路前进。看来，何立中太欺负人了！

骄傲的敌人虽有防备，但他们把我军可能埋伏的地区估计错了。据后来抓住的一个参谋说，何立中骑在马上，过了他预计我们埋伏的地区后，向参谋长说：“我当共军会打我个埋伏呢！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他正说这话的工夫，我军开枪了，道路两旁，机枪、手榴弹立刻混响起来。几千敌人像黄蜂窝挨了一棍，不知向哪里跑好，有一股敌人企图抢夺山头，被打垮了；有的企图往前突围，被军团部派出去的手枪团把路给堵住了。敌人开始顽抗，不肯缴枪，我们的战士连打带喊话：“缴枪吧，你们跑不出去了！”“放下武器一律优待！”

敌人这个部队里，有好多士兵了解我军的政策，在此情况下，纷纷缴了械。

这部分敌人，不愧是红军的“老朋友”，士兵们放下枪后，有的说：“我这是第二次向你们缴枪了。”有的说：“我是第三次缴枪了。”有的还发誓说：“我一枪没放。”他们像是纷纷表白自己的“功绩”。有的俘虏问我们战士：“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我们同志回答

得很好："我们指挥部特别邀请么！"

激战5个多小时，红军全歼该敌，毙伤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以下1000余人，俘团长以下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180余挺，炮12门，战马300余匹和电台1部。

张政枋回忆道：

师长何立中脖子上负重伤，当时昏厥；参谋长范驭州阵亡；六二八团团长裴焕彩被俘；六二九团团长杨德新自杀。放下武器的2300多名官兵在清理战场后，被带到甘泉西北二十几里某村宿营，吃的是小米饭和咸菜。何立中躺在甘泉河畔乱草堆中，夜间苏醒喊叫，被老百姓看到，何许以重金，把他用门板抬到甘泉城内。守甘泉城的一二九师营长刘效先，和一一○师六二九团第二营营长陈镇藩（准备去洛川领棉服被困甘泉）见师长伤重无药，命在旦夕，急电西安军医处任作楫处长派飞机送药，终因重伤时长，伤口恶化，医治无效而死。

110师在劳山地区遭受重创，师部和2个团全军覆没，一战竟损失近5000人，连师长和参谋长也做了红军的枪下鬼。消息传来，各路"围剿"军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瓦窑堡守军第84师一部干脆连夜弃城逃往绥德。

红军乘胜追击，将瓦窑堡周围原安定县国民党军的据点全部拔除。5日，陕甘苏区首府迁至瓦窑堡。

这时，中央红军已进至甘肃通渭、静宁地区，国民党军"西北剿总"一面急调重兵阻击，一面电令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阎锡山部正太护路军司令兼陕北"剿匪"前敌总指挥孙楚，立即率所部在陕北聚歼刘志丹、徐海东部，"不准与毛、周靠拢"。

国民党军变得谨慎起来，采取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中屡试不爽的堡垒政策，对陕甘苏区进行严密封锁，企图步步为营，逐步蚕食，缩小包围，最后消灭红15军团。

20日，第67军第107师第619团附1个营进驻甘泉以南榆林桥。

团长高福源，字少卿，辽宁盖平人，外号"高包脖子"。他本是北京大学学生，后投笔从戎，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因文武双全，深得张学良的器重，曾担任过他的警卫营营长。同时他还是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心腹爱将，曾担任过军部参谋处上校处长。

对于红15军团，高福源并不陌生。早在1934年春，第67军由河北廊坊调驻河南信阳、潢川、商城等地，"进剿"鄂豫皖苏区。高福源

率619团一直在商城迤南西地区最前方与红25军对阵，相继在泼陂河、大柳树、湖山寨等地交过手。尽管屡屡吃到红军的苦头，但高福源就是不服气，总认为红军不是他的对手，并口出狂言：早晚要收拾红25军。

面对这个狂妄骄横的对手，红15军团决定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实施攻击。战前，徐海东亲率营以上干部到榆林桥附近三次察看地形，选择主攻方向。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徐海东

25日拂晓，红15军团对榆林桥发起突袭，首先进攻西山制高点。

高福源虽一向自傲，但的确不是草包一个。来到榆林桥后，他立即观察地形，发现驻地周围低洼，西山地势险要，一旦为红军所占，必将居高临下发起攻击。于是派第5连连长黄克军率部附两挺重机枪，驻扎在西侧山寨，构筑碉堡作为支撑点，以防红军占据西山。

虽说高福源算准了红军的进攻方向，但他还是没有料到红军来得如此之急，西山上的工事才刚刚修了一半。驻守西山寨的那个连没支撑多久便被打垮了，连长黄克军负伤而逃。红军居高临下，控制了榆林桥，把高福源指挥的4个营压迫到树林里。

激战至当日下午，红军全歼守敌，毙伤300余人，俘敌1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300余支，机枪120余挺，炮8门，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战斗结束后，团长高福源却没了踪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徐海东命令继续在俘虏中盘查，一名红军战士见有个俘虏穿着讲究，便故意诈他：“你就是高福源！”

那人听后浑身发抖，连忙摆手说：“我不是，我不是，我只是个理发的。”边说边用嘴向旁边一歪。

原来，高福源与他换了衣服，冒充普通士兵，躲在一边。

高福源被押到徐海东面前，装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大声喊道：“要杀就杀，随你们的便！”

徐海东严肃地说：“哪个杀你！你是东北人，现在东三省都被日本强占了，你的父兄成了日本强盗的奴隶，你要有点骨气，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你们东北军弟兄，见了红军，枪都朝天放，你还充英雄好汉，跟红军拼杀！”

一番话令高福源羞愧地低下了头。后来经耐心教育，高福源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骄傲自满的情绪没有了，对红军也服气了，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动要求去做张学良的工作，成为红军和东北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牵线人。

直罗镇战役

【交战时间】1935年11月21～24日

【交战双方】红1、红15军团；国民党军第109、第106师等部

【指挥将领】彭德怀；牛元峰

【战果】红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11月6日，与红15军团在甘泉象鼻子湾一带胜利会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一、第十五军团，共1万余人。彭德怀任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闻讯极为震惊，立即调集重兵向陕甘苏区包围过来。西北"剿总"以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分为东西两路，首先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今富县）、甘泉、延安之间的联络，构成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限制红军向南发展，尔后采取南进北堵，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消灭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其中，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率第106、第108、第109、第111师，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由甘肃庆阳、合水经太白镇沿葫芦河向鄜县东进。先头部队第109、第111师于11月1日进占太白镇，第106、第108师随后跟进。

第67军第117师在军长王以哲的指挥下，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配合第57军东进，企图首先打通由合水至鄜县的交通联系，实现葫芦河东西封锁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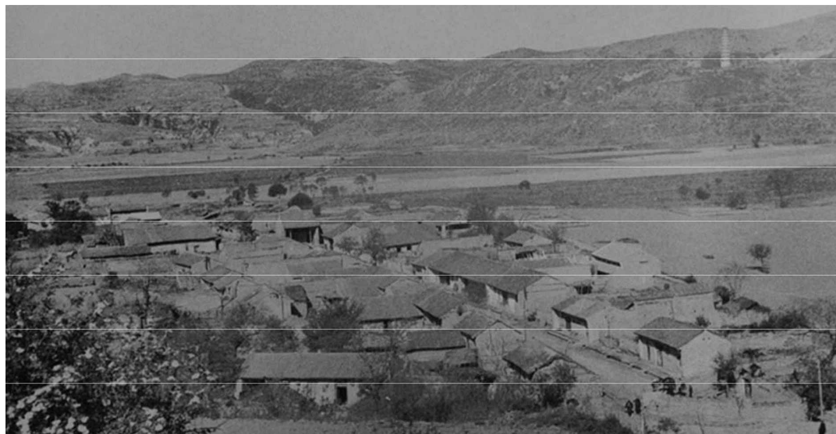
此时的陕北已是雪花飘飘了。聂荣臻回忆道：

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而一军团当时尚缺两千多套棉衣补给不上，部队在陕北透骨钻心的寒风中致病送医院的先后达千余人次。部队靠士气旺盛御寒，寄希望于打一个胜仗解决棉衣等军需、给养问

题。

形势万分危急。中革军委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敌军兵力多于红军1倍以上，如果让敌人构成东西、南北封锁线，就很难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中共中央将无法在陕甘地区立足。

针对敌人的进攻态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歼灭葫芦河东进之敌第57军1～2个师，尔后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这次“围剿”。



直罗镇

红1军团随即隐蔽进至鄜县西北的秋林子和甘泉西南的老人仓地区；红15军团则攻占了直罗镇以东的张村驿、东村等据点，并以1个独立营和1个骑兵连前出直罗镇、黑水寺一带进行游击，监视东进之敌。

12日后，红1军团进至九原、上高池、套通地区，红15军团主力隐蔽集结于张村驿、桃花砭地区。

这时，第57军进至太白镇地区已近半个月，一直犹豫徘徊，停滞不前。

为调动敌人，造成在运动中歼敌的有利时机，红一方面军决定以红15军团第81师1个团加紧对甘泉县城的围攻，以造成敌人判断失误，调动第57军东进；以第81师另1个团在羊泉镇地区布防，准备阻击第67军第117师。

果然不出红军所料，西北“剿总”命令第57军立即东进。

17日，第57军以第108师留守太白镇，军部率第106、第109、第111师沿葫芦河向鄜县方向前进。至19日，先头部队第109师进入黑水寺地区，军部及另两个师进抵张家湾地区。

19日，红1军团进至直罗镇东北纸房沟、新窑子、石咀、凤凰头地区集结待机。这时，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接到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敌109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

直罗镇位于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鄜县的必经之路，在葫芦河南岸，南北有连绵的土山对峙，中间系一条窄长的河谷。这一带山势并不险峻，道路却很差，车辆不能通过，步兵和驮马行军，只能摆成一字长蛇阵，蜿蜒行进。

红军决定在直罗镇设伏，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敌人，诱敌深入。彭德怀亲自率红1、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前往现场察看地形，研究作战部署。徐海东回忆道：

从出发地到直罗镇30余里，一小时不到就赶到了。大家下马后，首先登上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高山。直罗镇就在脚下，它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东的大道像一条白色的带子铺向镇子的中央，穿镇而过。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砌的寨墙却大部完好；镇的北半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我们几十架望远镜举在眼上，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细心地观察着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一个小山包，一棵小树，一条小沟，一家独立房屋，都是指挥员们观察研究的对象。

这些久经沙场的红军将领们都清楚，在战前观察时疏忽一条小沟、漏掉一个山头，说不定在战斗中会增加意想不到的困难。当登上紧靠镇东南侧的高地时，彭德怀指着那座用石块堆砌成的寨子，对徐海东说：“这个土寨子敌人可能会占它！”

这个寨子位于山包顶部，像个没有顶的碉堡，当地人称它为直罗寨子。

徐海东点头称是，“这个寨子是镇中的制高点，如为敌所用，我们就会吃亏。今晚就派一个营拆掉它！”

看过地形后，这些久经沙场的将领们一个个兴高采烈，摩拳擦掌，纷纷表示：

“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

“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彭总、徐军团长，下命令吧！”

作战方案很快就制订出来了：红1军团于21日拂晓前到达袁家山附近展开，首先以2个师自北向南进行主要突击。第一步攻占直罗镇北山，歼灭该处之敌，尔后协同红15军团夺取直罗镇。另以1个团在直罗镇东北，协同葫芦河以南之红15军团一部，阻止敌军沿葫芦河东窜；以1个团进至老人山方向，断敌先头师与安家川后续部队的联系，阻敌西逃，并打击可能来援之敌，以侦察连向黑水寺佯动。第二步视战役发展情况，准备歼敌后续部队。

红15军团主力（欠红81师）于21日拂晓前到达直罗镇以南地区展开。第一步自南向北进行突击，在歼灭南山敌人后，立即向直罗镇发起进攻，协同红1军团歼灭守敌。第二步视情况发展，准备协同红1军团作战。红81师，除以红241团及军团1个骑兵连，继续围困甘泉之敌外，师部率红243团在中（部）宜（君）独立营、地方游击队配合下，积极钳制鄜县、中部等处之敌，阻止东路敌军可能的增援。方面军指挥所进驻吴家塔。

20日晨，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率领所辖的3个团和第111师的1个团，在数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担任诱敌任务的红军小部队节节抗击，且战且退，将敌人一步步引向直罗镇。下午4时，敌人气势汹汹地开进了直罗镇。

牛元峰，山东沂水人，行伍多年，曾任东北讲武堂第五期队长、东北军辎重司令，是张学良的心腹。此时，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牛师长心情很爽，他的109师一直都是东北军的主力，就凭红军这点儿人马和那几条破枪，还想跟他较量一下，真是不自量力。想到此，牛师长差点笑出声来，命令手下人向“剿匪”总部和军部发报，称：我部已击溃赤匪主力，占领直罗镇。

虽说牛师长没有打过什么大仗恶仗，但也绝非酒囊饭袋，并未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见周围地势险恶，他思考片刻，命2个团分别驻守直罗镇两侧高地——北山寺和旗杆山，并作好警戒，加强防范；命第111师的那个团回归建制；自己则带着师部和另外1个团进驻镇内。

这时天色近暗，全师官兵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走了整整一个白天，早已是人困马乏，饥渴交加，开始大肆劫掠镇子里老百姓的粮食和家畜，准备美美地饱餐一顿，庆祝“胜利”。

就在敌人大吃大喝、疏于防范之际，红1、红15军团由待机地域在黑夜的掩护下向直罗镇迅速开进。深夜时分，红军从四面八方将第109师围了个水泄不通。

此战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站稳脚跟，可谓关系重大。毛泽东亲临前线，将指挥所设在北山坡吴家台北端高地几个破窑洞附近。在战斗打响前下达作战命令时，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21日拂晓，战役打响了。

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犹如两只铁拳，向直罗镇猛砸下去。

牛元峰从睡梦中惊醒，听到四周密集的枪炮声，顿时心惊胆战起来，知道是被红军主力包围了，一面向军部发电求援，一面命令各团占据有利地形，拼死抵抗，企图固守待援。

仓促应战的第109师官兵，在红军将士勇猛的冲击面前，立即陷入被动。但敌人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妄图垂死挣扎。

战斗进行得十分艰苦，也很残酷。

直罗镇附近的葫芦河两岸是这次作战的主要战场，需要来回穿行。白天观察葫芦河最宽处不过200米，窄处只有二三十米，河水流量不大，流速也不快。但当红军将士们下水后才发现，河水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浅，一下子就淹到了胸部，刚换上的新棉衣全湿透了，几乎不能御寒。河底全是淤泥，不少战士的鞋子掉在河泥中，只能赤着脚与敌人拼杀。

时任连长的王诚汉曾回忆：天气很冷，是这次战斗给我的深刻印象。并非是隆冬的那种寒冷，而是河水太冷。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红军占领了直罗镇两侧高地北山寺和旗杆山。在此据守的第626、第627团大部被歼，一个团长被红军击毙，一个团长举枪自杀，残部向镇内溃逃。

红军乘胜追击，将残敌围堵在两山之间的一条山沟里，集中火力予以痛击。这时，红1军团第2师也已攻入镇内。

牛元峰见地面指挥体系已被红军打乱，急忙收缩剩余兵力，然后实施疯狂反扑，企图突围而逃。激战中，红1军团第2师第2团团长李英华、第4团代政治委员黄甦先后牺牲，就连林彪和聂荣臻的军团部也险遭敌人冲击。许多年后，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打到中午，忽然上来一股敌人，约莫有一团人的样子，直向一军团指挥部所在的山头上冲来，企图向西突围出去。敌人向我们越逼越近。这个阵地，原来我们是命令二师陈光带一个团来占领的。可是他们还没有到达，敌人就上来了，我们只得带着直属部队，面对面地阻击敌人。我们当时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将警卫连派去保卫毛泽东同志去了。我们命令这个警卫排就地死守，左权参谋长叫通信员赶紧把侦察连、工兵连调上来，还命令直属队所有的人都拿着枪进入阵地，保证不叫敌人冲出去。可是直属部队没有充足的子弹，每人才只有四发，而且警卫排又没有长枪，只有用驳壳枪射击敌人。

战斗打得十分艰苦。聂荣臻的警卫员孙起锋，是从江西瑞金参军起就跟着他的老警卫员，就在这次战斗中，在离聂荣臻不远的阵地上，冲锋时中弹牺牲的。战后，聂荣臻十分伤心，将孙起锋牺牲时背的一只带血的图囊带在身边，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聂帅把它送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眼看敌人就要冲过去了。危急关头，警卫连上来了，在聂荣臻等人的指挥下将冲上来的敌人硬给压了回去。

战至中午时分，第109师2个团和师直属队被全歼。残部500余人在牛元峰带领下仓皇窜入镇东头的小寨子里，用一天前红军拆下的石头重新砌成围墙，抢修工事，继续负隅顽抗。

时任第109师参谋处长的沈叔明回忆道：

此时牛元峰带着师部一些幕僚和少数战斗兵转向直罗镇南面山上，就看到红军左一面红旗，右一面红旗。红军没有打枪，就把牛元峰带的人赶得七零八落，不像师长带着队伍作什么战斗部署，简直是一群没头苍蝇到处乱窜，最后退到镇子南面一个小高地上的土围子里落脚。这个土围子距直罗镇最近，地势也最高。牛元峰带一些人登上这个土围子，看到围墙似乎新被拆除，断垣残壁，纵横交错，两间窑洞也都加以破坏，但还可以避避流弹。由土围子向四下望去，各处均在眼底，当年修筑土围子的用意，也是着眼于军事的。牛部未被俘的残兵败将，陆续都来到土围子上；作为预备队的六二五团，守不住直罗镇，也上了土围子，大家总算得到暂时的喘息。

接到牛元峰的求援电后，驻扎黑水寺的第111师1个团立即增援直罗镇。但这个团刚刚进至安家川以东地区时，就被红1军团的阻击部队击溃，狼狈地逃回了黑水寺。西北“剿总”随即下达了三路援救牛元峰部的计划：东路，董英斌率第111、第106师火速向直罗镇增援；西路，王以哲指挥第117师由鄜县加速向羊泉镇、张村驿前进；中

路，第38军第17师进至公家原、丁家原，策应其他两路的行动。

命令发出后，三路援军中只有董英斌不敢怠慢，立即驰援直罗镇，以第111师沿安家川北山向直罗镇攻击前进，以第106师由黑水寺沿老人山向红军右翼迂回。而西路的第117师行动明显缓慢，中路的第17师则干脆按兵未动。

据此，红一方面军领导决定以少数兵力继续围困牛元峰残部和阻击由鄜县西援的第117师，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第106、第111师。

然而，援敌已被红军的神勇所吓倒，无心恋战。当遇到红军阻击后，第106、第111师在装模作样地进攻一番后，即转身沿葫芦河西撤。聂荣臻亲自带着红1军团主力和红15军团2个营冒雪跟踪追击，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歼灭第106师1个团，敌军余部狼狈退回太白镇。第117师在遭到红15军团红81师阻击后，就立刻缩回鄜县县城。

在此期间，留在直罗镇的红军向困守小寨子的第109师残部发起进攻。然而，敌军依托临时构建的工事，以猛烈火力将红军的进攻部队压制在高地下面的干涸河川里。

徐海东回忆道：

这个小寨虽被我军事先拆毁，但敌人昨天下午到达以后连夜抢修，加上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我们派了一支小部队攻了一次，没能打上去。正组织第二次猛攻，通信员报告说："周副主席来了。"

这时太阳已升起了老高。我们向山下看去，只见周副主席同其他同志从山上走下来。他们都拿着望远镜，边走边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等走到我们近前时，周副主席和干部们一一握手，详细地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牛元峰率残部又在土寨子里坚持了一天，但断粮断水的困境却使军心涣散。牛师长眼见援军迟迟不来，无比烦躁，心想总不能在寨子里坐以待毙，被饿死渴死，便决定于23日午夜，乘天黑突围向西逃跑。

一定要把这头"牛"追回来！红军追出了25里路，终于在直罗镇西南的一个小山上，将敌人追上并包围起来。没费多大事，这股残敌全军覆没，不是被击毙，就是做了俘虏，可是那位牛师长却没有了踪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时在徐海东身边任警卫参谋的詹大南回

忆道：

在最后围歼敌人的地方，我们很快查找到了被俘的敌师参谋长。于是我大声问："你们师长呢？"他用手指着离我们10多步远的山坡上的一具死尸说："那就是牛师长。"我开始还不相信他的话，又问了旁边几个俘虏。

这时，敌参谋长指着地上的一个红色长方形的大本子对我说："请你对照军官录上的照片。"

我拿起一看，里面少校以上军官都附有照片，第三页是少将师长牛元峰的，占了半页。我走过去看尸体，只见他头朝北趴在面向我追击部队的反斜坡面上，旁边还有几具敌人尸体。看到牛元峰这种死后趴的姿势和处在山脊棱线后的具体位置，可以断定：他是在抵抗过程中被我军击毙的，而且被我追击部队击毙的可能性较大。

我跨上一步使劲地把尸体翻过来一看，面部和上身都是血。照片上的牛元峰穿着笔挺的将军服，威风凛凛。这怎能和眼前身着破旧士兵服、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样呢？我辨认不清楚，不敢肯定此人就是牛元峰。

由于事关重大，我又接连问了其他几个俘虏。他们都说此人就是牛师长。接着，我从尸体上搜出一枚铜质狮头的私章，在手掌上印了一下，是篆体字，我不认识。于是，我让少共营留在原地待命，看守敌参谋长和这具尸体，我领着两个战士，带着军官名录和私章，从山梁上走下来，顺南沟门、新寨子回到文家庙，向徐军团长汇报。经过认定，私章是牛元峰的。徐军团长很高兴地说："赶快发电报报告中央。"并命令通信员，通知少共营把牛元峰的尸体抬下山来。

此役，红军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师长牛元峰以下1000余人，俘虏53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500余支（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次战役：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宁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乌蒙山回旋战



湘鄂川黔军委分会旧址

【交战时间】1936年3～4月

【交战双方】红2、红6军团；国民党军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李觉、郭汝栋等5个纵队和滇军5个团

【指挥将领】贺龙、萧克；万耀煌、龙云等

【战果】红军击溃国民党军的围堵堵截

1935年10月，蒋介石设立宜昌行营，以陈诚为参谋长代理行营主任，调集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大规模“围剿”。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转到外线寻求机动，创建新苏区。11月19日，一个风雨交加之夜，贺龙、萧克率红2、红6军团1.7万余人从湖南桑植和轿子垭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20日黄昏，前卫部队到达澧水北岸的张家湾附近。当夜，先头红49团强渡澧水，突破了敌人精心构筑的封锁线。随后又突破了敌军设在沅江的封锁线，实行战役展开。

至28日，红2军团先后进占溆浦、辰溪、浦市，红6军团相继夺取新化、蓝田、锡矿山，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获得了大量补充。

红军占领湘中，蒋介石慌忙调集李觉、陶广、郭汝栋、樊崧甫、汤恩伯等部分路“追剿”，企图将红2、红6军团消灭在沅江、资水之

间。其中，以李觉纵队3个师从沅陵、卢溪向辰溪、溆浦进逼；以陶广纵队3个师、郭汝栋纵队8个团进抵沅水西岸，堵截红军西进；以樊崧甫纵队4个师渡过沅水，向新化、溆浦推进；以汤恩伯纵队2个师13个团调至长沙、岳阳防守，作为预备队。

面对敌军重兵逼近，红2、红6军团决定退出湘中，转向西进贵州石阡地区。为调动和迷惑敌人，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于12月11日从溆浦的潭家湾、底庄、桥江等地出发，向东南方向急进，摆出一副东渡资水的架势。



红6军团长征途中攻克湖南新化城后部分干部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王震、第四人夏曦、第五人萧克）

20日，红军进至高沙和洞口地区，突然转向西进。两天后，在绥宁以北的竹舟江渡过巫水，沿着高山峻岭间的崎岖小道向北急进，在黔阳的江南街、托口再渡沅江，于1936年元旦抵达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把追敌全部甩到了后面。

12日，红军占领黔东石阡、江口，完成了从湘中向石阡地区转移的战略任务。

在休整一周后，红军随后继续向西挺进。21日，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25师龙溪封锁线，克瓮安，取平越，在马场坪击退郭思演第99师的截击后，占洗马河，夺龙里，前锋直逼贵阳。

敌人惊慌失措，立即收缩兵力，将第99师等部回撤贵阳地区布

防。这正好给红军西进让开了大路。红2、红6军团抓住有利时机，向西北急进，连续奔袭扎佐、修文，夺取乌江上游渡口鸭池河。

2月2日，红军渡过乌江天险，于4日进占黔西县城，6日攻克大定，9日夺取毕节，实现战略展开，着手创建根据地工作，成立了中共川滇黔省委，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

蒋介石对此非常恐慌和不安，将正在四川对红四方面军作战的万耀煌纵队火速调往贵州，并重新调整部署：命令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李觉和郭汝栋5个纵队由东向西进攻红2、红6军团；命令川军杨森、李家钰等部在高县、珙县、叙永、扎西地区防堵红军渡过金沙江；命令滇军孙渡纵队进入威宁、盘县地区防堵红军入滇。

2月6日，万耀煌纵队到达三重堰。10日，为调动敌人，创造在运动中歼敌的机会，萧克率红17师深入敌后，占领打鼓新场。与此同时，红2军团主力绕到三重堰正面，设伏待机。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

不料，万耀煌没有上当，反而乘红2、红6军团主力转向东北、正面兵力薄弱之机，于14日袭占黔西县城，并把被红军阻于乌江东岸的第99、第32师接应渡过鸭池河。

17日，红2军团回师大定。次日，万耀煌、郝梦龄纵队围攻大定。红军奋起抗击，在黄家坝重创郝梦龄纵队先头第54师。然而，敌众我寡，大定于当晚失守。贺龙率军团直属队和红6师向鸡公山开进，红4师向沙树坪进发。在羊场、乌溪西设伏不成后，于26日返回毕节城。



红2、红6军团部分人员在长征途中于贵州大定合影

19日上午，红17师从打鼓新场撤至将军山、七家田一带，与万耀煌部敢死队遭遇。这支敢死队由6个连组成，自进犯黔起一直冲锋在前，气焰十分嚣张。萧克当即命令红55团和红51团一部从公路东侧攻击，红49团从公路西侧攻击。激战一个半小时，红军全歼该敌，缴获步枪300余支，机枪9挺，随即占领将军山，构筑工事，阻敌前进。

25日，郝梦龄纵队进至锅厂，威逼红军将军山阵地北侧。万耀煌纵队则从正面对将军山发起猛攻。红17师居高临下，依托工事，打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战至26日，红军主动撤出将军山，向毕节转移。

为摆脱当面之敌，红2、红6军团总指挥部决定撤出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向黔南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的安顺地区转移，实施机动作战，待机再东向湘黔边境转移。

27日，红2、红6军团退出毕节，开始转移。此时坐镇贵阳的顾祝同企图把红军压迫到金沙江以东的云贵川边境，进行围歼。于是，他一面令樊崧甫、郭汝栋两纵队沿毕节大道平行向西逼进，协同李觉纵队，抢占威宁和水城一带，堵截红军南进安顺的道路；一面令滇军孙渡纵队在威宁、昭通地区堵截红军入滇，又以川军10个团沿金沙江北岸布防，防堵红军入川。

3月2日，红2、红6军团领导在赫章的野马川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当前敌情，决定改变行军路线，向西北乌蒙山区的奎香、彝良方向行

动，将敌军尽量向西北方向调动，然后再转向南行。

乌蒙山位于云南东北和贵州西部，海拔2300多米，是贵州的乌江、南北盘江和云南牛栏江的分水岭，逶迤千里，群峰壁立，气势磅礴。

红2、红6军团进入乌蒙山地区，大有在此扎根之势，可急坏了“云南王”龙云。

龙云，字志舟，原名登云。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自古英雄多磨难。龙云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有谁能想到他曾是金沙江畔的一个流浪汉。

1884年，龙云生于云南昭通一个彝族奴隶主贵族家庭，取彝名纳吉乌梯。不久父亲病逝，家境沦落。幼年的龙云只好流浪于云南昭通与四川凉山的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术士马得胜为师，学了一手好拳法。

辛亥革命爆发后，龙云投入滇军，不久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4期骑兵科。1914年秋，一个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法国大力士在陆军讲武堂摆擂台三天。前两天，法国人无人可敌。第三天，龙云登台打擂，用“和尚撞钟”之法将其撞翻打败。当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打败法国大力士，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同学们的敬佩，而且还引起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注意，并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

是年底，龙云毕业分配到昭通独立营任排长。如果没有在讲武堂比武打擂获胜的话，龙云的军旅生涯很有可能前景暗淡，毕竟他在30岁时才在滇军中出任最下层的排级军官，而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许多军界大锷在这个年龄早就当上了团长、师长甚至军长、司令。

一年后，龙云任唐继尧副官处侍从副官，很快又提升为唐的警卫军大队长，成为唐的心腹，从此开始发迹生涯。

1920年，唐继尧在川滇战争中失败。龙云亲自率领卫队，护送唐继尧离开昆明。唐即任命龙云为近卫第11团团长，驻蒙自地区，为将来重返云南创造条件。同年秋，龙云借响应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名义，进军广西，攻克柳州后，任柳州警备司令。1922年春，率部由桂回滇，帮助唐继尧重掌云南大权。他也因功升任第5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后任昆明镇守使。

龙云惨淡经营了12年，靠唐继尧发迹，掌握了滇军的实权，成为滇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时，羽翼丰满的龙云走上了军阀前辈走过的老路，开始不满唐继尧的专制独裁。

1927年2月，龙云联合蒙自、昭通、大理镇守使，发动“二六事变”，搬倒唐继尧，成立云南省务委员会，任委员兼云南讲武学校校长。同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不久，与滇系军阀胡若愚、张汝骥爆发内讧。在击败胡张联军后，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并重新改组了云南省政府。1928年夏再次击败胡张联军，张汝骥被俘后枪毙，胡若愚只身逃往上海。从此，龙云统一了云南，确立了在云南的统治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云南王”。

当时在西南主要军阀中，蒋介石认为最不好琢磨、也最难控制的，便是龙云。

其一，龙云是彝族人，蒋介石总感到他行事诡异；其二，龙云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努力，控制了整个云南，蒋介石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于是，蒋介石开始寻找机会拉拢龙云。1928年1月，蒋介石正式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总指挥。

这一招果然奏效。

一年后，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任命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令其出兵广西，抄袭李宗仁的后路，并允诺给滇军开拔费大洋100万元，攻占南宁后，委派卢汉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云南王”龙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龙云欣然领命，出兵讨桂。结果，滇军大败而退，自此滇桂结怨。

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龙云奉蒋介石之命派卢汉率滇军3个师2万余人入桂，同桂张（发奎）联军作战，誓报一箭之仇。

事情往往不遂人愿。滇军把南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强攻3月仍未能得手。这时，白崇禧率军驰援南宁，滇军腹背受敌，再次大败。

与桂军交锋两度惨败，龙云痛定思痛，提出“废师改旅”的整军方案，借机削弱异己力量，直接指挥团长。但这也引起了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等4个师长的强烈不满，进而爆发了“倒龙政变”。

不久，四师长内部发生分歧，形势突然逆转，龙云重新主持全省军政。此后，他通过成立军官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向法、德、比、捷等国购买军火装备部队，逐步建立起效忠自己的滇军系统，从而更加巩固了自己“云南王”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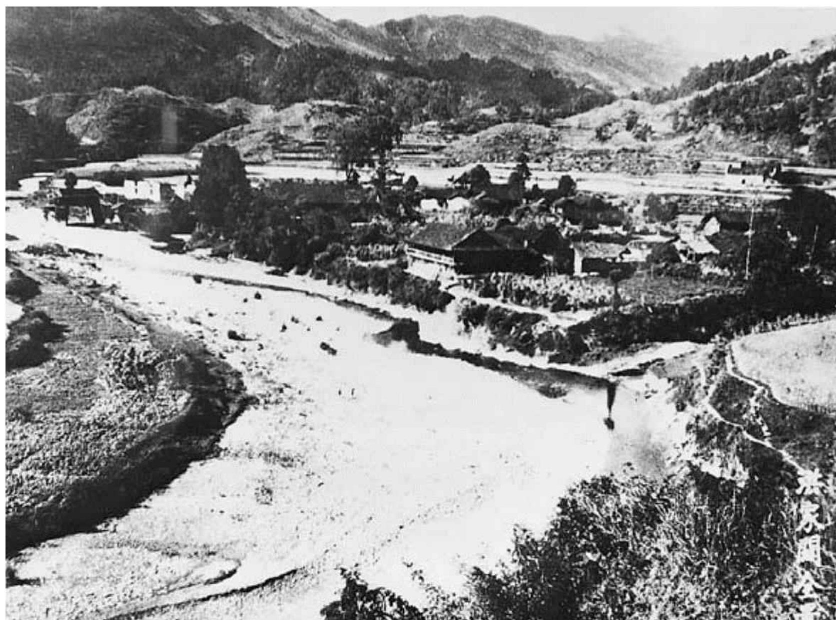
虽说龙云听命于蒋介石，两度与桂军血战，但同时他也看清了老蒋欲翦除异己的野心，与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在接到蒋介石命他“追剿”红军的电令后，龙云和粤桂黔地方实力派人物一样，也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双重恐惧之中。

对共产党，龙云并不陌生。他曾追随蒋介石在云南进行过“清党”活动，抓捕了不少共产党员。

对红军，龙云也有所了解。虽没有交过手，但他早就耳闻红军英勇善战；人称“红军之父”的朱德，早年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后在讲武堂任军事教官，与他既是校友，又有师生之谊；红5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更与他同为彝族同胞，并在滇军服过役，是他的旧部。贺龙的名声他也早就听说过。

这位生于湖南桑植洪家关的贺龙，人称“贺胡子”，曾手持两把菜刀，率乡邻青年捣毁盐局，夺取枪支，组织农民武装，参加革命，成为当时著名的左派将领。



贺龙的老家——桑植县洪家关

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的贺龙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后来回家乡桑植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2军团。为策应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贺龙指挥红2、红6军团于1934年10月发起湘西攻势，连克大庸、桑植、桃源、慈利诸县城，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随后挫败了国民党军80余团的六路“围剿”，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

有趣的是，龙云与贺龙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一，两人姓名中都有一个“龙”字；其二，两人都属猴，龙云比贺龙整整大12岁；其三，两人都是少数民族，龙云是彝族，贺龙是土家族；其四，两人都是少年历经磨难而成大器的，龙云曾在云南昭通与四川凉山的金沙江两岸流浪，贺龙则在14岁起就与人结伴出外运盐；其五，两人都参加过讨袁革命，并逐渐在军界崭露头角的，龙云先后出任滇中、昆明镇守使，贺龙则相继任澧州、湘西镇守使。

这些相似之处，令龙云对贺龙既敬佩又害怕。如今贺龙率红2、红6军团在自己的家门口发动当地百姓，组建抗日救国军，轰轰烈烈地闹起革命来，这怎不叫他心惊胆战，坐卧不安。

2月17日，在致电蒋介石的电文中，龙云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担忧：

据报，萧、贺股匪自窜黔北后，与贵之叛军、土匪裹成一片，扰乱区域扩大等情。如果属实，则将来共匪被击退出黔境，土匪、叛军势不能随之俱去，留伏黔地，妨碍甚大。

其实，龙云既怕红军在黔川滇地区生根发芽，更怕尾追在贺龙身后的蒋委员长的十几万中央军。一年前，朱毛红军进入贵州，蒋介石大批中央军也尾追而至，没有把红军搞垮，却趁机把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给搞垮了。如果让贺龙进了云南，蒋介石如法炮制，按整治王家烈的办法照方抓药，搞垮了自己这个云南省主席可比消灭贺龙要容易得多。

为了自己的云南半边天下坐得牢靠一些，龙云命令孙渡率滇军第2、第5、第7旅和第5、第17团，共8个步兵团，配属工兵第1营为纵队警卫营以及其他机炮等特种兵，赶赴滇东北切实部署，并派第3、第4补充队为第3纵队总预备队。

时任滇军第2旅旅长的安恩溥回忆道：

我为了巩固滇东北方面的统治，几年前曾请以昭通为中心架设东昭十一属长途电话网一案，虽然经省府批准办理，但拖了下来，未予实施。到了这时，龙云自动提出要积极办理，命我会同电报局长萧阳勋、电话局长赵述完负责进行，构成滇东北通讯网。但由于红军入滇甚为迅速，此事仍未完成。……龙云严令各县积极训练常备队、保卫队，召回退伍的保卫队员进行训练，各区乡的力量集中县城，积极修葺城垣碉堡，各县地方负责人战时须与县长共同死守县城；团务处、督练处召集退伍兵，成立战时两个保安团；由滇中各县成立两个补充大队。又派团务督练处第一副处长高荫槐为昆明城防司令，指挥驻昆明的所有步兵部队、宪兵、警察以及教导团的学生防守昆明。

龙云不惜血本，把看家老底子的部队都拉了出来，就是要阻拦贺龙的红2、红6军团入滇。他指示孙渡，务必将红军阻截于云南境外，并于3月9日致电顾祝同，试图引诱红军进入绝地：

此匪拟窜绥江，各方皆如此传说。此处地形，系属河套，若竟窜入，即易歼灭。盖三面包围，前迫大江，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顷奉庚亥电，杨军已派兵阻于盐津，如是匪即不能窜绥，而昭通方面，又有角奎河遏阻，亦属不易。恐或逼入威信，以窜川南，再折窜黔北，则又费手矣。可否止令杨军防守牛街，留盐津一面，令其溃窜，陷入绝地。



红军长征时在云南留下的标语

云南王梦想将红2、红6军团压迫到地险粮缺的绥江地区，以收当年歼灭石达开之效。然而事与愿违，红2、红6军团西进深入乌蒙山区，同国民党“追剿”大军展开了山地回旋战。

3月初，红军抵达赫章、平山堡、七星关、野马川、杨家湾，先头部队与第3纵队派出的游击队接触后，推进至浑水塘、小河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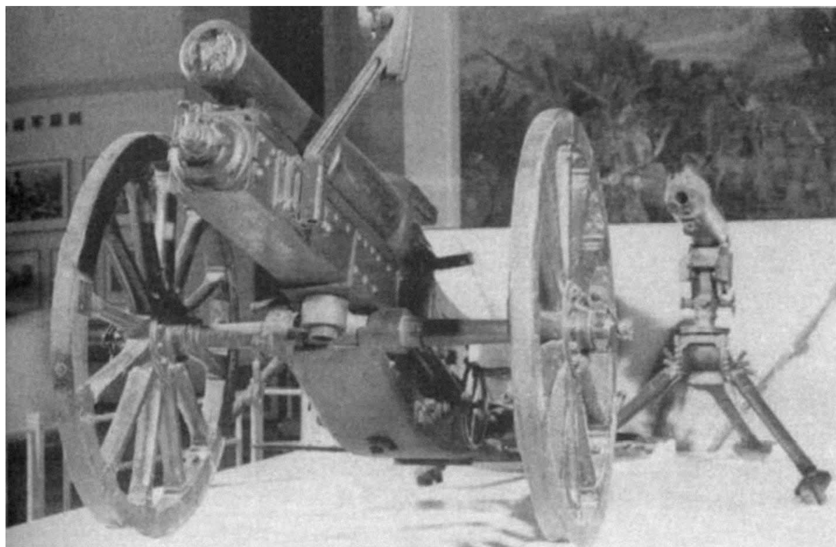
这时，滇军第5旅折回威宁，以威宁城为中心，利用草海和附近山势向东北构筑半月形的阵地。红军绕过威宁城，转回小河口循小路到了镇雄的牛场。镇雄县长和国民党追击部队判断：红军必经五眼洞大道攻镇雄。

谁知，红军取道八卡出牛场坝。12日，红2、红6军团获知万耀煌亲率第13师经得章坝向镇雄推进。贺龙、任弼时当机立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命红4师第11团在左、第12团在右，火速向得章坝方向迎敌；命红6师在第11团左侧平行前进，准备侧击来敌。

上午11时，红2军团赶到得章坝北三锅桩，以红6师在干沟梁子设伏，红4师直插大丫口，执行截击任务，军团部设在大屋基。

红6师第18团在团长成钧、政治委员余秋里的率领下，向进入伏击圈的第13师第37旅发起猛攻，迫其逃进冒脚罗沟。与此同时，红4

师直插大丫口，将万耀煌部本队和后卫第38旅拦腰隔断，迫其第38旅退入桃园居民地。随后，红4、红6师合围第37旅及第13师师部，歼其一部，毙伤俘320余人，缴获长短枪数百支、机枪7挺、弹药300余挑。



红2、红6军团在长征作战中使用的山炮，也是长征红军拉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战斗中，红12团冲入了敌军司令部，万耀煌在溃乱中只身逃走。但第13师主力还是乘机逃脱。这时，郝梦龄纵队和第99师由镇雄折回增援。

见战机已逝，红军当即脱离战斗，再次改向西行。

13日凌晨，红军进至财神堂时，遭到敌优势兵力的拦截。红军充分发挥夜战特长，硬是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出了重围。

此时，形势对红2、红6军团万分危急。前有郭汝栋纵队拦截；后面的郝梦龄、万耀煌纵队紧追不舍，进至安耳洞以东地区；左有李觉纵队集结于水塘堡和赫章地区；右有樊崧甫纵队跟随。敌人越聚越多，总兵力达到10万人；包围圈也越来越小，红军被困在纵横约30里的狭小区域里。

为了便于突围行动，红2、红6军团再次进行轻装，并把在桃子溪战斗中缴获的两门山炮中的一门埋掉了。另一门山炮一直跟着红二方面军（由红2、红6军团组成）长征到达陕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这门山炮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

藏，供人参观。

红军采取虚虚实实、布设疑兵的战法，巧妙地从郭汝栋和樊崧甫纵队接合部处突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于15日到达毛姑、青山一带。16日，红军第三次进入云南彝良县奎香地区。

从3月7日，红军第一次进入奎香，短短十多天，红军三进奎香，在云贵两省边界声东击西、神出鬼没。这下可把尾追在后的敌军难住了：共军主力到底在哪里？

就在敌军总也摸不着红军的踪影，不知所措之际，21日，萧克率红军主力经几天急行军，挥师进入宣威境内。

宣威是滇东北的重镇，又是川黔两省通向云南的要冲。一年前，中央红军长征时就曾在这里与滇军进行过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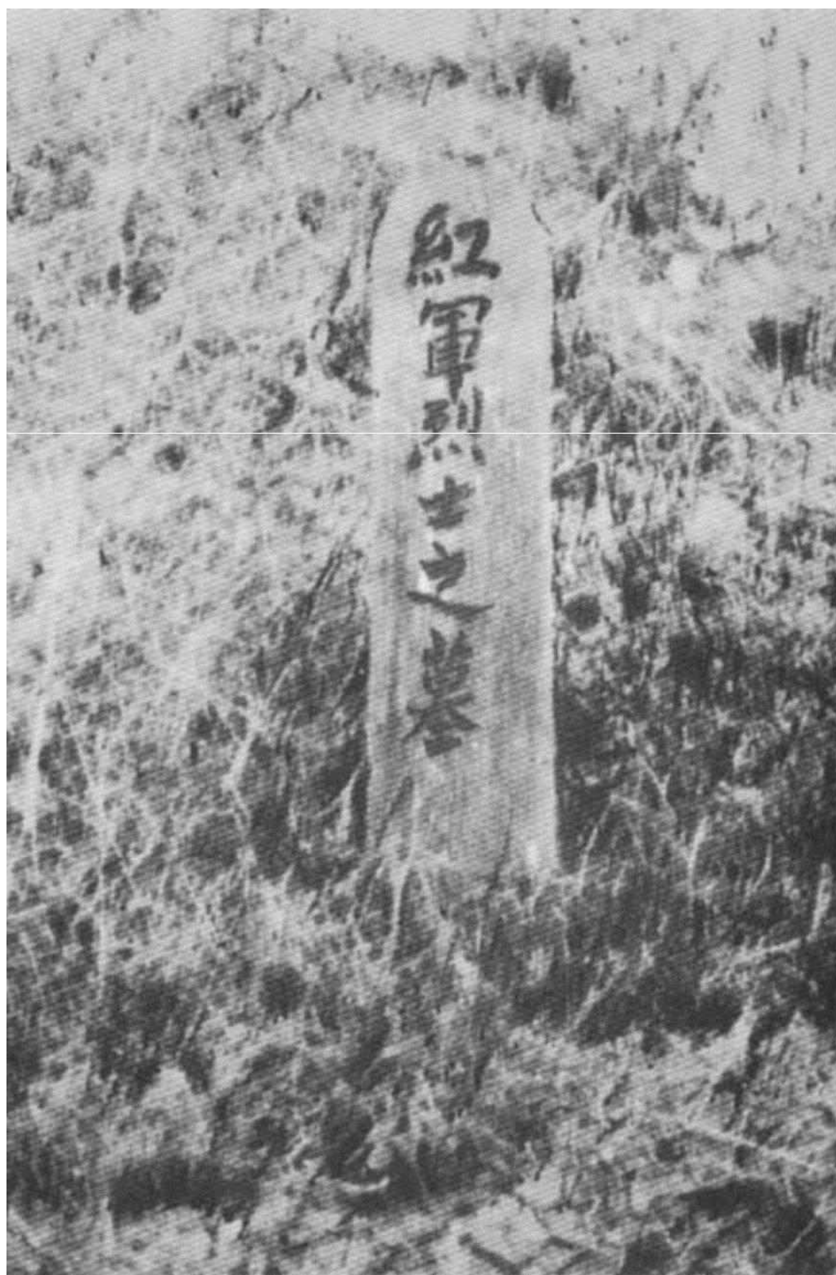
龙云顿时慌了手脚。此时，滇军主力正由孙渡率领在黔滇边境“追剿”红军，昆明实际上成了一座空城，一旦宣威有失，红军必将威逼昆明。于是，他急调各县团队临时编成2个保安团，委派罗廷标、和吉光为团长，统归第1旅旅长刘正富指挥。

22日，刘正富率领第1旅第1、第2团以及新编的2个保安团、补充第3大队李崧部、广富独立营龙奎垣部，共约5000人兼程赶赴宣威布防。当行至来宾铺时，红军已占领宣威的虎头山一带高地，两军随即遥相对峙。

23日，天刚刚放亮，刘正富指挥所部向红军阵地攻击，虎头山战斗就此打响了。激战至午后1时许，滇军渐渐不支。

就在这时，滇军第3纵队主力尾追红军而来。孙渡回忆道：

第三纵队正在昭通、彝良之间行军途中，忽闻向镇雄前进的红军，又回师经滇黔边境向云南的宣威进发，于是，第三纵队也不得不回头跟踪尾追。在途中我曾接萧克等来函一件，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我一面转报龙云，一面仍继续尾追。追至宣威北方的途中，左边有一条岔路，红军已由这一条岔路走了。但我到此并未尾追，只派兵一部在岔路附近警戒，以掩护后续部队通过，主力部队仍径向宣威南进。因为我所走的这条路，可以利用会泽通宣威的电报线路，尽先搜集情报，以便酌定行动。



红2、红6军团在云南虎头山与滇军激战后，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阵亡烈士掩埋，筑坟纪念

当行至距宣威县城约四十里附近时，据当地老百姓说，相隔三四

里就有电话线。我即令通讯兵去挂电话，随即找宣威县长范捷正询问情况。范云，第一旅现正在虎头山附近与红军接触，闻尚有红军继续到达云云。我即着范迅速通知旅长刘正富，说我们部队已经到达，随即可以参加战斗。

刘正富闻听此讯，好比落水人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派副官飞马请援。第5旅旅长鲁道源亲自带领队伍跑步前进，赶到来宾铺的山脚。刘正富的指挥所就设在山脚的一个凹地小水沟边。

见到鲁道源，正急得焦头烂额的刘正富喜出望外，连连拱手称谢："老弟，你可来了！再迟些，我这条老命恐怕就保不住了！"

鲁道源说："不要讲这些了，快把前面的敌情告诉我。"

刘正富擦去额头上的冷汗，心有余悸地说："今早8点多钟就与共军交火，双方互相冲杀了几次，第1旅的第1、第2团伤亡不小。现在情况略有缓和，正面大部分处于对峙中。李崧的补充大队全是新兵，一触即溃，据报退到曲靖去了。罗廷标、和吉光的两个保安团全是由县团队临时拼凑成的，没有什么战斗力，就没有使用到正面火线上，只用他们当当警戒。现在我把机关枪全部集中在一起，打算把机枪子弹打完，留最后一颗来打我自己。"

当鲁道源问起当面红军的情况时，刘正富支吾了半晌，也说不出什么来。于是，鲁道源干脆带上第9团团长冯云、第10团团长侯振邦和旅参谋长常绍群等人，亲自到高地上去观察。

下午4时许，红军向滇军左翼阵地发起了猛攻。

鲁道源命第10团火速增援。该团第3营刚刚冲到双方阵地的中间地带，就与红军展开了肉搏。

滇军哪里是红军的对手，没过多长时间，便溃不成军，2个连长被击毙，连营长也被活捉了。鲁道源慌忙令第9团第2营增援上去，并下达了"不准后退半步"的死命令，才算打退了红军的进攻，把左翼阵地巩固住。

此时，第3纵队各部相继赶到。孙渡素知红军的厉害，担心刘正富旅有被吃掉的可能，即亲率警卫营一个连赶到虎头山的虎头上，观察红军部署的态势。

只见在观音堂左侧，满山遍野的红军正在展开猛烈攻击，滇军阵地岌岌可危。孙渡即派萧本元的第5团增援观音堂左侧阵地。但于事无补，没过多久，萧团就招架不住，败象已露。直到马继武的第14团

也增援上去，滇军的虎头山阵地才算稳固下来。

天色渐渐暗下来，红军一路一路地退回正面高地上的方形据点里去了，枪声渐稀，战况随即沉寂下来。

孙渡深知红军擅打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如今一时吃不下刘旅，必撤围他去。

果然，萧克见滇军主力陆续增援上来，再打下去恐难以奏效，徒增伤亡，便于当夜撤围东进，经水坪子循海岱冲、龙场分成两路：一部向东由宝山等地入黔境，--部向南经马街去平彝。

孙渡遂命刘正富旅暂留现地清理战场，其余各部于次日午后出动，向平彝方向追击前进。

安恩溥回忆道：

此役，第三纵队重伤送昆明甘美医院、陆军医院治疗的营长董文英等以下官兵二百余人，死亡、轻伤统计数字尚未详知。红军的伤亡，经滇黔“剿共”总司令部政训处派人将红军阵亡尸体反复照相，大肆宣传说，击毙红军第十七师师长刘转屯、政委汤释锋、主任陈文彬、赤卫队营长马秋得及其他团营长以下一千五六百名，照相后掩埋九百余名。

虎头山战斗后，龙云自我陶醉地认为已把萧克部彻底击溃，立即向蒋介石报喜，并四处吹嘘：“一担桶已经打烂了一只，剩下一只好打了。”

28日，红2、红6军团在乌蒙山区回旋作战月余后，跳出了国民党“追剿”大军的重围，进占黔西南盘县、亦资孔地区，准备创建苏区。

30日，贺龙、萧克接到红军总司令部指示：立即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次日，红2、红6军团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在攻占沾益后，又向曲靖前进并直趋寻甸。

此时，正陶醉在“虎头山大捷”喜悦之中的龙云突发奇想，准备调集滇军的全部兵力扼守普渡河，企图在寻甸地区全歼红军。

“云南王”的如意打算是：即使消灭不了红军，至少要把红军堵在东岸，将其压迫走向会理，不经过昆明，同时也有理由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云南，或者只能以少量部队进入云南。

于是，他命令孙渡率第3纵队堵住普渡河，又令第9旅旅长张冲率近卫第1、第2团和工兵大队、警卫营4000余人，从昆明星夜出动，

迅速赶到普渡河铁索桥西岸设防。

4月6日，张冲率所部由昆明出发，星夜兼程，于次日到达普渡河。部署如下：工兵大队在索桥东西构筑桥头堡，近卫第2团除派第3营过河东占领阵地，掩护工兵大队构筑阵地外，控制于普渡河西岸索桥上下，近卫第1团占领乐宰、千山一带阵地。



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方面军一部

7日，孙渡率部到达嵩明地区。龙云即派团务督练处长卢汉为代表，召集孙渡及各旅长到杨林镇开会。

会上，卢汉夸夸而谈："虎头山一战击溃萧克匪部七八千人，打死2000人以上，现在所剩贺龙匪部和萧克匪部万余人，和我们现在集结的滇军实力比较，相差20倍。只要大家硬干、蛮干、沉着三者结合起来，消灭共匪指日可待。"

随后，他大讲龙云的作战部署："龙总司令的意思是要消灭共军于普渡桥附近，现已派第9旅张冲旅长率总司令的直属团队日夜兼程赶赴普渡河西岸一带防堵。普渡河上只有一座小桥，共军绝不能通过。只要孙指挥官率第3纵队加紧追上，一定可收歼灭之功。"

孙渡则不以为然，反驳道："许多大江大河都阻挡不了共军，小小普渡河起不了什么阻拦作用。他真正要过，你堵的地方他不过，折头一转，从别的地方过去了。如果堵的人不小心，会反而吃亏的。再

说，即使堵好了，他不同你打，大转起来，问题就多了。不如压迫他快点走为好。”

在座诸将不住地点头称是，大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之势。

卢汉气呼呼地说：“龙总司令说了，大家是知道纪律的。如果这次再不努力，那就难逃纪律的制裁。”

随即转身离去，会议不欢而散。

鲁道源冲着卢汉的背影，愤愤不平地骂道：“他妈的！千辛万苦干到今天，得这样一个结果，还有什么干场！”

明知在普渡河围歼红军的计划过于荒唐，但军令难违，孙渡只好硬着头皮照办了。

8日，孙渡率第3纵队由嵩明县城出发数小时后，即接到报告：工兵大队在普渡桥附近，与一小部红军稍一接触即狼狈溃逃，红军已过普渡河向滇西大道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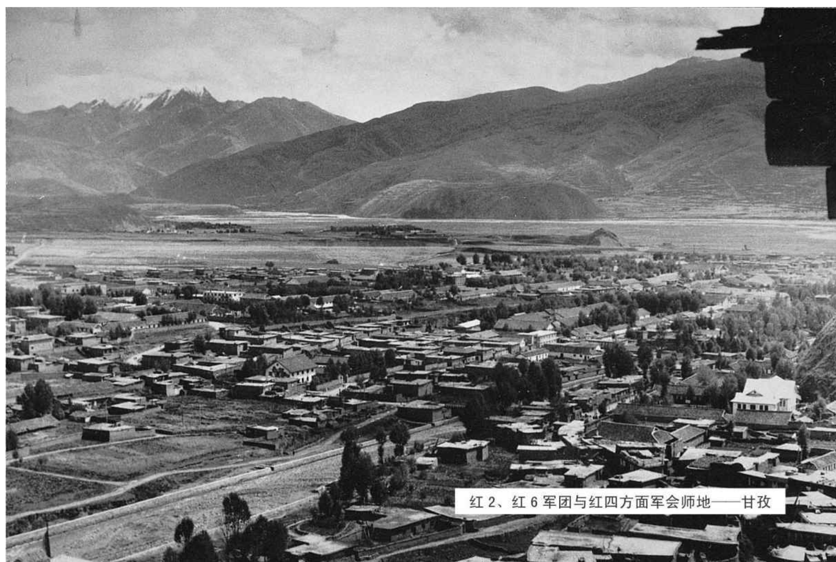
等第3纵队气喘吁吁地赶到普渡河畔时，只见河的上下游到处可以徒涉，红军早已渡过河，不见踪影了。

孙渡回忆道：

龙云之所以有此计划者，实由于宣威虎头山之役，他曾谎报蒋介石邀功。现更认为普渡桥的地形比虎头山险要得多，所谓“天赐良机”，可以邀得蒋介石进一步的宠幸。但是，他的直属部队太不争气了。据第九旅旅长张冲在安宁见我时说：“在行军中，看见山上被野火烧焦的灌木，就认为有共军，进行了好久的射击，以致延宕了抢占渡口的时间。”

龙云在昆明大唱“空城计”，偏偏贺龙不是司马懿。

红2、红6军团渡过普渡河后，飞快掉头南下，穿过密密麻麻的滇军间隙，如蛟龙摆尾，迅速占领了距昆明20里的富民县城，全歼守敌。随即大军云集昆明城外，摆出了一副攻城的架势。



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地——甘孜

昆明城防空虚，一时间人心惶惶，鸡飞狗跳！

红军兵临城下，而手中无兵可调，龙云顿时惊慌失措，坐立不安，接二连三打电报向蒋介石求救，并把军官学校的学生都拉出来守城，又电令守在普渡河的滇军十万火急回救昆明。

时任云南省团务处副处长兼昆明城防司令的高蕴华回忆道：

当时，代龙核阅文件的胡道文，到城防司令部对我说，昆明为首善之区，关系甚大，现将军队全行派出，只余宪兵、警察及教导团学员防守，恐有疏虞，望不可大意云云。我回答说："龙主席此次对红军入境，比上次更加重视，使用部队可谓全力以赴，盖有鉴于贵州王家烈前车之覆，深惧蒋介石假途灭虢，夺取云南地盘。至于昆明城防，四围碉堡现已构成，由数百名久经作战的教导团学员扼守，三几天可保无虞。蒋介石部队虽不可靠，我第三纵队各部，与红军接触，距离不远，红军不会攻坚，请你放心。"次日清早，即见警卫大队调回省城，当系胡道文向龙进言之故。

滇军急如星火地驰援昆明，正中了贺龙的调虎离山之计。

红军突然甩开追兵，渡过螳螂川，分兵两路，向滇西挺进。楚雄、镇南、祥云、宾川、盐兴、牟定、姚安、盐丰、鹤庆等县城都是民团防守，兵力单薄且战斗力不强，而且这些地区又较为富庶，官僚地主搜刮的财物甚多。因此，红军每天行军百里以上，或强攻或奇袭

或智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横扫滇西，下楚雄、破祥云、攻宾川、克鹤庆，进军神速，势如破竹。同时缴获颇丰，得到了充足的给养，体力有很大恢复，士气高昂，迅速成为一支粮弹充足、体力充沛的大军。

直到这时，龙云才尝到了贺龙的厉害，惶惶不可终日，暗地里叮嘱手下诸将：“切忌穷追，只需把红军送出滇境。”

滇军诸将心领神会，果真严守龙总司令的命令。常绍群回忆道：

滇军尾追着红军，经过禄丰、楚雄、盐丰、姚安、大姚、宾川、祥云、洱源、鹤庆都没有与红军接触。每天都是第五旅充当前卫部队，同红军的后卫部队相隔不远，保持一定的距离。到楚雄时，红军在楚雄出去的保马街宿营，滇军的第五旅只好在保马街后面的公路露营。次晨出发时，红军后卫部队的红小兵一面走一面唱歌，我们都听得见。红军走得快，我们也走得快，红军走得慢，我们也走得慢，一直到达丽江县境，红军便由丽江的石鼓渡口渡过江去了。

25日夜，红2、红6军团在石鼓街、石门关、白粉墙、巨甸街各处昼夜不断地抢渡金沙江。至28日黄昏，全军胜利渡过了金沙江，踏上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征途。

东征战役

【交战时间】1936年2月20日～5月5日

【交战双方】红1、红15军团；国民党晋军阎锡山部

【指挥将领】毛泽东、彭德怀；阎锡山

【战果】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约7个团

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明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陕甘苏区。这样，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便成为党和红军的首要任务。

虽说经过劳山、直罗镇两役，红军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苏区，但摆在毛泽东和红军面前的形势依旧万分险恶。

当时，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减员很大，有些部队只剩下空架子，连长只好去当班长，打仗缴来的枪都要请人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全部兵力也只有14000余人。武器装备更是差到极点，所有的火炮在长征途中都丢掉了；枪弹奇缺，每支步枪平均只有几发子弹；缺衣少药，红军将士们在大雪纷飞、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里仍身穿单衣、脚踩草鞋行军作战；中央红军大都是南方人，对陕北黄土高原的水土不服，加之刚刚经过一年多万水千山的艰苦转战，体质严重下降，亟待休整和补充。

陕甘苏区位于陕西、甘肃两省边界和陕西省北部地区，虽西起甘肃、东濒黄河、南达富县、北接长城，但面积狭小，仅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40多万；除瓦窑堡外，几乎所有的大小城镇增色被敌人占领，陕北苏区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命脉——西（安）肤（施，即延安）公路，也被封锁，整个根据地被切成了几块互不相连的地盘；境内山多林稀，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粮食缺乏，兵匪横行；频繁的自然灾害与国民党连年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更使这一地区雪上加霜，陕北人民贫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根本无力解决红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给。当时苏区军民的吃饭和穿衣都成了大问题，部分地方甚至连人畜吃水都无法满足。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前排左二）、朱德（前排左三）、林彪（前排左四）与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在一起

当时国民党的一些报纸曾幸灾乐祸地断言：如果认为红军在那里能够生存下去，那将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更为严峻的是，陕甘苏区周围敌军重兵云集——

东面，阎锡山部正太护路军司令兼陕北“剿匪”前敌总指挥孙楚率5个旅，分别布防于吴堡、义和镇和神木、府谷地区；

南面，杨虎城指挥的第17路军以第17、第43师据守宜川、韩城、白水地区；

西南面，张学良的东北军第67军驻守延安、甘泉、鄜县、洛川一带，第57军驻守甘肃合水、太白镇一带并拟东调进入陕西黄陵地区，阻止红军并企图隔断陕甘苏区与关中苏区的联系；

北面，岳井秀第86师从榆林、靖边、定边、安边向南不断袭扰，企图夺占陕甘苏区的瓦窑堡、安塞、安定等地；

东北面，高桂滋部第84师踞守绥德、米脂、清涧一带。

连同青海马步芳、甘南马鸿宾和宁夏马鸿逵等部，敌军总计20余万人，敌我兵力之比接近20:1，形势之险恶远远超过中央苏区的历次

反“围剿”斗争。

显然，红军要生存，要发展，在陕北“守摊”是没有出路的。

12月23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主张红军应当利用全国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

1936年1月31日，中革军委在延长县城召开会议，对红一方面军的编制进行了调整：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28军。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第1、第2、第4师；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第75、第78、第81师；红28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伍晋南，下辖3个团。并决定红一方面军约1.3万人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甘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

眼见红军主力大兵压境，随时有渡河东征之举，盘踞山西多年的“土皇帝”阎锡山再也坐不住了。

阎锡山，字百川、伯川，号龙池。生于1883年，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人们习惯把山西人称作“老西子”，阎锡山故有“阎老西”的绰号。

9岁时，阎锡山入私塾读书，16岁到县城吉庆昌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投机。在一年多的学徒生活里，他把投机商人那套精打细算、唯利是图、投机钻营的手段统统学到了手。

1900年，阎锡山因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2000吊，被迫逃往太原躲债。两年后，走投无路的阎锡山考入山西武备学堂，从此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

1904年，阎锡山东渡日本，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知识，后入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对日本教官鼓吹的实行军国主义、征兵练武、称雄世界的思想极为赞同。留学期间，阎锡山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中国同盟会。

在民国时期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军阀中，阎锡山向以狡诈奸滑、善于钻营、见风使舵著称，人称“九尾狐狸”。

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就已敏锐地意识到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将迅猛兴起，便一面讨好清廷顽固派和立宪派，以获取信任，攫取兵权；一面加强与同盟会的联系，大力培植私人势力，以图在关键时刻掌握革命领导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太原革命人士积极响应，举行武装起义。时任新军第43混成协86标标统（相当于团长）的阎锡山又玩弄起两面派的伎俩，一面调动部分兵力协助清军守卫抚署，一面密令余部击溃抗拒起义部队的清军巡防马队营，自己悄悄地躲到一边，暗中操纵，成则居功，败则诿过。当看到起义胜局已定时，阎锡山才正式出面，宣布率部起义，被推选为山西都督。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当上临时大总统后，阎锡山立即投靠效忠。因与袁大总统素无交往，他就想方设法讨好。除以重金贿赂袁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任命袁的亲戚陈钰为山西民政长、袁的拜把兄弟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外，甚至不惜将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城长住，作为人质，以博取袁世凯的信任。当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时，他立即声明脱离国民党，并秉承袁的指令，在三个月内将山西国民党部一律解散。当袁世凯想复辟称帝时，他就投其所好，密奏“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并再三电请袁登基称帝。当蔡锷等在云南发起护国讨袁战争时，他又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阎锡山的用心良苦，终于赢得了袁世凯的信任和赏识，被封为一等侯。



阎锡山

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袁死后，阎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这时，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坐拥实权，成为北洋军阀的中心人物，阎锡山便又使出讨好袁世凯的手段，多方与之接近，甚至拜其为师。

时北京政府内部分裂，大总统黎元洪与段祺瑞矛盾很深，阎锡山

第一个追随段反对国会，并在段被撤掉总理职务后，宣布脱离北京政府。随后他又和段一起声讨进京复辟的辫子军张勋。在段兴兵镇压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时，他立即致电表示听从段的命令，并派兵入湘与护法军作战。

就这样，阎锡山一步步取得了段祺瑞的信任，当上了山西省长，自此独揽山西军政大权。

同民国时期的许多权势人物一样，阎锡山在用人上也存在着相当浓重的乡土、亲族观念。“亲不亲，故乡人”是阎锡山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对亲戚格外照顾。他夫人徐竹青的叔叔徐一清，当上了山西财政司司长兼大汉银行经理，掌握着山西全省财权。还有个远亲，靠关系进入山西省粮食局任职。有人曾反映“此人根本不懂粮食”。不料，阎锡山哼了一声说：“那他会吃粮食么？会吃就行。”于是，“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成为山西的流行语。

当时的中国，各路军阀之间矛盾加剧，混战成了家常便饭。为确保自己在山西的封建割据地位，阎锡山施展两面三刀的功夫，见风使舵，倚强凌弱，不断扩充势力。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交战双方都派代表与阎锡山联系，争取支援。老谋深算的阎锡山认为此战胜负难料，便借口力量薄弱，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暗地里派人到北京、天津探听情况。当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吴佩孚败局已定时，阎锡山立即出兵联冯，拥护段祺瑞主持国事。

两年后，直奉联手发起反对冯玉祥的“讨赤”战争，阎锡山又采取两面应付之策，一面拉拢冯玉祥，对其表示继续友好态度；一面又勾结吴佩孚，进攻驻守京汉铁路河南段的冯玉祥国民军郑思成部，并出兵隔断国民军河南与直隶的联系，使冯玉祥处于直、奉、晋军三面包围之中。经三个多月的激战，国民军被击败，冯玉祥退守西北地区，阎锡山趁机将势力扩大至绥远，并收编了冯军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部，将晋绥军扩充到17个师又8个炮兵团，成为颇具实力的一方诸侯。

北伐战争开始后，阎锡山伺机观变，以便乘机扩充势力，巩固自己在晋绥的统治。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他应广州革命政府之邀，派老同盟会员赵丕廉前去商讨战事。临行前，他再三叮嘱：“秘密未揭开前，由你负责，揭开以后，是我的事。”

赵丕廉先到武汉，后至南昌面见蒋介石。蒋称阎是“老前辈”，希

望他能早日举事，并以国民军委会名义授其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老奸巨猾的阎锡山不愿立即表明态度，也不就任总司令一职。直到一年后，他才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提议的名义下就职，正式废五色旗，改悬青天白日旗。

阎锡山比蒋介石大4岁，又同在日本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可以说是蒋的大师兄。说起来，两人也曾有过很好的合作。

1927年7月宁汉合流后，蒋介石被迫下野出游日本。不久，阎锡山与冯玉祥即联合电请蒋回国，主持“北伐”战事。他在电文中称：“公留党在，公去国危，个人之去留事小，党国之存亡事大，爰用春秋责贤之义，再挽浪中已去之舟”，竭力表示拥蒋之至诚。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蒋介石回国复职后，下令第二次“北伐”。1928年2月15日，他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改编军队，成立4个集团军。次日与阎锡山相会于开封，当即任命阎为第3集团军总司令。在占领北京、天津后，阎又被蒋任命为平京卫戍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和北平分会代理主席、内政部长、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蒋阎二人的关系达到了顶峰。

然而，辉煌过后便是衰败。

蒋介石对非嫡系的地方军阀一向视为异己，欲翦除之而后快，阎锡山当然也不例外。更何况这位晋绥军的掌门人羽翼已丰，势力由晋、绥扩展到冀、察和平津地区，成为强大的地方实力派，一旦拥兵自重，蒋介石又如何放心得下？而阎锡山对蒋介石打压地方势力的那套伎俩也早有耳闻，处处小心堤防。

于是，蒋阎二人由互相猜疑、互不信任日渐激化为水火不容的矛盾，最终演变为战场上的殊死拼杀。

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大幅裁减地方军队，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调统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归命中央”，企图收拾中央军以外的地方军阀实力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军长、司令满天飞的战乱时期。那时，有兵有枪就能割据一方，就意味着权势、金钱和美女。因此，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首要任务就是保住自己的队伍和地盘，不被敌人吞掉。因此，编遣命令一出立即遭到各派军阀的强烈反对，继而大打出手。

先是蒋桂战争爆发，随后冯玉祥通电讨蒋，接下来张（发奎）桂

联军、唐生智、石友三也相继加入反蒋行列，但均被蒋介石一一分化瓦解。

工于计谋的阎锡山深感威胁，认为早晚也要轮到自己头上，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先是与唐生智约定，以阎为首共同倒蒋，并答应接济唐60万元军饷。

谁知，唐生智背弃前约，提出拥汪（精卫）反蒋的主张。阎锡山极为不满，转而串通张学良等人通电拥蒋反唐，并率晋绥军出兵郑州。

蒋介石对这位“师兄”出尔反尔的把戏早已察知，讨唐作战行动结束后，即授意韩复榘在郑州城里摆下鸿门宴，准备活捉阎锡山。

能够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独霸山西多年，统率数十万晋绥大军的阎锡山绝非庸碌之辈，心知蒋介石对自己不会安什么好心，便仓促化装逃离郑州。

跑回太原的阎锡山越想越生气，干脆于1930年2月致电蒋介石，称：“戡乱而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味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要求蒋下野。蒋介石也不甘示弱，当即回电笔伐。就这样，蒋阎二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所谓的“国是”之争。

不久，参加倒蒋的国民党各派系及大大小小军阀的代表云集太原，商议举事。

3月14日，鹿钟麟等57人发出倒蒋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一周后，阎、冯公开发表倒蒋通电。



中原大战爆发后，东北军入关援蒋、驰抵天津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总司令，并召开所有倒蒋军阀代表会议，决定组成8个方面军，沿平汉线、陇海线和津浦线三路分进。蒋介石则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免除阎锡山本兼各职，通令缉拿，并组成讨阎军。

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就此拉开了帷幕。双方共投入百万以上的兵力，在中原大地展开鏖战。

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率东北军大举入关，直插倒蒋联军的后路。阎、冯军纷纷败逃。10月8日，阎锡山、冯玉祥宣布下野。阎本人则化装潜入大连，在日本人的庇护下过起了寓公生活。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1931年8月5日，阎锡山在日本飞机护送下潜回大同，隐居在老家五台县河边村。后经他多方托关系在蒋介石面前疏通，于1932年2月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不久又恢复了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此与蒋介石“重归于好”，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在那个军阀连年混战、世事变幻无常的特殊时期，战场上同生共死的关系瞬间变成兵戎相见的关系，早已屡见不鲜。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陈济棠、唐生智等人打打和和，和和打打，关系就像一只万花筒，令人捉摸不透。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说穿了，就是相互利用。不过，在反共方面，蒋、阎二人却是出奇地一致。

1927年7月，也就是阎锡山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一个月后，就在山西实行“清党”行动。他忠实执行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共政策，提出“今日的清党，清其人，尤须清其法”，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工农革命群众和进步青年学生。并亲任军法审判庭长，杀害了共产党员王瀛等人。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的“围剿”，曾派出一个师的兵力远赴江西参战。

1934年冬，阎锡山见陕北红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声势逐渐壮大，深恐红军东渡入晋，便与原驻河南的高桂滋第84师勾结起来，怂恿高率部到绥德进攻红军，并以晋绥军第71师温玉如旅驻汾阳、离石，担任军渡河防；第71师方克猷旅经军渡渡黄河入陕，分驻义合镇至绥德一线，为高部后援。

1935年春，高桂滋第84师、井岳秀第86师在陕北不断被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阻隔包围消灭。眼见陕北红军越“剿”越多，阎锡山奉蒋介石之命，以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为陕北“剿匪”前敌总指挥，率4个旅入陕，会同已在陕北的方克猷旅，并指挥高、井两师，合力进攻红军。

阎锡山对此次“进剿”信心十足，满以为陕北红军势单力孤，缺枪少弹，在兵力和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晋绥军围攻之下，将不堪一击，很快就会土崩瓦解。

谁知，这一“剿”便是半年，陕北红军非但没有被“剿”光，晋绥军反倒是损兵折将，屡屡遭到重创。

8月1日，刘志丹率红26军一部和红27军共5个团及游击队，由清涧北上，秘密进至吴堡、宋家川地区，以一部兵力进攻慕家塬守军方克猷旅史泽波的第2营又2个连，主力进至慕家源以南地区隐蔽待机，求歼援敌。

果然，孙楚急令陈长捷第208旅和护路军马延守旅日夜兼程，驰援慕家塬。

18日，红军2个团和赤卫队数千人在绥德定仙墕设伏，歼护路军马延守旅先头1个团。团长吉文蔚化装成士兵，混入逃跑的队伍中，从山崖上跳到山沟，隐蔽在一个土洞里，侥幸躲过红军的搜查，趁夜逃回。

此役，红军共歼晋绥军1个团又4个连，俘敌1800余人，声威大

振。晋绥军入陕各部不再张狂，行动变得谨慎异常，死守碉寨不出。

噩耗传来，阎锡山立即召集黄河沿岸从河曲到永济共21个县的县长开会，商议对策。

会上，阎锡山操着一口浓重的五台口音进行训话："晋陕毗连，陕北共匪之活跃，实威胁山西之安全"，"剿共必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而防共更应该是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政治防共，须使多数人民参加防共组织"。

为此，会议宣布成立"防共委员会"，在全力推行"军事防共"的同时，大搞"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和"民众防共"。

会后，阎锡山在山西全省各地成立了以地主和富农为核心的、有一定社会基础的群众性组织——"主张公道团"，以及半军事性组织——"防共保卫团"，并亲自担任总团长。

"主张公道团"又称"好人团"，是阎锡山"自强救国同志会"反动骨干组织操纵下的外围组织之一。总团部设在太原，县、区、村成立各级团部，由总团部派来的经过专门训练的骨干担任团长、副团长，并由各县"主张公道团"选拔训练村团长。可谓层层控制，组织严密。

阎锡山把这个反动组织冠以"主张公道"的名字，欺骗老百姓："共产党有共产主义，我们也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共产党有组织，我们也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这是我们组织的宗旨"，"共产党不公道"，并大肆污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是"坏人"，"今天我教你们组织'主张公道团'，就是教你们拿出力气制裁坏人，消除社会不平，建立社会公道，消灭共祸。"一语道出了他组织"主张公道团"的反共目的。

沿河各县相继成立了12个"防共保卫团"，统归"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爱源负责训练，统一指挥，并在太原设立"防共保卫团总指挥部"，办理各项有关事宜。各县县长均兼任"防共保卫团"副团长和军事法官，对当地实行军事管制，凡认为和河西有联系或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可先斩后奏，有权直接处死。各机关团体的公务员和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教员一律参加军事训练。特务、军警四处活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同情抗日的革命志士，并张贴布告，标出赏格："谁报告一个共匪敌探，赏银洋五十元；有人指点捉住一个，赏银洋一百元；有谁抓住杀了，一个人头赏银洋200元。"总之就是要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漏掉一个。致使不少到山西走亲访友的无辜百姓或行商小贩，被当作红军密探而遭捕杀。甚至系红色裤带、带红色物品

或身装小镜、制钱的人也均在嫌疑之列。短短几十天，晋西沿河数县被杀的群众即达百余人，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这年冬天，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阎锡山暗暗叫苦不迭，生怕共产党进到自己的地盘上来。虽然没有与中央红军交过手，但其英勇善战却早有耳闻。

果然，直罗镇一役，红一方面军全歼东北军第109师，师长牛元峰也做了红军的枪下鬼。阎锡山闻讯，更是心惊胆战，急令孙楚将入陕主力撤回河东，作跨河守备，以巩固晋西，并把手下谋士重臣都找来开会。

见众人一个个坐立不安、面露惊恐之色，阎锡山心中不悦，为稳定军心，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吹嘘道："陕北共匪至多不过3万之众，初到陕北，立足未稳。而我方则南有中央10万大军向北进剿，北有我晋绥军四个旅向南压迫，共匪自顾不暇，渡河东征又谈何容易！再者，咱们拥有优势的炮兵和大量的手掷弹，就连中央军也没有这么好的装备。山地作战，更是相得益彰，共匪缺乏此种武器，咱们对共匪作战是稳操胜券。"

会后，阎锡山在山西境内积极防共备战，加强河防封锁，把沿河树木大部砍光，渡口崖畔削成陡壁，所有船只全部扣留黄河东岸，在南北纵长千余里的黄河岸边构筑防御工事。数月之内就修筑了高碉暗堡1000余个。每个碉堡驻兵1～2个班，重要渡口则驻兵1个排以上，配备机枪、迫击炮等重型火器。各碉之间的距离以火力能够相互交叉为准。在碉堡封锁线之外，又挖掘宽约1～3公尺、深约3公尺以上的外壕。交通路口要隘之处增设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据险扼守。

不久，中共中央发表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声明，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开赴抗日前线。

阎锡山一口拒绝，为加强河防力量，任命心腹大将、第34军军长杨爱源为前敌总指挥；任命第71师师长杨耀芳为"晋西警备司令"，驻于汾阳；任命第69师师长杨澄源为"晋南警备司令"，驻守临汾，分别指挥所部担任晋西、晋南各县的河防，配合孙楚正太护路军所部，企图利用黄河天险和吕梁的山隘要塞，采用"三线"、六区的纵深配备，层层设防，阻止红军东渡。

其中，黄河沿岸各个渡口为第一防线，是直接的守备地带。黄河东岸各重要城镇，如柳林、中阳、石楼、离石等地为第二防线，是中间阻抗地带，驻扎重兵严密防守，并相机应援沿河各个渡口。依托吕

梁山区的云绮岭及山隘要道设置第三防线，由周原健旅、霍原璧旅分别构筑工事守备，以弥补第一、第二防线之不足，待红军突破河防后，利用山隘要塞阻滞红军继续东进。

阎锡山真是处心积虑，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该防的也都防了，便四处吹嘘：山西是“钢铁山西”，“人过要留钱，鸟过要脱毛”，红军就是插上翅膀也难以飞过黄河。

红军东征作战成败的关键是能否越过黄河天险，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如何渡河成为摆在红军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起初，红军领导人设想利用黄河结冰期从冰面上通过，并派红一军团长林彪实地侦察。但这年的气候反常，时值早春二月，部分河段却已有提前解冻的迹象，同时又考虑到东渡后同西岸的交通联络和准备必要的回渡，最终还是决定在河面较窄、地形较隐蔽的延水关至福禄坪地段上实施偷渡。一旦偷渡不成，则改为强渡。

渡过黄河是东征战役取胜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红军既无强大的火力配备，又无远程炮火支援，要想迅速、隐蔽地渡河，前提是必须选择准确、有利的登陆点。为此，彭德怀决定亲自去察看地形，选择渡河点。

时值隆冬季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到处银装素裹。凛冽的北风狂呼怒吼，夹裹着雪片和冰粒，刮得人喘不过气来。黄河东岸防线上的敌军冻得缩成一团，早就躲在碉堡里生火取暖。这正是红军进行敌前侦察的大好时机。彭德怀回忆道：

我随毛主席到无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后，即率电台去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详细侦察渡河点。我用了七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以求既保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

1936年2月11日，毛泽东、彭德怀电令各军团长和军团各一先头师师长、各一先头团团长到河口一带察看地形，制订具体的渡河方案。

徐海东曾化装成当地老百姓的样子，头裹白毛巾，身穿羊皮袄，携带干粮，亲临河口一线的黄河岸边。白天，他观察敌情，选择地形；晚上就住在岸边的小村庄里，召集老船工询问水势，了解敌情；深夜伏案修改和充实渡河方案。就这样，徐海东整整在黄河岸边住了五天五宿，直到掌握了全部情况，才返回了军团部驻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徐海东与陈光、邓小平在一起

虽然渡河点选好了，但沿河渡船早被晋绥军全部拉到了东岸，不少船工、水手也被抓走。因而打造船只、征调水手就成为准备工作中最大的一个难题。

当地党政军民全力以赴，征调船工水手，昼夜赶制船只。尽管如此，用于渡河的船实在是太少了，根本无法迅速把这么多部队运送到河东去。怎么办？

红军就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有个同志无意中从老乡那里听到，过去有的走私贩子给阎锡山的部队偷运鸦片烟过河没有船，就买两只羊剥下皮，在羊皮内吹满气，夹在腋下，泅渡到河对岸。这下红军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用羊皮当浮具，扎筏子渡河。

时任红一军团工兵连连长的王耀南回忆道：

陕北高原好地方，牛羊肥来马又壮。在陕北，到处都可以看到羊群，有的像白云一样缭绕在山腰；有的似盛开的棉桃，怒放在山谷。羊的来源不成问题，关键是怎样完好地剥下羊皮。开始我们用刀剐，但不是剥得厚薄不匀，就是不小心把羊皮划破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些老乡，请他们示范。老乡们先把羊毛剪掉，从羊嘴里小心地划开一道口子，把羊的皮和肉分开，然后一手撕羊皮，一手用刀背轻轻锤打皮和肉的结合部位。这样，很快就把羊皮剥下来了。一点破损也没有，真是剥得又快又好。不久，我们也学会了。羊皮剥下后，我们先用细绳把羊的颈项和四条腿扎实捆住，然后通过腿部预先留下的一个小口子向着羊皮里面吹气，吹满后再用绳把这个口子捆死。这时，充满气的羊皮，又好像一只胖乎乎的绵羊出现在眼前。扎羊皮筏子，没遇上什么大的困难。因为，对这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跨过上百道江河、架过上百座桥梁的工兵战士来说，扎筏子早已是家常便饭。只是过去扎筏子用竹排和洋油桶等作浮具，而这次却是破天荒地用充满气的羊皮罢了。我们用木杆横竖捆绑搭成骨架，然后把吹得鼓囊囊的羊皮四脚朝天地夹在两根木杆之间，并用绳索捆扎结实，最后在架子上铺上木板，一只羊皮筏子就做成了。我们共做了两种羊皮筏子，小的用6张羊皮，共两排，一排3个；大的用12个羊皮，横三竖四。原来还想用牛皮代替羊皮，扎几个大一点的结实筏子。但一试验，由于牛皮硬，体积又大，吹不起来。只好作罢。当时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这可真是吹牛皮，破了产。”

18日，彭德怀、毛泽东下达东征作战命令。具体部署是：红一军团第1、第2、第4师和红十五军团第81师从绥德县沟口地段渡河，速占中阳县之留誉镇，并向南发展，同红十五军团取得联系；红十五军

团第75、第78师从清涧县河口地段渡河，速占石楼县之义牒镇，相机夺取石楼县城；红一方面军直属队随红十五军团主力之后渡河。

命令强调渡河要有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时间。然而统一时间，在当时做到却并非一件易事。聂荣臻回忆道：

因为当时指挥员所用的都是作战缴获来的破旧表，快慢不一。那时又不像现在可以通过广播校对时针。所以部队经常为遵守时间是否准时发生争执。有时上级批评下级迟到，下级不服，说照我的表我们还提早到达哩！为了防止扯皮，规定了一项制度：每天定时向上级司令部机关对表。当时，部队中还流行这样一句俏皮话，说，谁的"官"大谁的表准。这次渡河，毛泽东同志和我开了一次玩笑。19日他向部队发了一个电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我的一只旧表居然成了这次渡河时的标准表了。

过河，首先要打开一个登陆突破口。经反复研究，红一军团决定把突破口选在中阳县三交镇附近的坪上村渡口。

红2师第5团挑选了24名勇士，组成东渡突击队。每6人为一组，组长使用驳壳枪，队员一律使用缴获东北军的捷克式马步枪。每人配百来发子弹、4颗手榴弹。突击队还配备了1名信号员，8名水手和4名梯子手，全部都是经过长征的共产党员，最大的20出头，最小的才15岁。

20日晚8点，红军开始强渡黄河。时任突击队长的曾国华回忆道：

大家分乘上两只船，我在二、三组合乘的那只船的船尾。军团长便发出命令："开船！"顿时，篙桨一齐划动，木船迅速驶出沟口。

急流将木船一会抛起来，一会捺下去。河水汹涌翻腾，拼命地吼叫。水手们挥着热汗，勇士们瞪大双眼，不停地划，拼命地划，船急剧地顺水向下漂去。

远看岸边，雪白一片，就要靠近岸边的冰排了，大家的心像满弓上的箭头，真想插上双翅飞上岸去。就在此刻，岸上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子弹像暴雨似地袭来，四周的河水哗哗作响。信号员的头部中了枪弹，倒在船舱里；一个水手的胳膊也涌出了鲜血；船帮被打漏了，水呼呼地往舱里灌。在这紧急万分的时刻，我站起来扯开嗓子便喊："同志们！不要怕，赶快划，越快越好！"大家一齐动手，船就像插了翅一样，很快靠上了那块冰。因为用力过猛，船撞到冰上，又退

回好远，我们只好重划回去。当船离冰只剩几步远时，我喊了一声："下！"这时，也不管冰有多么厚，能否经得住人，大家都往下跳去。

敌人一见我们上了岸，射击得更加猛烈了，耳边只听到嗖嗖嗖的子弹飞过的声音。我们登上河岸后，便迅速散开，一面甩出去几十颗手榴弹，在敌人眼前构成了一道烟幕。随着这猛烈的爆炸声，我们端着刺刀，高声喊着："杀！"向敌人冲去。那守在河堤上的20多个敌人，见势不妙，撒腿就跑。

突击队上岸后，立即按照预定计划，分头抢占碉堡，一面布置火力防敌反扑，一面扩大突破口，掩护第二梯队登陆。

在红军牢牢控制住整个滩头阵地后，早已做好准备等待渡河的红军主力部队，源源不断地开到了河边。

为有组织、有秩序地顺利渡送部队，红1军团专门成立了渡河指挥部，由教育科科长孙毅任总指挥，负责调整渡河部队秩序；王耀南任副总指挥，分管船只调度和水上指挥。王耀南回忆道：

孙毅同志在长征中一直随身带着三件"宝"：一是腰间拴一只喝水、盛饭、漱口的三用瓷缸；二是既当棉衣又当被盖的老羊皮袄；三是一根手杖。他待人和气，说话幽默，群众关系很好，许多战士都喜欢同他开玩笑。开始渡河，由于人多拥挤，渡口秩序不很好，有的争着上船，有的不按规定坐好。孙毅同志见到这种情况，有时用手杖捅捅战士们的脊背，或者故意扬起手杖像要打人的样子。战士们一见是他，做个鬼脸，然后就顺从地按他指示办事了。

毕竟全渡口仅有6只小船，每船只能乘坐10人。船少人多，不时出现"争执"。

拂晓时分，彭德怀随军团直属机关来到岸边，准备上船。担任前卫的红224团小分队因急于过河，与彭总的警卫人员发生了争执。

孙毅跑过来准备"干预"，彭德怀却指示警卫人员把船让给小分队。过河后，小分队才得悉让船的竟然是彭总，再三请示团领导，要向彭总作检讨。

彭德怀反倒安慰他们："检讨什么哪，争先渡河，多消灭敌人，这是很好的表现吗！"

即便是这样精心组织，红军渡河还是遇到了不少麻烦和困难。这里地处黄河上游，崇山夹峙，浊浪滔天。河里的冻冰正在融化，汹涌

澎湃的河水夹杂着一座座小山似的冰排，一泻千里，咆哮而来。奔腾的激流一会儿把小船抛上浪尖，一会儿又按入波谷。特别是羊皮筏子，一旦撞上冰块，把羊皮划破，泄了气，筏子就会失去平衡而翻掉。

最终，工兵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连续作业一天两夜，用木船、羊皮筏子把红一军团的数千名战士渡送到了黄河东岸。当地的老百姓见到这么多红军靠这样一些简陋的渡河工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渡过了黄河天险，纷纷跷起大拇指称赞道："你们真是飞将军，飞过河来了。"

与此同时，红十五军团在清涧县的河口实施强渡，先后从辛关渡、贺家凹、舍塔里、咀头等地突破黄河防线，进占义牒，直趋石楼。红75师参谋长毕士悌不幸中弹牺牲，成为东征战役中牺牲的第一位红军高级将领。

红一军团从三交镇突破后，主力立即甩开留誉镇，分南北两路，直插关上村，将正准备东逃的阎锡山的主力——独立第2旅包围起来。

周原健的独2旅是阎锡山的看家王牌，下辖2个团，3600多人，装备精良，行动迅速，哪里吃紧，就"飞"到哪里去救急，号称"满天飞"。

关上村位居于中阳城南25里的南川河上游，地当两源相交的河谷山口，大山四合，一线中通，为东出汾阳、孝义，南下临汾的咽喉要冲。独2旅被红军堵在这里，进不能、退不得，只得踞守在一座破庙里垂死挣扎，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再也"飞"不起来了。

25日夜，围歼独2旅的战斗打响了。红1师由西北向东南、红2师由南向北发起攻击。时任红1师副师长的杨得志回忆道：

那一天，雪花纷飞，我们首先击溃了"满天飞"的旅部和1个团，又连夜包围了关上村的另1个团。在雪花乱飞的夜色中，陈赓等同志和我在山头上指挥。一团和十三团打了好长时间，却拿不下关上，看来敌人相当巩固。我有些着急，指着山下的战场对陈赓同志说："怎么搞的？我到前面看看去！"陈赓同志说："好！今夜一定要把这股敌人搞掉，不能让他们真的'满天飞'。"我带着几位参谋和警通人员冲到山下，听了红一团和红十三团领导同志的汇报。根据敌人负隅顽抗，我们从正面硬攻一时难以奏效的情况，共同研究了措施，由他们亲自指挥，两个团分别从两面实施包围，齐头并进。经过一番激战，这两

支部队终于一起冲进了村子，全歼敌人1个团，俘虏400余人，缴获了3门山炮。这一下“满天飞”再也“飞”不动了。

时任红2师政治委员的萧华回忆道：

我们二师阵地东南角的山洼里，打得特别激烈，阎锡山自己在太原有兵工厂，他的部队子弹多，打起来拼命放枪，并以猛烈的炮火掩护，多次企图突围。这是我军过河后遇到的头一次大仗，战士们劲头十足，又善于夜战、近战，因此卡住“布袋”口以后，就用手榴弹狠敲敌人，打到半夜光景，把这股敌人全部歼灭了。

战斗中，军团参谋长左权把王耀南叫到阵地前，指着破庙西南角一个敌人工事命令道：“王耀南同志，放一炮，把它炸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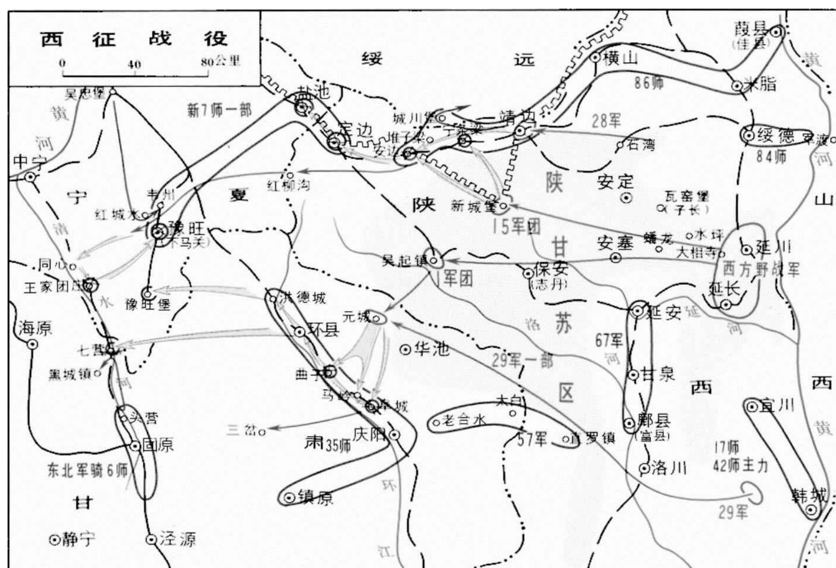
王耀南立即组织了一个爆破小组，在进攻部队的掩护下，用炸药一举把庙西南角上的围墙炸开了一个大口子。部队趁机一拥而上，将庙中残敌全部肃清。困守在村内骡马店的炮兵连见大势已去，只得向红军投降。

天亮了，红军战士还在漫山遍野地抓俘虏，收缴武器。此役，红军全歼独2旅第4团及炮兵连，击毙团长李清华，营长岳峻清、陈捷三等人，俘虏400多人。

时任红4师政治部副主任的王平写了篇题为《把“满天飞”打成“满山钻”》的战地报道，刊登在红一军团的小报上。

见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阎锡山慌了手脚，急忙把陕北的晋绥军4个旅调回山西，同时在兑九峪、阳泉曲一带集结主力，企图依据吕梁山要隘，阻挡红军东进。

3月10日，兑九峪战斗打响。红一、红十五军团从左右两翼对晋绥军杨效欧纵队约4个团发起攻击，决心聚而歼之。但由于阎锡山不断派兵增援，结果双方打成了胶着状态。从日出一直打到日落，晋绥军参战总兵力达到3个步兵师又1个炮兵旅共14个团。为避免与优势敌人拼消耗，红军在毙伤敌近3个团后，主动撤出战斗。



东征战役示意图

晋绥军并未追击，如同与红军事先商量好似的，于当晚也撤出了战斗。原来，激战一天，晋绥军损兵折将，尤其是杨效欧第66师和李生达所属第201旅损失惨重。阎锡山生怕与红军硬拼下去，会赔了老本，于是再三告诫前方诸将避免与红军主力作战，“要以马延守轻敌惨败，周旅关上被歼为诫，不得轻举妄动。”

中旬，红军鉴于晋南和晋西北敌人兵力薄弱，决定兵分三路，以红一军团并指挥红81师主力为右路军，以红十五军团主力为左路军，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进攻；以红十五军团一部及红30军和山西游击队为中路军，在石楼、中阳、孝义、永和、隰县之间地区牵制晋绥军主力，支援左右两路军。

16日，右路军南下，至4月1日，占领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农村，并攻占襄陵县城，扩大红军3000余人，筹款7万余元。

3月18日，左路军北上，至22日进至岔口镇。25日，派出1个团附骑兵连袭击晋祠镇，威胁太原。26日，向娄烦、岚县、兴县发展进攻，于31日在兴县以南曹家坡地区歼灭晋绥军2个营又1个炮兵连，俘200余人。

毛泽东随中路军转战于交口、石楼、隰县、永和一带。3月20日，他在给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的电文中指出：“敝军迭次

宣言，全国红军、白军亟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阎锡山置若罔闻，不顾民族国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与同胞为敌，诚不识是何居心？诸公深明大义，抗日救国早具同心，应请仗义执言，责阎锡山以叛国之罪，劝其即刻悔悟，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开赴张家口，与红军一同执行抗日任务。敝军本民族大义，决不追究其既往。”

红军步步进逼太原，阎锡山顿时急红了眼，一面命晋绥军第70师师长、预备总队司令王靖国指挥所部加强太原城防，大肆抓捕共产党和红军嫌疑，并标出赏格：“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5万元”；一面命正在晋西隰县、石楼一带尾追红军中路军的李生达部兼程北上，摆出“太原决战”的架势。

徐海东得知此事后，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看来阎老西确实比蒋介石小气得多，蒋介石说过，谁砍下我的颗头，给10万大洋。”

阎锡山在山西闭关自守20多年，连铁路都修成窄轨的，就是为了防止别的军阀势力进入他的地盘。如今，红军自东征以来，势如破竹，很快就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之间的吕梁山区，犹如一把把钢刀插在了“阎老西”的心头，令他坐立不安，深感红军势不可挡，唯恐老巢太原不保，便急电蒋介石派兵增援。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欣喜若狂，因为他信奉“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安内”不光包括“围剿”红军，也包括收拾地方实力派。

自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一天也未统一。经过几年浴血奋战，他先后打垮了两湖的唐生智和中原的冯玉祥、阎锡山，损耗了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赶跑了贵州的王家烈，就连一向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云南和四川也已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唯有阎锡山这只老狐狸，虽屡败于自己手下，但一直把持着山西军政大权，采取闭关自守之策，使中央军的势力无法进入山西，成为他的心头大患。

万幸的是，自红军长征以来，“追剿”红军便成为中央军进入地方势力派实力范围的最好的敲门砖。这次阎老西主动电请中央军入晋，真是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当即派重兵分路入晋，以3个师又3个旅分别集结在同蒲路南段和晋东南地区，阻止红军向晋东南发展；以5个师编成3个纵队协同晋绥军4个纵队防范红军进攻。同时，他还强令驻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长、延川进攻，截断红军退路，企图围歼红军于晋西地区。

针对敌情，红一方面军决定左右两路军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相机歼敌。



蒋介石（右一）指挥国民党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4月4日，右路军开始西移，但当进到河津地区时，因国民党军2个纵队向稷山逼近，随即北移，于15日攻占吉县县城，全歼守城的保安团，接着夺占平渡关至清水关各渡口，主力进至大宁、蒲县、隰县之间地区。

左路军则由康宁镇地区南下，在圪洞镇、金罗镇和师庄、三角庄地区三战三捷，共歼敌1个多团，俘晋绥军第196旅第392团团长郭登瀛以下700余人，于14日进至大麦郊休整。

郭登瀛是红军东征以来俘获的第一位敌军高级军官，对他的教育和处理必将在晋绥军官兵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如能像东北军的高福源一样，那对于沟通和阎锡山的联系，推动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为此，红15军团在大麦郊休整期间，军团政委程子华专门找郭登瀛进行长谈。程子华回忆道：

为消除他的思想顾虑，我一开始就坦率地对他说：“我也是咱山西南路解县人，在太原国民师范念过书，后来当了红军。在红军中我当过师长、军长、军团长，也做过政治工作。在我们红军队伍中，没

有薪水，官兵一样，一天只管三顿饱饭，只是想使普天下穷苦百姓都有好日子过。”

接着我又讲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中肯地向他指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目前大敌当前，国难日深，我们应团结一致，奋起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武装出武装。我们红军此次渡河东征，就是要到第一线去抗日。”

最后，我又针对他关注个人命运和出路的急切心理，坦率地对他说：“我们叫你在窟里多住几天，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更好地明了我们的主张。”

这次谈话后，我们即派人把郭登瀛送到红军总部保卫局驻地——康城附近的南窟。

郭登瀛被俘后，起初极度恐慌。他曾听过阎锡山的反动宣传：红军捉住俘虏后不是开膛活埋，就是用滚水浇死。于是，他抱定了必死无疑的想法，没想到共产党不仅没有杀他，对他不打不骂，就连他身上的怀表和几十块晋钞也未动。

在康城，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郭登瀛，开门见山地说：“我叫毛泽东，你听说了没有？胡汉民、蒋介石，我们都共过事，你也听说过吧？”

接着，毛泽东请郭登瀛坐到炕上，向他讲大敌当前、亡国在即的国内形势和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明确指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派，这个社，那个军，都搞统一战线，抗日胜利后，开国民大会选举。”

最后，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东进抗日的三点要求，请他代为向阎锡山转达。

由于当时红军已作出回师西渡的决定，郭登瀛即被送到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接见了郭登瀛，详尽地阐明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希望他回去之后动员和说服阎锡山走“联共抗日”的道路。郭登瀛深受感动，一再表示愿意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回去后劝说阎锡山及晋绥军高级将领“联共抗日”。

临行前，毛泽东让郭登瀛给阎锡山、赵戴文、杨效欧等晋绥军将领带上亲笔信，并发给他10元边币、90元山西省钞作为路费，还送他一匹战马，派两名警卫人员一直把他送到黄河岸边。

郭登瀛果然没有食言，回到太原后，立即向阎锡山汇报了他被俘的前后经过，呈上了毛泽东的信，并转达了中共关于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的主张。这对后来阎锡山接受中共抗日主张，提出“守土抗战”和“迎共抗日”的号召，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地区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分析华北时局，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并确定“第一期为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为进一步扩大东征战果，电令红28军从葭县以北东渡黄河，破坏晋绥军在罗峪口和黑峪口之间的沿河防线，直插晋西北地区，配合红十五军团迅速打通奔赴抗日前线的道路。

31日，红28军从神木强渡黄河，在地处晋陕交通要冲的罗峪口歼灭守敌第216旅丁炳青部1个营。然后转战兴县、临县、方山、离石与中阳一带，连战连捷，势如破竹。

4月13日，红28军进抵中阳县以西的留誉镇。这是一个只有数百户人家的小市镇，距离三交镇约三四十里。

三交镇是一个人口稠密、水陆交会的重要集镇，为中阳、柳林、离石三县的交通要塞，河西就是陕北苏区的绥德。这里南北两面环山，西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红军东征时，三交镇曾是红一军团的突破口。3月初，红军主力东进后，三交镇重新被晋绥军占据，由章拯宇第412团在此驻守。敌人依据黄河天险，在紧贴河岸的山腰、山顶和北山脚下均筑有碉堡，坪上村的山脚下也筑有工事，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渡口。

如果能拿下三交镇，便可打通了山西前线与陕甘苏区的联系。刘志丹深知此仗的重要性，部队刚在留誉镇安顿下来，他就拿上望远镜，与军里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爬上西山侦察三交镇的敌情。

黄昏时分，红28军在留誉镇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刘志丹首先传达了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指出：“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摧毁反动基础，扩大红军，我28军于明日就向三交镇发动进攻，务求歼灭该敌。”

说到这里，刘志丹环视了手下诸将，语气坚定地说：“这是东渡黄河后，同红军主力会师，向党中央献礼的一仗，一定要坚决打胜。”

“请军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攻下三交镇！”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作战计划很快就制订出来了：1团攻打南山，2团攻打北山，然后南北夹击直取三交镇。3团为军预备队，负责中阳县方向的警戒，并阻击可能增援三交镇的敌人。

一切安排就绪后，夜已经很深了。连续几天都没有睡好觉的刘志丹眼里充满血丝，没有丝毫的睡意，一会儿用铅笔在地图上做记号，一会儿在屋里来回踱步，思考着问题。警卫员几次送来饭，他一口也没有动，仿佛忘记了疲倦和饥饿。

参谋长唐延杰心疼地望着刘志丹，劝说道："军长，你去休息一会儿吧，有事我叫你，这样你怎么受得了？"

刘志丹只是摆了摆手，继续工作。

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1团进展顺利，接连突破敌人的数个碉堡，很快就从东南面攻上山。南山守敌见势不妙，全部撤到北山固守。这样一来，从东北面攻打北山的2团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攻击一时进展不顺。

唐延杰决定亲自去2团指挥战斗。刘志丹嘱咐道："你去叫2团占了前沿阵地，迅速向纵深发展，争取早和1团那面取上联系，以便两面夹攻敌人，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时间。"

同时，刘志丹命令1团迅速向北山移动，与2团夹击北山之敌。

但时至中午，北山的战斗仍没有太大的起色，敌人的抵抗十分顽强，火力也很猛烈。直到这时，红28军才发现战前的情报不准确，驻守南山和北山的守敌不是1个营，而是1个团部2个营又1个炮兵连。

要想夺取三交镇，就必须先拿下北山。刘志丹心急如焚，在同政委宋任穷商议后，决定亲自到1团督战。

宋任穷不放心，就叫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陪同刘志丹一起去。

刘志丹来到1团后，立即听取了团长黄光明、政委王再兴关于战况的汇报，指出："时间就是胜利，必须迅速组织力量消灭这些顽抗之敌。这次战斗，与河东整个红军安危有关，要号召党员和指挥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现在三交镇周围大部阵地已被我们占领，只剩下西北面那些主要山头，敌人凭着碉堡、工事拼命顽抗。二团那面强攻不易奏效，你们一定要没法积极动作，把敌人的阵脚打乱，以便迅速消灭敌人。"

随后，刘志丹又来到前沿阵地，找来1连指挥员，详细询问战

况。1连是最后攻入三交镇的先遣连队，接连突破了敌人的多个巩固工事和碉堡。尤其是突击班打得极为出色，在班长的带领下，全班一口气攻下了3个碉堡，消灭了四五十个敌人，而自己只有2个人负轻伤。

听完汇报后，刘志丹高兴地说："一连这种以少胜多，以小分队逐个攻取敌堡的办法是我们战胜与消灭敌人的好办法，一团应仿照这种办法，迅速夺取这些碉堡，消灭敌人。"

时近中午，刘志丹在与1团领导研究部署完战斗方案后，又提着望远镜，向阵地的最前沿走去。大家担心他的安全，都劝他不要再向前了。可刘志丹坚持要去，丝毫不理会头上嗖嗖呼啸而过的子弹，大步流星地住山上爬去。大家只好气喘吁吁地跟在他的身后。

刘志丹一直爬到一个距敌只有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才停下脚步。这是个长不足百米、宽约20多米的小山头，和敌人占据的山头对峙，中间仅隔着条小溪，小溪的西头和黄河汇合处的南边就是三交镇。

这个小山头上面光秃秃的，没有任何工事和隐蔽物，完全处于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刘志丹等人只好藏身在山头的棱坎下观察敌情。只见镇里的房屋道路历历在目，敌人的往来活动也隐约可见。

刘志丹高兴地对裴周玉说："你看这个山头不是一个理想的观察所吗？"

然后就聚精会神地观察敌情，并不断下达作战命令，让通讯员传达给1团指挥员。最后，他干脆坐在地上，拿出小本子，给宋任穷写了一封信，说明前线战斗情况，让通讯员送回军指挥所，他笑着叮嘱道："你告诉宋政委，过了中午，请他进三交镇去喝胜利酒。"

这时，山包上只剩下刘志丹、裴周玉和警卫员三个人。裴周玉回忆道：

4月，北国的山包上仍然是很寒冷的。刘军长毫不理会冷风的侵袭，迎风站在高处，观察和谛听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密切注视着战斗的进展。他嫌棉帽子的耳扇碍事，把帽带也绑起来，寒风吹得他的脸紫一块红一块的。

随着战斗的激烈进行，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消逝过去。刘军长的心也随同他手中握的怀表一样，滴答、滴答，计算着部队运动的时间，预计着彻底消灭敌人和争夺城镇的时刻。他站在那里，看着部队的战斗，想的是歼灭面前的敌人后，如何配合红军主力扩大战果，怎样才能调动和消灭敌人更多的敌人，我军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将

怎样做部队的工作，而忘记了自己是站在距敌人只有几百米远的山头上，全不计较个人安危。我和警卫员见他站得那样高，几次拉过刘军长，让他姿势放低一些，防止危险。无论我们怎样拉他与劝说，他为了便于观察敌情，指挥部队作战，一溜烟是照样站起来。谁知，就在刘志丹同志观察部队向敌人重新发起攻击和注视敌人态势的时候，就在我最后一次拉他时，敌人的那挺机枪突然射来一梭子弹，刘军长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我看见此情景，心里猛地一震，糟糕，军长负伤了。不禁惊呼一声，赶快跨上一步，把他抱住，急着喊道："警卫员，快去叫医生。"

子弹是从他左胸部穿过去的，碰着了心脏，伤口处流血很少。他穿的土灰色棉军衣的左胸，只见有处枪弹打着的洞孔。当时，他的面色顿时变得蜡黄，呼吸极度微弱，心脏略感到有些跳动，昏迷过去。

我忙把军长抱到山坡后边，找个隐蔽平坦的地方放下，待了一会儿，他神志略微清醒了，睁开了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想用双手支撑着身体坐起来。看他那副顽强的劲头，那种坚强的意志，无畏的毅力，还想为党为人民作更多的事情。他的这种顽强精神，似乎一下子全部迸发出来，用劲挣扎着抓住我的手，以极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说："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的……"只见他嘴唇又动了几下，但再也听不见声音了。这时，医生赶到了。可我们敬爱的刘志丹军长已完全停止了呼吸。

就这样，陕北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倒在东征途中的黄河岸边，年仅33岁。

宋任穷立即把刘志丹牺牲的消息电告中央，并连夜派人护送刘志丹的遗体西渡黄河，运往瓦窑堡。毛泽东给刘志丹题写的挽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为缅怀刘志丹的丰功伟绩，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刘志丹的牺牲使红28军的将士们无比悲愤，高喊着"为军长报仇"的口号，向三交镇发起猛攻。然而，战斗进行得并不顺利，红28军虽已攻入镇内，并占领了大部地区，但未能拔掉敌人设在制高点上的主碉堡，伤亡也越来越大。为避免继续与敌人纠缠下去，做无谓的牺牲，红28军主动撤出战斗，向南转移。

到达康城镇，宋任穷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志丹牺牲的经过，以及红28军东渡黄河以来的战斗情况。虽然全军只剩下700多人，但士气依然很旺盛。总政治部专门派人到红28军进行考察，决定保留该军建

制，任命宋任穷为军长、蔡树藩为政治委员，并补充了一部分兵员。

4月中旬，国民党军7个纵队从三交镇、中阳、孝义、灵石、临汾、新绛、河津之线，向红军逼近。为避免不利决战，红军于5月2日至5日从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苏区，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就此结束。

此役，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约7个团，俘4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余支（挺），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万银圆，并在山西省20余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用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西征战役

【交战时间】1936年5月19日～7月底

【交战双方】红1、红15军团；国民党军新编第7师、第35师等部

【指挥将领】毛泽东、彭德怀；马鸿奎、马鸿宾

【战果】红军歼灭国民党军7个营，击溃3个团又5个营

1936年5月5日，红军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甘苏区休整，东征战役胜利结束。中共中央根据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和陕甘苏区的情况，确定党在今后的政治任务是扩大和巩固革命大本营，壮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

然而，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集16个师另3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

在东北面，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的1个师又2个旅，与渡河入陕的阎锡山晋绥军的1个师又1个旅，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2个师，采取堡垒政策，步步进逼。在西面，宁夏第十五路军司令马鸿逵以所属新编第7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豫旺（今下马关）等地；马鸿宾的第35师驻守庆阳、曲子、环县、镇原地区，防堵红军西进。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此时已与中共秘密建立了初步统战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西北地区出征。

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1、第2、第4师，第15军团第73、第75、第78师和第81师、骑兵团等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发起西征战役，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以红军第29、第30军和地方武装、陕北游击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牵制入陕的蒋介石中央军、阎锡山晋绥军和原在陕西的敌军，保卫陕甘苏区，策应西征作战；红28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在该地坚持斗争的红74师，在鄂豫陕三省边区开展斗争，吸引蒋介石中央军主力，以策应西方野战军的行动。



誓师出征的红军一部

红军发起西征战役，重点打击国民党驻守宁夏的部队——马鸿逵、马鸿宾率领的“马家军”。

宁夏，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古为朔方郡，明清两朝为甘肃省的一个府，民国时期初为宁夏道，后改为宁夏省。自20世纪30年代起，统治它的是国民党宁夏省主席兼第十五路军总司令、人称“宁夏王”的马鸿逵。

马鸿逵，字少云，乳名三元，1892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祖父马千龄因在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劝说马占鳌(马千龄的同族侄女婿)降清，被左宗棠称为“良回”。这就是马鸿逵后来自诩他家“不是造反的回回”的缘由。

光绪初年，马千龄之子马福禄中武举人、武进士，率回民军队马步七营旗，驻防山海关、永平府及蓟州等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马福禄率部在廊坊一带与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的侵略军血战，史称“庚子第一场恶战”。随后在北京城内的战斗中阵亡。慈禧太后西逃途中，为表彰马福禄之忠勇，命其弟马福祥继之，统领部下并护卫西去陕西。1902年，马福祥所部驻扎宁夏，谓之宁马巡防军，这便是宁夏“马家军”的由来。

马鸿逵是马福祥的长子，自幼受家庭重教习武影响，读书习武。18岁入甘肃陆军学堂学习，期间参与反清活动，秘密加入同盟会，被捕入狱。后经马福祥奔走始得获释，随即投军，任“昭武军”教官、骑兵中营帮带。

1912年，袁世凯把“昭武军”改编为“宁夏新军”，马鸿逵任新军分统，率部阻击白朗起义军。因战功卓著，受重于袁世凯，被授予陆军少将衔。时马鸿逵刚刚20岁出头，成为“马家军”里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

袁世凯为牵制各路军阀，令送公子入京，以为“人质”。1914年，马鸿逵来到北京，出任侍卫武官。袁世凯死后，马鸿逵继任黎元洪的侍从武官。

曹锟当上大总统后，批准马福祥组建第5混成旅。1919年，马鸿逵终于结束了在北京的“人质”生活，回到宁夏，升任第5混成旅旅长。随后，与马福祥率部驻守绥远。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马鸿逵被曹锟、吴佩孚任命为骑兵总指挥，率部开往热河。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马鸿逵支持冯玉祥，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新编第7师，升任师长。他率部从磴口移驻石嘴子，将绥远让给冯玉祥部驻防。后又奉命驻防金积、灵武一带，大力整军经武，积极扩充军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北伐战争就此打响。9月，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组建国民军联军，进军甘、陕，响应北伐。马鸿逵被任命为第四路军司令兼第7师师长，率部出征。在解西安之围后，又兼任西安警备司令，实力再次得到增强。

1927年4月，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马鸿逵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兼第4军军长。随即出师潼关，会攻河南。

1928年2月，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扩编至9个方面军，达40万人。但马鸿逵的第4军反而缩编为第17师，这引起马的强烈不满，感到自己跟随冯玉祥多年，立下了汗马功劳，却没有得到更高的职位，心生反意。一年后，马鸿逵随韩复榘、石友三在洛阳联合通电反冯拥蒋，投向蒋介石的怀抱。

此时，蒋介石正急于拉拢西北军将领，扶植拥蒋势力，以对付日益强大的冯玉祥。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蒋介石迅即复电嘉奖，将第17师扩编为讨逆军第11军，升任马鸿逵为军长兼第64师师长、郑州警备司令、河南省政府委员。同时大慷其慨，一次就拨给马部军饷30万元，以及新式步枪千余支。

封官和重赏是蒋介石拉拢地方军阀的不二法宝。果然，马鸿逵不负蒋委员长“厚望”，在中原大战期间，作战勇猛，率部攻占山东泰

安，升任讨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徐州警备司令。

1930年12月，唐生智联合冯玉祥、石友三、韩复榘等人反蒋。韩复榘认为徐州是南北交通枢纽、军事重镇，且与马鸿逵为倒冯投蒋时的契友，便提议联络马共同倒蒋。

起初，马鸿逵答应参加反蒋，但事后思虑再三，深感蒋介石势大，倒蒋难以成功，遂向蒋告密，并具陈应对之策。蒋介石一面稳住韩复榘，把石友三部调到蚌埠、浦口一带；一面急调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唐生智，很快就将这次反蒋行动平息了。

照理说，马鸿逵在此事件中居功至伟，应当加官晋爵。但在一心想翦除异己的蒋介石眼里，马鸿逵只不过是一枚用于瓦解西北军的棋子。因此，当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惨败、被迫通电下野，西北军分崩离析、被蒋介石逐一收编后，马鸿逵的利用价值便大大缩水，日渐失宠。

1931年1月，马鸿逵的第11军被蒋介石缩编为第31师，调往河南许昌、漯河一带，参与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对共产党，马鸿逵并不陌生。说起来，他曾与共产党有过短暂的合作。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应冯玉祥之邀，派遣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军开展革命工作。1926年，冯玉祥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陈延年、宣侠父、刘志丹、邓小平等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人也先后在国民联军里工作，宣传革命思想。

是年冬，刘志丹出任马鸿逵部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在该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起政治工作机关，制定新的军容风纪，开展新式练兵，向基层官兵灌输革命道理。客观地讲，这一时期的马鸿逵还是倾向革命的。不久，马鸿逵率部出师援陕，配合北伐战争。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6月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宣布“清党肃军”，将刘志丹等几十名在该部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扣押起来，逐个审查，随后派人将他们押送出境。马鸿逵也由此走上了反共道路。

虽说凭借着投靠蒋介石、出卖盟友，马鸿逵在西北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路诸侯。但他深知自己不是蒋的嫡系，同时也看清了老蒋欲借红军之手翦除异己的野心，因此来到“剿共”前线后，出工不出力，只派出少数部队驻平汉铁路沿线的柳林至武胜关一线，而将主力控制在

信阳，按兵不动。并严令部下相机行事，不得擅自行动，避免与红军发生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

马鸿逵的部队素来军纪不好，作战是从不带给养的，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常以禁街或戒严的方式乘机抢劫，不仅在驻地大抢大掳，甚至还跑到鸡公山，把在山上避暑的外国人的物品洗劫一空。马部多为回民，禁食猪肉，开始还说水牛肉不好吃，只在老百姓家里搜宰黄牛。后来不仅把黄牛吃光了，连水牛也没留下一头。时值豫南水稻收割之季，马部便大肆抢割农民的稻子，连种子也没有剩下，弄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见马鸿逵纵容手下大肆骚扰百姓，蒋介石睁一眼闭一眼，装作不知。但当蒋介石数次电令要他赶快进攻红军时，马鸿逵每每讨价还价，横竖就是不听指挥。这下，老蒋可不答应了。

1932年，蒋介石以马鸿逵“剿匪”不力为名，命河南“绥靖”主任刘峙将兵力集中在平汉铁路的西平、遂平一带，胡宗南部集中在孝感、广水一带，一北一南，胁迫马鸿逵出兵“剿匪”。马鸿逵也不甘示弱，严阵以待，摆出一副老子谁也不怕的架势。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马福祥爱子心切，抱病奔走南京、汉口（时蒋介石在汉口）、信阳之间，为马鸿逵四处说情。不料在汉口身染重疾，一病不起。

得知老父为救自己劳累染病的消息，马鸿逵急奔汉口，遵医嘱转送北平。不料，马福祥年老体衰，经不起如此折腾，在途中病逝。

蒋介石闻讯后，一面派员慰问致祭，下令刘峙撤军；一面安抚马鸿逵，表示会“顾念西北宿将”。时西北政局不稳，马鸿逵趁机电请回师平叛。老蒋虽一直想插手西北，无奈一时抽不出兵力，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五路军总指挥。

为防马鸿逵在西北势力过大，养虎遗患，蒋介石以“剿共”为名，命令马鸿逵将所部整编为1个师6个旅，只允许带2个团回宁夏，其余部队与马鸿宾的部队互调。

马鸿宾，字子寅，1884年生于临夏，马鸿逵的堂兄。

父亲马福禄阵亡时，马鸿宾年仅16岁，由叔叔马福祥抚养。1908年任西宁矿务马队队官。1910年随昭武军到宁夏，任骑兵营营长。1912年任宁夏新军管带，后任甘肃新军司令。1916年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少将衔。4年后晋升为陆军中将衔。

与马鸿逵不同的是，马鸿宾虽出身名门，少年得志，但个人生活一直比较俭朴，反对暴政，主张以德服人。

1921年，马鸿宾升任宁夏镇守使，兼管内蒙古三旗军事。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马鸿宾乘机在宁夏扩充势力，招募了3个团共7个营的补充团，成为西北地区的一路诸侯。



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参议厅成立时马鸿奎题写的牌匾

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将马鸿宾的昭武军、甘肃新军、卫队马队、补充团全部取消，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22师，马鸿宾任师长。

1927年春，冯玉祥任命马鸿宾为甘边剿匪司令，率第22师收拾甘肃地方军队。是年秋，马鸿宾升任第24军军长。1929年春，马鸿宾由甘回陕。不久冯玉祥派马鸿宾任宁夏主席。

时宁夏杂牌军队很多，境内秩序混乱。马鸿宾身边只有5个营及手枪队等约2000人，深感力量单薄，遂令各县成立护路队，以扩充军力。同时对杂牌军队采取一面安抚，一面打击的策略。不出一年，宁夏暂又出现平静局面。

中原大战后，马鸿宾接受蒋介石任命，部队改编为暂编第7师，出任师长，后又被任命为甘凉肃边防司令。

1931年，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这年8月，西北军暂编第2旅旅长雷中田发动政变，扣押了马鸿宾。后经调解，马鸿宾获得释放，率部重回宁夏。

经此事变，马鸿宾深感自己的军力不足，遂整军经武。至1932年春，所部新编第7师辖3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以及直属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营、特务营等，近万人。

尽管如此，马鸿宾的新编第7师与马鸿逵的部队实力仍相距甚远。因此，当接到蒋介石要二马的部队对换的命令时，马鸿逵知道是老蒋借机削弱自己的实力，气得直骂娘。



宁夏省国民政府旧址

在那个军阀多如牛毛的战乱时期，能够经过多年的“大浪淘沙”留存下来，并能够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绝非庸碌之辈。很快，马鸿逵就有了应对之策。

当晚，他召开会议，调整部队编制，以4000老弱病残组成第35师和骑兵旅留在豫南，准备交给马鸿宾；其余精壮人员编为3个独立旅和1个特务团，密藏优良武器，开往包头，再由包头步行，星夜兼程返回宁夏。

马鸿逵在施展完“乾坤大挪移”后，便兴高采烈地赴宁夏上任去了。

1933年2月，马鸿逵主政宁夏，同时兼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自此开始了在宁夏17年的割据统治，人称“宁夏王”。

上任伊始，马鸿逵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制定公务员“行为准则”的八项要求，甚至连官吏、职员的着装都有明确规定。在第一次全省代表大

会上，他宣布清丈地亩、整理金融、建立保甲、“围剿”红军为四大治宁方针。随后，颁布《清丈地亩条例》、《宁夏省各县保甲人员服务规程》，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清查核实地亩，实行连环具结的保甲制度，防范红军。

在20世纪初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有兵有枪就能割据一方，就意味着权力、金钱和美女。马鸿逵深知其理，常对手下人说“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因此，他主政宁夏时的一切活动无不是以“抓兵”、“抓权”、“刮钱”为目的展开的。

马鸿逵上任时，宁夏的“马家军”只有12000人。为扩充军力，只好不断抓兵。据宁夏省政府统计，1935年全省人口为1002876人，到1941年1月仅剩729996人。而同期，马鸿逵的部队迅速发展为3个步兵军、9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再加上地方部队及马鸿宾的第81军，总计在10万人以上。平均每7个宁夏人中就有1个兵。

为独揽地方大权，马鸿逵长期实行所谓“合署办公”，以军管政，以政管党，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及各县党部，都在他的操纵之下。在军队中，马鸿逵更是处处安插亲信，他的用人标准和条件是“甘、马、回、河”。带兵的军官一律要甘肃人、姓马、回族，河州籍的最好。当时蒋介石中央与地方军阀在人事的分配上，向来是平分秋色，一般是省府各厅处，中央应占一半。但宁夏地方狭小，交通落后，远处边陲，蒋介石感到无须控制太严，决定除教育、财政两厅外，其他各厅处长，均由马鸿逵自行提名保荐。尽管如此，马鸿逵仍然一连赶走了数位国民党政府派来的厅长，最后统统换成了他自己的亲信。

同中国其他的地方军阀一样，马鸿逵嗜财如命，想尽各种办法，如田赋、税收、走私烟土、尅扣薪饷、强占房地、经济垄断等，搜刮民脂民膏。尤为甚者，马鸿逵在宁夏银行私印纸币345万元，强令百姓用手中旧币折半兑换新币。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争取驻防沙城的孙殿英部参加。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拉拢孙殿英，许以察哈尔省主席之职。但孙殿英认为在察哈尔处境困难，既不愿参加同盟军，也不肯就任省主席，蓄意保存实力，以作别图。

是年夏，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率领所部第41军，开往青海。同时又密电马鸿逵、马步芳等人，乘孙殿英不备，中途予以截击。

原来，这是蒋介石惯用的“一箭三雕”之计。一是借机调走孙殿

英，削弱冯玉祥在察北号召抗日的势力；二是西北的“马家军”决不容孙殿英插足，必会引起两虎相斗；三是待其两败俱伤之机，出兵西北，彻底消灭地方军阀势力。

果然，孙殿英中计了，于年底以奉命入青屯垦为名，率7万大军挺进西北。

孙殿英督兵西进，宁夏首当其冲。马鸿逵、马鸿宾自揣势单力孤，深恐地盘难保，便与马步芳、马步青商议联兵拒孙。

这时马步芳、马步青的势力，已从青海发展到河西地区，并控制了河州一带。他们知道青海与宁夏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孙殿英夺取了宁夏，自然不会放过青海。于是，四马联合起来共同拒孙。

经过4个月的激战，四马联军大获全胜，给予孙殿英部毁灭性打击。从此，宁青两马集团，拥兵自重，进一步扩张了在西北的势力。

1935年9月，马鸿逵接蒋介石电令，截击北上红军。想当年“围剿”鄂豫皖苏区时，马鸿逵出工不出力，一心保存实力，只是因为那里不是他的地盘。如今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大有进逼宁夏之势，马鸿逵再也坐不住了，立即向定边调动人马，积极备战，并向蒋介石进呈《剿共意见书》，献策乘红军长征初到陕北立足未稳，应立即全力“永绝根株”。

蒋介石也正要利用马家军对付陕甘根据地的红军，便亲自飞赴宁夏，部署防共大计。马鸿逵在蒋委员长面前慷慨陈词，吹嘘所部训练有素，拍着胸脯保证宁夏军民早已严阵以待，防共无虞。为讨老蒋的欢心并表达自己的“忠心”，他还特意在宁夏中山公园修造了一座“怀远楼”，以示委座对西北边陲的关怀。

见马鸿逵如此尽心“剿共”，蒋介石龙颜大悦，授予他陆军中将衔。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马鸿逵干得更来劲了，令所部在同心、豫旺、韦州、金积、灵武等地与陕甘宁边区接壤的地方构筑“防共碉堡线”，共构筑碉堡220余座。

1936年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西进。其中，红1军团为左路军，从延川出发，经蟠龙、保安、安塞、延安，到达吴起镇集结；红15军团为右路军，从贾家坪出发，经永坪、贺家渠、蟠龙、安塞，到达靖边新城堡集结；彭德怀率野战军直属队和红81师、骑兵团随红15军团跟进。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宁夏敌军的布防态势，彭德怀决心采用围城打援之计，具体部署为：以右路军红15军团首先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伪装进攻宁夏，调动驻庆阳、环县至洪德城一带的马鸿宾的第35师回援宁夏；以左路军红1军团在运动中寻歼回援宁夏之敌，并迅速夺取曲子、环县等要隘。



蒋介石视察宁夏时与马鸿逵（右2）、马鸿宾（左2）在怀远楼前合影

27日，红15军团分左右两翼队西进。28日，右翼队红73师袭占宁条梁，左翼队红75师强攻安边未克，随后改以红78师围困安边，主力转向定边以南地区。

敌人果然上当了。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察觉红军大举西进、有"进攻宁夏"的迹象后，急令马鸿宾第35师将防地移交东北军接

替，火速由陇东庆阳、环县回援宁夏，第103旅马玉麟部、第105旅冶成章部进至元城、庆阳、曲子一线堵截红军。

毛泽东获悉上述情报后，一面电请东北军不要妨碍红军占领曲子、环县和洪德，一面电告西方野战军，令左路军红1军团从吴起镇进至华池的元城，派一部兵力向庆阳进击，阻止东北军向庆阳北上，主力则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

28日，红1军团在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率领下，从吴起镇出发，向曲子、环县方向隐蔽前进，于30日前陆续到达元城镇地区。

曲子镇为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是由西峰镇、庆阳通向宁夏的咽喉要道，也是红军西征必经之地。镇子不大，土城方圆只有1平方公里左右，城墙高2丈、厚6尺许，四周筑有碉堡，城外有深达丈许的壕沟，可谓易守难攻。镇内驻有第105旅旅部的1个特务连、第35师骑兵团的1个排，以及环县保安大队，共300余人。

第105旅旅长冶成章是马鸿宾手下的一员猛将，性情暴躁，欺压百姓，十分野蛮，打起仗来更是不要命，人送外号野骡子。当地群众说他是“一对骡子，一对马，一对老婆，一对娃”。

在庆阳、马岭完成堵截红军的部署后，冶成章马不停蹄地赶到曲子城，亲自指挥布防。时任国民党第35师第209团第1营营长的康占元回忆道：

冶成章到达曲子镇后，与环县县长王某交谈。他们只觉得情况紧张，并没估计到大队红军会马上来临，所以还太平无事地和县长研究如何布置防务，对付红军。他们正在大吃大喝、猜拳敬酒之时，忽然红军在东关打响，关内秩序立即大乱。红军迅速把曲子镇层层包围。冶成章急忙登上城墙，紧紧地关闭了城门，指挥他的特务连、骑兵团通讯排一百多人都上了城墙，保安队分配在南城墙上，进行抵抗。

6月1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进至曲子城附近。下午2点许，红2师在萧华、杨得志的指挥下，由红2团担任主攻，红5团助攻，发起攻城作战行动，打响了西征战役的第一仗。

半小时后，红军即从城东南角打开缺口，攻入城内，与守敌展开巷战。冶成章率部疯狂反扑，使入城红军部队立足未稳，就被挤出城外。

这时，军团长左权和政委聂荣臻来到距敌几十米的前沿阵地，冒着枪林弹雨，亲自指挥战斗。聂荣臻回忆道：

曲子镇是座土城，方圆不过二华里，野骡子守得十分顽强，我们一度攻进了城堡，被野骡子和他的警卫部队打出来了。那时二师东征扩充了一些新战士，没有打过仗，新提升的一些干部也没有打巷战的经验。只知拼命往城里攻，刚打开一个缺口就几乎全团都向里冲。可是从上午攻到中午，仍未解决战斗。我和左权同志到阵地一看，看出攻击的方法不对头。我告诉他们赶紧把突破口坚决守住，同时把其他部队撤下来，在城墙隐蔽地点进行整顿，不要一下子都拥进城。只要将兵力、火力组织好，派一个连打进城去就行了。进城的连队，也不必过于集中，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进去人太多，反而展不开，招致无谓的伤亡。

攻城红军将士备受鼓舞，及时调整战略战术，再次发起潮水般猛冲，一举楔入城内。经过反复冲杀，击毙骑兵团团附陕有禄等100余人，军需主任卫一吾向红军投诚，环县县长率保安队逃出城去。至下午4时半左右，红军基本控制了全城。冶成章负伤，窜至城东北角的一处民宅窑洞里，把窑门口用沙袋堵住，企图负隅顽抗。

副旅长杨子福、副官孙清太都劝冶成章缴枪投降。冶成章认为他的后续部队一定会在天黑前赶到曲子镇，把他从重围中救出，因此命令继续死守，并说："你们一面好好地把守窑洞，一面看着对面山上的白路，援兵快从对面白路上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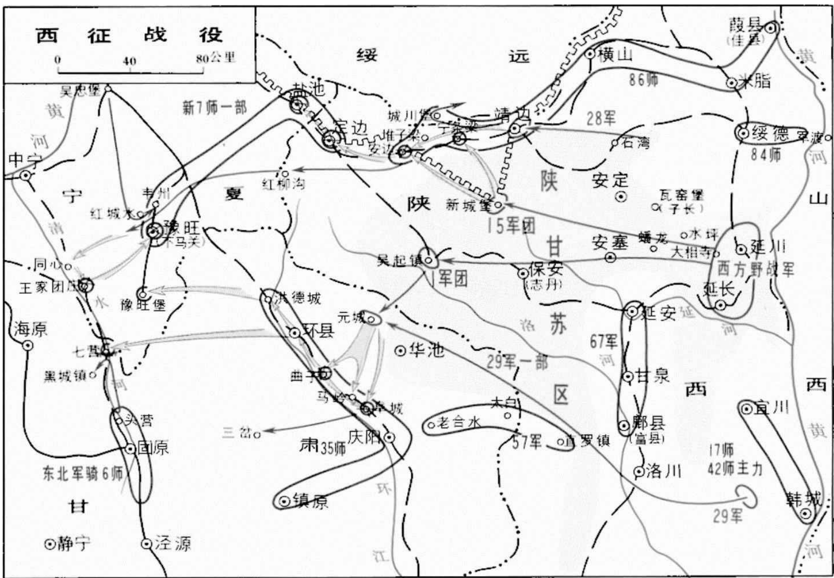
康占元回忆道：

双方激战到天黑以后，红军缓和了火力进攻。开始由当天战斗中跑到红军方面去的冶的两个勤务兵对冶喊话，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日和红军优待俘虏等政策。然而冶成章并不听话，决心要敌对到底，对他的部下说："不听他们的话，坚决抵抗，反正是死，投降了死还不如打死在窑洞里。"一直到晚间10点还是不缴枪。红军见劝降无效，便爬上窑顶，把手榴弹从烟囱里扔下去，炸得窑里仅有的5个人，除冶成章外，都要开门投降，冶成章死咬住一句话："死也不投降"。但也没有再抵抗。红军见此情况，又开始耐心的喊话劝降。一直到次日天明，冶成章再也没有抵抗的力量了，对面山上并没有出现什么援兵，窑洞里的5个人中4人负伤。绝望中的冶成章再也扭不住副旅长和副官们投降的愿望，于是才不得不缴了枪，低头投降。

此战，红军共击毙国民党军官兵100余人，俘冶成章等200多人，缴获各种枪200余支（挺），以及马匹等物资，曲子镇宣告解放。

而这时，奉命驰援的第103旅旅长马玉麟并不知曲子镇已破、冶

成章被俘，命令骑兵团团长马培清率2营、3营为前卫，第206团、旅部和第209团随后跟进，企图攻下阜城后，再夺路增援曲子镇。



西征战役示意图

谁知，只向北推进了十多里，先头部队即与占领东山的红军发生战斗。好在红军并不恋战，很快就退入阜城。

阜城位于环江岸上，两边是塬，西塬又被一道沟划分为南北两部。见天色渐暗，马玉麟害怕中红军的埋伏，便命令停止进攻，旅指挥所设在东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庄，2个步兵团在旅部周围宿营，骑兵团驻扎在距阜城约三四里的米家园子，其中马振川的第2营守卫在米家园子的东塬上，马文祥的第3营守卫在米家园子以南的东山沟口。


这张著名的“抗战之声”照片就是西征期间，美国记者斯诺在豫旺堡拍摄的

这张著名的“抗战之声”照片就是西征期间，美国记者斯诺在豫旺堡拍摄的

次日清晨，马玉麟率旅部和2个步兵团向阜城进发，行至米家园子与骑兵团汇合在一起。时天已大亮，马玉麟即把旅部设在米家园子，命令第206团第1营营长马登云占领阜城西塬，与红军南北对峙；第206团团长马文清率团部及其余2个营从阜城南面发起正面攻击，并把2个步兵团的12门迫击炮全部配属给马文清，向阜城实施轰击；马

奋英的第209团为预备队，在米家园子附近隐蔽待命。

战斗打响了。第206团2个营的敌人在迫击炮火的支援下，同时向阜城红军阵地发起猛烈冲锋。红军坚守阵地，顽强抗击，一连打退了敌军的数次进攻。

激战一个多小时，马文清见部队伤亡很大，无法冲破红军的防线，心生胆怯之意，便丢下部队，自己跑到米家园子，向马玉麟汇报战况。

“今天红军的仗口硬得很，兵力相当雄厚，火力十分旺盛，徒遭伤亡，攻不上去，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红军一连接一连地向东塬上增援，多得很、多得很……”

见马文清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马玉麟急忙问：“到底有多少连？”

“我用望远镜看到的就有十多个连，红军一定是增加了新的兵力，看情况可能是从东塬上包围我们来了。”

马文清没有说谎话，原来是红军在攻克曲子镇后星夜增援阜城。

马玉麟也大吃一惊，感到战局不妙，立即命令第209团第1营营长康占元率部增援守卫在东塬上的骑兵团第2营。

就在康占元集合队伍准备出发时，马玉麟又跑过来大声命令：“一个营上去兵还有些单薄，再带上第209团输送连。可能东塬上的碉堡已被红军占领，你把碉堡夺过来，先守住碉堡。”

康占元率部气喘吁吁地赶到东塬头，马振川的第2营已被红军压迫到塬边上，溃不成军，纷纷跑向半山腰的战马前，准备上马逃跑。康占元回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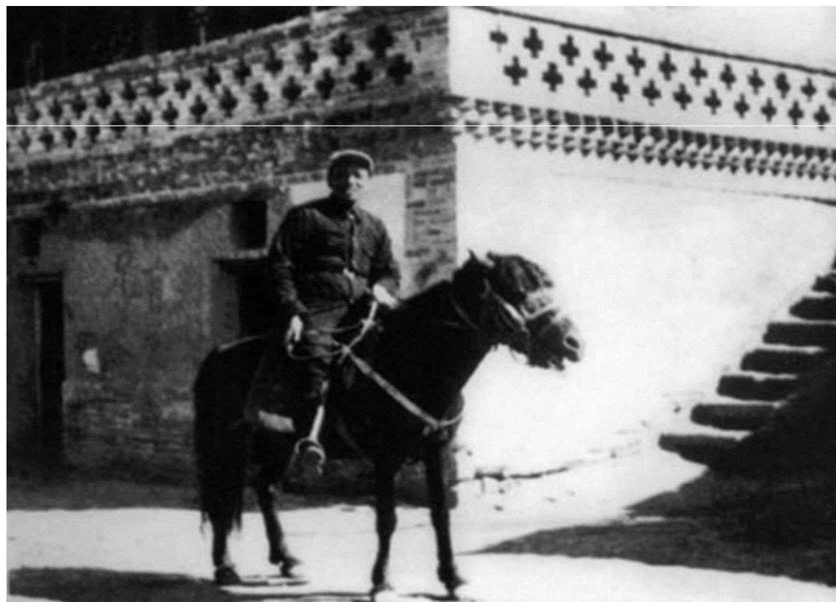
红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勇猛地向我营进攻。我只见漫山遍野都是红军部队，越迫越近，越来越多。由于双方手榴弹的爆炸，战地上空笼罩着一片烟尘，看不清地面上双方的活动。在激战一个多小时后，我营一连连长马尽忠阵亡，四连连长马如彪腿部负重伤，接着又中弹阵亡，二连连长牛金玉被俘，团部输送连连长下落不明。各连士兵伤亡惨重。随后，我的右大腿负伤。

这时，红军骑兵部队在沟南面山上红军步兵的配合下，向东沟口飞奔而来。守卫在此的骑兵团第3营营长马文祥顿时吓破了胆，连忙借口向旅长汇报战况，带上营部的几个亲信，骑马向米家园子绝尘而去。营部的其他人员见营长跑了，也争先恐后地撤离了阵地。

整个骑兵第3营群龙无首，乱作一团，纷纷向后奔逃。在西塬上的骑兵第2营也受到了“感染”，一个个纵马奔下山去，向南逃窜。

两个骑兵营上百匹战马从东山上冲下来，一下子就把守卫在米家园子旅指挥所附近工事的特务连冲散了。

这股逃跑之风如瘟疫般在第103旅的部队中迅速蔓延开来。第206、第209团的官兵自然不甘落后，掉头就跑。只可怜他们是步兵，没有战马可骑，只好扔下武器弹药、背包、粮袋，甩开双腿，玩命地奔跑。



西征期间，彭德怀在豫旺堡留影

起初，马玉麟还试图阻止部队后撤，但在性命攸关之际，谁还理会这位旅长大人的命令，只顾各自逃命。

骑兵团团长马培清慌忙上马，对马玉麟说：“旅长跑吧！骑步兵都跑完了，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话未说完，马团长就已策马飞奔，加入到逃跑的大军中。

转眼间，旅指挥所里只剩下了三四个人。副官催促马玉麟说：“旅长，部队跑完了，红军已到眼前的河滩里，你还不跑吗？”

不待马玉麟回答，副官干脆把他连拉带拽地扶上马，沿山向南逃去。

阜城之战，红1军团大获全胜，共歼第103旅6个步兵营，击溃2个骑兵营，俘1100余人。随后乘胜占领了环县、洪德城、三岔地区，至13日进抵固原县七营镇附近。

在此期间，红29军1个团也进至元城、曲子、阜城地区，配合左路军行动。至此，红军切断了第35师北上道路，迫敌退回固原的黑城镇地区。

20日，红2师攻占了七营镇。

七营镇位于清水河东岸，与黑城、三营同在一条线上，属南北通道上的要点。红军占据该镇后，马鸿宾忧心忡忡，为打开固原至中宁、银川的通道，决定联合东北军骑兵军一部进攻红军，重新夺回七营镇。

7月初，马鸿宾部署完毕：由第35师主力实施正面攻击；东北军骑兵第10师攻击红军左翼；东北军骑兵第6师攻击红军右翼。

17日拂晓，马鸿宾部与东北军同时向红军发起猛攻，遭到红军的顽强抗击。

七营镇附近有一条名叫阎家沟的大沟，沟深坡陡，地形复杂，是从右侧进入七营的必经之路。当骑兵第6师先头团钻进沟底后，在沟内预先设伏的红2师猛烈开火。敌人突遭打击，顿时乱了营。激战1小时，敌先头团死伤300多人，其余大部被俘。

战后，红1军团主动退出七营镇，转兵清水河东岸。

西征战役打响后，彭德怀几次指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西征战斗任务之一，强调指出：这和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重要。坚持要求每个指战员要深刻认识到，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要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红军这边来。

当时，红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第十七路军）。对西北军的口号是：“红军不打杨虎城”，“联合起来打日本”；对东北军的口号是：“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

为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红军对所俘骑兵第6师的官兵以礼相待，经宣传教育后，全部予以释放，并归还缴获该师的马匹、武器。

左路军红1军团连战连捷，右路军红15军团同样也打得顺风顺水。

6月4日，红15军团进占红柳沟。至11日，其先头部队占领同心

城，主力进抵王家团庄附近。

王家团庄是同心城东南最大的一个村庄，有2000多人，是个回民聚居区。村子分南北两个堡子，对称坐落，围墙又高又厚。

红15军团决定在包围豫旺县城下马关的同时，派红73师一部和回民独立师攻占这一村庄。守村的民团哪里是红军的对手，不一会儿就招架不住，四散奔逃，躲进了堡子里，坚守不出。

部队进村后，通过开展群众工作，了解到当地恶霸王彦秀在红军到来之前，把庄上有存粮的群众和商贩数百人关在北堡子里，企图用断粮之计逼走红军。

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几次派人去找王彦秀谈判。但王彦秀非常顽固反动，每次都是紧闭大门不露面，只让手下人站在墙头上与红军答话应付。

敬酒不吃罚酒，红15军团决定以回民独立师和红73师第250团3营对北堡子发起强攻，消灭这股顽敌。



红军西征时在宁夏固原县祁家堡子墙上写的革命标语

红军将北堡子团团围住，只见王彦秀的弟弟王彦海持枪站在墙头上，狂妄地叫喊着："你们有枪没有子弹，别吓唬人了！早点收兵吧！"边说边举枪准备射击。

只听"叭"的一声枪响，王彦海应声从墙上栽倒下去。原来是红军战士抢先开火，将其击毙。随即，红军发起强攻，顿时枪声大作，喊声震天。

堡子内的民团哪见过这种阵势，早就吓得乱了阵脚，慌忙打开堡子大门，举着白旗，高喊投降。红军战士蜂拥而入，活捉了王彦秀和民团团总王学成、恶霸王学富以及税务局长等数十人，缴获枪械数10支、战马100余匹，并将被关押的回民群众全部释放。

北堡子既下，马青年亲自带上5名战士来到南堡子谈判。寨主王彦清已听说红军的英勇，当即表示大开寨门，欢迎红军到来，并主动交出枪支。

在攻占王家团庄的同时，红15军团直属队和红75师于6月11日包围了国民党豫旺县政府所在地下马关城。

下马关是一座比较古老的城池，城墙高3丈多、宽1丈余，均由古青砖砌成，城墙上是一排排雉堞。守军为马鸿逵部新编第7师骑兵第2团第1营的2个连及豫旺县民团。

战斗打响后，守敌在城外民房内稍作抵抗就缩进城里，据险顽抗。红75师多次发动进攻未能奏效，遂决定派小股部队日夜轮番发起攻击，骚扰疲惫敌人，同时派宣传队向城内敌人喊话、投传单，大搞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军。

14日，红28军编入西方野战军序列，与红81师等部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后接替右路军红15军团围攻安边，夺取定边、堆子梁等城寨的任务。

从16日起，红15军团在中路军的配合下，直扑盐池城。

盐池城又名花马池，是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所在地，因当地盛产食盐而得名。县城虽不算大，守军也不多，连同民团在内不过600来人，但城堡坚固，易守难攻。守敌采取坚壁清野、死守待援的方针，放弃城外据点，利用县城构筑的防御工事，进行坚守。当红15军团第78师攻打定边时，盐池县长屈伸吓得魂飞魄散，急忙向马鸿逵求援。

此前，马鸿逵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称："据报毛泽东大部队，有由环县经甜水堡向同心、豫旺城集中，与徐向前会合，窜扰金积、灵

武、中卫、中宁之企图等情。查红军窜中宁之打算少，而窜靖远、海原之打算较大。少云兄可将中卫以北之河岸守备队，调派若干南移，以加厚中卫、靖远间之河防，同时将靖远、海原、黑城镇之封锁加强。”

为加强盐池城防，确保宁夏老巢的安全，马鸿逵急派所部新编第7师骑兵第1旅第2团第1营驰援。

红78师在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指挥下，于19日夜发起攻城战斗。因城高壕深，守军力量得到加强，加之红军缺乏攻城的重武器，激战两小时，未能攻克。

20日，红军围而不攻，抓紧时间休整，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了解敌情，观察地形，研究攻城方案。指战员们个个斗志高昂，表示“打下盐池，部队就有咸盐吃了”。

入夜后，红78师从北、东、南三面发起猛攻。战士们勇猛顽强，架起云梯，争先登城。守敌疯狂反扑，几次将登城红军压下城去。

红232团的勇士们冒着纷飞的弹雨，前赴后继，从北城墙登上城头，同敌人展开肉搏战，打开了突破口。后续部队迅速涌上城头，扩大战果。

至21日凌晨3时，红军攻克了县城，共歼守敌2个连及民团200余人，击毙敌营长孙兆祥，缴获枪200余支、战马200余匹、电台1部。

战前，县长屈伸给马鸿逵发电，信誓旦旦地表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但在红军破城后，屈县长早就没了原先的豪气，效仿当年的曹孟德割须易服，趁乱逃出城去。

打下盐池，不但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沟通了前后方的交通联络，解决了红军的吃盐问题，而且使食盐成为陕甘宁苏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时，下马关已被红军围困了十多天。守城敌军早已疲惫不堪，弹药不足，加之城内没有水井，被围后水源断绝，人畜渴死者渐多，眼看粮食也要消耗殆尽，军心涣散。

县长董天祥电请马鸿逵弃守，但马鸿逵以“擅自放弃县城，无法向上交代”为由，下令继续坚守，并命城内民众星夜掘井。但深掘十余丈仍不及泉，马鸿逵再电深掘，又挖了十丈后才出水。马鸿逵便以“此天助也，奋战必胜”等语，要求固守下马关。

红75师见时机成熟，于27日晨发起攻城战斗。11时，红3、红4

团相继攻进城内，后续部队迅速跟进，扩大战果，迅速打掉了敌军指挥所。

敌人纷纷缴械投降。敌营长趁乱跳城逃走，县长董天祥则不知下落。此战，红军仅以伤亡10多人的微小代价，攻克下马关城，俘敌280余人，缴获枪械180余支（挺）、战马150余匹。

28日，红75师和红73师包围了下马关以北40里的韦州城。

韦州城是宁夏河东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马鸿逵盘踞宁夏金灵川区的南大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当盐池、豫旺两县失守后，马鸿逵在宁夏东南部用于阻止红军前进的，只剩下韦州这一个重要据点了。因此，马鸿逵对韦州的防务格外重视，由骑兵第1团第3营协同一个保安团和壮丁队驻守。

在红军到来前，守敌已先行拆除了城外的民房，撤回城内固守。7月3日，红军乘夜色发起进攻。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红军架起云梯攻城，一度登上北城楼，击毙壮丁队队长苏瑞林。但因敌人火力太猛，为减少伤亡，红军主动退出战斗。

马鸿逵得知韦州被困，恐该地有失，危及金积、灵武和宁夏全省，立即派自己的骑兵主力——第1、第2、第3团各2个营和骑兵第4团1个营及省保安处骑兵第1大队，共1300余人，另附迫击炮1排，携八二迫击炮2门、机枪4挺，在骑兵第2团团长马光宗的指挥下，前去增援。

马光宗回忆道：

3日下午6时，部队从北塔水出发，取道小煤山向韦州方面前进。4日天未明时，到达十里墩，即下马徒步，向韦州进扑。当时红军在韦州南关一带，马部骑兵第二团的第二、三两营和第一团的第一营，即向东关进扑，第三团为预备队；第一团的第二营向东南包围，第四团的第三营向北关包围，保安队在塘房梁戒备，掩护骑兵后卫，防备红军袭击，共出了5个营。马鸿逵为避免消息泄漏，用阿拉语在电话中通知守军说：“4日早晨在十里墩望见大火，就是援军到了。”守军果然在4日的早晨看见十里墩望见大火，即向城外红军射击，打到下午2时，红军撤退。

成功解围韦州，马家军气势更盛，马鸿逵指示马光宗把红城水的红军情况侦察清楚，准备进行反扑。

5日，马光宗派营长田凤翔率队向红城水搜索前进，其余部队跟进，企图一举夺回豫旺县城。当进至红城水一带时，预伏在该地的红

75师发起突然攻击，战斗异常激烈。

马鸿逵得知马光宗部在红城水遭红军伏击，深恐自己的骑兵主力有失，即令马光宗撤退。当时战斗正处于胶着状态，马光宗认为骑兵在白天撤退，目标明显，容易遭到更大的损失，打算拖延到天黑后再撤。

正犹豫不决之时，连长马得禄跑过来低声建议：“团长，要攻就攻，要退就退，不要延到天黑，恐怕红军袭击。”

马光宗遂下决心立即撤退，一面派第1团2营营长马彦在北城外布置掩护，一面秘密传出口令：“准备全部退却，以预备号作准备，前进号作上马，冲锋号作撤退。”

这个金蝉脱壳之计果然奏效。当红军听到敌人的冲锋号音后，做好战斗准备，不料敌人的骑兵没有进攻，反而向韦州方向迅速退却。



惨遭马家军杀害的红军将士

至7月中旬，红军左路军和右路军分别成功地击退了国民党军的数次反扑和袭扰，巩固和扩大了占领区，使新老苏区连成一片。在新开辟的解放区，红军发动群众，扩充兵员，征集资财，大力做好民族统战、建党建政、组建革命武装以及争取、团结东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的工作。

7月底，西方野战军主力集结在豫旺地区休整，准备南下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历时两个多月的西征战役就此结束。

此役，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7个营，击溃3个团又5个营，俘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0余支（挺），战马500余匹，占领城镇10余座，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纵横各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山城堡战斗

【交战时间】1936年11月20～22日

【交战双方】红1、红15军团；国民党军第1军第1、第78师等部

【指挥将领】毛泽东、彭德怀；胡宗南

【战果】红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多旅

1936年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西关会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会宁和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会师。至此，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会宁西关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北移至海原、靖远打拉池地区，严重动摇了

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国民党军立即发起了大举进攻。

为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25日，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30军渡过黄河。随后，红9军、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红5军也相继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但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和敌情变化，红军几次破敌计划连续落空，已渡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第5、第9、第30军孤悬河西，而河东红军主力也在敌军重兵围攻下，处于回旋余地狭小的地区。至11月初，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红军不得不放弃西征以来开辟的大片新解放区东撤。

10月下旬，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亲自坐镇西安督战，调集国民党军第1、第3、第37军和东北军第67军、骑兵军共计5个军的重兵，分四路发起进攻，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且十分疲劳之际，将红军消灭于靖远、海原地区。一路是第37军毛炳文部，一路是第3军王均部，两路同时由会宁出发，向靖远方向追击；一路是胡宗南部主力第1军4个师由静宁向海原追击；一路是东北军第67军何柱国部的骑兵师由隆德向黑城镇方向追击。

除了面对敌军咄咄逼人的攻势，红军面临的自然环境也是异常险恶的。当时红军所处地理位置正是黄土高原最贫瘠的陕甘宁交界处，人口稀少，干旱少雨，物产不丰，数万红军拥挤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无法补充兵员、筹粮筹款。在此情况下，如果不打退敌人的追击，红军将被迫撤离陕甘，东渡黄河，这种形势是很不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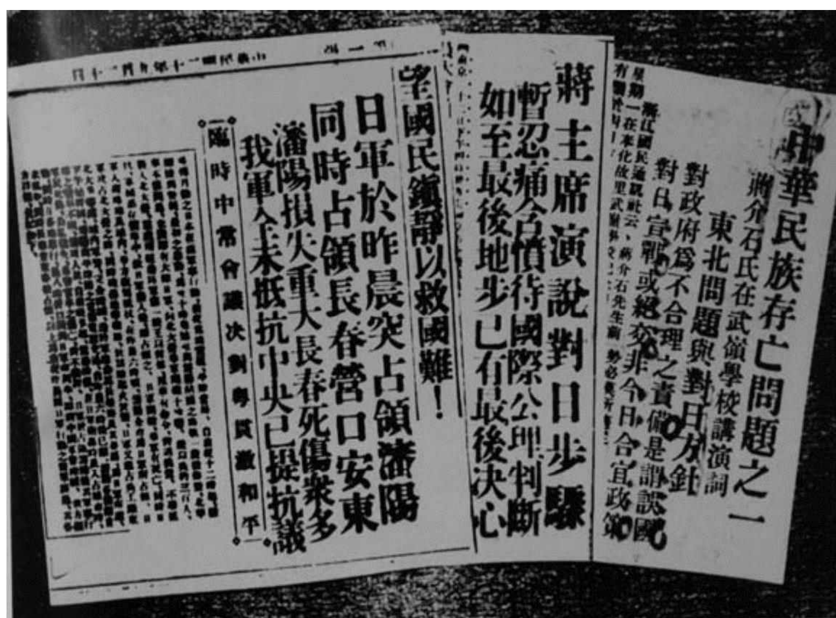
10月底至11月初，宁夏战役和海打战役计划相继被迫中止，在国民党军几十万重兵东南两面夹击、四路进逼下，位于河东的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81师，红二方面军第2、第6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不得不放弃西征以来开辟的大片新解放区，开始由打拉池、海原地区逐次向东转移，寻机歼敌。

随着红军被沿着黄河切为两段，中央军步步北进，追至陕甘根据地的大门口了。河东红军被压缩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以东，曲子镇以南这一狭小空间内作战，周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不要说部队越冬被服无处解决，就连筹粮和休息的时间都得不到。红军前敌指挥部分析认为：要打破敌军的四路进攻，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

对张学良的东北军要积极争取。九一八事变后，几十万东北军由于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枪未放撤到关内，致使东三省沦陷，

松辽大地山河变色，3000万同胞在日寇铁蹄下惨遭蹂躏；接着在长城抗战中失利又丢失了河北及平津地盘；被蒋介石调到河南、湖北“围剿”红四方面军，屡遭打击；最后被调到贫瘠偏僻的陕甘地区，参加对西北红军的进攻。结果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东北军对红军三战三败，遭受重创，损失近3个师的兵力，第110师师长何立中、第109师师长牛元峰也丢了性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东北军广大官兵思乡心切、报国无门，对蒋介石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非常不满，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

眼见东北军“围剿”红军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张学良心痛不已，更l加认清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险恶用心。他知道再这样和红军打下去，l东北军必将葬送在自己手里。如一味避战、保存实力，又可能被老蒋以作战不力吞掉地盘，这同样是不愿看到的。同时，他对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深表赞成，尤其是在两广事变反蒋和绥远抗战胜利的双重刺激下，与红军秘密接触，初步达成了联合起来“逼蒋抗日”的共识。但此时，张学良内心里还有一个忧虑，就是红军能不能对付中央军。


中華民族存亡問題之一
蔣介石氏在武嶺學校講演詞
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
對政府爲不合理之責備是謬誤
對日宣戰或絕交非今日合宜政策

蔣主席演說對日步驟
暫忍痛含憤待國際公理判斷
如至最後地步已有最後決心

望國民鎮靜以救國難！
日軍於昨晨突占領瀋陽
同時占領長春營口安東
瀋陽損失重大長春死傷衆多
我軍未抵抗中央已提抗議

“九一八”事变后，报纸上发表的有关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消息

对胡宗南的第1军实施重点打击。该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赖以起家的本钱。部队中的各级主官十有八九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长胡

宗南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武器装备均属一流。自调到西北战场后，第1军一直未遭到过致命打击，倚仗优势兵力和优良装备，骄横嚣张，目空一切。

在这种情况下，挫败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特别是能否沉重打击胡宗南指挥的中央军，就成了中共和红军能否继续在甘北和陕北坚持的一个战略关键。

据此，红军前敌指挥部决定集中主要兵力给予胡宗南部歼灭性打击；另以一部兵力牵制国民党第3、第37军，并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第67军、骑兵军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迟滞其前进。

10月底，红军第1军团第1师、第15军团第73师在陇东固原附近的何家堡地区，同时向尾追的马鸿逵第35师及东北军1个骑兵师坚决反击，歼灭2个团，俘敌千余人，缴获大量的炮、马匹等，余敌逃回海原。

红军主力在何家堡占据有利地形，准备给予胡宗南部以毁灭性打击。

不料，胡宗南的第1军在原地集结兵力、构筑工事，王均的第3军也由贺家集迂回到同心城红军阵地右翼，东北军王以哲部在西北“剿总”一再催令下进至豫旺一带，对红军形成夹击态势。

关键时刻，张国焘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第4军东撤，致使伏击计划遭到破坏。河东红军不得不放弃同心、豫旺等地区，继续东撤。

11月1日，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会合于关桥堡，决定争取在关桥堡附近寻机诱歼一部中央军，以阻敌北上。

对此，毛泽东深表赞成，提议：争取继续扼守关桥堡，吸引胡敌先头两师，然后全军从三面出动攻击该敌。同时告知彭德怀等：国民党中央军“关麟征称：率师近日以来星夜追剿，所过之地给养万分困难，官兵日夜不得一餐，……以情势观察，不独关师，追各部当有相同困难，目前敌疲惫已达最高度，宜以此特别情况激励士气，集中全力消灭敌人，争取全战役之胜利”。

不过，毛泽东也估计到，敌先头之师到关桥堡后很可能发生戒心，停下来等候后续部队不上此当，并担心地形不利作战。

果然，敌先头之周祥初第43师、孔令恂第97师稍停后才续进，而其行动路线又确实不利红军侧击。结果，诱歼胡宗南部的计划再度落

空。

国民党军队接连占领了海原、同心、中卫等地。蒋介石得意至极，判断红军经长途跋涉，不堪一击，信心十足地向部下宣布：红军“已是穷途末路”，目前已经到剿匪的最后10分钟，“有绝对把握消灭共产党”，决心集中兵力从庆阳、固原、七营、同心、中卫等地进击红军，妄图南北夹击，全歼红军于庆阳苏区，进而直捣陕北。

随着前线一次又一次提出作战计划，又一次次地被放弃，毛泽东深知对中央军作战之不易，一再提醒前方指挥员：“部署得好，有打着可能”，“再忍耐几天有消灭周孔一师的希望”，嘱咐前方要“依照实况审察裁决，总以打得最适当为目的”，甚至提出“不可能时则向金积、灵武、豫旺出动，诱敌深入以利机动”。

同时东北军与中央军齐头并进、相互倚卫，使红军指挥部深感为难。彭德怀多次致电王以哲，说明先是在豫旺堡，后是在同心城，红军几次设伏准备给胡宗南部以重大打击，均为避免与东北军冲突而“一再退让”，东北军却得寸进尺，始终与胡宗南部保持同步，有时甚至超过胡宗南部，使红军无法实施对胡宗南部的作战计划。

彭德怀明确劝告王以哲：还望凡能赞助弟方者，务请委曲设法，胡军本来轻视他军，兄部缓缓前进，彼亦未必见怪。

这时的王以哲正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一方面，东北军与红军妥协的消息早已传遍南京，南京政府在东北军中大量安插耳目，严密监视。稍有不慎即会暴露秘密，招至杀身之祸。王以哲多次向红军说明，“为避耳目计，弟以不后胡军为宜”。另一方面，蒋介石亲赴西安训示，对西北“剿总”军事剿共的部署督促甚严，大量补给源源不断，使东北军没有借口拖延不前，几乎每天都用飞机投送命令逼迫东北军推进。原先没有中央军时，东北军还可以假装前进受阻，如今天上有飞机监视，地上有中央军的速度作比照，又没有拖延的借口可寻，王以哲除非抗命，否则很难不进。为此，张学良也明确表示：过于延缓于各方均不利，总以于协同中不露痕迹为宜。

当然，张学良、王以哲处处小心谨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红军的作战缺少信心。毕竟，刚刚结束长征、实现三大主力会师的红军，困难重重，面对中央军20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和装备，没有必胜的把握。

中共中央非常清楚，要想保持与东北军的合作，就必须给紧紧尾追的中央军一次较大的打击。因此，尽管形势已相当严峻，但他们还

是不断向前线指挥官强调就现在地区歼灭南敌一部，阻止其迅速推进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从开始时希望一举歼灭敌一两个师，到主张集中力量打一个师，最后变成“就是一两个团也好”，其目的也不外就是想要“使敌进得慢些”，争取使红军能够有时间“筹粮休息”。

至15日，毛炳文的第37军正准备西渡黄河，“追剿”红军河西部队，王均的第3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东北军王以哲部继续向豫旺推进，胡宗南的第1军更是恃强骄纵，紧追不舍。

中革军委连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于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而且）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我军应于豫旺、洪德城间各个击破该敌，不击破则不能南进，因敌将继续穷追。”“以洪德城为中心，豫旺、盐池、环县之三角地区最利于我们作战。”并命令“1、4、15、31共四个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二方面军到环县附近休息，准备作打第二仗主力。”

当天，彭德怀在给各部首长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敌胡（宗南）、王（均）、王（以哲）有分三路向东追击可能”，“豫旺县豫旺堡以东山城堡、环县、毛居井地域人烟稀少，土寨亦多，地图与实地区多不符，极有利于我军作战。我们应在上述区域威胁该敌二、三个师。”

据此，红一方面军主力移至豫旺堡东、南、北地区待机；红二方面军移至环县以西地区休整；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移至红城水、萌城、甜水堡和石堂岭地区待机。

就在这时，红军前线指挥部收到了一封足以改变整个战局的电报。

电报是王以哲发来的，称：现东北军又奉令向山城堡、环县一带前进，并限20日前完成任务，若有违误即革职拿办。为配合友方，东北军决于16日进至豫旺堡，然后缓至19日再出发前往山城堡。考虑到胡部一向不按指定路线前进，必紧随红军身后急进，应有作战可能。但王仍顾虑红军不是胡的对手，因而再三叮嘱：“为保存抗日力量，亦似不必作无谓牺牲”。

原来，红军宁夏战役失利，无法得到苏联援助，使张学良深感不安。因为保持双方秘密结盟关系的重要前提，就是红军必须取得苏联

的援助，在与中央军的对抗上取得稳固的地位。本来，红军和东北军准备以甘北、陕北为西北大联合计划的重要根据地，现在却因宁夏战役的失利而将中央军引了进来，使之渐渐地落入到中央军的控制之中。如此一来，东北军将再也无法用瞒天过海的办法来保持与红军的和平合作关系。打也打不得，和也和不得，张学良进退维谷，左右两难。

进入11月，眼见红军一退再退，大有被中央军逼向绝路之势。而红军一旦不能击退中央军，东北军就会陷于孤立，前途同样不容乐观。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不会不明白的。因此在再三思忖之后，张学良、王以哲决定冒险为红军创造一次作战机会。

于是，战场形势发生了剧变：东北军故意放缓行动，使胡宗南孤军暴露在红军的面前。这正是红军苦等多日的战机，绝对不能轻易放过，非打不可。

毛泽东接连致电彭德怀："王均部远在同心城，王以哲已电令其豫旺堡以东地区盘桓数日，蒋介石令胡军向定、盐急进，丁(德隆)、周(祥初)两师为断备所阻不得不向山城堡，我可集中全力放手作战，消灭丁德隆"。

16日，红军各部大踏步后退，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结，进一步吸引胡宗南部孤军深入。对大踏步前进，战士们是乐于接受的；但对大踏步后退，特别是打了胜仗后还要大踏步后退，则更不容易想通。时任红1师第13团政委的魏洪亮回忆道：

敌人向北压，我们向北走。它压得紧，我们走得紧，从固原一带直奔长城方向。敌人得寸进尺，以为我们是溃逃，更是一步压着一步穷追。黄颜色双翅膀的飞机，每天多次出动，贴着我们头顶转。看架势，胡宗南硬是下了决心要撵上我们。我们红一师十三团，是何家堡战斗的主攻部队之一，刚打了胜仗，部队情绪很高。现在胡宗南压着脚板追，同志们心里自然不舒服。行军路上，议论纷纷，不外乎是一句话："敌人跟着屁股，为啥不打？"

……陇东高原，吃水比吃油还困难。山沟里流出的水，又苦又涩，有一股硝磺性，根本不能上口。硬闭着眼喝下去，不是身上发肿，就是拉肚子。当地老百姓，完全靠接雨水生活。这一路上，为了维护群众利益，我们从来没痛痛快快喝一碗水。但愿今天宿营的地方，能多找到些水……

部队忍着干渴，战士舔着干裂的嘴唇，向北，向北。连着又走了

两天，十一月十九日，来到了环县山城堡附近。

胡宗南果然上当了，认为红军已溃不成军，于17日把第1军分成三路，追击红军：左路第1师第1旅李正先部由宁夏灵武县惠安堡东进；中路第1师第2旅詹忠言部向萌城、甜水堡推进；右路第78师丁德隆部由田家塬向山城堡前进；第43师周祥初部、第97师孔令恂部为第二梯队，跟进至豫旺县城及附近地区。

谁知，追击命令刚刚下达，左路第1师第1旅第2团团长、黄埔三期生杨定南就被红军冷枪打死。当时杨定南正带着卫兵站在一个高地上用望远镜察看地形，突然从侧面打来两枪，杨定南当场毙命。

战事未开先折大将。胡宗南心中一惊，暗想此事太不吉利。

果然，没过多久，又传来噩耗。中路第1师第2旅第3团刘超寰部在萌城、甜水堡地区遭遇红四方面军第4军和第31军伏击，损失了600余人。战斗中，团长刘超寰腿部中弹，被打成重伤。

一天之内损失两个团长，胡宗南恼羞成怒，命令第43师接替中路，继续追击红军。

这时，蒋介石认为陕甘苏区东南西三面都已被国军重兵包围，只要占领定远、靖边一线，既可从北面完全封锁苏区，威胁陕北红军根据地中心——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同时又可打通和陕西国军李仙洲、高双成等部的联络，完全解决胡宗南部的给养。于是电令胡宗南率就火速向定边、靖边方向追击；同时严令东北军第67军和骑兵军火速推进，配合胡宗南部行动。

蒋介石并不知道张学良已于红军秘密谈判，达成互不侵犯的约定，并密令第67军军长王以哲不要与红军发生冲突。

就在胡宗南兵分三路追击红军的当天，王以哲电告彭德怀："现东北军又奉令向山城堡、环县一带前进，并限20日前完成任务，若有违误即革职拿办。为配合友方，东北军决于16日进至豫旺堡，然后缓至19日再出发前往山城堡。考虑到胡部一向不按指定路线前进，必紧随红军身后急进，应有作战可能。"

为敷衍蒋介石，王以哲发电报称：追击命令已经下达，东北军各部开始行动。实际上，在此后三天时间内，东北军以蜗牛般的速度行进。

18日，胡宗南部占领惠安堡后，主力向定边、盐池一线推进；右路第78师丁德隆部误以为红军主力已向洪德、环县方向转移，便自甜

水堡南下，孤军向山城堡方向追击，妄图南北夹击红军。

一场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战役悄悄拉开了帷幕。

位于甘肃环县以北洪德城和甜水堡中间地带的山城堡，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镇。别看它不大，却南系关陇、北通河套，历来为兵家相争之要塞。

传说这里曾是西周姜子牙“封神”的地方。明成化年间，戍边名将马文升为防止元朝后裔瓦剌部的侵扰，在这里构筑了一座城堡，取名“山城堡”。

甘东地区水比油还要贵，山沟里的水又苦又涩不能饮用，当地老百姓只能靠窖雨水过活，一窖雨水喝不了几个人。山城堡几十里附近都没有什么饮用水，只有一处泉水可供饮用，胡宗南部必然会全力夺取山城堡，而且这一带平川交汇，山城梁海拔1600多米，四周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土寨很多，地形复杂，便于大部队隐蔽，是一个理想的歼敌战场。

18日，毛泽东同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联名向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各部发布《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

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劳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的困难，并准备连续的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为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

1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我军先打其右路丁师。对周孔似宜让其北进数十里，然后坚决遏阻之，以便我军消灭丁师后，向其周孔之侧后打去。又二方面军主力宜跟进为预备队，其一部则坚决遏阻王军。如何，请依情况决定。

接电后，彭德怀立即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作战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求歼孤立深入的第78师。具体部署如下：

以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在山城堡以南待机，第15军团一部诱其东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东及东北山地；以红四方面军第4军主力于

山城堡东南地区，第31军于山城堡以北地区隐蔽待机；以红28军在红井子一带牵制左路第1师第1旅；以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81师等部在洪德城、环县以西地区，迟滞东北军第67军和骑兵军；以红二方面军主力集结于洪德城以北之水头堡地区策应各部作战，作为总预备队。

20日，山城堡地区上空阴云密布，北风呼啸，天气严寒。红军设伏各部已隐蔽进入山城堡南、东、北地区，构筑工事，封锁消息。当地群众积极配合，实行坚壁清野，封闭了水源，埋藏了粮食，只待敌人自投罗网。

此时，敌左路第1旅进至红井子，遭到红28军的顽强阻击，第97师跟进至大水坑；中路第2旅撤回豫旺县城休整，由第43师接任，向保牛堡前进；右路第78师，师部率一个团进至保牛堡以南，第234旅1个团进至曹家阳台，第232旅1个团进至山城堡地区。



黄埔军校旧址

进入山城堡地区的是第232旅第464团。团长晏俭发现这一带“居民逃避，十室九空，给养柴草，无处购买，而地区辽阔，人烟稀少，道路困难，后方兵站又不能追送，前方部队时虞断炊，实以严重问题也”，尤为严重的是没有水源。晏团长派人多方打探，得知山城堡有一处大泉水，可以供数千人饮用，遂决定就地宿营。

当晚，彭德怀下达了作战命令：红15军团和红31军为右翼队，经

田家庄北端，猛烈攻击敌军左侧背；红一军团为左翼队，从芦家庄、朱家庄、小七沟东南端配合右翼队夹击敌军；红4军以一部占领俞家湾西北端适当阵地，遏止正面敌军前进，其主力与红二方面军主力协同右翼队取道母家庄、刘家口西端向贾家砭、芦沟子、十五里沟攻击；红28军继续在红井子钳制敌军；红6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81师、特务团、教导营等部在胡家洞子、郭家大湾监视东北军。

历史是多么的巧合。国民党军第78师师长丁德隆和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既是湖南同乡又是黄埔同学。

生于1904年的丁德隆，1924年年初与比他小1岁的左权，一同在广州孙中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陆军讲武学校学习。同年11月，二人一起转入黄埔军校，编入第一期第6队。

尽管是同乡加同学，但二人并没有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反而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1925年1月，由第3队学员陈赓引见，左权结识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党的教育下，左权很快就实现了从信仰三民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的转变。1个月后，由陈赓、周逸群介绍，左权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亲自主持了入党仪式。

不久，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率部大举进犯广州。左权任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第2营第6连排长，参加东征战役。因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很快就被提升为副连长、连长。6月，回师广州，参加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9月参加第二次东征。年底赴苏联莫斯科，编入中山大学第7班学习，与邓小平、傅钟、朱瑞、李卓然同班。1927年秋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0年6月，左权奉命与刘伯承、陈云等一起回国。9月由上海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军学校教育长、军长、军政治委员、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长征，参与指挥所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到陕北后参与指挥直罗镇、东征等战役。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率部参加西征战役。

丁德隆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先是留校任校本部副官处少尉见习官，随后在黄埔军校教导团任中尉排长，与左权并肩战斗，参加第二次东征。丁德隆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旋升任上尉连长，随军北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丁德隆积极追随蒋介石反共，自此平步青云。1928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6团团长，并参加了第二

次北伐、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1931年，年仅27岁的丁德隆升任第1师独立旅旅长。1932年7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丁德隆率部在英山、麻埠地区与红军作战。10月9日，红25军军长蔡申熙在湖北黄安河口镇战斗中，正是被丁德隆部击中牺牲的。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丁德隆率旅部和2个团死守广元城，与红军血战四五日，迫使红军撤围而去。作战中，红25师副师长潘幼卿、红88师副师长丁纪才牺牲。1936年4月，丁德隆升任第1军第78师师长，10月晋升为陆军少将。

与红军打了多年仗，丁德隆十分清楚红军的作战能力，但毕竟是王牌军的师长，所部人员齐整、装备精良，难免心里会有轻视之意。所以才会犯兵家大忌，孤军深入山城堡地区。不过，他还是很谨慎的，命令所部宿营后即构筑工事。

丁德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他的老同学左权正在与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研究如何对付他的第78师。

其实，当时在红军内部对究竟打不打这一仗，直到部队展开以后，还是处于“有争议状态”。聂荣臻回忆道：

不主张的理由是我们的部队很疲劳了，敌人侵占山城堡后，又抢修了一些野战工事，不好打。我说，现在我们部队都已经展开了，怎么还考虑打不打呢？好打也要打，不好打也要打。至于说到敌人抢修了一些野战工事，这是部队野战时驻下后的常规，没有听说一个部队驻在一个地方不构筑工事而能安心睡觉的；这种野战工事，都比较简单。我把这个跟左权同志说清楚了，先取得一致的意见，方开始打。

打的决心已定，那么又该如何打呢？

左权认为，与丁德隆这样一位骄傲而又有些谋略的老同学作战，不但是军力和军队素质的较量，更是指挥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能力的较量。要战胜这位老乡、老同学，不能有一点闪失的，必须要谨慎决策，认真对付，周密准备。丁部装备精良，拥有各种火炮和重火器，并有飞机的支援，善于打正规战和阵地战，与其作战死打硬拼是无济于事的，而且只能增大自己的伤亡。只有隐蔽作战企图，秘密接近敌人，突然发起攻击，充分发挥红军的夜战优势，才能取得胜利。为此，他专门把红2师师长杨得志叫到指挥部，详细向他介绍敌我态势，明确军团的作战意图和形成的作战部署。

第232旅第464团在山城堡宿营后，旅长廖昂即按丁德隆的命令修筑工事。但廖昂仍不放心，便派出两个连沿通往洪德的大道侦察。

谁知，这支侦察部队在八里铺以南遭红一军团一部突击，大部被歼，一部慌忙逃回山城堡。

廖昂感觉大事不妙，正准备再派部队去侦察时，山城堡上空突然出现一架飞机，投下一个标有紧急的通讯桶，里面有一份紧急情报："红军大批部队正从东、南、北三面向山城堡运动接近，有包围山城堡的态势，具体人数不明。"

廖昂看后十分震惊，赶忙召集手下人开会，商议对策。会上，廖昂认为山城堡地形对于防守一方极为不利，完全是瓮中之鳖，应立即后撤至曹家阳台山地固守。

但深受胡宗南器重的第464团团长晏俭坚决反对，认为山城堡四周地形恶劣，如果撤退中途被红军伏击，只会败得更惨；倒不如以山城堡修筑好的工事组织防御，同时向附近的友军和空军求援，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和相对坚固的土木工事，固守待援。

廖昂听后，感到晏俭的建议颇有些道理，遂决定在山城堡固守待援。

21日下午，红军冒着大雪对山城堡之敌发起进攻。其中，红15军团和红一军团第2师向山城堡西北之哨马营攻击，断敌后路；红1军团主力由南向北，红31军由北向南，红4军由东南而西北向山城堡进逼。

杨得志率领红2师迅速向山城堡西北方向秘密前进，一个半小时急行军15公里，赶到哨马营，与红15军团一部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守敌发起突然攻击。



山城堡战斗旧址

哨马营位于山城堡西部，一旦失守，第232旅的后退道路就会被切断。因此，廖昂派出2000多人驻守哨马营，并在四周山头上修筑了碉堡工事。然而由于修筑仓促，守军碉堡之间相距很远，兵力部署、火力射向固定，无法互相支援。

身经百战的杨得志很快就找到了守敌的死穴，决定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在集中火力压制敌军的同时，组成爆破小分队，由红5团政委陈雄亲自带领，实施突击，用手榴弹一个个地炸掉敌人的碉堡。激战至黄昏，哨马营大部分阵地已经被红军攻陷。

这时，胡宗南下令各部向山城堡集结，同时命令第232旅死守待援，只要能够坚守一天，援军就会赶到。但廖昂惊惶失措，认为死守肯定全军覆没，决定立即突围，向曹家阳台转移。

时天色已黑，红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趁势出击，从山城堡南、东、北三个方向发起猛烈总攻。于是，红军就和敌人混战在一起。

夜战是红军的拿手好戏。这一晚，天出奇的暗，没有月亮，没有星光，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全凭着感觉，凭着夜间行动的经验，向前摸索运动。聂荣臻回忆道：

这时天已经很黑，伸手不见五指，也分不清敌我，枪也不能打，手榴弹也不能投，上去就摸帽子，摸着是国民党戴的那种帽子就拿手榴弹砸头。

就这样，没几个回合，第232旅便被杀得溃不成军，拼命逃跑。魏洪亮回忆道：

战士们如出山的夜老虎，挥着雪亮的马刀，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猛追，紧追。我们这个团，班、排长以上的干部，绝大部分是老红军战士，他们熟悉夜战，更善于追击，毛主席的“敌退我追”这句话，是人人领会贯通的。班长带一个班，排长带一个排（有的只带一个班），横冲直撞，插到敌人当中去，跑到敌人前头去。

胡宗南的所谓“精锐”，白天打阵地战还有一套，可是，夜战碰上红军这些夜老虎，他们就绵羊也不如了。特别是被冲垮以后，兵离了官，官没了兵，完全变成了散沙一把，乱石一堆。有的士兵知道红军的俘虏政策，跑一阵，跑不动了，干脆找个坑坑蹲起来；有的夹在人群中，吁吁奔跑，不知天南地北。天亮，一看前后全是红军，把枪一丢，一屁股坐下去，不动了。

很快，红军攻入山城堡，并乘胜追击，将敌大部压缩在山城堡西北山谷中。战至22日上午9时，红军全歼被围之敌。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1师第1旅。第1军各部仓皇西撤。

山城堡之战，红军三大主力同心协力，共歼灭国民党军第1军第78师1个多旅，沉重地打击了胡宗南部的嚣张气焰，迫使该敌全线退至大水坑、萌城、甜水堡及其以西地区，从而停止了对陕甘苏区的进攻，壮大了红军的声威，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到了积极作用，为长征画上圆满的句号。

当天，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联合签署，向全军和全苏区人民发出《为各方面军歼胡敌一旅通电》，热烈祝贺红军三个方面军联合作战，取得山城堡战斗的伟大胜利。

23日，左权在前敌指挥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高度评价了

山城堡之役的战略意义及形势发展趋势："东北军、西北军都不愿意打红军，形成了对我们有利的条件。我们只打胡宗南部队，教育了张、杨二将军，这对加快统一战线工作的步伐起了很大作用。不久，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抗日高潮，代替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高潮的局面。"

果然，20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山城堡战斗，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仗、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而载入史册。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刘伯承传编写组：《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徐向前传编写组：《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刘伯承年谱》，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

《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星火燎原全集》，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军事教研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4年

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

侯树栋、范震江、刘波、杜福增：《长征纪实》（上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王树增：《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姚有志、李庆山主编：《红军举世罕见的二十大战役》，白山出版社，2008年

谢远学、郭山文主编：《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谢远学、郭山文主编：《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王健英：《中国红军人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刘秉荣：《中国工农红军全传》(第11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刘秉荣：《红四方面军纪实》（上），知识出版社，2001年

朱秀海：《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

王清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集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廖国良：《中国工农红军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朱滨、刘庆文、延胜编著：《战斗的历程》，海潮出版社，2006年

张宇中、柳泉：《铁流二万五——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

王志军：《中国革命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

朱秀海、魏碧海：《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

魏在田：《天下第一军——红一方面军纵横征战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刘建伟：《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

黎汝清：《湘江之战》，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

李涛：《赤都风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纪实》，长征出版社，2012年

李涛：《湘江血泪——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纪实》，长征出版社，2012年

李涛：《大围追——国民党军围堵中央红军长征揭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

郭德宏、阎景堂：《红军史》，青岛出版社，2006年

张少宏、李阳、李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例》，黄河出版社，2014年

声明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引用了大量的图片资料。由于资料的来源广、头绪众多，在客观上难以逐一进行核实。特在此郑重声明：希望图片资料版权的所有者予以谅解，并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凡认定自己是本书所使用的某张图片资料的版权所有者，请提供可靠的证明材料，并请及时与作者或出版社联系，我们将根据有关规定，合理支付报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地革命战争经典战例/张社卿，李涛编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7

（人民军队历史上100个经典战例.胜道;1）

ISBN 978-7-5034-6172-9

I.①土…　II.①张…②李…　III.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例　IV.①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9212号

责任编辑：张蕊燕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23（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16

印 张：22 字数：233千字

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5.0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众所周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武装斗争中诞生，在浴血奋战中成长，至今已经走过了八十八年的辉煌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挥下，这支军队冲破艰难险阻，纵横山河疆塞，历经磨难，百炼成钢，战胜了一个个强敌，创造了无数个奇迹，书写了一部气势恢宏的英雄史诗。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黄洋界保卫战、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从解放战争时期的苏中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三大战役等，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等等。这一个个经典战例，一个个战争奇观，汇成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弱转强的发展壮大史。

本丛书共分四部，分别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四个历史时期，撷取了具有鲜明代表性的人民军队100个经典战例，其中既有进攻战，防御战；也有围歼战，阻击战，攻坚战，奇袭战，伏击战，遭遇战，追击战，突围战，等等。